

0101127

D16
13:2: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六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6—1927)

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201011270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
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8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黄修荣主编)
ISBN 7-5013-1469-1

I. 共… I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②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671 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五、六卷

书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6~1927)

著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涿州市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38.75

字数 950(千字)

版次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套)

书号 ISBN 7-5013-1469-1/K·261

定价 精装:76元(全二册) 平装:60元(全二册)

D4192/17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王德京

学术指导

-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研
究员)

丛书前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

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编者说明

一、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6卷。本卷汇集了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的部分中文文献资料，包括过去已经由外文译成中文的其他有关文献资料^①。

二、本卷分为四个专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国大革命问题，也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主流派与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争论的一次大爆发。为使内容集中起见，将此次会议的有关文献编为一个专题。此次会议前后的有关文献资料分别编为两个专题。1929年以后的有关回忆和学术讨论资料则作为附录。

三、本卷各个专题及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大体上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原稿中的音译人名按约定俗成的原则作了统一处理，明显的文字错误已作订正；原稿中有着重号的地方，一律改为黑体字。

四、本卷注释除标明为原编者或译者所加外，其余均为本卷编者所加。

^① 译者稿酬由出版社根据有关规定支付。

五、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王德京同志负责选编，姚全果博士参与了有关资料的核校工作。

目 录

编者说明·····	(1)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上）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 季诺维也夫	(1)
(1927年4月14日)	
中国革命问题····· 布哈林	(34)
(1927年4月19日)	
中国革命问题····· 斯大林	(77)
(1927年4月21日)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 托洛茨基	(84)
(1927年5月7日)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	
(1927年5月18日—30日)	
布哈林的报告·····	(112)
讨论·····	(132)
报告人布哈林的结束语·····	(200)
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210)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斯大林	(217)
(1927年5月24日)	
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发言·····	(23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总结（节录）	

.....	布哈林 (239)
(1927年5月)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下)	
时事问题简评(节录)	斯大林 (257)
(1927年7月28日)	
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	布哈林 (279)
(1927年8月18日)	
对反对派的批评意见	斯大林 (290)
(1927年9月27日)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节录)	(293)
(1928年6月)	
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	托洛茨基 (306)
(1928年6月8日)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349)
(1929年12月10日)	
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等 (366)
(1929年12月15日)	
四、附 录	
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	李立三 (384)
(1929年9月)	
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论	罗 易 (395)
(1929年)	
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学术讨论会记录	
.....	(402)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	
错误问题	维经斯基 (474)
(1930年)	

-
- 论陈独秀主义 蔡和森 (500)
(1931年9月10日)
- 托洛茨基给伊罗生的四封信 (525)
(1936、1937年)
- 彭述之为《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导言 (544)
(1976年)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 中国问题的争论（上）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

季诺维也夫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考虑到中国问题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所以我以书面形式来表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由于在讨论中国问题的莫斯科干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进行论战并把实际上我没有的观点强加于我，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我请求把我的这个提纲向全会的与会者散发。因为我将请求全会把这个提纲作为中央即将作出的关于在上海被占领和最近所发生的其他事件以后中国形势的决议的基础。

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5日于莫斯科

* 这个提纲从未正式公诸于世，也没有被译成中文发表过，这里是根据西柏林新方针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中国——被扼杀的革命》一书译出的。本刊摘要发表，仅供参考。——原编者

中国当前所发生的事变，和 1923 年 10 月德国所发生的事变一样，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如果说我们当时把我们党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德国身上的话，那么今天关于中国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何况国际形势对我们来说更复杂和更危险。

中央当时在 1923 年利用德国发生事变的机会，召集了地方党组织（和全会一起）的非常代表会议，通过了专门的提纲，动员了全党，并通过自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召集了国际非常代表大会，等等。

今天同样应该这样做。

.....

5. 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今天在革命中的作用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农民的问题。

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吗？

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清一色的：它的主要类型是旧的商业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大规模地限制这个资产阶级的发展，所以它把在商业中所积累起来的资本都集中投到土地上（而这就是中国农民遭受剥削的封建根子）。

在有些地区，整个耕地面积的 75% 归商人所有。高利贷者放出的债一年要向农民收回高达 120~360%。商业资本完全控制了家庭劳动和手工劳动，首先是控制了在中国起重大作用的纺织工业。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中国的土地主到城市做商人，他们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相结合在一起。这期间中国农村开始内战。农民组织起农会，参加农会的已经有 500 万人，建立起武装的农民自卫队，而且已经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总是组织得很好的大地主和乡绅，包括他们的武装队伍——民团。

所以农村中的内战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毋庸置疑，这一战争

的战线已经很快地扩大，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相当多的阶层（至于道道地地的大地主则不用说了）在这场战争中今天已经站在革命街垒的对立面，聚集在国民党右派的周围。

在城市每天都在进行无产阶级反对当地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有大规模的罢工。在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的头两个半月，那里已有 20 万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仅仅争取到以 13 小时工作制取代 17 小时工作制，以 10 个半小时工作制取代 11 个小时工作制。在广州，罢工斗争几乎发展到爆发总罢工。

在参加工会的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中国的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同大地主相勾结，并且向外国帝国主义妥协，以便同它结成同盟来镇压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

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也无法领导农民，因为它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同大地主有勾结，它通过政治上的联盟同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因此这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农民和日益发展的革命，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成为反革命的因素。

农村的内战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一开始爆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就发生危机。国民革命政府只能是这一内战的参加者，也就是说，要么成为工农和城市贫民的政府（因而是反帝政府），要么成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因而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的政府。

6. 国民党是什么？

国民党是什么？对此必须十分清楚，否则就会犯大错误。

从 1922 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起就开始组织这个党，其表现就是 1924 年 1 月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向左发展，其表现是试图依靠工农和城市贫民，这当时便引起了广州资产阶级起来（商团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这一路线。在工农的帮助

下 1924 年镇压了广州的资产阶级，这导致工农分子纷纷涌入党内。一时间，工农和城市贫民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多数。1926 年 12 月广州的组织计有 15 万名成员，其中大学生 30000，工人 32000，农民 64000。如果除去大约占农民总数 25% 的混在农民旗帜下的乡绅和大地主，激进的左派分子仍然占绝对多数。但是这个左派多数不领导党。领导党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少数，他们依靠国民革命军指挥部，在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下，国民党右派在这个军队所占有的每一个地区内直到今天还掌握着政权。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走得如此之远，他们在这个军队的指挥部的帮助下，不仅掌握着国家机器，而且还驱散国民党的委员会，如果它们不代表纯粹资产阶级的路线的话。（李济深在广州的政变。）按照这种方式，国民党成为一个在右派领导下的不定形的组织。几乎根本不由组织召开会议，对政治行动和国家建设的问题也不进行讨论。

因为不召开会议，所以党员根本没有可能影响当局的政策。这些情况导致国民党的群众在客观上反对掌握着党的领导和局部政府权力的右翼。中国共产党人竭力依靠党的这个大多数，他们必须同大多数左派一起打倒右派，把他们既从党内也从政府中清洗出去。这样的清洗过程同武装工人和农民联系在一起，因为依靠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机关的国民党右派无疑将用武装来抵制左派要掌握政府权力和党的领导的企图。至今工人岗哨不是没有武装就是被当局解除武装（广州）。农民协会主要以竹竿来武装，他们的武装需要时间。因此，在革命被武装得更好以前，上面的策略是必要的。今天，当依靠唐生智来反对蒋介石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这些策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唐生智也不会解决使政府向左发展的问题，因为这位将军比蒋介石更反动。他是大地主，与日本帝国主义保持着联系，但是 1926 年却讨好国民党。

国民党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学说。列宁评价孙文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的民粹主义。而实际上孙文主义“就其纯粹

形式来说”，是特殊的、变了样的、适应中国条件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列宁称孙中山的党为自由主义政党。孙文主义是中国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加立宪民主主义。与孟什维克相反，列宁在俄国民粹派身上不仅看到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而且看到他们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核心，也就是就民粹主义是俄国逐渐成熟的土地革命的表现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动内容，而且也要看到它的进步的和民主主义的特点，孙文主义首先表示追求中国的民族统一，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追求农民革命。这一国民运动日益变成农民运动。但是，在孙文主义中知识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今天的国民党中他们形成强大的和有影响的一翼，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孙中山于1894年建立“兴中会”，这个党几乎只依靠资产阶级。1905年孙中山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同盟会”，这个党已经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农民。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前不久，孙中山为今天的国民革命党，即国民党奠定了基础。他把自由资产阶级、知识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家庭手工业者的广大阶层吸收进来，同时试图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

虽然孙中山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被剥削群众的真诚朋友，但是他在自己的学说中仍然只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孙中山长期来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热烈崇拜者，早先的美国总统林肯是他的理想，他声称，在夏威夷岛上由美国帝国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天堂。

农民问题在孙中山的学说中也非常缺乏研究。

孙中山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和在日益成长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下开始越来越注意工人运动，并且确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孙文主义的三个主要口号众所周知，就是：“1. 民族主义，2.

民主主义,3. 国家社会主义。”^①集中起来,它们形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很清楚,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不可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基础。人们可以和应当把孙中山当作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来纪念,他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伟大贡献。人们可以和应当把孙中山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定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盟者,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孙文主义,而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孙文主义?问题就是这样。

作为政治组织的国民党是什么?国民政府是什么?国民军是什么?

人们常说,今天的国民军就是红军。但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既不应当把它同我们革命的红色程度相比,也不能同红军相比,因为它既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部队,像我们的红色近卫军部队那样,也不是一支由工人领导的和从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军,像我们的红军的情况那样。国民军是非常不纯的。它的广州的核心被加入它的组织得很坏的部队所扩充。在今天组成的40支部队中有35支是在战斗中转向南方这一面的。这些军队是由雇佣兵组成,志愿兵占很小比例。但是,普遍的形势使他们成为一支很好的革命的和作好战斗准备的农民军。元帅权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它恰恰是不可靠的。国民军的指挥员大都不仅不熟悉工人,而且也不熟悉农民运动,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久前还站在北方那一面。共产党人在军队中为数很少。总司令蒋介石是右派,即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已经一再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是会背叛中国革

^① 即民生主义。——译者注

命的人。他的最近的声明(1927年3月)被赞美成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胜利,其实是一个外交步骤。这就像克伦斯基在一段时间内利用声明来对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一样(当时这个中央委员会还企图保持中派的立场),所不同的是,蒋介石现在占有的实权比克伦斯基当时占有的要多。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进行的第一次政变并不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追求功名的斗争”(如政治庸人所说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蒋介石的胜利导致广东反动派的胜利,反革命武装部队(所谓民团)加紧摧毁农民协会和解除农民武装。旧官吏又回到政府里。工人受到重大的打击。

国民政府直到最近都是将军们手中的工具。只有群众的压力才能缓和政府的右倾和使比较左的分子参加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是费边分子一类的人)。国民政府往往公开反对工农运动:在许多地方镇压工人罢工和扼杀农民运动,它阻止运动的发展和制止运动,采取瓦解和逮捕的手段并竭力把农民运动说成是土匪运动,它支持罢工破坏者组织反对工人。它拒绝农民的最合理的和最基本的要求。它既不认真地从“上面”给农民什么东西,同时也不允许这个运动从下面发展起来。直到1925年大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一直起主导作用。

广州直到不久前还是国民运动的主要据点。这里长期来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因此,了解国民政府对广州工人运动的态度是特别重要的。广州工人的实际工资自1917年以来下降了约50%。广州工人的平均工资在每月3元和10元之间。只有少数熟练的产业工人(他们组成工人贵族,占广州20万工人中的极小一部分)每月在15元和27元之间。正是这群工人贵族组成机械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不是加入阶级的工会,而是追随国民党右派。

国民政府在“国内和平”的口号下要求工人“在国民革命军前线的后方”不举行罢工,而且一切经济冲突要由政府的调解委

员会来裁决。工人乐意这样做；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调解总是有利于企业主。撇开公开站在资本家一边的场合不谈，政府的劳工局常常作出判决工人饿死的调解决定。国民党内有“劳工部”，此外还有“商人部”。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商人部施加压力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把国民党的官方机关拉到自己一边。孙中山在世时就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资产阶级借口对付所谓的“红色恐怖”，组织了他们的武装打手。最近甚至发生企业主私刑拷打工人，至于把工人从企业中扔到大街上去，就更不用说了。广州国民政府对于企业主的这些英雄行为不仅常常视而不见，而且还鼓励建立黄色工人组织，由以前转到企业主一边的工人领袖来领导。政府反对武装工人。1926年8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命令解除工人武装、逮捕工人和将那些拿起武器反对企业主的雇佣打手的人送交军事法庭。1926年12月，在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出发去武汉以后就已经公布类似的命令，并且工人被为此目的而动员起来的部队解除武装。

在政府从广州出发以后，“革命的”将军李济深就解散了“左派”影响“太大”的国民党广州委员会，并且实际上建立了右派委员会。同时在5万名国民党党员中只留下13000名党员，工人退出了。但是在这个委员会中还有共产党人。这位“革命的将军”还隆重接待来到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但是共产党人参加接待时揭露了李济深这位广州的真正主人的这一切英雄行为。

国民政府的警察局继续袒护罢工破坏者联盟反对真正的工会，在警察局的庇护下企业主一再镇压罢工。1926年10月第3军第25团的一部分武装士兵在夜晚侵入火车车辆修理厂并开始射击工人，造成伤亡。这起“事件”的发生与铁路上的一起和平的经济冲突有关联，在这一冲突中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广州发生的事情，也在国民军占领的整个地区发生。省政府遵循广州的中央政府行事。1926年6月在广西省的梧州发生了枪杀工人和逮捕共产党人的事件。借口是：罢工工人扰乱北伐的后方。有3个参加了香港罢工的工人遭到枪杀。

农民组织也遭到同样的情况。在田阳县一部分农民武装被残酷地摧毁。

在湖北省，1926年10月和11月，一系列农民组织遭到解散。例如在……^①，在驱散工人和农民的示威游行时有10人受了致命的重伤。在湖南，在解散一个农民组织时，这个组织的一位领袖被绞死。国民党右派实际上领导着政府的重要机关和军队，并利用它们来摧毁工农运动。地区的首脑和军队的司令官在许多地方联合反对工人和农民，而国民党的法庭和报刊却熟视无睹。

政府官方要求，纲领中不要掺入任何政治。农民组织被说成是“匪帮”。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可以读到如下的说明：1925年《人权报》写道：“眼前的祸害，我们认为是匪帮和与他们有关系的农民组织。这是最大的祸害，我们非常希望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消灭他们。”

《民国日报》在1926年7月17日的社论中写道：“农民组织总是只造成不安宁，它扰乱了农村的和平。”《国华报》也这样攻击农民组织。

还在孙中山在世时就已“决定”地租支付额降低25%。但是始终没有执行，因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整个机关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通过资产阶级又与大地主有联系。

最近，国民政府对工人推行了不可容忍的政策。1927年1月5日，广州政府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一致，公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它禁止工人在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设置罢工纠察岗，

^① 此处字迹不清。——译者注

并且拟定了对几乎所有行业的工人都适用的强制仲裁程序。不过，在强制仲裁审理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的代表多次直接作出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工人不利的决定，对商人有利而对商人的雇员不利的决定。众所周知，有一系列这样的情况：蒋介石的人把对他不合适的工人集会解散（在汉口），等等。工会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被认可，广州和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其他地方的工人组织直到今天还被看作是“非法组织”。

革命不仅没有给工人阶级保证 8 小时工作制，而且没有保证工人阶级每周休息 1 天，或者保证工人阶级具有劳动保护或广泛的社会立法权。师傅和厂主对苦力和工人仍然可以施行体罚。中国产业工人的境况甚至在今天仍然非常贫穷，只是比苦力的境况稍好一些。

工人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

国民党表面上具有 30 万党员。政府官员由于“职务上的理由”都加入党。他们的组织极度不明确。没有一个人能说明，党的基层单位是什么，或者党在哪里开始和在哪里终结。普通党员对他们领袖的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小的，但是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同时在政治上非常不可靠。

实际上蒋介石和其他将军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

在最近一次国民党全会上进行的中央委员会的改组也许会带来某些改进。但事实是，除了政治局以外又建立了一个具有非常广泛的但没有明确规定的全权的“特别委员会”。

在社会问题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常推行的政策令人想起旧俄国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政府没有保证工人和农民在经济上得到实际改善。国民党的政治立法同样也是有限的并浸透着资产阶级的原则。

可惜我们共产主义的报刊，特别是我们党的报刊至今仍在美化国民党的真正本质。国民党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还被说成是

“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府”或者是“四个阶级的联盟”。

似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再适用，似乎在那里会有一个“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政府！我们报刊的普通读者必定得到这样的印象：国民党人“差不多”就是共产党人（他们只是在“细节”上和我们不同），中国眼下几乎已经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关于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的政变（当时俄国共产党人遭到逮捕），我们的报刊连一个字也没有提，俄国的工人，同样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都对这一事件毫无所知。

不久前，在1927年3月，才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关于国民党内发生的事情揭开了一点幕布。

在编辑部的这篇文章中我们读到：

“国民政府已经由最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明显右倾的中央所控制。中国南方各省的情况更是这样……高级国务活动家、中国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以及诸如此类都是国民党的右翼。根据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联系来看，国民党右派人士是注定要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拒绝有效的社会改革和反对革命的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的。”（《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3月22日第12期第554页）

在文章中我们读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感到严重不安”并且公布了事实上反对罢工权的法律。

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社论说明，“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患缺乏革命的工农血液的病，中国党必须为输入这样的血液作出贡献，那时情况就会根本改变”（同上，第557页），那么这样一种独特的诊断和奇怪的治疗“贫血”的方法就证明，《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者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国民军最近取得的胜利大大扩大了国民党的地区，它因此添加了汉口和上海这两个工人人口很多的中心。在有利的形势下这会导致国民党左派的加强。但是，就是现在我们同时也已经能看

到右翼的加强。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无疑得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完全赞同，修正了对国民党的关系，转到了他们这一边，竭力要加入国民党，目的在于“到达组织的头部，以便砍掉该组织的脑袋”。

资产阶级涌进了国民党的行列，此外国民党还从涌进革命军的新部队的指挥员中得到了新的成员。这两股源泉导致右翼的大大增强。“右派虽然不掌握群众，但通过同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的紧密联系而得到加强”（引自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海勒的文章）。

“目前，运动中的左翼力量比右翼力量大。但是不应当忽视以下事实：在广州军队获胜的过程中，许多同路人加入了该军，这些人很容易被用来反对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左翼不是继续守卫革命的利益的话。”——拉费斯这样写道（《中国的革命》第131页）。拉费斯本人同马尔托夫一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特别明显地倒向孟什维主义。

如果把今天的国民党同工农苏维埃相比，甚至只同1917年2月时期的工农苏维埃相比，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同俄国共产党人当时参加苏维埃相比，那就会犯重大错误。第一，国民党只有30万党员（在4亿人口中），而二月苏维埃却代表千百万人。第二，布尔什维克在加入二月苏维埃时保持了自己党的完全的独立性，而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第三，如果说国民党与苏维埃是同一回事，那么为什么反对中国苏维埃的口号？

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大会上说，国民党是党和苏维埃的杂交体。

斯大林同志在同一大会上说，“国民党是这样一类革命的议会，有它的主席团即中央委员会”，并且他补充道：“蒋介石比策烈铁里和克伦斯基多了一个脑袋，因为他根据情况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者们的战争。”

后者同前者一样错误!

如果说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议会,那么在议会中各党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的议会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要“通过俄国来说明情况”,那么不如把国民党同旧的社会民主党(加上一部分立宪民主党“左派”)相比,当时这个党还是进步的。

但是,把今天的国民党同1920年基马尔的党相比,倒是恰当的。基马尔党当时尽力装成革命的、“几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向工人卖俏、把农民群众抓住、答应同共产党人合作、称他们的政府为“人民代表委员会”等等。但是在它等待到适当时刻来到时,它便把共产党人驱入地下、砍断了他们的一些领袖的脖子(谋杀了苏布基等等同志)并且成立了资产阶级国民政府,实行保守的国内政策。

当然,不能把土耳其完全同中国相比。首先,在中国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它能起很大的革命的作用。这一重大差别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有在成为独立的力量,不再是国民党的追随者的时候,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那时国民党的命运——在我们这方面的策略正确的情况下——就会不同于基马尔党的命运了。在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中有许多真诚的主张同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代表。如果策略比较好,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就会同右派彻底决裂,并因此能建立一个能起巨大的革命作用的群众性的组织。但是,基马尔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来说不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中国将走土耳其和基马尔的道路还是走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道路?帝国主义者这样问自己(见1927年3月6日《京华时报》)。对于世界革命来说,特别是对于苏联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的这样一种发展:国民党右翼获得胜利和这个“基马

尔主义的”右翼——在蒋介石或别的任何人的领导下——同美国帝国主义或者英国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这样一种结果比占领上海以前的状况会更坏。这个结果会使国际帝国主义得以“和平地”占领中国市场，会促使巩固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会解放英国帝国主义的手脚和使国际帝国主义可能发动反对苏联的战役的时刻推近。无论如何必须认识到有产生这样一种结果的危险。

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完全有义务：**把今天的国民党的全部真相告诉自己人和整个工人阶级，使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清楚了这整个事情，不要作任何这样的尝试：用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实际上是由阶级斗争产生的问题。**

为了革命的利益，有必要利用一个将军去反对另一个将军。但是，这种玩弄各个将军之间的对立和竞争的把戏不能代替阶级路线。我们按照群众意愿确定方向。正如社会革命党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革命的某一时刻具有重大意义一样，国民党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也具有不小的意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她既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右派也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左派。**

7.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比较年轻。随着上海工人4个月的政治罢工(1925年6月到10月)和香港工人将近1年半的抵制罢工(从1925年6月起)，中国共产党才开始发展起来，成员增加到15000名(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增加得大概同样多)。而中国的工会大约有150万工人，年轻的共产党对它有强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协会也有一定影响，农民协会由于有着相当有利的条件和正确的政策，比以往发展得更迅速。

中国共产党是以非常含糊不清的条件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一个成分。她不能批评孙中山主义这个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学

说。

如塔斯社 1927 年 3 月 23 日的电讯报道的(这一电讯没有在我们报刊上发表),国民党全会于 1927 年 3 月 13 日作出的决议中有一条是:“在共产党的机关报上不应当发表干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任何文章。”这种说法实际上意味着禁止中国共产党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什么时候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义务。

各种共产主义组织实际上是很不定形的。在人民看来,共产党人要对国民党的一切行为,包括反对工农的行为,负共同责任,因为他们对国民党不作任何尖锐批评。在向群众宣传鼓动时,共产党人根本不以或者几乎不以人民的名义,不以本党的名义,而总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出现。这样,在联系群众时,常常丧失党的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尽管发生的事件规模巨大,共产党却没有自己的日报,或者根本没有影响广泛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刊,虽然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已经有着部长的席位。没有共产党的日报实际上就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中心。总之,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属品。以下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即在共产党内有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附属性,使党不能履行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极其曲折。她的基本方针既不明确也不稳定。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全体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减轻这一切痛苦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也许可以说,这是代表人民的而不是代表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

它(资产阶级)不懂得,像工人组织和罢工中表现出的这样

一种最小程度的阶级斗争决不会削弱反帝和反军阀力量的战斗力。它尤其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取决于它与无产阶级共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战争的结果，而决不是取决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种观点决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这完全是孟什维主义的观点。共产党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失败是肯定的。但是，在看到极右倾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也存在着极左的情绪。例如发表了以下的声明：“1926年3月20日，国民党死了，从5月15日起，她腐烂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手去支撑这具腐烂的尸体呢？”（《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409页）。这个声明当然是错误的。国民党不可能作为共产主义的组织死亡，因为它从来不是这样的组织。它作为具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核心的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是决不会死亡的。这种极左情绪只能说是对共产党的错误政治行为所导致的极右的、几乎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政策的反动。

首先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彻底贯彻国民党〔应为共产国际——本书编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赞同的列宁的提纲，因为只有这个提纲能提供保证获得胜利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军占据的地区合法化。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甚至在那里也是非法的，在那里军队的长官一有机会就镇压共产党人。必须创办共产党的群众报刊。共产党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向群众说话。

8.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是根本违背在国民党〔应为共产国际——本书编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列宁的提纲的。这

一方方针的支持者显然把发展路线想像如下：我们先是推进国民军^①的完全胜利，即推进中国的统一，然后我们便开始使共产党与国民党分离。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联合资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无产阶级再开始作为一支有着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独立阶级力量出现。这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主义观点。

一种民族统一完全可以具有不同于另一种民族统一的方式。众所周知，1911年革命后中国统一在袁世凯（中国的斯托雷平和维特的杂交种）底下。后来，中国统一在张作霖的暂时联盟者吴佩孚（直隶时期）底下。大家知道，1911年革命初期，中国统一在孙中山底下的时期十分短暂，因为那时还没有可以保证统一的真正的阶级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在争取统一的斗争中，必须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如果统一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实现（尽管它很民主），那么无产阶级进行未来斗争的前提条件就会极端恶化。得到加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会迫使无产阶级接受比现在更为不利的条件。无产阶级必须为中国的民族统一事业服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公式。中国的民族统一必须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这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式。因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世界就不能解放自己。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不会被“万里长城”隔开。但是，只有当无产阶级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占据不断加强的领导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发展和最终长入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坚持认为：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建立临时的联合，甚至联盟，但是不要同它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共产国

^① 此处应是指国民革命军。——编者注

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30页)

再则,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再是处于萌芽状态。中国的内部矛盾成熟得非常迅速,就像在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中的情况一样。

共产党人能够 and 必须支持国民军^①和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能够 and 必须在一定的前提下参加国民政府。列宁赞同布尔什维克加入临时革命政府,但是他不言而喻反对加入李沃夫公爵或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

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在以下条件下参加国民政府:

1.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她完全有自由进行鼓动、宣传、组织工作、武装工人等等。

2. 共产党完全有自由向群众批评国民党的不彻底的措施和错误。

3. 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国际要非常严格地监督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

4. 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且在群众面前捍卫这个口号,如果党认为这是正确的话。

5. 政府的立场应当是:“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列宁)

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并且可能直接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到毁灭。如果我们在国民政府中有几个部长,但是,没有单独的日报,那么这种状况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更加危险,并且使人怀疑,共产党的部长们能否实现他们的责任重大的任务。人们肯定会说,共产党的部长参加国民政府将损害党的名声,如果党仍然是国民党的附属

① 此处应是指国民革命军。——编者注

物的话。

我们党第一次从《共产国际》(1927年3月)的社论中知道,“关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向全党提出了如下任务:

1. 从内部联盟的政策过渡到联合的政策;2. 制定明确的独立的政治路线;3. 实现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国民党的基础;4. 要使国民党不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而是使它的组织采取俱乐部的形式。”(1927年3月22日;第12期第555页)

其次还报道说,中国共产党认为绝对有必要在国民党中组织左翼。《共产国际》的社论认为,“所有这一切决议都需要修正。”然而这些决议的基本倾向是绝对正确的。需要“修正”的倒不如说是允许中国共产党**仍然成为国民党的附属物**的那条路线。

一般来说,是否允许共产党加入非共产主义组织?在有的情况下这是允许的,而且形势的特点甚至要求这样做。例如英国工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英国共产党人必须加入工党。列宁根据形势的特点说明了这种必要性。他说:

“必须指出,英国工党的情况非常特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党,确切一点说,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党。它是由工会组织的全体会员组成的,现在总共有400来万党员,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有相当的自由。”列宁当时说,英国共产党员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写文章说工党的某某领袖是叛徒,说这些旧领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既然共产党员有这种自由……,那就必须加入工党。”(《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27—229页)

此外,不应当忽视以下事实:列宁不主张英国共产党人在英国已经进行革命的时候加入工党,而是主张在英国相对“和平”时期加入工党。英国最近发生的总罢工的例子证明,工党和共产党

人之间的关系当运动向前发展时就立即尖锐起来了。

而中国正经历着革命的高涨时期。运动日益发展，工人阶级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部分之间的矛盾同样日益发展。

当然，不能把国民党简单地比作英国工党。一方面，在英国工党中工人占优势。在那里涉及的是同我们自己阶级的成员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但我们仍然不应忘记列宁关于英国工党所说的话：

“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标准来看，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动的最坏的反革命分子。”（《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25页）

英国工党的领袖们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常常甚至是“工人”帝国主义者。

另一方面，国民党左派，如果它与共产党人合作，目前在客观上起着反帝因素的作用。当然，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国民党中工人成分不占优势。资产阶级成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中至今一直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些成分明天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国民党的右派领袖已经就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

必须考虑到，国民党就整体来说只有在一定时刻才会进行反帝斗争。国民党要求废除中国被迫接受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取消最显著的关税不自主的形式，但仅此而已。关于关税不自主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令人想起，例如英国认为可以满足印度的需要，以便解除一部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必须明确承认，国民党的中央和右翼热衷于同美国、日本甚至英国妥协，它企图获得

它们的贷款，等等。完全有可能，国民党领导核心的暂时的反帝斗争立即会让位于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我们也不应当对国民党的“左翼”领袖，首先是汪精卫抱任何幻想，在决定性时刻，他们表明自己也不比英国总委员会的“左翼”领袖好多少。但是，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国民党左派的人士引上革命的道路，而不是变成左派的尾巴，因为左派本身就是右派的尾巴。

原则上问题必须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和必须加入国民党，**但是只有在列宁允许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前提下才可加入**。到目前为止，情况不是这样。

在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和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但为的只是积聚力量、立即将群众引到他们的旗帜下、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并竭力将他们赶出去和消灭掉。我们的口号暂时并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地和绝对地对国民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

中国共产党必须公开宣告，她不再承担使她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受到丝毫限制的任何义务；她宣布她以前承担的这种义务现在无效。中国共产党必须发表宣言和散发传单，向人民说明这一宣告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创办一份日报。

如果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么这不仅会导致毫无批评地颂扬国民党、掩饰国民党中的阶级斗争、隐瞒枪杀工农和使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实，而且还会导致共产国际内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

一些法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3月23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共产党的领袖塞马德·蒙穆索、加香和其他人讲了话，向国民党发了电报：

“巴黎工人祝贺中国革命党进驻上海。在巴黎公社56年以后

和俄国公社 10 年以后,中国公社标志着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显然,有人对法国共产党工人说,现在的国民党是中国公社!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于 1927 年 3 月 17 日刊登了蒋介石的像片并称他是中国革命工人的领袖,而不告诉德国人蒋介石实际上是什么人。

《红旗》于 1927 年 3 月 18 日报道:“在红色工会国际的行列中有 300 万中国工人。”

我们党的一份最大的报纸《巴库工人》这样来说明我们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她建议国民政府“在国际政策方面暂时推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政策”(《巴库工人》1927 年 4 月 5 日)。

《巴库工人》忘了:“布列斯特政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和在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党例如在克伦斯基政府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建议推行布列斯特政策。谢德曼和哈赛政府在推翻威廉之后也推行“布列斯特政策”,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是导致资产阶级的胜利。如果社会民主党实施布列斯特政策,那么这就意味着凡尔赛和约,同时意味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如果蒋介石推行布列斯特政策,那就意味着同英美帝国主义联盟。《巴库工人》犯了一个“小”错误:把国民党政府混同于无产阶级政府。如果容忍这样的“小”错误,那么国民党就可以尽情地镇压工人罢工,并且它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公社”。国民党的右派和温和派完全可以不管共产党而同英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然而,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使错误达到了顶点,他签署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4 月 5 日的共同声明,声明说:

“即使我们的基本观点在细节上不一致,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镇压工人罢工、解除工人武装、枪杀工农都只是“细节”!

这一号召否定了以下谣传:“共产党在筹备工人政府、共产党

要用暴力占领租界和推翻国民党。”似乎由工人占领帝国主义租界和推翻国民党政府是一回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汉口工人占领租界，但这决不意味着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号召中不是使国民党的革命分子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水平，而是自己降到了国民党领袖的思想水平。这样一种问题的提法隐藏着极大的错误。

同时这个号召表示这种思想：共产党暂时在国民党内合作的形式应当代之以**两党的“联盟”**。一部分共产党人明显坚持这种思想。

我们决不认为，国民党应当变成一个“工人和农民党”和共产党应当被代替和吞并。认为我们在东方不需要工人党，而需要“工人和农民党”这种思想完全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从来没有任何“工人和农民党”能拥护工人的事业。“工人和农民党”的理想曾由诺阿·约尔丹尼亚实现，但是人人都知道，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国民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今天**只要它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就支持它。特殊的情况甚至允许我们在国民党内合作，**只要我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得到保证**。但是，如果国民党领袖把事情弄到中国共产党不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同国民党合作，也就是说，如果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排除出去，**那么共产党也不应该害怕这一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也要推行同国民党联盟的政策，只要后者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一刻也不应当忽视工人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

但是，完全有可能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如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正确——十分强大，足以抵制右派并使共产党能够在上述前提条件下留在国民党内。但是，如果共产党人不立即公开谈论自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完全独立的问题，如果共产党人放弃支援国民党左翼人士建立自己的派别去反对右派，那么国

民党右派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获胜。这个胜利会对整个中国革命产生致命的后果，一般来说会给世界革命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和把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对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否起领导作用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如果**小资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能向左摆的话，无产阶级是可以起领导作用的，而推动小资产阶级向左摆的不仅有我们的宣传，还有一系列的客观因素：经济因素、财政因素（战争负担）、军事因素、政治因素等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21卷第382页）列宁在1915年这样写道。

只有采取正确的独立的阶级政策，中国共产党才能促使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转向左面，即转向无产阶级方面。

9. 论苏维埃的口号

今天，在占领上海以后，今天，当国民政府支配着拥有2亿人口和广大的工人中心地区，在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唤起了农民运动以后，可以和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口号是建立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苏维埃、其中也必须有国民军士兵的特别代表。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允许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见前面所述）已经谈到有必要在东方也宣传关于苏维埃的思想，并一有机会就成立苏维埃。在中国这一时刻已经来到。只有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才能真正保证防止中国民族运动按照“基马尔主义”发展。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和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建立苏维埃才会给整个运动以必要的推动力量，因为这使民族运动注入社会的内容。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为工人阶级领导整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一个较好的形式。只有苏维埃才能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和开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因为直到今天实际上还是旧官吏在进行管理。

今天苏维埃的行动纲领看来可能大致如下：

1. 土地国有化(在孙中山的第一个纲领中也有这个要求。对这一要求必须真正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解释)。

2. 进行真正的土地革命(不只是改良),完成由此产生的一切任务:完全免除贫农和小农支付地租和他们负的债务,消灭一切封建主义残余,等等(国民党的最近纲领完全没有明确规定:(1)固定税率;(2)取消特别税;(3)改组农村的管理机构;(4)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5)解散一切针对农民的武装部门;(6)禁止高利贷;(7)确定支付地租的最大限额,等等,等等。总之,这不是土地革命的纲领)。

3. 铁路国有化。

4. 实行工人8小时工作制(以及一系列其他劳动法)。

5. 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讨论外债问题。

6. 没收中国的工厂和企业(大中企业),中国的银行收归国有,如果银行的所有者反对国民革命。

7. 应当预计到这样的前景:没收外国工厂和企业、租界以及大农场和其他地产。同意联盟的外国人允许其大量购买,参加干涉的则没收。

8. 建立正规的和真正的红军,即工农军队,由工人领导而不是由军官野心家们领导(必须把后者吸引过来,根据俄国革命最初几年的经验,必须利用他们)。

9. 武装工人。

10. 解放妇女。

11. 制定一系列法律来消灭封建主义残余。

不言而喻,中国的苏维埃必须适应中国的情况,即必须使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情况”(列宁)。在今天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人民,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可以和必须理解中国苏维埃。苏维埃在今天还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而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

民的专政。

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以下口号作为农民的最近的口号：

1. 取消地租或至少立即减少 50%。
2. 取消非法的税收和强征。
3. 打倒土豪！
4. 解除民团武装。
5. 武装农民。

使革命在组织上武装起来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把苏维埃建成革命的真正中心（苏维埃对于国民党来说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积极活动的场所，就像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积极活动的场所一样）。同情国民党的人民群众也会支持建立苏维埃的观点，只要我们推行正确的政策。凡是在我们能够占领城市管理部门的地方，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武装工人并使城市管理部门成为革命运动的支撑点，从而加强反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运动。

显然，如果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也必然要实行“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最初对小资产阶级甚至还要作更大的让步。

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攻势，公开和广泛宣传苏维埃和上述纲领，而不让国民党有任何干扰。这将对国民党的左翼分子的一次真正的政治考验。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真正获得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国的工农运动将大大加强，将形成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将保证目前的斗争最终不会演变成没有任何深刻的社会内容的、纯粹是南北双方的斗争。

如果放弃努力，不把运动提到一个更高阶段，那么就不能结束英国和美国的屠杀。只有在一件事情均由国民党右派来掌管，即由资产阶级来掌管时，帝国主义者才会感到满意，因为资产阶级明天就会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只有帮助更多的工农群众站立起来，把他们武装起来，建立起苏维埃，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苏维埃能够把亿万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在“胜利或死亡”的口号下抵抗

帝国主义。

10. 中国革命的对外和对内立场

中国革命成了推动国际帝国主义的焦点。这里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暂时是小规模的)聚集的地方。在这里逐渐显示出有可能结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统一战线,虽然这条统一战线还远没有得到巩固。南京的屠杀证明,国际帝国主义一旦发现中国革命取得了初步的巨大胜利,它会变得如何的残暴。

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使帝国主义有这样的危险:

1. 直接丧失几十个亿(租界等等);
2. 正是在市场问题重新成为决定性的问题时丧失市场;
3. 革命的“传染病”扩散到印度、印度支那等地去。

这也说明,为什么一向最懂得用表面的友好来掩盖对中国革命的敌意的美国帝国主义放弃等待的立场。

当前在中国的港口,在上海租界等地存在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困难局面。但是,毫无疑问,只要中国革命方面实行正确的和果断的政策,帝国主义的暴行只会激发起中国的更大的力量,导致帝国主义军队的“可靠”部分的瓦解,并引起欧洲和美国工人的愤怒。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帝国主义者建立统一阵线。总之,工人阶级的领导只能在这种紧迫的气氛中保证获得成功。

列宁在1922年4月写道:

“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7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1905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迫近着。在1905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312—313页)

如果说,列宁在1922年就认为,中国“在咆哮着”,那么他在今天,在1927年对此又会说些什么呢?

中国革命只有在它使其他国家卷入革命,只有在它使它们卷入“国际革命”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

中国革命只有在转向为争取苏维埃而斗争的时候,它才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限度的同情和支持。“拥护中国苏维埃”——这一号召比“拥护国民党”这个口号更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理解和支持。

动摇不定和企图把国民党右派推向前台去充当国际帝国主义“可接受的”和可能的“中介人”等等也是十分严重的——这一切做法只会毁坏事业。

蒋介石计划进行的整个北伐并不是革命讨伐反革命,而不过是要改善被孤立的广州的状况的一个战略部署。强大的工农运动使这一讨伐成为至少是部分地成为革命讨伐反革命,这并不是蒋介石的功劳。群众本身,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给国民斗争赋予了社会的、革命的内容,违背了国民党领导者的意愿,无论如何是违背了国民党右派的意愿。随同北伐发生的事件、群众的高涨情绪、他们力量的爆发,都表明:在中国有着如此众多的导火线,中国革命隐藏着如此无穷尽的力量泉源,加深和大大发展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是多么巨大。

中国革命的外部 and 内部形势是彼此紧密相联的。

帝国主义者现在在两条战线上充实他们的策略。

一方面,他们准备发动一场直接对付国民革命运动的战争,并且已经局部开始进行了。在中国的全部港口集中着海军舰队。战略据点被占领。部队加强了。轰炸南京不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流血的“开始”,接着就会发生一场闻所未闻的血腥屠杀。在外国人居民点进行着狂热的军事准备,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广州也是如

此。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在最近的将来放下假面具，外国帝国主义将对中国的革命进行惩罚性的征讨并毫无顾虑地企图指定张作霖或它的其他直接代理人为“中国的主人”。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宁愿同国民党的“温和派”(不只是上述右派)分子达成协议，并且为了这一目的不仅利用收买和“爱抚”手段，而且也使用威胁、最后通牒等等手段。美国、日本和法国无疑宁愿同“温和派”达成协议，分裂国民运动和实行妥协，以至稍稍改变剥削中国的形式而不是改变剥削的实质。这条途径最后也会被英国帝国主义的“最负责的”人士所喜爱。派往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到得太迟，以致没有帮上孙传芳的忙，但是他们现在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必须看到这两个危险。克服它们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必须唤起全体工人和亿万农民，必须赋予国民运动以上述社会性质，不要害怕“吓退”资产阶级，坚决走建立苏维埃的道路，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和宣布8小时工作制，立即利用国家和有钱人给城乡的贫苦居民以实际的援助和给整个运动以尽可能强大的推动力，因为人们开始突破资产阶级的框框。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营垒内的右派和“温和派”不能为害。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革命。只有一场这样的雪崩才能阻止外国帝国主义者。如果想做得“不吓退”中国资产阶级，使国民党的右派和温和派领袖“不反感”，“不刺激”外国资产阶级，那么这就会毁了一切。只要帝国主义者注意到这样一些努力活动，他们就会变得极其厚颜无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部分就会叛变。

在我们尽一切努力来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战争危险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帮助中国革命坚定地向前迈进，并提到更高的阶段，不害怕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反动阵营。

有一种论据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背叛”工人，因为它“需要工人来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这种论据是孟什维主义的

论据。孟什维克总是说,俄国资产阶级虽然很想背叛工人,但是“这不可能”,因为它“需要工人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马尔丁诺夫在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今天,在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还在重复他当孟什维克时关于俄国革命所鼓吹的那种孟什维主义的陈词滥调。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一发现工人阶级不愿意只是作为本国资产阶级手中对付外国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独立地提出他们自己的任务,就开始背叛国民革命运动(更不用谈无产阶级革命了)。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时才能获得胜利。

要实行对付外国的彻底的革命政策,前提条件就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者们即国民党右派要实行彻底的革命政策,反之亦然。

只要统帅部留在蒋介石手里,只要政府中最重要席位留在国民党成员手里,只要资产阶级的这些代表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有着重要的支撑点,只要革命事业也总是不断地受到严重的危害,在目前情况下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从内部的叛变(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不管是很快还是很慢)远比轰炸南京和占领上海要危险得多。如果说孙中山早先的战友陈炯明会转向反革命,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会呢?蒋介石已经暴露出自己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所有帝国主义的报刊都肯定,而且最有影响的帝国主义的机关报都断言,他同张作霖进行了秘密谈判。如果让统帅部留在这个人手里(即使受着监督),那么这就是没有明白:这是内部存在最大危险的征兆。如果共产党人对此也不负政治责任,那么他们就是走在一条他们必须立即离开的十分陡峭的道路上。

11. 整个国际形势

最近的事件一再重新证明,国际帝国主义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中国的形势紧张得像一根弦。不管最近情况如何发展,世界的均衡总是不可靠的。爆发一场新战争(或一些新战争)的前景日益接近。

在世界政治中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炸药。

对苏联的包围越来越明显。张伯伦的最近照会不只是一篇“报刊小品”，不只是一根“扔给顽固派的骨头”(不应当夸大英国保守党人的两部分之间的差别)，而无疑是采取有力步骤的外交准备。这个照会是要使英国外交能够在适当时刻转而采取更有效的方法的一个“切口”。这个照会是整个政治链条中的一环。

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策划的统一战线，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巨大的不幸。

德国的局部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的增长使德国资产阶级对“西方”的同情增长。德国的外交最近越是活跃，就越是清楚，它以某种方式倒向反苏维埃阵线的时刻接近了。

意大利法西斯完全处于英国的影响范围(承认比萨拉比亚由罗马尼亚人兼并)。立陶宛发生法西斯政变，毫无疑问是得到英国同意的。在波兰阶级对立尖锐化，这种对立——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会加速实现皮尔苏茨基的冒险企图。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不进攻条约，例如同拉脱维亚签订的和同波兰准备签订的不进攻条约，当然，对于苏联来说绝不意味着真正的安全，虽然它们对于苏联来说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对苏联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大城市的机关的突然袭击无疑是由英国组织的，并且部分地也得到美国的支持。这些袭击是一整条故意的政治挑衅锁链上的环节，苏联当然过去和将来都不会去管它们的。北京的突然行动是打算挑起苏联在满洲采取激烈的行动，以便把日本卷进同苏联的斗争并解放英国和美国的手脚。不过这个突然袭击也想减轻国民党右翼分子的工作，首先是吓唬国民党的温和派领袖。也不排除以下可能：张伯伦援引北伐军在搜查和逮捕我们同志后伪造的“文件”，将采取对付我们的进一步措施，将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上发动反对我们的运动，也许将直到同苏联中断外交关系。

由于工会总委员会显然什么卑鄙的事都准备干,所以张伯伦干这件事就更容易了。在英俄委员会在柏林召开“热烈的”会议后的第二天,总委员会同工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声明,它对“英国的旗帜在中国受到沾污”感到遗憾,并建议将同国民政府的“冲突”转交国际联盟去裁决,也就是交给张伯伦去裁决。

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在北京的行动必须从两方面来给以回答:(1)一方面不要上当,要用镇静、克制和继续执行和平政策来回答,(2)同时在中国要尽一切努力来加深群众运动和发动更广泛的工人阶层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他们在北方的走狗和反对国民党右派。

整个说来,国际形势很久以来还没有这样紧张过。

中国问题成为关系到世界革命直接的命运的主要问题。它对苏联的最近将来有直接的影响。列宁预言的时刻正是在今天来到了,他在他的政治遗言中写道:

“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虽然落后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式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刻,就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变得文明起来。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54页)

我们是否能获得“第二次喘息”,反对苏联的新十字军东征是否遭到失败,就像它由于“西方和东方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东方和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列宁语,同上)而遭到失败一样——列宁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今天我们党和共产国际肩负着最重大的责任。

今天的策略问题实质上如下:

1. 当我们尽一切可能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尽一切可能来阻止国际帝国主义对南方的公开干涉的扩展。

2. 苏联必须仍然推行和平政策,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捍卫和平事业,因为和平事业今天处在重大的危险之中。

3. 同时必须尽一切可能来把中国革命尽可能远地推向前进,并且使用全力使它不只是具有国民的性质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

4. 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建立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真正中心,即苏维埃。

5. 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必须消除束缚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一切可能。

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国民军司令官枪杀上海工人、逮捕上海工会委员会主席、解除中国其他城市的工人武装——这一切都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

国民党目前的领导者直接担任了中国的卡芬雅克这一角色。枪杀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的事件,从国际的观点来看,直接导致同外国帝国主义者拥抱。最近的事件证实了在这一文件中阐述的路线。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14日于莫斯科

(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革命问题*

(1927年4月19日)

布哈林

一、中国事件的国际意义

伟大的中国革命提出了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企图通过一次报告摆出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局限于阐述某些对于判断中国革命及正确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面临的策略任务有重大关系的基本问题。

但是，有必要先谈一谈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

整个世界现在正进入其**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我们时代**各种基本历史力量互相比量的新阶段**。帝国主义世界面临着异常尖锐的**市场问题**。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主要势力在经过一段不长时期的沉寂之后，再次在这方面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攻势。例如，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现在就正以前所未有的劲头推行帝国主义的政策，它占领尼加拉瓜，从而激怒了整个拉丁美洲；它在墨西哥策动反叛行动；它十分积极地参与反对中国人民的军事行动。

怎样**对付种种革命潮流**的问题也尖锐地摆在帝国主义的面前。现在可以这样说，国际资本主义又一次感觉到了**来自革命运动方面的直接的世界性威胁**。

1912—1921年期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曾使帝国主义者惊

* 这是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原报告只有六节，第七节是蒋介石集团公开背叛革命后增写的。——原编者注

恐万状，资产阶级感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已成为直接的**世界性布尔什维主义威胁**。这在当时已是不言自明的现实，以致连马尔托夫也写了厚厚一本关于“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书。事过不久，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如今资产阶级又一次处于世界范围的直接革命威胁之下，因为中国革命的战场如此广阔，卷入社会阶级斗争漩涡的人如此众多，这一事件造成的结果真是难以估量。由此也可明了，为何有关我们苏联的问题如今也特别尖锐地摆在国际帝国主义面前。

马克思曾讲过：“革命的党使反革命的党团结起来”。国际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日益巩固以及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形势，正使反革命力量麇集到一起，这一趋势的表现就是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企图，想建立起反对苏联和中国革命的统一联盟。

十分自然，由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种种矛盾，这一前所未闻的斗争变得更为复杂了。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行动中，我们已经看到各种摩擦和分歧——酿成帝国主义间重大冲突的前兆。这类冲突以后会急剧蔓延开来，导致帝国主义大国间的严重对抗。但是，目前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是串通一气来对付各个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在东段的战线被再次打破了，我们要充分估计到下述事实的巨大意义。即在一年时间内，除了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外，我们又有了一个革命的反帝的国家，这个国家已占有半个中国，这实在还是首次。现在的中国革命不仅具有国家的组织形式，还拥有一支客观上发挥着巨大革命作用的军队。如今，除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外，远东又出现了一个以越来越强大的革命力量为后盾的**革命的反帝的国家**。

革命力量的这一发展导致反革命力量的集结。其结果是，我们在不易察觉，或者说在不太易察觉的情况下已经**接近，就实质而言，一场新的战争**，因为现在实际上正在进行着一场以革命的

中国为一方面同以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和中国反动派为另一方的战争。我们不应当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即尽管不存在通常伴随战争爆发而出现的各种形式，事实上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再说从来也根本没有谁说过，每次发生的战争在外表形式上都只能是我国1914年情况的重复……。

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力一次又一次为中国革命的现实所证实。马克思在上个世纪中叶写道：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将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①

诚然，这一预言只实现了一半，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尚未被打倒。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毫无疑问，“欧洲反动派”来到长城跟前时看到的将不是法国革命的三个口号，而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

1853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一段话也颇令人感到兴味。马克思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时写道：

“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②

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这一描述几乎完全变成了现实：英、美

^① 《马克思选集》（德文版）第3卷第444—445页。——原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原编者注

两国果然出动军舰去镇压给“现代工业体系的地雷”投进火星的中国革命了。

大家都知道，列宁是多么重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我们断言，我们时代各种主要历史力量的斗争已进入一个就战场范围之广阔来说前所未见的新阶段，这与列宁的充分得到证实的预言是完全一致的。前不久，一家欧洲资产阶级报纸写道：现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上海，正在建起一条广阔的革命阵线，其队伍拥有的人口已达8亿。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斗争已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这个强大的巨人已奋起战斗，而这就意味着，随着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孕育着军事冲突、破坏性战争、激烈的社会阶级动荡、伟大的革命）的出现而使人类面临的那场伟大斗争将格外激烈起来。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上面先说了一段一般性的意见，现在谈谈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此首先必须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因为对待任何新的历史事件，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避免生搬硬套和公式化倾向，避免只是重复那些过去已说过的东西，而应当探索和找出该历史事件所具有的特殊的、独特的和不同于一般的特征，并进行分析和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中国革命的特点首先在于这是一次民族解放革命。它要解决的任务是**统一中国**，变中国为一个统一集中的国家，使中国摆脱半封建的分散割据状态，走上享有平等权利、不受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历史发展的康庄大道。

由历史进程提出的这些客观任务说明，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把中国革命称之为民族解放革命。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不是一次单纯的民族解放革命，而是一次发生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革命。我们以后会看到，

这一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同 19 世纪中期，譬如说，在欧洲先后发生的一系列民族解放革命是有深刻的区别的。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当时也存在统一国家克服封建的分散割据状态和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生存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要解决的正是这样的任务。但是，中国革命与这些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深刻差别在于，中国革命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要使中国人摆脱殖民地式的半奴隶依附关系，因为殖民主义剥削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实行政治、法律和国家的压迫方面都有其特殊表现。“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块众所周知的牌子最能说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从中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态度，看到中国本身所处的地位以及从这种地位出发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任务，构成了中国革命区别于上世纪欧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即以一系列民族解放战争为标志的那种斗争的第二个独特之点。

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这是一次**反帝革命**。这场革命旨在反对一种特殊历史形式的外国资本主义。它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它要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打破帝国主义的势力。

第四个特点也即涉及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它在发展的**现阶段暂时还只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当然不是说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在其发展的现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在国内的目标是反对封建残余，反对束缚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中世纪羁绊。这场革命反对的是封建残余，是这种封建主义的社会阶级代表，即同资本主义最高的也是最腐朽的形式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军阀”。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第四个特点**。

最后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革命的**第五个特点**。我这里指的是，这场在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暂时还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革命，**有一种经过若干不同阶段和时期**

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向。它有最终将中国的发展引上社会主义轨道的趋势。自然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场革命是这种转化的“典型”范例。

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极需加以强调。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详细地谈到。这里想先讲一讲，是什么东西使这种转化本身成为可能的呢，首先的一个前提是，**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较弱。**这并不是说，那里工人阶级已形成一种无人可与其相抗衡的巨大力量。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独特的力量对比这一因中国经济的特点而产生的事实。在中国大工业和铁路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占有极大的比重。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往往不取决于本地资本的大小，而取决于整个资本的多寡，取决于所有工厂（不管这些工厂属于本国还是别国）的数量和规模。我们在谈到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时指的正是这种意思。

此外，中国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包围**，而且也受**社会主义的包围**，这一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另一方面讲，中国还受着**殖民地的包围**，尽管这种包围同样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十分显然，不能将它与日本、美国、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对于理解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上述各点便是构成中国革命独特之处的那些基本特点。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其复杂的特征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面临的策略问题也必然具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上述种种从总体上勾划出中国革命独特面目的特点中，有必要稍为详尽地谈一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革命性质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久前由拉狄克同志的报告而在共产主义学

院引起的争论中所提出来的。拉狄克同志在这所学院就中国国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在策略上得出的结论。问题首先涉及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从中国革命的阶级实质来说现阶段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

拉狄克同志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请看拉狄克同志发言速记记录稿中的一段话：

“我们一向把中国革命定为民族革命解放运动。**民族革命解放运动——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这是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同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是工业资产阶级，而在帝国主义时期是金融资产阶级）的直接或间接统治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国家中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速记记录》。着重号是我所加^①）

可见，拉狄克同志提出的论点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革命就其社会阶级实质而言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从一般意义上说，我们是可以同意这一论点的。^②但是，拉狄克就在这同一报告中又提出另一个涉及中国社会主要阶级力量组合情况的论点。这个论点说：“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革命的根基是很深的。中国革命的根基不比我们1905年的浅。可以肯定地说，那儿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要比我们1905年时强大，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必对付两个阶级，而只要对付资产阶级一个阶级。**”

如此这般，拉狄克在这里告诉我们，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要对付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封建主，所以工人阶级同农民一起打击的**只是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因

① 着重号已改为黑体字。——编者

② 我们不打算对一些不涉及问题实质的不确切的或不正确的提法过于苛求。——原作者注

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团结就比我们在1905年时具有更好的条件。

这样的论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拉狄克同志陷入了语无伦次，自相矛盾的境地。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可以不必有资产阶级参加，而且可以针对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其领导权属于工人阶级还是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如雅各宾党领导的法兰西大革命时期），其基本内容在于消灭这种或那种封建残余。按照拉狄克同志的看法，中国是没有封建主义的。那么，又怎么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呢？这种革命在国内又是反对谁呢？既说不存在封建主义，又说工人和农民仅仅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消灭封建主义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又从何说起呢？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以后是怎样提出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孟什维克说，1905年革命基本上**解决了**消灭封建农奴制度的任务，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客观上已不必要，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进行一次新的革命。列宁是怎样对待这一问题的呢？列宁认为，如果这项任务果真已为1905年革命所解决，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就真成为历史的“多余之物”了。但是，这个任务并未解决。国内各阶级之间开展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因为国家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消灭封建关系残余**的任务尚未完成。只要封建残余存在，国内就存在资产阶级革命问题，不管这场革命由那个阶级来进行，也不管在这场革命中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如何。

拉狄克同志还谈到“**土地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尖锐性**”。可是，既然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那又怎么可以说土地问题空前尖锐呢？如果从理论上看问题，“土地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尖锐性”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整个运动的中心内容，原因就在于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对社会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造有两种途径：自由资产阶级的方式和“庶民”的方式。但无论采用何种途径，都要清除封建主义对社会的束缚，都要清除掉封建主义的“渊藪”。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所在。可见，拉狄克同志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一口气提出了两个论断，可是两个论断在原则上却相互矛盾。拉狄克同志的第一个论点认为，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革命面临着资产阶级的任务，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第二个论点却又断言，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一来，他的第一个论点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了。因为，如果封建主义已被摧毁，它的残余又是微乎其微，那么，所谓伟大的，在现阶段尚属资产阶级性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也就无立足之地了。

然而必须承认，有许多事实看起来似乎能够证实拉狄克同志的观点，并且使这一矛盾很难得到解决。但这仅仅是乍看起来产生的印象，对此有必要稍加说明。

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曾列举了必要的材料说明中国的土地关系。在这里打算只讲几个最基本的数字。

在土地关系方面，我们了解的基本情形是这样的：50%的农民租种他人的土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即土地在1至20亩之间的农民阶层，占全体农户的49.5%。由此可见，小农经济几乎占全体农户的一半，却只占有**15.9%的土地**。土地在20至40亩之间的小农占全体农户的23.7%，拥有22.8%的土地。两类农民相加，即将农民中最贫穷的两个阶层，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小农加在一起，结果是**73%的农户只拥有38.7%的土地**。实际上各类农民之间的对比关系还要令人吃惊得多。

农商部的这份统计材料是经过若干次调查核实的，不久前，东南大学也进行过一次考察，其结果也大体证实了官方的资料。至于说到**地主**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这个术语的含义是十分不

明确的。它概括了几种不同的社会阶级集团：较富有的大农户、所谓的“乡绅”、官吏、商人兼地主以及“名副其实的”封建大地主、半资本主义的甚至资本主义的大地主。

广州的一个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在其根据中国有关资料出版的一本杂志中多处提到，有的地主往往占有几十万亩土地。但从总体上讲，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不起最主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小土地占有制国家。这种状况乍看起来在经济上令人感到有些难以理解，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地主的土地占有制不起决定作用，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土地占有制国家，那末，初看起来，解决任务是十分容易的。既然地主不多，自然也就不存在封建主义，因为封建主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拉狄克正是在这一点上把自己的头脑搞糊涂了，他匆匆忙忙下个结论，一笔将中国的封建主义勾去，从而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内容也一笔勾销了。

然而，我们上面讲到的在经济上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十分明显，我们面临的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它既不是“典型”封建主义的国家中土地关系的简单重复，也不是由“典型”封建主义转化为“典型”资本主义或近乎“典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土地关系的简单再现。

首先应当分析一下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地租现象。如前所述，有50%的农民从较为富有的农民或地主手中租种土地，在这里有必要附带说明一点，就是连我们住在中国的俄国同志，当他们在撰写书稿时，给“地主”一词下的概念也是时有不同的，往往隔几行就出现令人颇费猜疑的用语。不妨举几段文字来看看问题何在。例如，有一位在广州调查中国土地问题的同志写道：

“中国当前存在的地租形式可归纳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货币

地租，二是实物地租，第一种地租形式多半为富裕的农民所采用，不甚普遍；第二种地租形式，即**实物地租则与第一种不同**，它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广州》杂志第8—9期，伏林同志的文章）

他接着写道：“上述种种实物地租形式实质是变相的**封建代役租制**，只是加上了一个地租的形式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劳动地租，就其经济内容而言，它不过是**土地占有者采取封建手段获取劳动力的一种方法**。”（同上书）

就事情的本质而论，上述引文已经足够了。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它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实际上存在着劳动地租、对分制地租和**占统治地位的实物地租**，等等。

拉狄克同志就此说道：

“半数农民是佃地农或半佃地农。而且这里所说的地租不是（这也是伏林同志所不明白之点）我们常说的半封建的地租，这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地租**，地主是那些向农村放债的商业资本家、商人、官吏。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业未得到充分发展，这些人无法将资金投到工业中去，你们都知道，中国的银行很糟糕，就像谢得林所说的那样，是漏洞百出，工业又很年轻，既无经验，又缺乏领导者，缺乏关税保护，所以，把钱投入工业是要冒风险的。而在农村要简单得多，政府可以从庄稼人身上**预收四年的税**。庄稼人是躲不开的。于是他们去向商人借贷。这样一来，商人便成了所有主，他们从庄稼人身上刮去50%—60%—70%的收成作为地租”（《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速记记录稿》）。

首先，在拉狄克同志的这番议论中有一点令人费解：既然农民无处可躲，于是去向商人借钱，然后又按借款付息，那末，为什么要把这叫做地租呢？地租者，为所租土地付租之谓也。如果是按借款数字向高利贷者交付利息，这是不能叫做地租的。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学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不知地租又来自何处，真

叫人摸不着头脑。

其次，拉狄克同志在同伏林同志展开论战中并未批驳下述基本论点。如果地租以实物形式缴付，如果地租以徭役和代役为基础，如果地租以实物偿还，而且实物形式居于统治地位，那末，把这称作是外国资本影响下出现的“新的资本主义地租形式”是绝对不行的。这种定义把通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统统搞颠倒了。^①可以说这里存在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形式同半封建主义地租形式的结合**，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本人兼出租土地的事是存在的，甚至是很常见的。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放债取息的高利贷者就是土地占有者，其所得不算债息，而是租金，而以实物偿付租金的形式，便是资本主义地租的最新的、最发达的形式，那就是不加区别地乱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了。

拉狄克同志在分析各种经济关系时走入了歧途，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面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面却牵强附会地把各种不相同的事实凑到一起，竭力为所谓中国没有封建主义的观点辩解。拉狄克同志没有觉察到，他这样一来就把他自己关于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彻底否定了。

总之，既然实物地租、对分地租和劳动地租等等在中国是占

^① 请看马克思对此是怎样说的：

“因为**产品地租**形式和一定种类的产品及生产结合在一起，因为对它来说农业经济和家庭工业的结合还是不可缺少，因为农民家庭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它和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所进行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本来就独立无关、总之，为了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个形式完全适于我们例如在亚洲可以看到的静止社会状态提供一个基础。在这个形式上，和在以前的劳动地租形式上一样，地租是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并且也是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即直接生产者在无代价的情况下，事实上还是在强制——虽然这种强制已经不是出现在以前的野蛮的形式上——的情况下必须对土地（他的最重要的劳动条件）所有主提供全部剩余劳动的正常的形式。”（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930页）——原作者注

统治地位的形式，那末，这就是半封建主义制度的残余。这种半封建主义的残余，毫无疑问，是同渗透到农村的资本主义形式，首先是同借贷和商业资本形式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譬如说，就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相当普遍的。^①

但是，远不能说这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我们面前仍然摆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地主所有制在中国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却又是中国革命中极为尖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目前各种事件的中心问题。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点，即这些问题从经济上进行分析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迄今所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书刊，即使从“单纯描述”事实的观点来看，也没能提供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们只好就如何最正确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提出某些设想和推论。

当分析到中国农村经济（按拉狄克的说法是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残余）的时候，在中国究竟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一些人断言中国不存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另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提出了比较周到缜密的论述。这场争论背后是有很深的根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分析地租时就曾提到对土地的封建占有，在此种封建占有的情况下，土地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化身”——皇帝的财产，法律上归皇帝所有，“王公卿相”等封建等级中其他一切代表人物是这块土地的占有者，但不是所有主。毋

^① 但是，还必须记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影响早就同封建主义交织在一起了，而这种影响的存在绝不是用来证明“封建主义”“不存在”的理由。举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1520年被拥戴为德皇的查理五世实际上是依仗着富格尔银行的势力“击败”法朗斯瓦一世的。当帝国后来采取一系列反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措施时，富格尔银行首脑便写信给德皇说：“众所周知，陛下若无我之佐助是难以获取皇位的，这可由您所派密使之签字为证”。然而，连这样的事实也绝不能否定当时封建主义的存在，谁都会看到，此类证据简直引人发笑。——原作者注

庸置疑，中国存在过这样一个阶段，而且事情至今并未完全发展到成为本身的对立物的地步。这种关系残余的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的。^①中国存在着复杂的等级制度，存在着复杂的国家机构，在那里，受控于更大封建主的大封建主可以任意审判和制裁他人，他既是军事长官、当地的“王公”，又是地主，又可以征收赋税等等。在中国曾多次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封建领地显然曾多次毁而又建，建而又毁，现在已只是封建关系的残余。但是，旧的残余主要在于，地方上的主要行政长官、“省长”、“军阀”等可以随心所欲地征收土地税；从法律上讲，这种行政长官不拥有土地，土地不是他的世袭领地，然而，从土地上征收的税款他可以塞进自己

① 下面一件事实最能说明拉狄克同志所下结论草率到何种程度。拉狄克同志在其讲义《〈中国革命运动史〉教程（1926—1927）》（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写道：

“中国是作为一个**土地私有制**国家迎接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书刊提到的有关中国土地所有制性质的种种深奥问题皆产生于**无知**，皆由于一些欧洲游览观光者和浅尝辄止的中国问题作者听说，皇帝就是神，他势力极大，而且是土地所有者，于是便不加核实，毫无批判地把自己得来的消息公诸于众。而我们的同志有时不去研究基本的著作，只读这类**政论**文章，所以就无法驱散这类政论文章引起的在一些极为重要问题上的迷雾”（该书第6—7页）。拉狄克同志这番议论的主要依据是俄国埃肯夫神父的著作。且看并非无名的“政论家”卡尔·马克思是如何说的：“假设在这种直接生产者面前对立出现的，不是私有土地的地主，却像在亚洲一样，是那个对他们来说是地主同时又是主权者的国家，地租和课税就会合并在一起，或者就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课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普通臣民对国家都不能没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必再有什么更加苛刻的形式。在那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那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那里，因而也就没有土地私有制，虽然对土地来说，既存在私人的也存在有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924—925页）。

这样一来，拉狄克同志盲目相信埃肯夫神父的记述，就把**马克思**说成是“不学无术之人”，是“浅尝辄止的著作者”、“游览观光者”、散布“迷雾”的“政论家”等等。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正是资产阶级政论家最惯于把私有制变成从创造世界以来即已存在的，并将“永世”存在的永恒范畴。——原作者注

的腰包，这就是旧的封建制度残余之所在。经济学术语把这称作“赋税”而不称作地租。但是，当这位行政长官征收的赋税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而且预征四年以后的赋税的时候，当他不仅剥削剩余的产品，而且常常剥削到必要的产品，致使居民彻底破产的时候，那么，就很难说这与“行政长官”拥有领地并利用农民的双手为其“耕作”领土有多大区别了。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封建制度虽然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但却存在着。这并不完全是通常的封建主义，这一点无需争论。但是，中国经济生活方面许许多多封建主义的制度和特点仍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各自盘踞在“自己”省份的所谓“军阀”（实质上与古代封建公国无异^①）也往往都是大地主，他们可以动用自己手中的全部国家机器和镇压机构，可以运用自己的全部权力征收各种赋税。有时他们本身从法律形式上讲不拥有土地，但实际上土地属于他们，因为土地收入的极大部分实际上是由他们占有的。这就是封建主义主要残余之所在。属于这种残余的还有乍看起来无法解释的现象，即官吏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占有土地的（更确切地说官吏中很大比例是土地所有者），所谓“厘金”也属于这种封建主义残余。它虽是19世纪实行的一种税收，但仍然是封建主义形式的（各方设卡收税，税款数额惊人，等等，等等）。

这就是使拉狄克同志感到晕头转向的那些表面矛盾的正确答案。既然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种概念：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北方军阀的战争。资产阶级革命的矛头所向，是针对这些封建主义强盗，针对这些地主、封建主的。他们中一部分人法律上拥有土地，另一些人法律上虽不占有土地，在

^① “全国分裂为18个省，这些省大部分是老的封建国家的残余，其余许多省大小相当于普鲁士王国……”（《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基础》，约瑟夫·赫洛威博士编辑，1921年柏林——莱比锡版，第4页）。——原作者注

实际上却享有从这些土地收获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在这些代表封建束缚、已成为历史发展绊脚石的“军阀”之间存在着纷争，民族资产阶级才可能起来（暂时起来）反对他们。说到中国国内的阶级力量，那么这才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所在。

关于封建主义方面，我还想指出另一个对解决问题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在一份关于1926年12月15日至1927年1月27日期间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有一段话明确谈到“农奴依附关系”。

现将有关段落逐字引述如下：

“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在广东奴隶制不仅存在于家庭关系方面。在土地关系中也存在奴隶制，不久前我们无意中就看到好几个地区有佃农充当奴隶的现象。他们不得结婚，不得离开地主的庄院，除了口粮以外，他们每月只得到三个铜子的工资，外加一点其他的赏赐。要作出更详细的分析现在还有困难，因为在广东本身现在还刚刚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在中国其他省份，如山东，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即一大批佃农实际上是地主的奴隶。这却是事实”。

这也是给拉狄克同志的“最新的地租形式”提供的一个颇为不坏的实际描绘！

有鉴于此，有必要就拉狄克同志关于中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的总构想讲几句话。他的总构想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十分缓慢，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停滞不前”，资本才涌向农村，农业出现了迅速资本主义化的现象，所以封建主义连影子也没有了。这个构想把一切统统颠倒了过来。问题根本不在于：因为城市发展缓慢，资本主义才向农业渗透并造成了农业的破产。实际上因果关系根本与此相反：**正因为封建主义残余是对农民的严重束缚，正因为“军阀”肆无忌惮地对农民进行掠夺，正因为地主伙同军阀一起进行着各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掠夺和压迫，正因为农**

民在骇人听闻的沉重赋税压榨下，在地租压榨，高利贷盘剥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摧残下大批遭到破产，所以国内市场才日益衰败并遭到破坏；正因为这种赤贫化、穷困化等等的进程实在惊人地严重，当地工业和城市才失去了迅速发展的牢固基础。这反过来又促使农民或变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赤贫者，或不得不去当“土匪”或形成城市的乞丐大军等等，而不是成为无产者。

这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

拉狄克同志在报告中很少提到（这也是颇有代表性的）**外国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这一点，对于研究判断中国革命的政治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帝国主义**首先同封建主义这一最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中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从国际革命的角度来看，这一事实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这样一来，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便与其反帝性质融合在一起了。反帝同样也是中国革命一个最主要的特点，这是由对**中国实行半封建形式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所引起的。在我们俄国，外国资本也起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外国资本在我们这里“创建”了工业；因而也培养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资本与包括外国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相比，力量要弱得多。所以，我们这里无产阶级在数量方面可以说是大得不成比例。在中国，经济上的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因而工人阶级与当地资产阶级之间的比例也更为触目。可是从另一方面讲，资本向中国的输入又不同于昔日向沙皇俄国的输入。在中国，外国资本在更大程度上起着阻碍当地工业发展的主宰者的作用。它把中国当作一个殖民地国家进行剥削。在俄国那时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国经济的这一特点及其在**经济上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必须摆到突出的地位**。说明这一依附关系的数字当时是按工业的部门和民族资

产阶级的不同集团分别列举的。^①这些材料表明，最重要的收入项目如铁路、水运、采矿、重工业等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在**外国资本**手中，像海关这样的财政管理部门则几乎完全由外国资本所控制。其重要环节都操纵在外国人手中的银行和信贷也起着很大作用。它们通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分散在各地的广大居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还有一点，即出口业务，特别是出口原料的采购业务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类业务是外国资本通过买办、商业资本以及经营有关业务的银行来同中国最广大居民，首先是农民保持经营关系的中间环节。

由此可见，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即十分陈腐的封建关系残余及某种形式的当地商业资本和信贷资本同最现代形式的外国帝国主义的相互结合。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沉重地压在中国**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头上的剥削制度。外国资本同封建制度和军阀机构相结合，各省“头目”又靠军阀的刺刀掌权，通过这些我们真正看到了一部压在最广大居民阶层身上的残酷的剥削机器。现今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首先要反对的就是这部机器。

这种情形就排除了将中国革命同上个世纪**欧洲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加以类比的^②做法，因为中国存在的是一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迫。这种情形也排除了同我国革命进行类比的可能性，因为，在我国，外国资本不像在中国那样面对面地同群众作对。我国群众只是在第一次遭到外国武装干涉时才同外国资本发生正面冲突。帝国主义殖民压迫在中国是如此严重，其压迫机器的压力一直殃及居民的最底层。对军阀（也就是封建统治者、封建主义强盗和行政长官），对外国帝国主义者（这些挥舞皮鞭、宝剑和套索，带来前所未有的剥削，同时又宣扬要对上帝恭顺的外国人）之

^① 见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原作者注

所以同样义愤填膺，原因就在于此。不言而喻，这种封建主义形式同国际帝国主义相结合的现象，使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规模并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由此而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首先，在中国发生的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极为重大的世界性现象；其次，这一斗争是**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预先（因为我们以后还要接触各种各样的实际政策问题）得出以下一个基本结论：**不同时注意和强调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这两个方面**就无法“搞清”问题。对于制订党对当前中国革命转折关头的策略来说，那将铸成大错。

四、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

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问题。我想先说一说总的趋向，然后再具体分析民族革命战线内部正在蓬勃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阶级力量重新组合和运动的具体发展前景。

首先讲一讲**中国革命下一步发展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拉狄克同志对这一提法也进行了攻击，而且，顺便提一下，他还对“非资本主义的演变”的提法进行了攻击。

“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个老的术语，早在我们同民粹派的论战中就使用过它，对于“非资本主义的演变”是何种含义，也从未发生过疑问。为了不产生任何一点疑问，可以再强调一遍，我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指的是向社会主义方向演变。其实，问题当然不在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拉狄克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只有一种前途的意见，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前途。另有一些说，“我们有幸”第一个具体地对**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而且不用说我们是**以马克思关于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十分强调的那些设想为

依据的。可是，拉狄克同志在此却想“堵住这条路”，尽管他已经慢了一步。他说，只存在一种发展前途，那就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如果中国革命只存在一种发展前途，那当然是十分美妙的，可遗憾的是情况比这多少要复杂一点儿。不言而喻，如果像拉狄克同志那样把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任务一笔勾销，同时把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也一股儿忘个干净，那事情就十分“简单”了：既然封建主义并不存在，那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向社会主义发展。可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既然尚未彻底解决，那末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事实就是如此。难道在实行某种妥协的同时继续进行斗争的前途就是不可想象的吗？难道“解决一半”任务的道路就完全被排除了吗？这条路现在还没有走过，因而也是可以“走一走”的。打军阀，但又不**连根**拔除封建残余和进行土地革命；打帝国主义，但又同他们达成妥协，共同对国家经济实行管理和进行资本主义的领导；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革，但又决不超出改革的范围；同工人一道前进，但又绝不要让他们独掌领导权和实行专政，这样的计划是**存在**的。如果中国不是一半为军阀所占据，如果帝国主义者已经遭到决定性打击，那末，走这条道路是完全不必要的。然而，尽管正在开展着的阶级斗争使越来越多的拥护过这条革命发展道路的人转而拥护**反革命**，这条道路现在**还是**不能排除。

另一种前途是迅速地**将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进行到底**，将这场革命转入另外的阶级轨道，因而也就是最终转入经济轨道，然后再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

最后还要说一句，对中国来说，**第一种**前途中还有一个方案，但这是拉狄克同志不肯承认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技术水平都比革命前俄国落后的国家。对这样的国家甚至可以设想一种道路：资产阶级革命将进行到底，实行激进的革命专政，领导权也归无产阶级掌握，但却**缺乏独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在一定的

国际形势条件下，即国际革命在世界其他地区处于停滞状态和苏联受资本主义大国包围，总而言之，在世界各种力量的组合发生不利的变化的条件下，提出可能发生蜕变的问题是完全恰当的，有人曾就同样的蜕变问题对苏联讲了许多“多余的话”。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善变能力是极为令人惊叹的，他对苏联感到十分疑虑，对中国却是无比地乐观。

他认为苏联可能有两种前途：或者发生“热月政变式的蜕变”，或者建设社会主义；在这里“一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而对中国却成了完全可能的事。他就是这样说的：不要让中国丢掉这种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时也许可以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有趣的玩笑”。可是，在拉狄克的全部方针中，这个“玩笑”却有着相当深厚的根基，具体说就是：既然在中国已经不存在封建主义（最为狂热的“拉狄克信徒”“同意”某些“并非不学无术者”的意见，即早在公元前好几百年，中国就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那末，十分自然，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的水平高于当时的俄国。

既然中国已经没有封建主义的残余，而我国曾存在封建残余；既然我们受到“文德”^①的威胁，而且联合问题还要打下一个大问号（我们的反对派是这样断言的），而中国的工农联盟要巩固得多，那末事情就如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明白，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对我们来说是悲观的，而对中国来说则是乐观的。

然而，稍微进行一点较确切的经济分析就会得出恰恰与拉狄克同志论点相反的观点。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前景要以国内阶级的巨大变动和国家政权的阶级变动为前提，也就是说，要以另一种社会阶级结构及国家政权本身的另一种社会基础为前提。要赢得这样的

① 18世纪法国革命时的反革命策源地。——原编译者注

前景，就必须先使中国完全统一起来，就必须彻底完成民族解放斗争，就必须最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使帝国主义者遭到最沉重的失败，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且一环紧扣一环，运动将通过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转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

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拉狄克同志的意见。不过应当指出，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大加发挥的观点，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期间中国问题委员会已作过相当清楚的阐述。例如我们在讲话中谈到中国革命的阶段时讲了中国革命可能的三个阶段，说到已经过去的两个阶段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初开始时，斗争的倡导者是那些在工人、农民中寻求支持的自由资产阶级、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此时，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都不起太大的作用。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工人阶级积极奋起，农民运动开始发展，结果阶级重心转向了小资产阶级。这时我们看到的是，尽管领导权还在自由资产阶级一边，但工人阶级的压力正在日益增强，无产阶级已开始提出掌握领导权的要求。此时，资产阶级虽然对群众运动的高潮已开始产生恐惧，但还能参加反帝力量的联盟。最后一个阶段，即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概括地说，这个阶段革命战线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四阶级联盟向另一种联盟过渡的阶段，即大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小资产阶级退出联盟。

目前正在展开的阶级斗争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这一历史性转折，标志着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即资产阶级开始脱离革命，但尚未完全变成反革命。

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五花八门，阶级内部关系千差万别的国家。这当然不是整个经济十分成熟的标志，而是相反，只说明中国和中国的经济

在技术上十分落后。我们可以看到半工人、手工业工人、小商贩等许多阶层，看到资产阶级内部存在各种差别细微的阶层，看到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保持种种不同类型的联系。所以十分自然，**资产阶级往往采取离奇古怪的曲折道路脱离革命**。不能认为那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有明显的区别，而现在这些大人物一下子统统离开了民族革命阵地。这种五花八门的现象在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阶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属于这个阶层的有城市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小市民、独立经营的商人和那些生活艰难却有时雇用几个工人并对他们进行直接和间接剥削的人。就其对革命的态度而言，这个阶层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群众。一方面我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中有十分激进的阶层，另一方面也看到有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变得极为**反动**，因为它本身正受到所谓“工人阶级过份要求”的威胁。小资产阶级中的这些阶层唯大老板之命是从，同大老板一起叫喊所谓“工人恐怖”的调子。

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离开革命，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这是用手都可以摸得着的事实。它在民族革命战线内部阶级斗争领域的许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反映。但是，这里需要强调一个思想，即这种脱离革命投入反革命阵营的过程是一个参差不齐的过程。在解决策略问题时，对于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这种差异和区别，对于他们在先后不同时间内脱离革命的情况，无疑需要从战略和策略上加以考虑。

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从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时期已经讲到过。工人阶级正更加有力地夺取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着斗争，正越来越明白无误地表示出自己的领导者的作用和民族革命运动主力军的作用，从而为整个**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明确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顺便还要谈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道路

是否走得通？特别是从经济上看是否可行呢？

中国革命，首先是从经济观点看，怎么有可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呢？对这个问题需作如下回答。中国的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彻底的、不妥协的解放斗争是以赶走帝国主义为前提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必要的随机应变办法和利用不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没收大的企业。对重工业、纺织工业、铁路、采矿和相当部分的银行系统等等，再加上土地，都可以收归国有。当然，这要以政权的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为前提。向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过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便是这一过程的政治前提。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没有国际力量援助的情况下是存在着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大危险的。不过，也有许多情况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苏联的存在；其次是某些资本主义大国可以加以利用，也可以从欧洲经由苏联过境；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摩擦；第四，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会提供援助；第五，殖民地运动正在不断发展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都起着保证作用。当然，这些条件还不能给具体的策略问题和具体的策略任务提供答案。它们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工人阶级政党的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任何一国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的任务，是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这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斗争。

五、民族革命战线和阶级斗争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中国革命现阶段比较具体的问题。在这里不打算赘述所有的细节，连外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态度上的不同方针和不同色彩这样一些对说明形势颇有价值的点也不准备细谈。有一点必须强调指出，即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北洋军阀同以武力反对中国人民的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勾结是有一定的政治基础的。这个政治上的基础就是想通过帝国主义势

力、奉系军阀（即张作霖集团）势力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国民党人的联盟，孤立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共产党人（在谈到“右派国民党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还有许许多多中间派也钻进了所谓国民党左派）。

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报刊都十分露骨地宣传这条路线，它们把情况说成是：只要赶走“俄国顾问”，赶走共产党，把国民党激进派连同共产党一起掐死，把工人运动打下去，把农民制服，那末事情就好办，就容易谈得拢了。张作霖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调子不止一次地声称，在同帝国主义斗争方面，他同国民党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他说什么他（张作霖）只不过是主张持较为温和的立场；不可能一下子把不平等条约全都废除，但这都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他和南军一样，反对“赤祸”，反对苏联的影响（说什么苏联在继续推行沙皇俄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老政策）。在不同的阶级力量 and 不同的阶级集团相互角逐中，有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现象。奉系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集团都在引诱国民党右派分子，企图（而且是不无成就地）一步步把他们变成自己的走狗和代理人。奉系一些最左倾的头面人物（如被人称为奉系“灵魂”并一向以“左”出名的杨宇霆将军）就是主张采取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结盟，更严酷地对付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共产党这种办法的最突出的代表。可以说，整个国际资产阶级、奉系军阀所有的机构、国民党右派、左派奉系将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报刊都接二连三地在鼓吹这一点，这是他们基本的政治路线。十分清楚，以“赞成”或反对“红党”划线的公式是有深刻根源的，这根源就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在于该国的社会阶级阵线，在于正在开展的阶级斗争。它与自由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向右转的过程，与这个自由资产阶级纷纷退出共同的民族革命联盟并投入反革命阵营的过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然，这种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摩擦、冲突、叛卖和政变尝试等等，有关这些我下面还

要讲到。这种向右转的过程本身又同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另一个来势凶猛的过程，即强大的工农群众运动交织在一起。千百万劳动者破天荒第一次投身到政治生活中来，他们越来越坚决地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必然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决，一月比一月更为尖锐。这就吓跑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本来就是代表站在工农对立面的社会阶级集团利益的那部分人。连一些资产阶级观察家，譬如英国官方的商务报告的作者都认为^①过去的一年是工人运动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的一年。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事实证明，连那些天天在报刊上叫喊“穷鬼们的暴行”、“无法无天的平民”是对一切“文化”和一切“文明”的“威胁”的工人运动的死敌，连这些人在其比较像样的出版物中也宣称，最近这一一年在中国产生了汹涌澎湃的运动，这场运动越来越多地仿效着西欧的榜样（这不是从机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而是从组织形式、纪律、团结程度等的角度来看）。

席卷中国的经济罢工已迅猛异常地发展为有鲜明政治性质的罢工。这些罢工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工人阶级无比顽强的开展罢工斗争，表现出情绪饱满地投入战斗的年轻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工人运动的日益活跃，还表现在共产党的队伍相对地有了重大发展。不久以前，共产党在数量上还是微不足道的，而现在终于成为国家发展中一个重大的政治因素。拥有3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其所起作用远远超过其党员数量本身可能具有的意义。共产党在工会中和农民中都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再加上共产国际和我国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份量就更大了。因

^① 此外“1925发生了中国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除此以外，这一年还是有组织的劳动者（按西欧各国使用这一术语时所指含义而言），在中国奋起的一年。这种奋起是1925年上海一些日本人的工厂爆发罢工产生的直接结果”。（A. X. 乔治：《关于1925年6月30日前中国商业、工业和经济情况的报告》第13页）——原作者注

为民族革命战线的任何一个参加者,不管他想搞什么阴谋诡计,也不管他有什么打算,他时时会感到中国共产党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他时时都需要考虑到苏联对整个世界事务,首先是对中国事态发展所能起的影响。

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几个**中心地区**。这只要看一看**上海**就清楚了,这个城市越来越成为中国“工人的彼得格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就从初级的、无组织的自发性经济罢工发展到了高级的自觉的政治性阶级斗争。上海发生的事件,工人们提出的口号以及上海工人参加战斗时高举着的旗帜上的标语,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工人运动已具有极不平常的规模,这个运动的发展极其迅速。时间不长,这个运动就经历了从阶级自觉最简单、最初级的形式到最高级形式的所有发展阶段;从极为原始的斗争方式发展到采用最高形式的斗争方法。因为工人阶级的最高斗争形式是起义,而**工人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思想标志着运动的阶级觉悟水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

中国工人阶级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但是它现在还不是一支统一的、完全一致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中还有许多在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上相差甚巨的阶层,其内部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以致有时甚至发展到在不同的工会之间几乎要爆发武装冲突的地步(如资产阶级在广州煽起的冲突),工人阶级中还有虽然影响不大但在每次冲突,每次罢工中都被资产阶级利用的**黄色**工会。总而言之,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工人运动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痼疾。但是,这个运动总的趋势是蓬勃向上,日益高涨,对这一点是不应有任何怀疑的。

在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具有头等历史意义的重大因素,那就是**农民运动**。这个运动同样正在从自发形式日益向越来越有组织的形式过渡。能说明这一现象的事实很多,如

“红枪会”的兴起；不同省份“农会”和“农会”代表会议组织的发展；这类组织还有计划地开展制定土地纲领的工作，并且把土地纲领的要求同全国的革命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等。因农村内部斗争日益尖锐而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中国农村中存在着对农民的高利盘剥，横征暴敛，地租、赋税沉重不堪，内战连绵不断，整个农村疮痍满目，凡此种种都为农民土地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工人运动一样，农民土地运动已达到相当巨大的规模。

运动的发展使工人和农民同他们的阶级敌人，甚至包括其中在革命初期参加过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些人发生了冲突。工人不仅为赶走帝国主义而斗争，而且十分自然地要提出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等经济要求，以及承认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改善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国家和本厂的法律地位等等。随着革命运动的步步深入，不言而喻，提出的要求也必然会更尖锐，更坚决。在中国这声势浩大的革命中，任何阶级都要尽最大可能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然，完全避免这种“过火行为”是不可能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实际情况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你在一处看到的是把资产阶级赶出工厂，在另一处看到的是没收和瓜分商品，在第三处可能又是没收钱库等等。这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事，这也是现今中国工人运动广泛深入的一种表现。

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之下，资产阶级愈来愈开倒车，愈来愈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开始时，在中国有一种很吃香的理论和口号（这种口号现在还有），说什么中国的资本家并不是资本家，工人是商人最要好的朋友，商人也是工人最要好的朋友。据说，这还是“永恒不变的”。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反帝战线内部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的分野。如果说这种理论和口号过去一度很吃香的话，那末现在就很难这么肯定了。阶级的界限已发展到如此明显的地

步，这类理论已无立足之地，它只能愈来愈暴露自己。

农民群众的反抗不仅仅涉及封建主。封建制度同高利贷资本紧密相联，而高利贷资本又通过银行系统同**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等连结在一起。农民登上历史舞台，掀起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农民要求减租减息，减轻赋税；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风起云涌；到处都出现一种不仅没收军阀、封建主的财产，而且没收大、中地主（其中一部分人介于地主和富农之间）财产的倾向；农民力图废除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起以**农民自卫军**为后盾的各种农会和农协等农民自治机构，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农村的资产阶级上层、“士绅”、官吏以及同他们有联系并日益感到强大的农民土地运动威胁的阶层产生影响。当基本的农民群众，譬如说70%—80%的自耕农和小农投入到运动中来的时候，当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掀起惊涛骇浪的时候，农村中同农民相对立的一面——封建主、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旧官吏也在加紧武装起来对付革命。这种动荡不可能不影响到**城市中某些集团**，特别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出租土地的人住在城里，而不住在乡下，他们又是通过银行这个渠道同城市资本联系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民族革命运动发展本身和工农群众投入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潮流，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民族革命战线内部发生重大分化改组。**对这种发展前景不能闭口不提，而应当谈一谈。我们在执委会扩大全会的中国委员会中就讲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是，必须在革命过程中的同盟军农民和大工业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有的同志讲，资产阶级是一支革命力量，我们应当把它拉到自己一边来，这是正确的。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尚未出现非在‘要么同农民在一起’和‘要么同资产阶级在一起’之间作出抉择的情况之前是正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对这一点也讲得相当准确而肯定。该决议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革命的动力，而

无产阶级是这一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决议还说：“不果敢地去处理土地问题……对革命将是危险的”。决议最后对阶级关系问题作了如下的表述：“当前形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过渡性质，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相当广泛的阶层结盟还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的联盟这两种前途中的作出抉择。如果无产阶级提不出彻底的土地纲领，那它就不能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就会丧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提纲和决议》）。有必要指出的是，阶级斗争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纷纷建立起了各种强大的组织，另一个结果则是革命的宿敌和现在离开革命转向反革命阵营的那些人也在拼命地建立自己的组织。常常可以看到社会上出现各种追赶时髦、胡乱模仿和以假乱真的现象。例如，现在职工会最流行，于是企业主也把自己的组织叫做“职业工会”。有时不得不问一声：这是什么样的工会，是工人的工会还是企业主的工会？正因为如此，往往弄出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来。例如，广州的传教士也有自己的工会，还提出要求，要提高他们做祈祷和圣礼的费用。连这竟也成了“工会运动”的一种独特形式！

在农村中，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而且正在迅速扩展的一种称之为“土地主协会”的组织。这些组织同城市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店主“工会”和其他组织串联一气，形成了一股有组织的势力。这股势力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在政府中有得力的“靠山”，可以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且每每得到满足。这股势力在农村有它自己变相的宪兵——由“土豪劣绅”控制的“民团”。“民团”是一支军事政治力量，它在农村常同农民自卫队和农民协会的其他组织进行真刀真枪的交手，在城市则经常同工人的武装纠察队（赤卫队的前身）发生冲突。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同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十分类似的现象。例如，资产阶级有一个口号是反对工人的“无理”要

求。这简直是一个典型的口号。它是资产阶级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斗争中广为运用的主要手法之一。所谓罢工“破坏”经济，在无休止的罢工和现在经济生活中到处出现混乱的情况下“无法办事”等等论调，都属于这种手法。反对“劳工恐怖”的叫嚣也属于这类货色。对于小资产阶级，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它不是清一色的，而是许多阶层组成的，这些不同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正慌慌张张地离开革命，离开民族革命联盟。

十分清楚，现阶段各种阶级力量之间斗争总的情况是，正在发生重大的分化改组，革命发展正处于**危急**时期。资产阶级的各阶层纷纷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同国内的封建主，同干涉者，外国帝国主义者（当然是那些在中国为所欲为的）结盟。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正在**向右转**，其中不少人在当前发展阶段正变为越来越**敌视**革命的力量。因此，**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和军队内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重大的分化改组。这种分化改组总是伴随着种种冲突和斗争，而且斗争的界限事先也难以预料。

在谈到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点不应忘记，即这个组织是一个由各有其本身组织形式的**几个阶级组成的联盟**。国民党没有一般政党所特有的那种严格的党纪和严密的组织形式。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在我们谈到国民党并把它分为右翼和左翼的时候，必须记住，虽然名义上在一个**党内**，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着**两个党**（如加上共产党就是三个党了）。这两个党并不遵守共同的党纪。整个国民党的纪律，总的说来，同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党纪的概念是相距很远的。在我们谈到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指的是还远没有实现统一指挥原则的一支**雇佣军队**，军长们往往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而且经常相互倾轧。如果你注意观察一下国民党同一些国民党员将军的关系，你就会发现，这些将军对自己党组织最高领导机构的决定的态度是极其“随便”的，而且违反党纪的事件常常带有相当鲜明的**阶级内容**。

国民政府或者确切一点说国民政府**某些部门**，某些机构在**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上的政策，即使从最基本的要求来看，也远远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革命给工人阶级和农民带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赢得了各种各样的自由：罢工自由，集会自由，建立纠察队的自由等等，等等。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许多领域中，我们看到的行动离**满足工人阶级和一个共产党可以提出的最低要求相距还很远**。这与阶级斗争总的进程以及**国民党本身和国民政府本身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别**有关。国民党出现分化早为人们所知：1925年右派在西山召开的会议便是一例，会议参加者后来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次会议提出了**同共产党、同“赤色分子”进行公开斗争**的口号。它还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实行妥协、敌视苏联、镇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纲领。当然，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已被清除出国民党。这一点也需要考虑到，因为现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种向左转的情况，而这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的。再以去年**蒋介石的三·二〇事变**为例。那时，在广州以“左派”汪精卫为首的集团已被剪除，所以蒋介石依靠效忠于他的军队在国民政府内部的阶级关系方面搞了一次“变动”。很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对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采取的态度已从有节制地反对发展到了激烈反对的地步。

再举一例。不久以前，国民政府迁出广州，那儿就留一个右派国民党人李济深。于是这位本身也是国民党员的将军把广州的国民党委员会解散了，自己任命了一个委员会，随后又发布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工农运动的命令。一些地方的斗争变得相当激烈，往往酿成公开的冲突。令人愤慨的事件接连发生。汉口发生了枪杀参加占领外国租界**的工人**的事件，广东一些官方机构往往对“土豪劣绅”及其武装“民团”亲近，而对农民协会及其武装疏远，他们演的都是同一出戏。必须指出，土地改革问题至今没有在实践中摆到应有的地位。预定采取的主要措施——减租25%，在很大

程度上还只是“纸上谈兵”，而且改变了方向，使享受减租的人享受不到。

官方机构，特别是军事机构采用镇压手段对付工农组织的事不胜枚举。毫无疑问，这是根据一定的阶级方针行事的。

诚然，各地情况并非一概如此，而是存在着极大差别的。但是仍然必须指出，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组织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政府机构或军队机构对工农运动采取的敌对行动，正在形成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也就是正在酝酿中的反革命路线。

这里还要提一提右派国民党人想方设法试图同帝国主义集团建立联系的问题。虽然我们还未掌握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特别具体的材料，但我们确信，这种企图是存在的。国民党内部的这一斗争表现为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斗争。右的倾向最近几个月突出地表现在蒋介石的独裁方面。蒋介石一身三任，既是总司令，又是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质上全国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最主要的三个方面的重要职权都为他一人所独揽。蒋介石的独裁作法在武汉左派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冲突。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出现了两个中心：以蒋介石的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为中心的蒋介石司令部和武汉的国民政府。

这个冲突有其深刻的阶级原因，当然不能用“个人恩怨”来加以遮盖。这个冲突与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十分尖锐的斗争有关。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掌握的事实说明，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右派势力正在联合起来，这已是相当明显的了。

还可以举出一大堆事实来说明，民族革命战线内部日益发展着的阶级矛盾无论是在国民党内，在国民政府里，还是在军队本身，都有反映。而且有些指挥官，有些政治活动家朝秦暮楚，时左时右。毫无疑问，从军队到中央政府，所有这些机构中发生的来回游离现象、重新组合和冲突，其基本原因是社会阶级基础的

变动。这个变动反映到所有在民族革命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最高层领导机构之中。

当然，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因为中国现在还只存在国民党一个执政党，它是几个**阶级的联盟**，而这些阶级之间的冲突又一天比一天尖锐。与各类军队和各军长保持着联系的国民政府即由这个国民党组成。军队中的指挥官很多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商人或这一类人物。此外，还有一点要考虑到，即在北伐过程中，还有一批将领是在国民革命的刺刀威逼之下参加到国民革命军中的，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了发生种种冲突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社会阶级机构的种种摇摆不能不反映到各个方面，反映到所有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的机构和制度中来。

六、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策略问题

这种情况就给我们提出了**极为复杂的策略问题**。解决策略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照套**俄国革命**的样子。不少同志常常倾向于把1917年2月至10月期间俄国革命的经验机械地搬到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去。然而，我们前面谈到的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却告诉我们，这种同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类比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例如，把蒋介石比作克伦斯基，把国民党比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就过于简单草率了。说什么，开展阶级斗争导致克伦斯基即蒋介石的独裁。开展阶级斗争就是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垮台，就是布尔什维克**独树一帜**。由此而得出的策略结论是：采取公开推翻克伦斯基即蒋介石的方针；提出为反对中国的克伦斯基蒋介石的政权而举行**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的口号；**退出国民党**这个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组织；提出“十个资本家部长滚蛋”的口号等等。这就是类比的结果。我看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几乎直接地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有一点是他的独到之处，即当他接触到打还

是不打，举行不举行起义的具体问题时，也总是马上模棱两可起来。他总是说：“也许行，也许不行”。

这种类比和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独出心裁地把真伪、是非混杂在一起的典型。

我国 1917 年 2 月至 10 月期间的整个形势与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有着基本的区别，**克伦斯基推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而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现时在客观上奉行的是**反帝的政策**。这是起主导作用的根本点。克伦斯基方面进行的战争和来自克伦斯基方面的进攻是帝国主义类型的进攻。我们不仅不支持克伦斯基保卫祖国，而且**反对**这种行动，设法**瓦解**这种保卫国家的行动，可是，在民族革命斗争中谁也不敢说共产党人不该支持北伐。不但如此，共产党人的立场，也就是说最彻底的、最激进的革命立场应当是：防止可能出现的种种妥协行为，进一步发展胜利的军事斗争，并成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坚决的代表，与此同时当然要考虑到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的可能性。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应该这样提出问题。这样才能使情况改观，这一点极其重要的。必须竭尽全力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支持反对封建主和军阀的军事讨伐行动——北伐**。可是拉狄克同志在占领上海前一两天所作的一个报告中却说：“同志们，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心不在上海，不在于近期内是否占领上海。问题的中心在汉口。占夺上海是一件很难的事”。然而，围绕着上海和上海问题，整个世界一度都议论纷纷。上海成了一切谈论的中心。说上海“很难占领”，这就意味着在事实上否定同军阀及其外国庇护人作斗争本身，意味着否定北伐的意义，意味着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上散布失败主义的情绪。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同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彻底打败张作霖，必须彻底赶走帝国主义。所以，决不能把打败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同原先曾是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内部日益开展的阶级斗争任务**对立起来**。北伐等问题摆

在革命人民的面前，是回避不了的。在这方面，也就是说在对军事战线任务抱支持态度方面，是同我们在克伦斯基时期所取的态度大不相同的……可见，尽管蒋介石“本身”决不比克伦斯基好，甚至比克伦斯基坏得多：克伦斯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工人组织和共产党还是得考虑到这项任务。在关于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积极地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克伦斯基，对他的任何支持都是对革命的背叛。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可以支持蒋介石，因为他在未倒戈叛变之前尽管抽象地说来就其阶级本质而言比克伦斯基还“右”还“坏”，他进行的却是积极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拉狄克的论点中有哪些正确之处呢？他说必须把力量调动起来同蒋介石作斗争，蒋介石必然会变成工农的敌人，这是对的。那么，他的论点中又有哪些是错误的呢？错就错在他认为不存在战线问题。还有一点错误是，在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好时便要开展武装斗争。列宁教导要无畏地举行起义。可是，列宁也曾教导我们“不要把起义当儿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支持北伐（而在克伦斯基时期则应反对战争）；支持同军阀作战的蒋介石的军队，但同时动员力量反对蒋介石；在群众和军队中开展相应的宣传；采取把国民党右派排除出去的方针；采取先把蒋介石“围困”起来的方针，只在经过相当准备之后再同蒋介石开战，等等。

第二个“类比”。国民党就是孟什维克，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我们越早把共产党的队伍拉出这个联盟越好。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告诫。可是，他们忽略了另一个特点，即国民党是一种颇有点特殊的组织，它是介乎政党和有各种阶级组织参加的苏维埃那样的组织之间的一种东西。同社会革命党人（或同孟什维克）类比的作法是破绽百出的。从阶级观点看，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不是几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内则是既有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这里，自由资产阶级的组织是立宪民主党，这一党在革命发展

的很早阶段便成了反革命的党)又有小资产阶级,还有工人阶级。从组织方面来看,国民党实际上不算是通常意义上的党。国民党的组织结构比较便于从下而上地予以控制,办法是在内部进行阶级力量的调整,把右派,把那些凯末尔分子(把这些凯末尔分子同整个国民党混为一谈是愚蠢的)赶出去。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利用这一特点,既应是我们的任务,也应是我们的义务。难道我们可以全然不顾这一特点?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要**考虑到这一特点并加以利用**。如何利用呢? **必须越来越广泛地把国民党变成经过选举的群众性组织**。这是可能的,而且要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工人应当时时刻刻努力从下层开始,把国民党的重心扭向左转。共产党人应当推动激进的左派人士加入国民党,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并以此**改变该组织的社会成分**。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肯定地说,这是**可能的**。谁也不会设想一切都会**顺顺当当,一举告成**。但是,当这条路还可以走得下去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利用它,直到受各种力量严重冲突的限制而无法继续走下去为止。当然,有的人可以大叫大嚷,说我们把苏维埃同国民党“混为一谈”。可是,这并不能使他们有理由不去具体证明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倒有几个例子。1925年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已经被**开除出党**,推行反共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联合会(实际上是**右派**,而不是左派)也在最近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被**除名**了。这几件事总还是有点意义的。谁能说再加把劲干不去就不能使国民党内部的力量**进一步**向左转呢?谁也不能这样讲。从来也没有任何人肯定地讲,国民党内部力量的运动将始终靠这种转变,一直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更大的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便爆发出各种矛盾。但是,争论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在理论上甚至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即连苏维埃也不能彻底为我方所“控制”,于是无产阶级的党举行起义来**反对苏维埃**。大家还记得七月前的几天我们是怎样在

莫斯科举行武装游行反对莫斯科苏维埃的决定的吗？还记得我们在彼得堡又是如何组织武装游行反对苏维埃组织的决议的吗？从理论上讲，举行起义反对某一种苏维埃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要知道，当时譬如说，在莫斯科就发生这种情况，即我们依靠由真正的士兵组织的莫斯科“守备部队大会”，反对由社会革命党帮助盘踞的士兵苏维埃。这一点所有的莫斯科人都还记得。我们不知道，在国民党内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因革命的发展而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的爆发，这种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共产党人目前必须利用国民党结构上的特点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

拉狄克同志儿戏般地提出退出国民党也即让右派吃掉国民党的观点之所以令人感到更加惊讶，原因在于拉狄克同志又赞成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这简直可以说“逻辑跑得无影无踪了”。

从理论上讲，我们退出国民政府的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理论上可以作各样的设想。我们可以设想，有朝一日我们会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口号。但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根据要这样做。恰恰相反，现在需要为控制国民党而斗争，需要使出全部的力量确保国民党内部的重心向左转移。这就是现时应有的正确策略。这也就是从现今中国形势中得出结论。工人的政党应当在各地国民党基层支部依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支持从下层开始改变国民党的社会成分；从基层开始把群众中的代表人物推举到地方自治机关中去，推举到地方政权机关中去；把工农武装起来，把国民党变成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讲，采取夺取国家机构和军队等的步骤是正确的。

我们对阶级力量的判断，对阶级力量发展趋向及由此而产生的策略的估计是一清二楚的，各个环节也是一环扣一环地互相联系的，在这方面根本不可能说是另有什么“体系”。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正经历着一个过渡阶段，即由民族革命联盟内部力量从一种组合向另一种阶级组合过渡的时期。为了顺

利地完成这一过渡，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进展特点充分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与此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全力贯彻共产国际规定的路线——经过必要的中间阶段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而要使这条路线得到实现，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本身必须不断发展壮大，它必须毫不掩盖自己与众不同的无产阶级面目，必须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可能表现出来的种种动摇进行必要的抵制，而且能够同时不为那些以儿戏代替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治的左的言词所迷惑。

我们对中国革命及其发展前景的估计是很现实的估计，它与事实是相符合的。这一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也模模糊糊感觉到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疯狂地进行反华和反苏攻击。这说明他们已经看到我们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估计是正确的。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指出，即一些最顽固的机会主义者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一半出于恐惧，一半出于自愿，也去支持帝国主义者。我们可以举托马斯的声明为例。

他说：“我不相信英国政府希望打仗，但由于某种不甚清楚的原因，我们的谈判恰恰在我们差不多即将取得良好结果时中断了。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给政府造成麻烦或企图加强实力而在这种问题上捞取党派资本，绝不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观点，也绝不是出于爱国之心(!!) (1927年2月3日在达比的讲话)。

于是，托马斯十分明确地说道：“在英帝国主义同中国革命之间的战争中，我应当支持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政府来反对中国革命”。

托马斯在另一处说：“反对派的任务不是进行抨击，而是向世界表明，它是支持政府的”。

或者以“我国的”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为例。他说，想把英国排挤出中国是百分之百的幻想，也是十足的无稽之谈。或者再以中国工会代表团与阿姆斯特丹国际首领之间的会谈为例（关

于这次会谈的报导刊登在荷兰社会民主党报纸《人民报》3月10日上)。这份报导中有这样一段话，现逐字引述如下：

“对于代表团提出的关于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否准备派遣委员会去中国支持中国工人的问题的答复是，工会国际对此无能为力；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工会运动是一种**建设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竟是这样！），而建设只有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国家中才能进行。在中国国内政治秩序未恢复之前，工会国际不考虑向中国派遣代表团之事”。

这简直可以说是**公开的反革命观点**。唯一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就是共产国际，因为中国革命是人类社会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发展过程中雄伟壮丽、声势浩大和十分壮观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过程的名字就叫做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奴役的国际革命。

七、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和工人阶级的任务^①

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上海无产阶级惨遭枪杀的事件，以及蒋介石集团的将领们屠杀人民的罪行，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中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我们讲的“新的局面”不是指通常的情况变化，因为一般性的变化随时都在发生。我们讲的是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事态发展已涉及到正在进行斗争的各类阶级力量的分化改组问题。因为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标志着民族革命运动的**转折关头**。这次政变使运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发生了**变化**。对于因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得逞而造成**新局面**视而不见或估计不足都是极端荒谬的。我们暂不谈**现在**公开同蒋介石交火是否正确；也不谈把武器藏起来暂不接战，从而不让别人解除自己的武装，及时将工人武装撤出

^① 本节写于蒋介石一伙举行反革命政变之后，因此我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不包括这一节。——原作者注

战斗，而全力投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积蓄力量，待各种力量联合到有取胜机会之时再行出击是否更为恰当。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我们姑且放在一边。

首先让我们对发生的事情作一番**阶级分析**。根据前面讲过的情况，我们不难理解这一事态的阶级内容。蒋介石的政变是国民党右派的叛乱，是大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左派**的一次叛乱。我在前面叙述的事态演变最后以投向**反革命阵营**的资产阶级公开实行专政而告完成。工农群众的反抗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已经强大到足以使大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但还没有达到在**发生战斗的各个地方**给民族解放事业的背叛者以应有的回击的程度。

中国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已经结束**的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封建军阀，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组成的营垒；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营垒。自由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可以**参加革命**（这与俄国反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相反），因为在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同于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任务也必然要有改变。

尽管如此，这个阶段就已经存在着两个营垒变为三个营垒的趋向：即封建买办和外国资本一个营垒；本国大资产阶级为另一个营垒；“左派联盟”（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为第三个营垒。

当前情况的特点是已存在这样三个营垒。蒋介石集团已在屠杀工农，但它还在同封建军阀作战。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不反对大力支持蒋介石，他们看到在所谓的军阀之中，有许多人在不久的将来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而且确定无疑是要垮台的。

这样一来，当前又出现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向，即三个营垒在“新的基础上”变回到两个营垒，一个是本国大资产阶级同

部分封建主和外国资本的联盟；另一个是工人，农民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

决不应忘记，国民党中执委中大部分人属于“左派”这一事实。决不应忘记武汉政府现在是“左派联盟”政府这一事实。决不能忘记一部分军队，而且是相当大一部分军队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政府这一事实。最后，还不应忽视冯玉祥的军队至今尚未投入战斗这一情况。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还会遇到许多不测事件，还会有少数人发生动摇和投敌叛变。但是，**阶级斗争的逻辑，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逻辑将胜过这一切。**

现在，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而且是**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叛徒**。在进行反对工农的战争的情况下，要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已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态度，所以历史事件发展的力量将把他越来越推向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的方面去。而且这种妥协不是狭义的“权变”性质的妥协，而是极其类似结盟性质的妥协。固然，蒋介石的军队也是雇佣军队，因而类似某种“嫡系部队”，这种情况可能延缓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垮台的过程。但这只能是暂时现象。只要回顾一下北伐开始以来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北伐的胜利不是因为南军装备优于敌人。而是相反，南军装备不如敌人。可是南军却打赢了。他们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们具有争取民族解放的高昂斗志，是因为广大群众把自己的阶级夙愿和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到来，是因为他们得到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支持。

伴随右派分子分裂出国民党和出现两个政府而来的是“社会意识”内部的重大变更。**武汉**必将成为吸引广大群众的中心。**南京**（蒋介石一伙）将随着国际帝国主义对其政策的日益赞扬而迅速丧失其政治资本。共产党的威信则必将提高，因为早在发生政变前共产党就曾斩钉截铁地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独裁者”。

武汉及忠于武汉政府的军队应当成为军队中的组织中心。武

汉方面对蒋介石采取的断然措施（据悉武汉政府已发出通缉蒋介石的命令）是符合革命要求的适当措施。国民党在排除了奸细、叛徒和破坏分子之后应当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组织**。把国民党的旗帜交给蒋介石集团是绝对错误的。相反，必须把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叛徒处理。因此，现在，可以说**特别是**现在，采取**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荒谬的。农民、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为实现的、相当长期的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联盟具有坚实的基础。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极其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大胆果断地进行土地革命，进一步放手推进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下最大气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下狠心做好**组织群众**的工作。在农村建立农会和农协，组织工厂委员会，加强工会工作，建立罢工委员会或工人执行委员会，把这些委员会连同手工业者、小商贩的组织一起组成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武装工农，征集国民党员，千方百计加强共产党组织，所有这些任务现在都应提到首要位置上来。当前，做好**各地方**的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无论如何要使农民这支第二梯队跟上来，因为归根结蒂要靠农民群众的力量和这部分群众的有生力量来决定这场伟大斗争的结局。应当尽可能避免那种可能给中国革命的敌人用作指责所谓中国被“苏维埃化”的口实的组织形式。这一点有必要考虑到，因为中国那班反革命无赖在到处叫喊什么，“俄国共产党人”想在中国搞他们那套“俄国”制度，他们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上面提到的那批无赖就同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十分要好）一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不过，中国革命在实践经验中找到了能够团结广大群众的运动形式。一切**依靠群众**，这个口号越来越必要，尤其是在现在。

中国人民还将面临艰巨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已经集中了大量的军事力量，他们收买了被工农群众运动吓破了胆的民族资产阶级。然而，中国革命将克服蒋介石反革命的一时得手，冲破“爱好和平的”、“笃信耶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封

锁，它将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因为这场革命已把千百万人发动起来从事伟大的革命创造活动，因为它正使千百万不愿再戴上奴隶枷锁的奴隶们振奋起来。

共产国际已宣布蒋介石为叛徒和敌人。共产国际所属各共产党必须竭尽一切力量，使这一场叛卖的得利者、“文明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遭到他们在武装干涉苏维埃国家时期遭受的同样可耻的失败。在中国决定着世界革命的命运。世界革命的战士们应当火速前往援助。

〔录自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獻资料选辑》（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革命问题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1927 年 4 月 21 日）

斯大林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

- （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
- （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
- （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 （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畏惧；
- （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

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

(己) 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事件发展的两条道路：

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而结束革命；

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

二者必居其一。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一专政的经验可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加以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走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以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现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已没有像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革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

因此，这两条革命道路之间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奋斗。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在第一次北伐时期，当国民革命军迫近长江，节节胜利，而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来不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

这并不是说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矛盾。这只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革命时,竭力利用革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限制革命的规模,使革命主要沿着争夺地盘的路线进行。这个时期国民党内右派和左派间的斗争就是这些矛盾的反映。1926年3月蒋介石要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的企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重大的企图。大家知道,当时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1926年4月)。

这条路线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

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农村中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以及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城市里汹涌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国民革命军向帝国主义海陆军包围着的上海的胜利推进,——诸如此类的事实都说明当时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只有这一情况能够说明下列事实:1927年2月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成立新中央,这一企图在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一致反对之下遭到了破产。

但这个企图是一种征兆,表示国内正进行着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安心,他们将加紧反革命的工作。因此,联共(布)中央在1927年3月说得很对:

(甲)“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它进一步的胜利只有在发展群众运动这一坚定的方针之下才有可能”;

(乙)“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变为拥有

武装自卫力量的实际政权机关的方针”；

(丙)“共产党不应当隐瞒国民党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应当用揭穿右派的办法把群众动员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1927年3月3日)。

因此不难了解，后来革命的巨大规模和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袭击，不能不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抛入反革命的阵营，正像国民革命军的占领上海和上海工人的罢工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样。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南京的炮声在这方面就成了中国斗争力量重新划清界限的信号。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并提出最后通牒，是想表明他们在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像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这就是说，革命的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拥护进一步展开革命的人们和主张消灭革命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将日益加剧，充满当前整个革命时期。

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而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既然脱离工农并勾结帝国主义，终究要遭受和军阀同样的命运。

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其次，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由此可见，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组织，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千百万劳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增长，而对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

最后，由此可见，共产党在与革命的国民党人在同一队伍中战斗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保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必要条件。

四 反对派的错误

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

反对派要求中国革命以类似十月革命的速度发展起来。反对

派不满上海工人没有去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决战。

但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其中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国际环境不像1917年那样有利(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战争)。

他们不懂得在后备军还没有跟上的不利条件下是不能进行决战的，例如布尔什维克不论在1917年4月或7月都没有进行决战。

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不避免决战(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然而**现在**成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

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1905年的情况是这样，1917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在目前，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提出反对这个地区内的现存政权的口号，这就是说，提出成立新的政权机关的口号，提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人结成联盟的共产党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权的口号，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而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权。

其次，这就是说，把两种任务混淆起来了。一种任务是成立和巩固现在革命的国民党所依靠的工农群众组织，例如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另一种任务是成立作为新型国家政权的苏维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

最后，这就是说，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

就是说，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

可见反对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①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

现在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由此可见，反对派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因此，不久以前我党中央全会坚决地摈弃了反对派的政纲是完全正确的。

载于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第90号

(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① 卡维涅克(1802—1857)是法国1848年2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他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6月起义。——原译者注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

(1927年5月7日)

托洛斯基

斯大林的大纲题目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曾公布于1927年4月21日的真理报于中央会议后，此大纲在中央会议上并未提出讨论(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并未离莫斯科)斯大林大纲的错误，以至脚头颠倒，尾巴主义的精神表现得照耀如明，如对此大纲的错误不指出来实等于莫大的罪恶。

应该了解中国革命给我们的教训

一、不准讨论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问题，(最近所发表的)他们说这种讨论帮助了苏联的敌人，易于引起敌人借口的讨论自然难以公布，假若因讨论就引起敌人的假造“事实”假造“证据”结果不利于讨论，那我们也认为不必要的。然而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以及整个的指导路线，换句话说，就是和“斯大林大纲”相连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讨论，为什么这个大纲可以公布，而对于大纲的批评就不可以公布呢？

说讨论中国问题是妨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错误，若是这样，不仅联共不该讨论这问题，就是所有一切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共产党都不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中国革命的利益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并且给了我们很多教训，重大问题，尤其是所争论的问题，应当公开的彻底的加以详细讨论，认为这是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利益有冲突，这是绝对的不正确，由此可知拒绝讨论并不是与苏联的利益相反，而是不利于官僚派的指导，因为他们的不正确“机械”的指导，一方

面中国革命受了很大的损失，他方面减弱了国际地位。

二、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党的每一次决议案之先，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事实上已经表现出决议案的错误，以前是不许批评和讨论的，事实上证明了决议案错误之后，则又背地换一个新的决议，然而还是“机械”的，并且比从前更错误。现在斯大林的大纲就是一例，这种方法与党的发展绝不适合，特别是给幼稚的党以大的打击，我们应该从失败与错误中找出经验，斯大林大纲已经公布，最低限度对此大纲的内容提及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都应该公开的讨论。

斯大林大纲是代表中央而发表的，然该大纲并未经中央会议讨论，此事实是绝对不能消灭的，政治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布哈林，毛洛多夫，把这个大纲看过，仅经他们三个人的同意，就以中央的名义公布，自然对于形式上没有争论的必要，然而由此错误而产生的惨酷失败，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有世界意义的问题，无论如何对党及对中国革命的利益都是不适用的。

帝国主义的压迫与阶级斗争

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俄国1905年相比，第一就是半殖民地地位，忘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内部生活之压迫，是根本自欺的政策；但是只见抽象的民族的压迫而忘了内部的阶级冲突，亦不能脱出自欺的政策。斯大林大纲错误的根本来源与一般不正确的指导路线，就是犯了这种错误，也就是未能正确的明了帝国主义的作用，及其影响，中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

帝国主义的压迫，应该证明了“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是正确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各阶级一致”(?)“广东政府是中国全民族的政府”(见新闻报3月6日加里宁的演

说)

这种观点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先生所说的，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中国没有阶级斗争的定律之实质是一样的。

中国是半殖民地，是被压迫的国家，为要使中国生产力的增加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必须赶走帝国主义，中国为求独立的斗争，自然是一种进步的斗争，一方面这种斗争给世界无产阶级发展辟一最容易的道路。

然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不是机械式的压迫，造成全中国“各阶级之一致”，外国资本主义最大的作用是中国有力的资产阶级官僚与军阀紧相连系，帝国主义的命运若没有这种密切的关系，那末，所谓军阀在中国近代生活中就失掉了作用与意义了。

如果说买办阶级（外国在中国经济政治上的代表者）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了深渊的鸿沟，这未免太愚了吧？此两阶级的接近比资产阶级与工农阶级接近得多呢！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队伍等于内部的标棍，总是仇视工农群众，常常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民族资产阶级之加入国民党，并且占了领导地位，那国民党实质上已成帮助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革命营垒只有在工农运动很懦弱，阶级斗争不发展，中国共产党不独立，并且服从于国民党纪律之下做资产阶级手里的戏具等等条件之下，若以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会使中国各阶级联合在观点上已经怀了错误的胎，这是中国民主立宪党（资产阶级政党）戴季陶的观点，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非但不能减少政治上的阶级分化而且使这种分化加剧，帝国主义在中国内部势力的根本来源，不是扬子江上飘泊的军舰——这是一种辅助品——而是经济上政治上中国资产阶级与外资相连，因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军事上势力之强大，故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须扩大的激烈的中国人民的力量——工农反帝国主义高潮，只有在他们（工农）生活中的切实利益与民族解放利益相联

条件之下，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城市及农村中被压迫民众之暴动，反对高利贷者，反对官僚，及地方不良的军人，都是下层群众之醒觉与他们的利益相符合，组织与训练他们，这才是真正革命的前进，也只有如此，中国社会民众才能得到社会解放。反之若是军事失败与胜利，或是右派，半右派，半左派的军官失败都不过是浮面的而已，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兴起正是推动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公开的军事上的结合，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但不能减轻工农与资产阶级间冲突，而适得其反，更加剧了阶级的冲突，以至于流血的国内战争，中国资产阶级有强健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它永远反对中国的工农，它帮助中国工农的敌人以金钱，物质，枪弹，如果想达到中国民族解放而用阶级调和的方法，停止罢工，以及农村暴动否认武装群众等等是机会主义者妥协者的幻梦，在中国解放的议事日程上，希望求得帝国主义者对孝子贤孙一点赏赐，也是一种极愚的幻想而已，马尔丁诺夫(过去是少数派的领袖，现在是斯大林的心腹，第三国际的要人！——抄者志——)所提议的代替罢工与农村斗争而以政府的仲裁机关来解决冲突，这与戴季陶先生蒋介石将军绝对没有什么区别呵！

马尔丁诺夫对中国革命的理论

三、“民族统一战线”或是说“四个阶级联合”的路线，长期的作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的领导——请看布哈林的报告第一期《共产国际》第一篇论文，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积极份子会议上未敢发表的演说，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发表的论文(4月10日)，3月16日真理报上登的社论，3月6日新闻报上加里宁的演说，3月9日真理报上的鲁来达克的演说等等——他们指出了很远的这样前途，在蒋介石叛变后，最近的真理报上反驳反对派说：中国现在的革命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府”。

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将使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错误走到原则上的

错误的极端，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上丝毫不相合的，这是使俄国和国际的少数派理论的特点，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复活，现在少数派的领袖坦氏在最近的社会主义威可斯杂志上说：“多数党也站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上，这个原则的适用直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使命之完成，在4月15日真理报上马尔丁诺夫虽负有责任的痛骂社会民主党，但是他完全照着少数派的方法，很明显的告诉了极左的反对派，——拉狄克须要保存四个阶级的联合，不要捣塌了这个联合政府，工人与资产阶级在这个政府中是可以一致聚首，不要使这个政府太早的执行社会主义使命。”（第8期4页。4，23。）

知道多数派与少数派斗争史的人们，特别是知道他们对于与自由资产阶级关系争论问题的人们不能不承认少数派的领袖，坦的吹嘘，他们原则上的正确，马尔丁诺夫的理论与此原则相符合，并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是一种规律吧！若这个理论在第三国际抬起头来，那完全是我们的罪过。

1905—1907年少数派的政策蒙蔽事变的路，马尔丁诺夫又想将此种政策应用到中国去，好像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商人把那些品质不好的在本国不能销售的商品运送到殖民地去一样，在这种情形之下，商品照旧的运出，原则上与20年前并无差别，所不同的，仅仅在那时沙皇的统治之下，而现在是帝国主义铁蹄压迫之下，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沙皇的统治有大的区别，然而少数派所用的罩子，则和以前没有一点不相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反沙皇的斗争，同是阶级斗争统不能以长期的“统一战线”为原则，关于这点，4月的流血事变已经很明显的，很完全的证明了，这种事变完全是由四个阶级联合政策发生出来的。

四、斯大林大纲中对于过去事变发生的分析中曾有这样的话：“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事实怎样，反映出来这个路线，谭平山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12。）自己的报告中说：

(注)“在国民政府开始于1926年成立时,名义上好像是在左派手中撑着,但实际上政权落在右派手中……工农运动因为受了各方面的阻碍,不能扩引到广大的群众中去,3月20日事变后,又造成了军人专政的中心——蒋介石——政治权力还是像以前一样,在右派手中撑着,这个政权按他的实质说应当是属于左派的,但完全失望了。”

(注)谭平山的报告曾出一本小册,名《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在这小册子上还有拉思图的序言,这本小册子,给了我们的事实,将所有指出来的路线都推翻了谭平山自己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混乱,并且相互矛盾,一方面说阶级斗争在中国加剧,另一方面说与这些事实相反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拉思图的序言中更表示他没有明白在中国发生了些什么?中国有些什么?中国目前将要发生些什么?这样,左派应该握到政权,但是他失掉了政府的权力,政权落在右派手中,便造成了他们的图谋,于是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工农运动不能发展了。

谭平山更进一步的描写出来,所谓绝对正确的路线与反映出来的事实,他说:

“我们在实际上是牺牲了工农的利益,……我们与政府经过长期的谈判,但始终连一个工会条例也未曾见发表……用社会各团体的名义也曾向政府提出很多的农民要求,但未得政府的允许,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而政府常站在地主方面。”这样结果是怎样得来的呢?谭平山很严重的指出下面两个原因:

(一)左派不能很好的应用权力,巩固和扩充自己的势力。

(二)右派乘我们一部分政策的错误,得施行其政策的可能。

五、在这样政治关系之下,还美其名曰“四个阶级的联合”这

完全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国会史相同，大资产阶级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跟随在自己之后，小资产阶级主张民族统一的巧言来欺哄工人，并且拉他们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到了一定的时候，妥协主义者则起来作深一层的解释，说这是资产阶级叛变了民族运动。

六、“中国资产阶级曾做了反帝国主义斗争”也是事实，然而这个证据是否可靠呢？各国的妥协派，时常这样说：自由资产阶级于相当时期是革命的，但是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帮助，仅仅是为达到与帝国主义妥协共同来反对无产阶级。北伐的结果，资产阶级比较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了，这个路线产生的结果，还不是一个迷路吗？谭平山说：“我们在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联合四个阶级维持下去，结果怎样？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大部份的胜利，巩固了将动摇的帝国主义，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这是错误政策的结果，这是不能使革命向前一步的政策。

妄想证明路线正确的大纲

七、将无产阶级政党与大资产阶级放在一个为大资产阶级占领导地位的圈栏内的政策，现在斯大林还想证明政策的正确，大纲中说：“我们的政策是当右派还服从国民党(!)纪律的时候，就利用他们政治上的联合和经验”，然而现在我们应该明白的看到资产阶级是怎样的服从纪律，无产阶级怎样的利用右派，就是大资产阶级同中等资产阶级怎样的与帝国主义“联合”，他们消灭和残杀工农的经验，将来中国革命史上一页血书还不是这种利用的结果吗？此外，大纲中又说：“相继的事变完全证明这种路线是对的”，他只有如此再不能向前走，因大的反革命事变斯大林仅得出一个很悲哀的结论：现在“孤立”的政策（孤立右派）应改为与右派作“激烈斗争”的政策，这就是说等到右派“同志”已用机

关枪向我们说话以后，我们才能与他们斗争呢！

八、大纲中还自辩的说：“预先”已料到资产阶级必然的从革命队伍中退出，难道说这种料到于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政策就算够了吗？这种资产阶级必然退出革命队伍的预料，假若不与确定的策略相符合，这不是一句空话吗？坦在上面引用加许马尔丁诺夫路线的那篇文章中说：“在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阶级的反抗会要高涨，永远统一战线，绝不可能”（社会主义威思克）这就是说，坦也承认“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队伍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实际政策，少数派则在可能范围内，无论如何要保持统一战线，应用他们的政策直到与资产阶级的政策相吻合。提出的口号和积极的群众或者要使部分的工人组织——如中国现在——服从资产阶级的组织，布尔塞维克政策就与之相反，政治上组织上要与资产阶级分开出来，在革命的初步即揭破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打破一切小资产阶级为统一战线的自欺。时常与资产阶级为争领导群众而斗争，从共产党中那些希望资产阶级或为资产阶级粉饰门面的份子。

两个前途与已往的过失

九、斯大林想把两个革命的前途相互反证出来，第一个前途就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达到此目的。第二个前途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为要使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走到第二条路上来，不仅是去说空话，应公开的说直接的说，然而直到现在所有的革命路线的领导与此路线适成反比例，反对派所以要批评和反对此领导的原故，因反对派在开始的时候，就站在列宁的观点上提议无产阶级要站在民族利益德谟克拉西革命的基础上，为争城市农村劳苦群众领导地位应与资产阶级奋斗。

十、从斯大林大纲中得出来的结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离，只是在资产阶级自己把无产阶级掉落，解除他的武装手打脚踢的时候，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照这个路去走，就是走着 1848

年革命的旧路，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旗帜，追随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后，而后者又追随在自由资产阶级的后面，并且他还把无产阶级引导入加文雅克的刀刃之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虽有其伟大特质，可惜于革命过程中又重演了一遍1848年革命中的根本错误，与1905年、1871年、1917年革命好像没有给我们任何教训一样，又好像没有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存在一样，而重复去演过去的悲剧。

人人知道蒋介石就是自由共和国的加文雅克，蒋介石做了加文雅克所做过的事，反对派开始就这样说斯大林的政策必然帮助重演一遍，此外还有补充一点就是加文雅克若没有福生罗林，路易勃浪等畅论民族统一战线，他是做不到的，这个畅论的作用在现在的中国是谁呢？不仅是汪精卫，共产党也是这样的人物，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路线则出自第三国际，假若这种错误不公开的解释出来，那末中国革命两条前途的理论，仅仅作了路易勃浪和马尔丁诺夫一种人物的玩具，换句话说，4月事变的一幕将要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一次。

中国共产党的现状

十一、为要使民主革命斗争，要依照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走，先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为主要的工具，要有自己独立的政党，在自己旗帜之下去斗争，任何时也不能使党的政策组织和其他政党混合。若共产党没有理论上政治和组织上独立的保障，所谓二个前途，简直是布尔塞维克空前绝后的一种笑话。中共在过去以及现在实际上并不是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相联合，而是服从了将军和政权都握着在自己手中的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国民党，他在政治上完全服从了蒋介石的纪律，不准批评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虽是反帝国主义同时也反阶级斗争，党的机关报为独立政党的主要工具，而中国共产党连这种权利都被剥夺了。在

这种条件之下还说是什无产阶级要争领导地位，不是自欺欺人吗？

十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服从蒋介石的国民党失掉本来面目和政治地位之无价值呢？为的是要统一民族战线，认为资产阶级是不能退出革命队伍的——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否认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斯大林在他的大纲中仅仅把这条路线作了事变后的假面具，为要证明这个政策，还说甚么工农联合，但是中央的依赖此说与“四个阶级联合”政策同样会使这种联合成为空谈，甚至于使他成为资产阶级发生作用的工具。这种依赖状况成为走到工农运动路上的大障碍，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工农联合，若没有真正的工农联合，中国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

十三、中共将来应有的出路在那里呢？斯大林大纲中对此问题虽有很简单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很容易生出大的混乱和不可救药的损失，斯大林说：与革命的国民党共同奋斗，共产党应该保证自己的独立的！此错误并不是没有原因，但在斯大林大纲中对于这种根本问题，竟一字未提，只说到“更应”保障自己的独立，这就是说理论上政治和组织上无产阶级的政党，还要依赖会变成资产阶级工具的小资产阶级政党。

十四、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之发展，只有共产党中之优秀分子能够毫不客气的批评自己之下，帮助他们直接的任务，假若不在很短的时期内将此种少数派的理论完全洗清，企图掩藏从前的错误，不容许尽量的讨论，使中国在最危险的环境中，那么一定要发生分裂的危机，而各派将很激烈的斗争，并且机会主义的失败，会使中国发生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群众运动与职工运动，虽然不断的加速发达，农村中农运不断的起来，假若共产党仍旧照从前一样，成为服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质量上还是一个无力的陪客，加入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政府，那时就应该直接了当的说，在中国现在还不是组织共产党的时期，因为不组织

共产党是要比它在革命中着着用血换来的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变成一个奇异的传闻吗？

谁估计错了革命步骤

十五、在斯大林大纲中特别指责“反对派的错误”，大纲中本想去矫正反对派的左倾，但斯大林自己的错误则走到右边去了，正所谓矫“左”过“右”呢，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模糊难找的出路，并且推动领导路线向妥协方面走去。

十六、主要的诬蔑“反对派”为不明了革命步骤之不能很快的发展，不晓得他为什么提出十月革命的步骤，假若提革命步骤问题，那测量此步骤的不是外面的，十月革命的工人所能的，而是应出自中国革命内部的阶级关系，中国资产阶级并没算到中国革命很快的步骤，她在1927年4月完全抛掉了统一战线的假面具，尽其全力消灭革命，中共追随国民党左派之后，受这种打击，表示出完全没有准备，这是什么原因？因为领导者估计的步骤太慢——无希望的落后——有尾巴主义的实质。

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4月23日共产党中央和武汉“左派”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在此宣言中说：我们后悔，事前没有准备，现在我们只好说一声真实的惭愧吧！（4月28日真理报。）

这几个忏悔哭泣的字中除了作者的原意外，已经把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步骤的估计无情的驳复了。

十七、在工人自己趋于独立斗争的时候，而我们继续与加强与资产阶级去联盟，我们想去利用“右派的经验”，因此一切工具都握在右派手中，我们采用的政策同鸵鸟一样的把自己的党藏隐起来。1926年3月20日事变，惨杀工农以及一切国民党领导反革命的性质的事实，都不在自己的党报上登载出来，我们忘记了保存自己党的独立，我们没有组织自己的党报，“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谭平山——我们在军队中没有丝毫的进步，未

能抓着大批的兵士，我们准备了造成蒋介石军事专政的中心，换句话说，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事变前，我们夸耀了蒋介石，我们确信了蒋介石服从纪律，我们能干的政策，会战胜中国革命右倾的事变——谭平山的小册拉思图的序言——总之我们对于事变的政策，都是落后的，在每一步中，我们为顾全资产阶级的利益，失掉了革命发展的速度，造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顺利条件，左派国民党对于这些事变只说了一声：“真实惭愧”。

十八、现在有无革命中心，或是创造个革命中心，在中国革命现在情形之下，大纲中说：“蒋介石叛变的意义，就是在中国南方形成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军队，和两个中心，武汉是革命的中心，南京是反革命的中心。”只从表面的和用很笨的方法分析中国现在的情形，必难免于错误的，并不是很简单的把国民党分成两个，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应该在新的阶段力量上来分析，倘若认武汉政府是一个现成的中心，他将继前业，继续北伐，这无异认这次事变（4月12日）的反革命，为一种个人的“逃跑”，或是简单的一回事就完了，如此去看简直是什么也不懂，工人不是很简单的失败了，而是由于他们的领导者之无能，群众现在认识对于左派国民党和跟他跑，就像昨日他们对整个的国民党一样。能否这样想呢？现在所有的斗争，不单是反对以前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军阀，并且反对那些因为我们的政策错误而占领所有的军事机关和大部分的军队的“民族资产阶级”。

为要使革命发展到更高和新的阶段，必须把受欺骗的群众拉到自己方面来，唤醒那未觉悟的群众，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就要指出那可耻的政策，并且要扫除净尽无论任何人假若还使“牺牲了工农的利益”——见谭平山的报告——帮助那所谓四个阶级联合的政策，徘徊不前，就应该不客气的请他们从共产党中出去。经过流血的事变以后，统治在空中的国民党旗帜还没有放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我们不要给人夺取”！斯大林曾说这

样的话——这种简直是离了实际不知多远，是多么的可怜，要放于九霄之外去才好，群众所需要的只是革命的大纲和从自己队伍中组织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的为保证自己内部的战争机关，上层份子所组成的武汉政府是放弃这使命的，担负这种使命的只有工农兵苏维埃和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才有可能。

苏维埃与武装工农

十九、斯大林极力反对苏维埃口号的必要，同时他又几次的声明，“反对反革命的主要工具，就是武装工农，他是消毒的良剂”。对于武装问题两方都无异议，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为着革命的利益而武装工农，只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计算。第三国际的代表实际上恰与武装工农在实际行动上成了反比例，又怎样解释——见四个同志给俄国在第三国际中代表的信——虽然有武装工农的完全可能，然而在实际中表现完全没有武装，又怎样解释呢？这还不是我们希望不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不致他受痛苦，不使他向右转的政策所致吗？需要武装工农的时期，而没有这种武装的良剂，现在一般的工农群众特别是武汉的，还没有得着武装起来，为什么呢？为的不使汪精卫动摇。

二十、武装工农自然是很好的事，但必须有个正确的政策，国民革命军实质上不是南方的武装农民么，然而武装农民不是对反革命的消毒良剂，他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为什么？因为政治领导者（指反革命——译者）仅仅仿效了苏联的政治部，党代表，等等的皮毛，而没有阶级的政治训练，实际上这就是因为没有苏维埃作一个中心领导，机关政治部党代表等等，若是没有对立的革命政党，没有兵士苏维埃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欺骗群众的工具。

二一、斯大林根本否认组织苏维埃，认为苏维埃只是个口号，只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口号”，我们要问，武装工农要反对那

一个呢？是不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呢？

武装工农的口号差不多仅仅成为纸上的空谈，成为欺骗群众的工具，若要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就与工农兵苏维埃毫无二义，难道说武装工农将要忍受他们的敌人政权的压迫，任由仇视他们的官僚放肆吗？实际的武装在现在情形之下必然的造成苏维埃政权的形式。

二二、再进一步说：谁来武装工农群众，谁来领导这武装的群众？当国民革命军向前进攻，北军被缴械的时候，自然易于武装工农，此时唯有工农兵苏维埃是反对反革命的“消毒良剂”。过去的幸不可挽回了，现在的时局更转变愈大工人自己获得少数军械（是不是他们错误呢？）而从工人手中没收去了。北伐停止了在这种条件之下，武装工农是极重大，同时也是困难的任务，认定组织苏维埃还非其时同时又提出武装工农的口号，这真所谓乱纷愚昧已极！殊不知革命前途发展过程中只有苏维埃是事实上武装工农群众和领导武装群众的一种组织！

为什么不能组织苏维埃？

二三、斯大林答复本题说：“第一苏维埃不是任何时都可以组织，组织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假若这句话是对的，那就延迟了革命发展的步骤，不组织苏维埃于最后剧烈斗争之先，我们已经是错误了，已成不可挽回的过去事实了，假若认中国革命将消沉至长的时期，此时群众对于苏维埃口号自然没有回声，然而在此时要武装工农的口号也是没有根据的了，我们认此政策的不正确之结果，还不致于这样的沉重，我们认为在最近的将来有许多新的革命高涨之顺利与可能，蒋介石被迫不得不与群众调膀子，允许工人以8小时的工作制，施些小惠于农民，当农村革命向前发展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蒋介石场合之下，不难造成更顺利的革命条件，于最近的将来刚刚失败的

无产阶级先锋队，应重整旗鼓向前进攻。无论在一二月之前后，是否进攻，我们总要在议事日程上准备着我们的大纲，口号和组织形式，换句话说，就是要提苏维埃的口号，使之与中国革命前途并进，使之与革命的命运相互反映。

二四、大纲中说：“第二，苏维埃的组织，不是一种无益的会议，苏维埃政权应该是反对现存的政权和夺取政权的机关。”苏维埃政权不是一种无益的会议要算是大纲中唯一正确的理论，然而一个革命者提议武装工农也不是无益的会议吧？谁说于现时阶段中组织苏维埃，结果是无益的事，而武装工农，才是重要的事，那么他不是向自己开玩笑，就是向别人开玩笑。

二五、斯大林反对组织苏维埃的第三个理论根据：“就是因为武汉政府内几个左派国民党上层分子，在4月23日的华美的宣言中对蒋介石的叛变说了几句惭愧的话，于是斯大林就说他们是革命的，若组织苏维埃，即是暴动起来反对左派国民党，因为除去左派国民党之外在武汉境内没有第二个政权。”

以官僚式的关系对反革命政策的问题，从以上这几个字中完全表现出来了。分析某一政权不根据于阶级斗争之扩大而根据于对国民党的希望，不啻某阶级加入和退出革命队伍，与革命前途毫无关系，国民党的政权，依然是继续存在着似的，就使这种观点是正确，也不能说这是在革命中有了保障，国民党右派已经有了反动的买办官僚，而右派的国民党有什么呢！可以说差不多什么也没有，苏维埃口号是号召群众起来组织实际的政权机关——经过两个政权的过渡时期。

二六、苏维埃对于“武汉境内唯一的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应该取什么态度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下列的方式：苏维埃对于革命的国民党的关系，将要以革命的国民党对苏维埃的关系成正比例。换言之，就是根据苏维埃怎样组织起来，怎样的武装和巩固起来，所以为民众而成立的政府，必须自愿的受他裁制，因为

苏维埃的制度之所以可贵，特别是在革命时代，就是他能够保障中央与地方的一致。

二七、斯大林于1925年曾称国民党为“工农政党”(?!)——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 264 页——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相符合，据斯大林观察国民党的基础，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殊不知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实际的情形是工农跟着国民党跑，而使他们向前跑的则是资产阶级，并且我们还知道资产阶级要使他们向那方跑，这样的党，我们把他叫做资产阶级的党而不叫做工农的党。现在资产阶级得到“休息”以后——就是她打散了没武装的工农与没准备的工农以后——据斯大林的意见革命已转入了新的阶级，“工农政党”的左派国民党，就在这新阶级中应当占据领导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要问，国民党既是工农党，为什么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又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权呢？

二八、斯大林反对组织苏维埃第四个理论根据：“组织苏维埃就是给了中国民众的敌人，以新的攻击中国革命的工具，使我们的敌人有新的造谣中伤的可能”。他们可以说中国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莫斯科苏维埃化”的人工造品。

明显些说吧！斯大林以为若我们发展扩大和巩固民众运动，那末，中国民众的敌人将会以他们所有力量去造谣，中伤为能事了，此外别无其他的意义，不然，就是毫无意义。

中国民众害怕真正的莫斯科苏维埃化吗？不会的，斯大林既不是中国民众的敌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论据呢？这种论据在中派右派左派等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政治之中都装饰成莫斯科的保护色了。他们组织起党代表，政治部，宣传部，中央会议监查委员会等等。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怕把莫斯科的形式搬到中国去，他们为达到他们的目的，尽力的穿戴上这些装饰品，他们之所以要用这些形式，自然他们不是敬爱莫斯科，而是因为这些形式在民

众中已“通俗”。中国的农民会知道苏维埃将给参加苏维埃的农民以土地，不知道的还想求知呢！中国的工人知道苏维埃可以保证苏联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蒋介石叛变的经验中先进的工人应该知道：没有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机关，没有保证无产阶级与城市中农村中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联合机关，革命是不能胜利的，组织苏维埃是纯粹出于中国民众自己的经验，怎能说是“搬运莫斯科的苏维埃化呢？”我们的政策应该适合群众的革命和客观的需要，而不要根据敌人的言论或是怕敌人造谣中伤。

二九、有人说：武汉政府冯玉祥，唐生智，操纵了武装的力量，这是事实不可否认的，而武汉政府冯玉祥，唐生智，都不愿组织苏维埃，若组织了苏维埃，就会与这些同盟者断绝关系，大纲虽直接没有这种理论，关于武汉政府，我们从斯大林口中听到的是“革命中心”与“唯一政权”，同时在党的大会上，替冯玉祥大吹大擂：“工人出身”“有希望的革命者”“稳健可靠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复过去的错误，果如此作下去，那就要失败，武汉政府和军事领袖们，自然要反对组织苏维埃的，他们不愿意解决土地问题，因为他们与地主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他们要向右转而与地主，资产阶级妥协，而我们之所以要组织苏维埃之重要也就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推动武汉政府向左走将反革命逐出。

三十、如果苏维埃不与“唯一的武汉政府”争斗，这岂不是形成两种政权的基础吗？谁若想不只在空话，而要在实际上巩固工农政权，就不能不明白这种政权是要经过两重的时期，这两重政权时期之延长与否，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何，是要按“唯一政府”之实际表现何如，共产党之独立及其工作与苏维埃发展之速度如何，而定我们的任务，就是量力增加二个政权中之工农成分，这就是准备着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德谟克拉西的纲领共同发展到底。

三一、“在扬子江中数十只帝国主义的军舰，随时可以开到上海，汉口等处的条件之下，组织苏维埃不是痴人说梦吗？”这个论据虽然在斯大林大纲中没有，然它是在广大的党内会议上巡行着（马尔丁诺夫，牙洛斯拉夫等等这样说）马尔丁诺夫想大不列颠之军舰恐吓和消灭苏维埃的意义，并不是他的新的创造，1917年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曾恐吓我们说：“苏维埃要夺取政权，会引起协约国占据卡限斯坦得和彼得格勒”，我们的答复，则认为只有广大的革命运动才能拯救革命，外国帝国主义者承认中国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利于中国资产阶级妥协，他们才能够在中国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条件之下，因为整个的国民革命都会爆裂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基础，引起与帝国主义的冲突，自然必不可免，过去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并未使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事件，免除及工人免死于蒋介石机关枪下。由此我们过去的经验证明：中国革命只有渡到广大群众基础之上，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加深革命的社会大纲，才能够纷乱外国的军队及唤起士兵的同情，与苏维埃真正保证革命于外来打击之下。

斯大林应用什么来代替苏维埃呢？

三二、斯大林以“建设革命农民委员会职工会和其他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实质上就是准备将来苏维埃政权的基础”，然而这些是什么呢？我们在他的大纲中，连一字也找不到所谓“准备了将来苏维埃的基础”，这仅是一句空话而已，没有实际意义的，这些组织应有的作用，现在是什么？他们应当指导罢工排外货折断官僚机关的脊椎骨，打倒反革命的军事强盗，消灭地主，解除高利贷者及富农的武装，来武装工农，这就是解决所有的农村民主的任务，推进以至于夺取地方政权，实际上这不是苏维埃？然而斯大林不能正其名的执行这些任务；反而提议——如果从总的方面看来，这个提议是重的——替代苏维埃，以苏维埃的代用品。

三三、所有以前职工会所执行的任务，已近于苏维埃的作用（香港，上海，武汉等地），然而要完成这种任务，职工会是不能的，他包含着工人太少；他不能容纳完全的与无产阶级接近的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实行指导罢工。怎样能使下层群众少受损失：分配粮食，参加征税的政策，参加武装组织的任务，（指导农村革命且不说）只有在指导机关不仅包容整个的无产阶级，并且要密切的在日常生活中与城市农村的劳苦群众相连系场合之下。从蒋介石政变每个明白的革命者的脑筋所受的打击中，就应该觉悟到军队与职工会，在过去是分离的，假若存在了兵士代表苏维埃，就与此情形完全不同了，敌人仇视职工会与农村委员会，要反对敌人的攻击都比苏维埃里弱得多。无产阶级与城市农村被压迫的群众联合，除了苏维埃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能够实现这种联合。否认这种事实的人们，就是相信那些上层分子，妥协分子，不相信下层的革命群众。

与左派国民党破裂吗？

从上面所说的已经很明显的看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分裂只是一种恐惧。大纲中说：“这是等于从战地退出丢掉自己的同盟者——国民党，是敌人所愿意的事”这种漂亮的话，完全不与实际相合，不是说与国民党分裂而是准备着与国民党联合，但是绝不是站在服从的原则上，而是实际的平等，革命的国民党还正在组织中，我们主张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工作，是要把工农渐渐拉到自己方面来，训练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不要跑到步步动摇的国民党之前，而应公开的，直接的，用自己的名义，自己的旗帜，把工农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事实上给国民党以一个例，看他（共党）是一个群众的党，帮助国民党前途；毫不放过的指出他们每次的摇动与向后转，造成与国民党联合的真正革命基础。这就是造成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三四、无因的造成与认定、反对派赞成政治上“孤立”中国共产党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与说反对派赞成退出英俄委员会相同,这两种诽谤都是拿来与国民党右派及叛卖工人阶级的英国总工会联合的假面具,反对派尽所有的力量来巩固和发展与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拥护工人与城市农村的劳苦群众密切的联合,为革命的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而奋斗。

(一)当共产党牺牲工农利益具了空想的目的,而与资产阶级同盟在革命的营垒内,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联合形式是不妥当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原则的。

(二)极端否认这种联合的形式,就是直接的间接的拯救党于其他阶级监视之下,自己的党完全独立。

(三)共产党取消自己的旗帜为同盟者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影响与威权,这种联合形式应该反对到底。

(四)联合应该明显向着共公的任务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建筑在暧昧之外交的,动摇的形式上。

(五)创造完美的正确的群众周知的合作条件及任务。

(六)保留共产党批评同盟者的自由,监视同盟者同监视敌人一样每分钟都不要忘记,若同盟者依附了其他阶级,他就成了敌人的力量。

(七)与小资产阶级群众联合,应高出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

(八)最后应注意到自己,注意到自己的组织,注意自己的武装和力量,保有这些条件,才不是仅仅与动摇的而可以开倒车的上层分子联合,而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真正革命分子联合,这种联合是应依靠于城市农村被压迫群众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之下而形成的。

德谟克拉西革命或是社会主义革命

三五、妄加以诬蔑之词，说反对派认中国革命，目前直接就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批评”也没有什么希奇。1905年前后，少数派不止一次的毁骂多数党。如果目前俄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那列宁的政策才算正确。列宁则对他们说，多数党的政策，为使德谟克拉西的革命彻底完成是唯一道路，而在某种适宜条件之下这种革命，就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

三六、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列宁是有条件的提出。列宁对于我们都很明显的知道，仅仅中国革命本身的力量而无已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苏联和世界革命先进无产阶级的帮助，则中国革命只能给资本主义发展开展以宽阔的大路，给工人运动以优良的发展条件。

三七、中国共产党之是否能独立存在，他是否需要与国民党联合或服从国民党，苏维埃是否能继续巩固起来，以及其他，全要看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与速度而决定。中国完全有成为资本制度议会式的可能，中共也曾称赞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如果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革命，不在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要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的制度。再等到世界革命在历史的路程上开一新阶段，则替资本主义制度以无产阶级专政方能实现。

三八、第一，完全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之不可免。

第二，这种论证，对于我们很重要——因为解决资产阶级的任务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国民会议本身是一个空洞口号，一种骗人的东西，如果不说明谁怎样在什么政纲之下去组成；蒋介石明天可以退出国民会议口号，反对我们，与今日提出工农大纲反对我们一样，组织国民会议不经过蒋介石而经过工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才是庄重的正确方法。

三九、布哈林企图证明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是正确的，故认中国的“封建残余”作用，在经济中占优势，岂知这是根本无用的企图，如果布哈林站在经济观点上，分析中国革命而不是空想。“封建残余”总是不能证明4月事变政策的正确，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形式，帝国主义依据海关来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及限制内部的市场，就是说诞生，或保护落后的农村经济的生产形式，及旧式的剥削的残酷压迫形式过剩人口的增加，更加速了穷困及奴隶的情形。

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封建”成分，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消灭，就是说不是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是与他直接斗争，愈在丛杂病态的农村制度与资本主义相互交错形式之下，则解决农村问题，不能用上层立法的方法，必须使农村群众密切的与城市工人及贫民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进攻，才能解决。若与资产阶级地主同盟，而忘掉了自己在群众中工作，服从四个阶级联合政策的错误，不但是准备了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合，同时也就保存了野蛮残忍的剥削形式于农村经济的生活中。

反对组织苏维埃于资产阶级性的中国革命中，等于忘掉了1905年，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给我们的教训，当时革命目前的根本任务是推翻沙皇及消灭农奴制度，这未尝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然而他要求武装工农又组织苏维埃。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曾说：为着真正反对沙皇，保存自由，不是空口说白话，唱资产阶级的漂亮高调，所可能的，不是工人应当帮助新的政府，而是政府应当“帮助”工人，因为自由的唯一“保障”要使沙皇制度破坏到底，唯有武装工农，巩固扩大发展工农兵苏维埃的力量，作用及其意义方有可能，此外则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激进者政客自欺欺人之说。帮助武装工农不但不违反历史的使命，而且促进完成俄国的再无人能够战胜的自由，君主不能复辟，共和国得到保证，反之，那就是欺骗群众，给他们以一钱

不值的报酬，“革命给人民以粮食”的口号，在所有资产阶级的革命中，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工人应当帮助资产阶级——取消派的人们是这样说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说：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人应该启开民众的眼睛，看清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教训他们不要相信资产阶级的空话，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结，自己的武装！（列宁）

中国革命者应该从他的脑子内将现有的决议案弃掉，深刻的思考，将那四个阶级联合政策，与列宁这段简截而着实的话对照一下，才不至于错误，才能完成目前的任务。

中国革命与英俄职工联合委员会

四十、中国革命的领导不仅仅是局部的政策错误，而且根本的路线不正确，从上面所说的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假如将中国革命的领导路线与英俄委员会路线相比较，那就更明显了，英俄委员会的机会主义实践线虽不能说与中国演出来的一样，然而大体上都是领导路线的机会主义倾向。

四一、在英国与在中国所有的路线都是“巩固”与上层分子的个人的联合，外交上的联盟，实际上是放弃了扩大革命与左倾民众和卖阶级^①领袖之间的画分，追随在蒋介石之后，使中国共产党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最困难的条件，追随在的斯失列、喜克同、画特林（都是英国黄色职工领袖，——译者）之后，苏联职工会在原则上是在职工运动中取得中立的态度，承认英国总工会是英国无产阶级唯一的代表并承认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

四二、英俄职工委员会在柏林会议的决议案，不啻说我们在将来拒绝帮助罢工和反对工贼的意志，这些决议的意义，是将职

^① 原文如此。

工运动的少数派，(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是革命的成分——译者注)完全弃掉，因为我们承认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唯一的代表。正是职工运动少数派所视为卖阶级的东西，并且还大声的声明“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在原则上这已经是投降于工人运动的民族自限的范围，再向极端走一步即为保守的形式。

四三、蒋介石说我们干涉中国的内政，喜特林说我们干涉英国工联的内政，蒋介石喜特林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谤诽，都是反对于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有利的工人国家，在这种情形，或另一种情形之下，蒋介石与喜特林，固然有条件的不同，地理的不同，有时会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然而他们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去与这种领袖同走，我们不能不被截断了与群众结合的可能。

四四、英总委员会卖掉大罢工以后，我们作了不正确的政策，不但维持了他的动摇地位，而我们根本的去接受这种要求在漂亮好听的领袖地位之下，我们对中国革命与英俄工人运动，好像是操必胜之权，结果则准备了特质的失败，机会主义的动机常常归于相信自己的路线。

四五、英国职工会的领袖们从全苏联职工会中得了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的期票，使张伯伦(英国外交总长——译者)夸耀他们与布尔塞维克斗争的能干比哀的美敦书的恐吓更有效力。张伯伦并用一方面是总委员会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有不列颠帝国的政策。

四六、以鲍尔温(英首相——译者)和张伯伦愿意英俄委员会关系断绝为前提来攻击反对派，说反对派实际上是帮助他们，实际上是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手腕。鲍尔温恐怕苏联职工运动强烈的影响英国的工人运动，英国资产阶级未尝不抑制总工会，但是对那些总工会领袖们的抑制，资产阶级从各方面得着胜利。总工会的卖阶级领袖拒绝接受苏联职工会捐助英国罢工的矿工工人，我们还与他们讨论帮助矿工工人问题，英国资产

阶级压迫总工委员会，经过总委员更压迫苏联工会的代表。柏林会议中英国资产阶级从苏联的职工代表得了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的让步，这样的英俄委员会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是有利而无害的。——见泰晤士报宣言——张伯伦，鲍尔温，愿意英俄委员会断绝关系，是想更进一步的经过英俄委员会来压制苏联职工会，英国资产阶级从各方面都得胜利，而我们无产阶级则无意义的失掉了一切。

四七、也曾听到过无稽的谬论，说蒋介石不同意，反对派的中共应退出国民党不啻把曾经对他的将领，说过似的，其实这个论据，只可证明蒋介石的欺骗伎俩和虚伪，为自己粉饰好从背后来打工农群众，想蒋介石无时不是反对与共产党联盟，而反对派则无时不是反对与蒋介石联盟，所以马尔丁诺夫得到一个反对派，“一般的”政策是由反动的结论来。难道这是奇怪的吗？不是的，布尔塞维克的发展是随着孟雪惟克（即少数派——译者）的诽谤而发展的，他们说布尔塞维克反动，布尔塞维克帮助贵族反对资产阶级，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雪维克等的话，列诺迭克说，法国共产党希望分裂进步党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帮助了普恩贵，法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的声明，说苏联不加入国际联盟实与帝国主义非常有利的的工作等等的话。

蒋介石以为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应该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断绝，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应该与大资产阶级断绝，这种的事实，不是证明他们同情于反对派，而是证明这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的仇视，懦弱的妥协派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说两个极端相反的阶级为分裂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帮助了反动者。骂反对派的政策与蒋介石，张伯伦托马斯的相同，其实这些妥协派，未能彻底的了解，无意义的承认反对派的路线为无产阶级革命性质。

四八、英俄职工联合委员会的柏林会议，正是英帝国主义对

中国施炮舰政策之时，然而并未坚决的提出有利的方法实际去反对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惨杀，就是这坚决的方法，也通通未加采纳，难道说这不是一个英俄委员会不能找到反对战争任何方法的明显证据吗？英俄委员会不但不见其利，反而成为革命运动的大障碍，因为他们可以说他们与苏联职工会同是为“争和平”这种谎诈方法会使英国工人受着催眠术。苏联职工会在其中的作用便促成了英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保护英国职工总委员会变节的国际政策，这不是减弱与和缓英国革命分子反对职工总委员会的力量吗？白列亚利喜克司和他们的党徒麦克唐纳尔，托马斯使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催眠术状态中，直到战争临头还没有觉悟，而战争开始后就号召工人阶级起来保护德谟克拉西的祖国。托马斯近来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批评马克思苏俄职工领袖及其他是资产阶级的雇用者——真理报5月8日，而关于麻醉工人阶级的白列亚利喜克司一字未提到，好像是没有他们一样。为什么？殊不知没有他们就没有托马斯的政策存在的可能，没有托马斯就没有鲍尔温保守党政府存在的可能。帮助那个与我们联合的白列亚利实际上是帮助英帝国主义，且加重了他压迫中国革命。每个学过列宁主义的革命者，详究那些发现了的事件，不能不明白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观念，促成了4月政变，实是与蒋介石联盟的好结果。

四九、阶段论。一个国家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根本趋于机会主义的动力，自夸的“阶段”论，斯大林已不止一次的声述。要求中共政治上组织上须有完全自己的独立是越过了阶段，要求组织苏维埃吸收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国内战争是越过了阶段，要求与卖掉工人阶级英国职工总委员会断绝关系，也是越过了政治的阶段。保守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军事专政的蒋介石，英国职工总委员会以及一切统治阶级的特权组织，障阻革命运动发展的组织都用越过阶段的观点来观察，岂知广大群众

还未走到这伟大的历史阶段的时间，他的先锋队就应该很能干的应用自己的政策来破坏这个阶段，我们过去所有的政策是落在革命之后，以至于变为保守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事变，英俄职工委员会的命运，就是给予我们严重的警告。

五十、去年英国总罢工的失败，现在中国革命未能影响国际工人运动，不啻 1923 年德国工人失败未曾给我们的教训一样。此种政策的结果会一时减弱了革命运动，完全有害于自己，如再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国际策略，这种现象还要继续下去。现在革命潮流退落之时，比以前更应激烈的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民族自限的倾向，为着国际主义而奋斗。

原则上承认不干涉政策，就是证明领导工人阶级趋向于保守，一部分落后的工人会想出无须帮助英国大罢工和中国革命，他们会相信他们的领袖告诉他们的话：“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成功，我们也能在我们的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假若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所以我们应当用和平政策，不用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我们帮助中国革命和某国工人运动不仅得不到实际的利益，反会推动世界资产阶级用军事来干涉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我们的命运是很危险的。”

无丝毫疑义，当新的国际革命运动失败以后，一个国家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的创造者，根本是限制革命潮流的高涨而趋于民族自守。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错误要产生许多错误，造出布尔塞维克以外的路线，认批评与警告为眼中钉，自己走到右边去了，反而给左边一个打击。前途依照这种路线走下去，那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将有莫大的危险。对于这种危险若默而不言，不告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叛贼。

我们毫无疑问的说，错误是可以更改的，我们可以找到无危险和损失的路线，事实与过去的经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只要我

们的党，苏联的党，国际的党细心的妥稳估计事实，从事实中求得符合事实的结论，那我们坚决的相信，我们的党会做到革命的统一的精神。

1927年5月7日 托洛斯基

(录自《中国革命与反对派》，上海民志书局1929年9月版)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 中国问题的争论（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
（1927年5月18日—30日）

布哈林的报告

党员同志们：很遗憾，我今天的报告不仅要分析各种对我们十分重要的客观联系，而且要对一些论据和文件作出回答，因为本次会议向大家分发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所以，很遗憾，我不得不涉及我们的反对派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还要与这些同志在这里进行论战。

首先，我谈谈托洛茨基同志对我们批判反对派的理由所持的看法。这里分发的提纲《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第14页上有这样一段话：

“反对派过去遭到了而且现在仍然遭受令人愤慨的批判，就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列宁主义观点，即继承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城乡范围内，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争夺对被压迫群众领导权的观点。”

特别是外国同志，对讨论的各种问题不甚明了，所以，我必须验证一下托洛茨基这些话是否真实和可靠。这里有极其重要的文件和极其重要的事实。下面我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小册子《中国和摩洛哥》出版的年代——1925年谈起。我们在这本小册子中

看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谈到东方各国的民族纲领时说：‘苏维埃的思想对广大人民来说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接受，那么亲近，以致他们也将找到像印度和中国那样的道路，无疑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这些国家看到苏维埃形式的政府。’”

季诺维也夫然后说道：

“同志们：将来，运动的**最后阶段**就将变成这样。目前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而且也不会马上走到这一步。中国工人阶级在运动的现阶段必须把中国人民的全部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便给它的死敌，给全中国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我说的是日、英、法、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全国性的联合是必要的。”

我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这段话中得出以下结论：1. 按照季诺维也夫1925年的观点，应该把苏维埃这个口号视为革命的最后阶段的口号，而这一阶段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阶段；2. 苏维埃这个口号是与这个最后阶段相适应的；3. 当时，全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必要的。

马尔丁诺夫非常清楚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下面我谈谈1925年。

我们尊敬的党员同志们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我认为就是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这次全会从去年2月底3月初开始到蒋介石举行第一次政变，即去年3月20日结束。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任共产国际主席，实际主持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历次会议。当时，我们看到现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胡汉民也曾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并且发了言；而他实际上是整个蒋介石集团的首领。当时他来莫斯科，是因为他几乎被蒋介石驱逐出广州，不是因为他太左，而是因为蒋介石认为他太右。季诺维也夫对此很清楚。人们一点没有起哄，当然，这次政变与己无关的想法并不

鲜见。但总觉得这方面的问题相当复杂，极其严重。我请求同志们允许我在此列举一个事实，看看季诺维也夫同志当时的言论。我从这次扩大全会的记录中抄录了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中国问题上的所有论点。他的论点颇有教益！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谈了世界革命的行进路线的问题，并作了论证和以下光辉预见：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世界范围内的局势，那么，完全可以断言，种种迹象表明，欧洲革命已列入议事日程，而东方问题可以暂缓考虑……所以我们的次序应该首先是欧洲，其次是美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会议记录第18页）

我认为，嘲笑这种陈词滥调是多余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不是他的发明。还是撇开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预言，谈谈一些具体问题吧！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执行委员会开幕词中说（我强调一下，这是在蒋介石3月20日举行政变前几天说的）：

“此外，我们已经说过，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绩。这个年轻的党已经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革命运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这个民族革命政党在密切合作，最近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增加了2倍，而国民党增加了6倍。

我认为，这两个比较年轻的共产党……”

这两个年轻的共产党，这也许是一个印刷错误或疏忽，然而，不论俄文版还是德文版却都是这么印的：

“在这一年里完成了巨大的历史性工作。最近可以期望它们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两个党证明，共产国际不仅牢牢扎根于西欧，而且牢牢扎根于像中国这样一些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的国家。”

你们看，这段话也丝毫没有反对联合政策的意思，也没有对国民党右翼提出任何反对措施。季诺维也夫同志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他的报告有一节是专门论述这些问题的，但你们认为他这是对什么“宣战”呢？是对共产党的右倾错误还是对国民党右翼？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我本人在这篇报告中极其意外地发现，

他的批判是针对中国极左派的。那么，这个“从一开始就对事变作出正确判断的反对派”说了些什么呢？它说：

“我们深信不疑，我们在那里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已经说过，我们应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东方问题上，因为我们是世界性的党，世界性的国际。可是在这个方面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极左’的夸张说法。如果某一个中国革命家……”

也许是像胡汉民这样的一个领袖人物吧？

“直接参加过中国的革命斗争，现在来到莫斯科并声明，当然是抱着真诚的信念声明，他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讲话的，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在中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你们看，他在这里只字未提阶级政策。接下去他说：

“同志们：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抱任何幻想或忘乎所以。我们要看到，成绩是伟大的。我们在东方建立的这种联系，是第一国际即马克思的国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国民党拥有40万党员，明天，历史就有可能使它在中国掌权。这样一个政党如果能与我们联合起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时人们有些飘飘然是不足为奇的。”

所以，如果托洛茨基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这一切”，那么，这个第二阶段论是一个错误的、不恰当的论点。

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这个阶段在时间上与蒋介石去年3月20日的行动是分不开的。当时蒋介石几乎要逮捕几个国民党左翼人士和我们的一些同志，其中包括那位出席今天会议的同志。这件事第一次表明了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

当时谁也没有谈到这个伟大的揭露运动！这些同志，其中包括托洛茨基，谁也没有要求提出任何警告，仅仅提议不要激怒中国人，这就是对这次事件作出的反映。

还有一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当时是我们党的政治

局委员，对当时我们奉行的政策，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是负有责任的。这就是第三个阶段。

接着是第四个阶段，即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在座的同志大部分出席了那次全会，我们在这里可以完全一致地、百分之百地断言（甚至伍伊维奇同志也同意），我们的反对派当时就中国问题绝对没有讲一句话。

反对派既然从一开始就已预见到了一切，那它为什么避而不谈中国问题呢？我不知道这个“一开始”是什么意思，是开始于创世纪还是开始于另外一个什么时间。托洛茨基写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一切并与我们进行了论战。可是，我们当时根本一句话也没有听见。

不错，我们曾经听到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声音，但说的不是中国问题，而是他们试图搞宗派的问题。对一些问题本应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本应给予切实的帮助，然而，我们无法向我们的反对派提出这类要求。昨天，我查阅了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的所有文件，我敢保证，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荒诞、无耻、虚伪的文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出席第七次全会的，他们可能听说过谭平山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讨论情况以及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可能还听说过，共产国际，首先是委员会，尔后是全会纠正了谭平山的一些错误，我们揭露了共产党路线方面的一些错误。我们还纠正了谭平山的一些错误，特别是重大错误。这些完全被人遗忘了。但是，在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以后的今天，在本次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同志就一个激动人心的文件——谭平山的讲话，写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

托洛茨基做得更为出色。他批判了斯大林的提纲，仅仅因为斯大林在提纲中说了总线线是正确的，于是托洛茨基同志就说，第七次全会通过的总路线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只要看看谭平山那篇

激动人心的文章就一目了然了。谭平山这个讲话是在我们通过总路线以前作的。托洛茨基却说，谭平山的讲话反映了总路线方面的所有错误。这是对事实毫无所知的表现，或者说是 dishonest 的表现。在第七次全会上，我们没有听到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等同志发表过正确观点。当时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人对决议有任何意见。即使在今天，人们对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没有提出过任何意见。

即使在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第四个阶段时，我们也没有听到我们的反对派说过一句聪明的话。这里还有一篇专门的作品，那就是拉狄克同志的作品。他大概是帮了一些忙，作了一些预见？现在我觉得他是最糟糕的。我只引证他在 1926 年和 1927 年写的东西。他在为米夫同志的《上海事件的教训》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上海事件加强了中国第一个工农政府即广州政府。”

至于对实力和重要现象的评价，即对国家政权的性质的评价，拉狄克同志在 1926 年认为广州政府是一个工农政府。这是极端错误的。

1927 年，拉狄克在一本为青年教育特别是为中国青年的教育而出版的大学生丛书（第 1 卷第 251 页）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写道：

“从广州政府的社会税收政策和农业政策看，它是第一个工农政府（着重号是拉狄克加的），仅这一点就为……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创造了条件。”

现在你们说，这一句简短的总结是否支持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上述提纲。

在此，我还要顺便谈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攻击。马尔丁诺夫同志说过，按广州政府的性质而言，它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我认为，这个说法的不足之处只是它没有强调这个联合政府是由一个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但

是，以讽刺的口吻去谈论“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则是可笑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全国性的联合难道不是一种联合？什么叫联合？就是一个阶级为了某种目的支持另一个阶级。我们说这是一个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种说法完全正确。

但是，马尔丁诺夫的措词不当和中国问题专家拉狄克同志的许多错误说法绝对不能相提并论。拉狄克把广州政府称为工农政府，这是颠倒是非。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反对派从一开始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简单地保持沉默，或者同意我们的观点，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现在谈谈事件本身。我的出发点是，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是大家知道的。首先我谈谈那些与最近的革命事件和本次全会上我们的内部斗争有关的问题。

首先谈谈第七次全会关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中国各阶级重新组合的决议。

决议说，中国革命面临着一个从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的联合向另一个联合即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联合过渡的时期，而资产阶级将走向斗争的反面。这个过渡时期基本上已以最近的上海事件和广州事件而告结束。有三大原因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1. 工人运动的发展；2. 农民运动的发展；3. 帝国主义的压迫。当然，所有这些事件和所有因素彼此都有一定的联系。自从我们上次全会以来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群众性罢工不仅具有经济性质，而且具有政治性质；工人阶级向资本家阶级、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甚至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工人群众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态度越来越激烈；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有了改善。无产阶级日益认识到，工人阶级将成为本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领导者。

农民运动的发展也极为迅速。

一些同志或许读过那篇报告，我们的鼓动家在这篇报告中记述了他的湖南省之行。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他说，这个省是最大的省份之一，境内农民运动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去年1月到10月鄂军进入这一地区。在第一阶段中，农民协会已拥有两万名会员。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那位同志称这个阶段为革命阶段），农民协会的成员已达200多万。而这200多万人领导着1000万农民。

这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几个月内，农民运动和农民组织有了巨大发展。他继续写道：

“大约有一半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而在湘潭（？）湘乡、浏阳、长沙、茶陵、宁乡、平江、湘阴、株洲（？）、长阳（？）、毛田（？）、临湘、安化等地，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参加农会并服从农会的命令。”

这就是说，农民运动和农民的组织都有了巨大发展。这位同志报告中提到的农村的各种口号也很有意思。比如，农村到处可见这样一条激进的口号：“打倒土豪劣绅”和“一切权力归农会！”。他描写得十分生动：从前，土匪、地痞和流氓无产者等被列入另册，现在，湖南全省的情况都变了，也就是说，农民把土豪劣绅列入了另册。农民组织的领导人常常捆绑土豪劣绅，把他们关起来，有时还杀头。

土豪劣绅如果反抗，人们就向他们征税，惩罚他们；冲进他们的家，宰杀他们的猪，拿走他们的粮食，甚至还糟蹋他们的女儿妻子。现在，在湖南境内的许多农村，农会实际上就是地方政权，就是法官，就是政府，就是当地的政权。农民运动的发展是社会各阶级实行重新组合的重大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贿赂，他们分裂民族阵线的计划，外交问题和整个政治路线的尖锐化，拥护或反对赤化，拥护或反对共产党，拥护或反对莫斯科等等。我们必须极力

强调，这次因蒋介石的政变而出现的重新组合不能与以前出现过而且将来还会出现的普通的力量组合同日而语，这是中国革命的果断措施，是各种力量的原则性的重新组合；以前曾经领导过民族运动的力量正在转向反革命。而如今已经采取了果断措施，自由资产阶级已经变成反革命力量，它们的首领和统帅蒋介石现在属于反革命阵营，他正在日益明显地与帝国主义者和北方的封建统治者建立直接的联盟。这就是当前阶级力量的布局，也是我们在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应该看到的新的重要现象。

现在，同志们，我们应该像通常所说的进行自我批评：我们应该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在第七次全会上制定的路线并回想一下我们是否犯了重大错误。我们还应想想，我们的反对派向我们提出的论据有多大的威力。这里存在两个问题：1. 从前实行的某种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否完全恰当？2. 为了防止来自蒋介石方面的直接危险，我们在这里是否做了我们（我首先指的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应做的一切，或者说这条路线在蒋介石政变以前是否是叛卖性的或错误的？

只消把托洛茨基提纲的实际内容作一番分析，就能得出下面的结论：按照托洛茨基的提纲，在中国革命中，绝对不允许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托洛茨基说：

“此外，有人甚至天真地认为，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即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代理人与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否，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比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不知要密切多少倍。资产阶级在民族战争的营垒里犹如一个内部障碍。它无时不在敌视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并随时准备向帝国主义妥协。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并领导着国民党，所以，它基本上是**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留在民族战争的营垒里，是因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很薄弱，阶级斗争尚未发展，中国共产党尚未独立，而且还服从于

国民党这个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按照这个分析，在中国，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在任何发展阶级都是绝对不允许的。我认为，这是托洛茨基同志无视各个不同阶段和社会的发展。在他的眼里只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他把它们简单分类，规定这种分类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在上面援引的那段话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比如，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买办阶级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这话正确吗？也正确也不正确。因为差别这个概念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对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军事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是根本不同的。由于群众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出现了另一种阶级划分；因此所谓根本不同不是一成不变的。

部分资产阶级即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用军事手段反对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工人运动还很薄弱。这个阶级是客观存在的。三年前的中国工人阶级与今天的工人阶级已不能同日而语，而这些阶级之间的重新组合是以各阶级发展的程度为转移的。我们不能断言，民族资产阶级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凶。

马列主义分析的全部艺术不是确定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工人阶级是另一个阶级，它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而是分析具体情况。托洛茨基完全混淆了所有的具体情况，他完全忽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他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说到策略的结论，那么托洛茨基的提纲完全把联合资产阶级的各种政策排除在外。有人也许要说，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列宁的学说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现在托洛茨基认为，人们一开始就必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作迅速的斗争，进而推翻资产阶级。他断言，这条路线是一开始就制定的。如果说托洛茨基同志是在用列宁的论述论证这一点，那么，他是在滥用列宁的学说，特别是在滥用关于民族革命和殖民

地革命的学说，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是怎么说的？他认为无论如何要排除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吗？绝对不是！列宁写道：“共产国际必须同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临时协议，甚至与他们结成联盟。但这样做不是为了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是为了保持尚在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

因此就不要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吗？不是！列宁甚至更多地强调，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与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联盟。列宁看到了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而托洛茨基则无视这些阶段。托洛茨基否认存在联合资产阶级的可能性，而列宁则赞同这种联合。我们必须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托洛茨基那里找到了相应的论据。这是托洛茨基根据对北伐的原始评价提出的论据。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北伐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记得，甚至拉狄克同志也曾谈论过北伐这一十分重要的事件，他还使用了一个更为有力的词汇——革命功绩。

关于这一问题，托洛茨基在其提纲第 11 条中写道：

“中国资产阶级‘难道’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了吗？这个论据也是空洞的陈词滥调。各国的机会主义者在相应的情况下总是企图使工人相信，自由资产阶级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帮助，只是为了同这个帝国主义结成反对工人的联盟。北伐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变强了，而工人却变弱了。”

这就是对局势的评价。托洛茨基同志听说，各国的机会主义者都赞成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于是他马上就说：谁鼓吹联合资产阶级，谁就是在重弹各国机会主义者早已弹过的老调。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都不是马列主义。

托洛茨基同志知道，在 1905 年，布尔什维克曾反对以任何方式联合自由资产阶级，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必然站在反革命一边。这是我们和孟什维克的分水岭，而托洛茨基就因此而断言，机会主

义者一直是这么叫喊的。每一个俄国同志或非俄国的同志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俄国革命的历史，就一定会说，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绝没有同我们的沙皇政府进行有力的斗争，没有进行过武装的斗争。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进行反对活动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尔后就成了反革命，所以它没有时间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但是，中国革命开始时，在某一个阶段，资产阶级是领导力量，这却是事实。这个阶段在中国由于社会力量的特殊组合和帝国主义的特殊作用而长得多。

托洛茨基同志根本不懂，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国家、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殊情况。他只知道机械地照搬那些适用于其他国家，适用于没有殖民地压迫和特殊问题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规范和定理。

能否断言，由于北伐资产阶级变强了而工人变弱了呢？我们在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中已经看到，有组织的农民在一定时期内数量上已有了巨大增长。报告人告诉我们，这是与当时广东革命军的到达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切实地研究一下这个事实而不是大叫大嚷，如果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论据而不是凭空捏造，那么，我们会看到，对于革命来说，北伐最重要的成果是促使广大工人、农民群众觉醒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成为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

群众在北伐期间成长起来了，从革命的发展观点看，这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而托洛茨基同志忽略了这一点。

下面谈谈所谓因我们的策略而造成的危险。当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这方面已谈了很多，但是第七次全会的决议已经充分表明：我们的方针是孤立国民党右翼，掌握军队，发展群众组织。概括地说，这些就是极其重要的措施。

我们苏联共产党中央已经通过决议。该决议的签署日期是3月3日，部分已经发表。决议说：

“当前，一切忠于革命的同志必须将注意力放在中国革命上。由于阶级力量划分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阶段。今后，只有坚决开展群众运动，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反之将会遇到很大的危险。必须武装工农，将农会变成真正的政权机构，实行武装自卫；必须将国民党右翼从国民党内排挤出去，使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并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共产党不应姑息国民党右翼的叛卖政策和反动政策，应该发动群众，使他们团结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产党必须到处以本来的面目出现。”

此外党中央还决定在这种形势下提出其他的口号，采取其他的措施等等。这些关系到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还有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早在蒋介石政变以前很久，中国共产党就致函各国党组织，谴责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和叛徒。同志们，你们也许知道，讨论这方面问题的公开集会已经举行。

同志们，现在我谈另一个问题，即国民党的问题，武汉政府问题，苏维埃问题等等。国民党至今具有传统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大家都承认，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口号是错误的。但是，反对派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中还看到这样的论点：中国共产党的六月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这两位同志在给我们党中央的提纲中说的话。但是，这个六月决议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退出国民党的口号，而不是与国民党合作——党外合作的口号！共产国际当时就反对这个决议，因此它未获通过。

反对派同志还提了一个同样模棱两可的口号，它几乎是退出国民党的口号的变种。下面我就谈这个问题。有人断言：说退出国民党的口号完全不正确欠妥，可以说我们还应留在国民党内。我认为，即便这样表达也欠妥。如果我们现在要征服国民党，那么，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如果我们隐蔽地反对征服国民党的口号，那

么，这就是错误的。这就是我们争论的原因。我们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国民党创造群众基础。

我们认为，国民党这个形式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发展的现阶段的特殊暴力问题和政权问题是分不开的。

到目前为止，形势就是这样，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活动都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实：蒋介石未曾声明为国民党和争取国民党而斗争。我们还知道这样的事实：现在有两个国民党，所谓国民党左翼是至少目前是实际进行斗争的旗帜。人们可能会问我们：现在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是否正确？或者：把蒋介石定为革命的叛徒，中国人民的叛徒，国民党旗帜的叛徒，是否合适？我认为，国民党已经积累了一些政治资本。这样解决问题，乃至草率地放弃国民党，是荒诞的，不合时宜的。我认为，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的叛徒并加以鞭挞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与武汉政府的问题当然密切相关。

我首先想谈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一个人的提纲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上存在的不同。我们在这两位同志的提纲中看到：

“应该不倦地使广大劳动群众明白，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苏维埃能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

但隔了几行又说：

“必须向武汉提供最有力的全面的支持，并以此为起点，组织卡芬雅克党的自卫。其次必须集中全力，为武汉政府的组建和巩固向武汉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每个人都会懂得，这里所说的武汉绝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政治上的概念，即国民党左翼的中心和现国民党政府的中心。

如果说只有苏维埃才能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那么，这两位同志的提纲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一个人不能同时代表两种相

互对立的观点。如果我们断言，只有苏维埃才能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那么我们就应放弃武汉政府。如果我们说，武汉政府是革命的组织中心，必须以武汉为起点组织卡芬雅克党的自卫，那么，我们就应该宣布第一个论点即声称只有苏维埃才能成为革命中心的论点不能成立。这是一个昭然若揭的大矛盾。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后来的提纲中试图克服这个矛盾，而他的做法是完全放弃武汉政府。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中只字未提武汉政府，而是谈了双重政府和放弃武汉政府的方针。一方面断言，必须巩固武汉政府，从而打倒卡芬雅克党；尔后又断言，应当放弃武汉政府，当然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托洛茨基同志为反对斯大林的提纲，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

“这些话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对革命政权机构的官僚主义态度。政权不再被认为是发展中的阶级斗争的体现和巩固，而被认为是国民党的独立的意志表现。有些阶级消失了，但国民党的政权没有改变。这还不足以将武汉吹嘘成革命的中心，何况它确实还没有成为这样的中心。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全国各地都有相应的官僚买办，而国民党左翼有什么呢？至今还一无所有，或者说几乎一无所有。苏维埃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一种呼吁，即呼吁通过两个政府的过渡建立真正的新政权机构。”

这是一个更明确的答复。我们试分析一下这个伟大提纲中的论点。首先说说下面的言论；

“政权不再被认为是发展中的阶段斗争的体现和巩固，而被认为是国民党的独立的意志表现。有些阶级消失了，但国民党的政权没有改变。”

这样的论点正确吗？否！这显然是一种文字游戏。

这左右两翼代表着各个阶级，尔后一些阶级消失了，一些阶级保存下来了。这叫做更替，是阶级的一种重新组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国民党的分裂。怎么能说有些阶级消失了，而国

民党的政权没有改变呢？这分明是在做文字游戏，而无视分裂已经存在，无视武装斗争已经开始。

说到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意义，那么我问您，托洛茨基同志，您在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共同起草的提纲中为什么说不必给它以帮助？为什么应该把它变成革命的组织中心，以便反对卡芬雅克党呢？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在这些滑稽的矛盾百出的提纲中不存在丝毫严肃性。

我们在托洛茨基最近的提纲中看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

1. 国民党左翼几乎不存在。
2. 因此武汉政府也几乎不存在和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要反对一个不存在的政府呢？了解这个问题倒是很有意思。这种论点是否符合实际？我看它不符合实际。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第一个讲话中就断言，国民党拥有将近50万党员，此后这个组织数量上又有了很大发展。您以为这些人都是来自自由资产阶级阵营吗？是国民党右翼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的吗？这种想法十分荒谬。

如果自由资产阶级成了反革命并已经消失，那么党员的数量就已失去其价值。谁也不敢说国民党从未成过气候。从数量上看，国民党右翼向反革命的转变在这个组织中未能引起多大的变化。那么，怎么能断言国民党左翼几乎不存在呢？我认为是存在的，它有很多人作后盾。如果我们奉行正确的政策，还可能多争取一些人。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武汉政府的问题自然就会得到与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完全不同的解释。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国民党左翼是不存在的，因而武汉政府自然也是形同虚设。但是我们知道，国民党左翼有很多人作后盾，武汉政府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我们看到了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事行动，看到了对内部叛徒采取的军事行动，而且在今后很大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会看到这

种军事行动。我知道，这几天，一个将军如果叛变，定会受到武汉政府一个师团的攻击。我们知道，武汉政府的军队正在向北挺进；我们知道，现在蒋先云的部队还在武汉政府的领导下开往前线；我们知道，武汉政府正在国内推行一种比过去正确的政策。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中已经说过，应当全力以赴支持武汉政府，以武汉为起点组织反对卡芬雅克党——外国资本的斗争。如果我们说武汉政府是革命的中心，那么，我们就要立即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千方百计地支持武汉政府，以便在这个政府内外同我们必然要遇到的各种叛变行为作斗争，然后在群众基础上组织国民党左翼，努力将武汉政府内的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排挤出去，反对军队中的各种叛变行为，捍卫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捍卫方兴未艾的工农群众运动，捍卫土地革命的开展等等。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季诺维也夫同志早在一年半或两年以前已谈到中国的苏维埃这个口号，并说它是符合革命发展的最后阶段的口号。今天，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把它忘了。现在托洛茨基等同志代表的是另一种观点。托洛茨基谈到两个政府并存的问题时也说，国民党左翼和武汉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从这里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废黜武汉政府，赞成建立第二个政府，即建立反国民党左翼的苏维埃政府。人们必定提出这个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认为，我们必须纵观全局。

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中没有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翼作出精确的阶级分析。从阶级观点出发，应怎样看待武汉政府，怎样看待国民党左翼呢？不可否认，在武汉政府内部还有一些激进资产阶级分子；不可否认，在国民党左翼中也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左派，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转向反面。无可争议，在军队机关和政府机关里特别是军队里，有相当数量的动摇分子，他

们迟早必然转向反面。但是，难道这就是放弃一个大型群众组织，特别是放弃一个必将随事态的发展而日益强大的群众组织的充分理由吗？我认为，这就是全面研究中国政权问题和分析必要口号的焦点。可以用苏维埃这个口号为例，列宁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他的论述是正确的。然而，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接触过国民党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改变像国民党左翼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存在吗？国民党左翼不是正在日益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所代替吗？在研究政权问题时就可以忽视相应的组织形式，忽视这个组织的存在吗？托洛茨基同志在其提纲中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可以说，他是想消灭（当然是纸上谈兵）国民党左翼，以便抹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将国民党左翼看成是一个伟大的群众组织而加以否定，如果我们是以国民党左翼不存在这个前提为出发点，那么，像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中所写的那样当然是正确的。但这是否否认事实，这种策略的依据首先是否否认中国的最重要的事实。中国在斗争。武汉取得了政权，武汉政府在斗争。它的支柱是一个大型群众组织，它正在进行一场日益残酷的斗争。

如果我们对事实加以分析，如果我们不否认国民党左翼的存在，那么，我们立即就会看到，托洛茨基同志想用杜撰来掩盖其原有的错误即确确实实地否认中国革命的现有事实和阶段。

下面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德国革命期间，托洛茨基同志认为，起义以前我们不应组织苏维埃，而应依靠德国无产阶级的行会组织，让它们以后向苏维埃过渡。这是正确的。在德国这是正确的，因为那里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我们直接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没有掌握工会，而且德国那里还有一个有竞争力的大党——社会民主党。我们认为现阶段我们应当依靠国民党，把它视为将来定会向苏维埃形成发展的群众运动的一种形式，因此有人便大叫：这是叛变！如果这是叛变，那么，托洛茨基同志，您在1923年就是一个双倍的甚至三倍的叛徒。列宁教导我们说：第一，苏维埃

的形式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内容。苏维埃可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也可以是农民政权的一种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他的每一个同事都可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苏维埃这个形式外，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形式。例如，他认为英国就是这样。他没有排除运动的其他形式和专政的其他形式。

中国还不可能立即进入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托洛茨基本人也未必能自圆其说。

那么，现在正确的路线是什么呢？依我看，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上说，正确的路线就是开展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这是整个形势的焦点。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土地，废除农民欠高利贷者的债务，土地国有化，重新分配土地和自下而上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会，将其变为完成和实现这些变革和革命要求的地方政权；通过有组织的政权中心、党的中心和国民党左翼的中心支持这个过程；在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占领最重要的岗位；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武装工人和农民，反对变节分子；开展强有力的工作，建立无产阶级的军队和可靠的农民部队，依靠国民党，尽可能地实行民主化，以期尽快改组这个党。因此我们建议，我们应提出这样的口号：联合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者和军队等各大组织，使所有这些群众组织与国民党左翼实行联合。这样做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中国将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个口号。随着自发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我们将拥有国民党这样的类似历史上的半政党的组织，它将争取到越来越多的群众，以各个重要的群众组织为支柱，吸收大量的人，组织政府。我认为，我们将因此而把问题纳入正确的轨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群众问题等等，在一些同志看来纯属荒唐。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共产党在这方面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还因为国民党和国民党左翼的内部结构上还存在一些传统的非民主的形式。这种形式将阻碍今后运动的发展。

如果我们这样拟定我们的任务，如果我们正确地分析了以往的事件，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的领导基本上没有犯错误。我在此只指出下面一点：如果有一个人从中国或澳大利亚来到这里并说某地某团的指挥官行动不当，甚至是叛变行为，或者说这个或那个共产党组织犯了重大错误等等，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里说的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这些细节问题也要莫斯科出面解决，是不可能的。甚至在重大问题上，比如在是否进行北伐或加深革命的问题上，我们虽然发表了一定的意见，但是党中央分成了两派，各有偏向，一派偏向这边，而另一派偏向那边。我们应取代中国党的中央吗？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只能发表一点指示和对政策方面的总路线负直接责任，这当然不是为重大错误开脱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认清领导的界限。党在这个时期所犯的主要错误与党在第七次全会以前所犯的错误是有密切联系的；有些是与那个所谓激动人心的文件即谭平山的讲话中陈述的事实有联系的。我已经说过，有些人刚从遥远地区到这里，并不知道我们在第七次全会上已纠正了谭平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对这些同志来说，这个讲话也许将是继续争吵的资料。但是就我们而言，我们在第七次全会发出的指示中，以及在我们从这里发往中国的一切重要的政治指示中，都批判了这些错误的残余。这些错误的主要特征是共产党人对开展群众运动特别是在农村开展群众运动也抱有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则是各种错误的起因。我们必须反对之，而且应该在本次执行委员会全会将要通过的提纲和决议中加以说明。

同志们，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在决议中还应指出我们西欧和美洲各政党的错误。中国革命的意义是巨大的，所以不能低估它，虽然各党对于中国受到的干涉和中国内部事务的关系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说到共产国际的领导，我们已与它的惰性作了极为激烈的斗争。有时我们拟定和发出的指示措辞相当

激烈，乃至一些同志提出了抗议。但我们认为，同志们，中国革命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讨论的问题和发生的事件向我们提出的问题非常棘手，因此，如果我们的党犯了错误，在目前这个重大问题上没有发挥充分的主动性，那么，我们大可不必羞羞答答，拒不进行自我批评。中国最强的反革命势力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因此中国问题与欧美工人运动的内部问题有直接的联系。各国共产党是唯一团结的力量，只有它们能同这种危险作切实的斗争，但是，传统压力很大，以致我们共产党也不能以高姿态去认识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点希望：在本次执行委员会以后纠正这些错误，这一点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的战争危险，反对侵华战争，反对中国的叛变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热烈鼓掌）

讨 论

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是执行委员会在6个月前即11月至12月在其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进行讨论、核实并确定的。在这次全会上反对派的表现相当猖獗，当时他们还利用全会发动宗派主义的进攻。当时我们就已听到了什么热月、卡芬雅克和革命的掘墓人这些词句。然而，反对派虽然积极起劲、疯狂、露骨地破坏了第七次全会的讨论，但是，在讨论中国革命和在中国的策略问题时，他们又认为没有必要发表任何意见。当时，我们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是11月29日开始的，并且连续进行了三次会议（中国委员会的大量工作除外）。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志出席了全会。他们谁也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在28日会议的速记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

“台尔曼同志主持会议。首先投票表决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在本次会议上，我们得到了反对派的文件，他们在其中对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策略展开了全面进攻。请问，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现在大叫大嚷提出的问题，为何不在6个月前的第七次全会确定这个策略时提出来？当时他们为何不提出在决议中规定退出国民党、立即组织苏维埃、立即开展反对广州政府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直接任务？我们现在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那里得到的文件既看不出忠告也看不出帮助的意思。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党和国际的困难试图再作一次恶毒的、无能的、伤天害理的宗派斗争。同样，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反对派也因共产国际所谓的右倾摆动而对它恣意攻击。我认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同志选择这种左倾进攻的方针，并不是因为这符合他们自己的信念，而是因为路特·费舍的批评方法最省事又最适合他们宗派斗争的目的。在我们反对派同志的不太长的历史上，我们找不出一个事实能表明他们还有其他动机。

同志们，我认为，如果中国的形势确实像反对派同志今天在其文件中分析的那样，那么，像托洛茨基这样一位敏锐的分析家不是在半年前，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会向这一步迈进了。反对派文件中提出的结论的前提是，中国有可能爆发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只能把退出国民党、同时与国民党右翼决裂的要求，理解为对武汉政府的直接武装干涉，而不能作别的理解。如果中国革命的时机确已如此成熟，如此发展，那么，这确是一桩对全世界具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的大事。而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除了令人意外的事，除了因为蒋介石的叛变，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事件已经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乃至托洛茨基同志可以小题大做……

(托洛茨基：只因有了这个小题才能大做)

……早在他与季诺维也夫同志结合成反对派之前，大概就已

找到了他能从中预见到这种状况的“小题”。我有这样的印象，托洛茨基同志如果及时找到这个“小题”，那么，他献给我们的就不只是《英国向何处去？》，而且还可能有另一本《中国向何处去？》的书。只是现在他为了反对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不惜代价需要论据时，他才至少幻想找到一个能够“大做”的“小题”，企图借此给党和共产国际以强有力的打击。这就是我们在反对派的文件中见到的对中国状况的看法。我认为，从反对派原来的态度上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发展的看法产生得确实有些突然，也就是说，正好是在适合于宗派斗争的时候产生这种看法的。对此我援引下面的事实：以前，在宗派斗争开展以前，我们在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小组那里从未发现过今天他们在这里发表的对中国革命的观点。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提到了一条这方面的很有意思的消息：托洛茨基同志不久以前还表示反对在中国实行强硬的政策，理由是他认为苏联的西方政策是有害的。根据布哈林的消息……

（托洛茨基插话：这个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

……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小组在1926年5月曾提议放弃中东铁路。当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疑都会将放弃这条铁路解释为放弃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帮助张作霖。而这个提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后来，即半年以前，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讨论中国问题决议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如果他现在突然一反常态，吵吵嚷嚷地攻击第七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策略，如果他要求立即提出中国工人苏维埃这个口号，破坏同国民党左翼的统一战线，那么，我们与其说用他们的实际信念，倒不如说用宗派需要更容易对这一点作出解释。

（托洛茨基插话：您是这方面的行家）

与此同时，即去年春天，拉狄克同志认为，广州国民政府是

一个工农政府。关于导致1925年上海大屠杀的那些罢工，拉狄克认为，这些罢工并不像1905年俄国工人的首次罢工运动，而是与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工人罢工运动相近似。

我有这样的印象，如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秋天同意退出英俄委员会，那么，反对派就会同样激昂地拥护这个委员会；如果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作出退出国民党、打破与国民党右翼的统一战线的决议，那么，反对派就会将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失败归咎于这个决议……

(托洛茨基插话：您做点聪明的事试试看我们是否会进行批判)

……同时再批判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我认为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很快就会在反对派的武器库中找到“亚洲国际”这个论据。至少马斯洛夫已经在尝试建立一个“西方”共产主义，作为“亚洲国际”的一个极。

下面我想谈谈中国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的问题。我认为，第七次全会作出的关于留在国民党内的决议是正确的，而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在中国革命今后的发展阶段中也仍然是正确的。反对派面对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在文件中用很大篇幅向我们提出了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和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反对派同志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使用了许多诸如“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类富有弹性的词语，为各种解释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但是，文件的整个精神却暴露出一个问题，即现在是否到了修改共产党关于群众和统一战线策略的时候。我认为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由于战争的危险，我们正在经历各种十分伟大的斗争。我们只有与群众一起才能取得这些斗争的胜利。统一战线政策和尽可能地接近群众，在中国革命和苏联共产党今天的处境中是非常重要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反对派的文件错误地、甚至直接了当地歪曲了中国共产党加

入国民党一事和第七次全会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首先是故意回避我们加入国民党后得到的一切利益。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党在数量上的增长就会明白。1924年，党只有几〔百〕名（大约500名）党员，今天它已发展到58000名党员。而第一个发展高潮是在加入国民党后不久开始的，至少是这个党因此而成了半合法的党。它为今后的发展（这一点很重要）提供了到农民中去的可能性，现在它对工会也更容易产生影响了。它早已通过工会与工人群众建立了联系。加入国民党是第一步，1927年的上海流血事件是第二步，而通过这第二步，共产党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并作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开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产生作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们的文件中不是发表这样的观点吗：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即使事先估计到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刻将会出卖、背叛、脱离革命，也绝对不允许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他们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党没有在国民党内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阶级本色”。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不惜引用伪证，托洛茨基说共产党没有一份能表达党的独立方针的报纸。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去年，共产党就有两个期刊，今年至少有10个。而且，国民党的有些报纸是我们的同志编辑和领导的。不久以前我们得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在中国出版的消息。现在正在出版的有：在武汉出版的党的中央周刊《向导》，发行量为50000册；不久前在广州出版（现在又能在广州继续出版）的《新青年》，发行量为5000册；在武汉出版的青年周刊《中国青年》，发行量为40000册；在北京出版（现在可能已经停刊）的北方周刊《政治生活》；广州地区的《人民周刊》；在上海出版的工会中央报纸《工人小报》；在上海出版的两家党的周报《上海工人》和《中国工人》；铁路工人的机关报《工人周报》。国民党的一些工人的机关报《工人周报》、国民党的一些报纸和大部分期刊是由共产党人编辑和领导的。党在国民党内部保持了自

己的本色，当然有自己独立的组织，自己的管理机构，自己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等等。它的表现是一致的，它在国民党内，就像在农民组织和工会中一样建有自己的党团。共产国际的一贯路线就是教育这个党在国民党内保持自己的本色。如果不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进行批判和集聚反对国民党的力量，像蒋介石这样的国民党右翼人士也不致将国民党推向危机。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影响和工作，北伐是不可能举行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展壮大工人和农民的群众斗争。共产国际从未同意在加入国民党时，为了不致吓倒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只局限于搞罢工的做法。共产党的方针是将国民党右翼排挤出党。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愤恨也证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不但没有失去本色，反倒确实保持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本色。

关于党的发展，加入国民党不仅仅在组织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如果没有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影响和工作，去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不可能举行的。农民运动的开展和革命化、工会的发展和工人群众的革命化都由于北伐战争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还缺乏经验，在国民党内犯了一些错误，这是事实，是必须承认的。欧洲各国的党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同样也犯过错误。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为了阐明莫斯科对中国的影响，我请大家记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3月3日决议的如下内容：

“中国革命正在经历一个严峻的阶段，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今后，只有坚决开展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武装工农，将农会变成真正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武装自卫。中国共产党必须揭露国民党右翼的叛变政策。”

3月3日这个决议证明，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一样，对蒋介石的叛变，对资产阶级脱离革命战线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它们及时让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事件作好准备，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早已

声明，这个事件是不可避免的。

同志们，现在我们在中国面临的是一种新的情况。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脱离了革命战线。这意味着革命遭到暂时失败，但这也是一个进步，因为通过这次危机中国革命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现在我们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了无产阶级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地位。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就预先见到了这种发展趋势，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种发展趋势也是符合规律的。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切实地研究这种发展趋势，为新的形势作出具体的指示。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两个提纲草案。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草案没有批判的现象，没有批判中国党和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同志的错误。而批判这些错误是应该的，同时是必要的。我们过去批判了，现在和将来还要批判。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草案显然是在攻击共产国际在中国政策上的总路线，是在攻击一条正确的路线，而主席团的提纲草案是适应当前形势的，是符合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保证，主席团的提纲将获得执行委员会通过。这次将要一致通过的提纲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实事求是的决定，而且将是对一再试图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反对派的一项声明。（鼓掌）

托洛茨基：同志们！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你们知道了苏联共产党至今没有了解的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获准参加今天的会议，尽管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礼节上都完全有权出席这次会议。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政治教育的第一条准则是：它不仅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接受的东西，而且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领导的路线才能为党员群众完全明白和理解。这是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的传统。而拒绝向党公开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的提纲，是理亏的表现，是缺乏自身安全感的表现，也表明这是害怕反对派的提纲会在党的舆论面前显得比多数派的提纲更正确。除此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理由去隐瞒这个提纲。

我曾经尝试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我批判斯大林的提纲的文章，但没有成功。由于我的提纲是针对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的，所以它禁止发表我的批判文章，禁止发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其他文章。

昨天，这里分发了一份由库列拉签署的起草委员会的决议，其中援引了我们辩论的消息。至于其中是否有所指，我不太清楚。总而言之，执行委员会会议是在没有任何一位新闻记者参加的特殊气氛下召开的，而献给全体会议的仅仅是《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有这么一句狂妄到极点的空话：“谁蓄意破坏共产国际内部的团结，谁就是犯罪分子……”等等。这句话的矛头所向是不言而喻的。早在决议草案发表以前，《真理报》就宣布一切敢于同即将发表的决议进行论战的人为犯罪分子。我们可以想象，明天《真理报》将会怎样向党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在此期间，在莫斯科这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管产生什么看法，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按处理反对派的办法作为反党处理的。斯大林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提纲实际上已被宣布为绝对正确的。更有甚者，在执行委员会辩论的日子里，一些在自己支部的讨论中反对攻击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人甚至被草率开除出党，或者至少受到开除出党的威胁。同志们，你们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辩论和作出决议的。我提议，希望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准确地、客观地公布关于我们讨论的情况，并附上这里分发的提纲和文件。我们不能掩盖、封锁和禁锢中国革命。

同志们，党的制度的日益腐化是一切危险中的最大危险。领导的每一个错误都由于反对派采取的措施而被说成是“善意的”。蒋介石实行政变的电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我们私下里就说：反对派必将为此付出特别惨重的代价，因为恰恰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它受到不少警告。

有人总是在伺机制造新的所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

茨基、皮达可夫、斯米尔加“事件”，以此转移党对一些最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尽管党代会即将召开，或者正因为如此，驱逐反对派事件层出不穷。这种方法已被广泛使用于党的各级组织，使用于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区，每一个城市。这么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随时准备接受来自上面的一切，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毫无办法。人们麻木地希望，等到战胜了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以后，一切事情就会走上正轨。相反，制度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事情刚刚开头，还没有结束。照此下去，只会遇到困难和其他挫折。

这套制度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人们在美其名曰不损害苏联利益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不敢公开发表一条批评意见。然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吃了大亏。我们的国内政策需要革命的国际政策，因为对外政策的错误只会扩大对内政策的错误。

下面我们谈谈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草案，首先谈谈直接涉及议程讨论的一个问题。同志们请听：

“共产国际认为，自命为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的党和组织，既然没有最坚决地参预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既然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散布消极情绪，那它们就是在客观上（有时是主观上）帮助帝国主义者……是支持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和准备世界大战。”^①

这些话多么动听。但是，如果把这些话也运用到英俄委员会，那么，它们也仅仅是动听而已。请问这是“最坚决地参预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吗？绝对不是！这是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吗？不是！是在这个问题上散布消极情绪吗？毫无疑问！这不是在英帝国主义者备战的时候客观上（在英国方面则是主观上）帮助它们吗？当然是，而且是毫无疑问的。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20页。——原编者注

.....

让我们继续听听布哈林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革命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最近一次（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对中国革命动力问题所作的分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全会指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转向反革命方面的论断。”

上海和武汉的工人如果有机会读到四月事件的发展竟然与布哈林同志为中国革命预先规定的历史行进路线完全一致，那他们定会感到非常惊奇。人们还能想象比这更丑恶的漫画和更可笑的学究气吗？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被在国民党这个联合党中占有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战胜的，因为共产党在一切决定性问题上都服从这个联合党的组织纪律。这次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工人和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来说，仿佛是一声晴天霹雳，而决议在这次政变以后说：这一切都是按照布哈林的英明论断发生的。这确实是一个闻所未闻的论断。

这个论断在这里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论断在现有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充其量不过就是下面这句空话：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定阶段必将脱离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

同志们，是资产阶级被抛弃还是它抛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两码事。这是革命要走的两条道路。革命走哪条道路能取得胜利，列宁指出的以往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所走的最正确道路是：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惯都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①

领导者的错误观念使中国资产阶级走这条道路更困难了还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9页。——原编者注

更容易了？在很大程度上更容易了。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批判关于四个阶级联合的卑劣理论，把它视为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背叛。我们这么做了吗？没有，恰恰相反。

现在，我没有时间对革命的发展和意见分歧的激化进行历史的论述，布哈林却拥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做得那么全面又那么漏洞百出。我一直打算在党或共产国际的理论刊物上进行这种早该进行的论述，可惜布哈林只在人家没有条件给予恰如其分的即实事求是和证据确凿的回答时提出这个问题。

今天我只说以下几点就足够了：

1. 3月16日，即蒋介石实行政变以前不足一个月，《真理报》的一篇社论^①指责反对派，说准备叛变的资产阶级按照反对派的样子窃居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真理报》不是向中国工人澄清这个事实，而是愤怒地否定这个事实。它声称，蒋介石是服从国民党的纪律的，就好像反对派在革命迅猛发展的时候就能服从联合党的政治纪律似的。同时还要指出，如果正像什麦拉里的夸夸其谈那样，反对派确实对官方的路线什么也不应该说，那么，布哈林在一年来的演说和文章中为何只要一涉及中国革命最迫切的问题，就连篇累牍地指控反对派呢？

如果时间允许，我想在这里宣读拉狄克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封信重复了他去年7月一封信的内容。这第二封信是去年9月写的，信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最迫切的问题。

2. 4月5日，即蒋介石政变前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拒绝了拉狄克的意见，并再次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那些警告缺乏根据，我们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一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斯大林的通篇讲话是安抚和平息

^① 指3月16日《真理报》社论“中国革命与国民党”。——原编者

大家的不满，是麻痹我们党和中国党。当时有几千名同志听了这个讲话。这是4月5日的事，确实，讲话的论点并不像布哈林想强调的那么出色。斯大林这个讲话的速记记录从未发表过，因为几天以后，那只被挤干的柠檬就夺取了政权和军队。我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员，完全有权要求得到这个讲话的速记记录。但是我的努力和尝试纯属徒劳。同志们，现在你们不妨试试，也许你们幸运一些。可我表示怀疑。斯大林的这个被封锁起来的速记记录不需要其他文件就能揭露官方路线的错误并证明，断言上海事件和广州事件正好“证实”了斯大林一周前在莫斯科维护的路线是那么不合时宜。

3. 中央委员会收到了它派往中国的三位同志3月17日来的报告。这个文件十分重要，真实地描述了共产国际路线执行的情况。用这个文件的话说，鲍罗廷一会儿像右派国民党人，一会儿像左派国民党人，就是不像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这样，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已变成了国民党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它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它的武装；他们认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压缩在最小的范围内。上帝保佑，无产阶级手握钢枪却害怕徘徊在各阶级之上的民族革命这个巨大幽灵。你们可以要求得到这个文件！谈一谈，研究研究，以免盲目投票。

我还可以向你们列举几十篇最近一年半至两年中的这类文章、讲话和文件。我愿意随时写出这方面的书面材料，对各种数据和文件作出极为精确的说明。不过，上面所说的也足以证明，所谓事态证实了当时的“论断”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让我们翻开决议，继续往下看：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革命的前一时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更有甚者，布哈林今天竟然还断言，马尔丁诺夫关于国民政

府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一著名论断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即马尔丁诺夫没有强调领导联合政府的是资产阶级。好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可惜马尔丁诺夫的杰作还有其他的错误。马尔丁诺夫在他发表于《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非常坦率而又明确地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是**（不是！）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而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是他那篇圣文中的白纸黑字。

那么，究竟什么叫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呢？你们以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见过这个字眼吗？如果说资产阶级将被压迫的各阶层引导到自己的旗帜下并领导他们去夺取政权，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资产阶级对被压迫阶级的政治剥削。然而，民族革命是进步的！你们反对？当然，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是进步的。但是，它的进步性所依赖的条件不是各阶级的经济联合，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经济剥削。凡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谈阶级斗争，只谈阶级联合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和平幻想的预言者。凡是为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实行政治剥削的进步性而奢谈四个阶级联合的人，都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因为这里本来就存在着机会主义者，存在着“调和主义者”与和平幻想的鼓吹者的政治作用。

国民党的问题与此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布哈林所制造的混乱是一个地道的政治魔术。说什么国民党是一种“特殊形式”，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形式，只有青天白日旗能说明它的特殊性。总而言之，谁不理解这种极其复杂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理解，因为这恰好就是布哈林认为的“特殊性”），谁就丝毫不能理解中国革命。但是，布哈林本人所理解的东西，用布哈林的话说别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而且是革命时代的政党，它只有作为政党才能为人所理解。这个党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没有体现出“四个阶级的联合”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我们不能滥用“联合”这

个词，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滥用这个词。就政治方面而言，联合是对某种合作取得相互谅解的“平等”的双方结成联盟的代名词。遗憾的是，无论过去和现在，中国都不是这种情况。共产党是一个由自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的下层组成部分。去年5月，共产党甚至承诺不批判孙中山的学说，即不批判不仅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学说。

这个“特殊”的国民党掌握了关于执政党实行**独裁**的学说，并面对共产党人从中得出一条结论：“免开尊口”，因为在俄国，据他们说，也只有一个党在领导革命。

在我们这里，党的专政（理论上被斯大林完全错误地否定了）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的代名词。在中国我们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国民党的专政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和激进派支持下，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农民阶级的起义，依靠人民群众和革命力量加强了自己的实力。我们容忍了这些，我们使它轻易走到了前台，即使现在，我们也还要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正奢谈国民党的特殊性，唯独不向无产阶级指明隐藏在这种“特殊性”后面的卑鄙的阶级手腕。

党的专政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绝对保证自己政党的独立性，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确保这种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是一个受约束的政党。它从未有过一份自己的报纸。你们设想一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革命中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过去没有，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份自己的日报？因为国民党不同意。我们能容忍这些吗？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于是布哈林就喊道：退出国民党！为什么？难道你们想说共产党作为政党在“革命的”国民党内部难以生存吗？继续留在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内，这一点我可以接受，条件是给共产党以完全的政治和组织活动的自由，保

留一个供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活动的可靠的基础。

关于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其次在我的提纲中都有条有理分（39条）列举得非常清楚。这些条件就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左翼内的条件。如果布哈林同志主张无条件地即千方百计地、不惜任何代价地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那我们不敢苟同。

（**勒麦列**插话：革命时期留在哪里？）

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一种联合或一种联合的组织形式，势必导致合作者屈膝。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

共产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创办一家自己的完全独立的日报，这样它才能作为政党真正开始生存和活动。

我们继续往下看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取消主义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革命的危机是革命决定性的失败。”

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我当然认为这次失败是巨大的。而试图掩饰这次失败，只会妨碍对中国党的教育。

至于这次失败是否会持久，持续多久，今天谁也无法作出明确的预测，总之，我们的论述是以无产阶级具备克服这次失败的可能性为出发点的。但是，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克服这次失败的先决条件。党的领袖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真理报》新近已发表）中所维护的政策，在革命政府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极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地纠正中国党和我们党在这两个最重大问题上的政策，那么失败将会加深，会持久地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我在我的提纲中有一个附录，载的是陈独秀同志的讲话，我在其中已经谈了这方面最必要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仅指出—

些提纲和列举一些其他文件。我曾答应宣读拉狄克致中央委员会的信，可惜我已来不及在这里驳斥那些“放弃”中东铁路等等非常轻率、非常荒唐的说法了。布哈林和我一样，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文件，因为这个问题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只进行了非常肤浅的讨论。

(布哈林：否定这一点是不知羞耻)。

只要给我3分钟，我就立即来驳斥这个不知羞耻的布哈林，因为他所说的纯粹是谎言。我当时的唯一建议，用鲁祖塔克的话说，是我们方面的一项声明。鲁祖塔克说，这条铁路将暂时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布哈林就是因此对鲁祖塔克展开了猛烈抨击。当时我们在这个声明中坦率地、严肃地重复了我们在北京决议中所说的话：在中国人民建设其自己的民主、统一的政府时，我们将以最优惠的条件把这条铁路自愿地高兴地移交给中国人民。政治局曾经说过，不，在这种时候，一个这样的声明将被认为是软弱的标志，我们将在一个月以后发表这个声明。我当时虽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事只经过一次短暂的讨论，后来才作了些可怜的不切实际的修改，尔后弄成了一个比较体面的东西，分给了党的组织和各个支部，并在见诸报端时加上了不切实际的接语。总而言之，最近，这已成了我们这里的习惯。

(主席：托洛茨基同志，我提醒您注意，您还有8分钟讲话时间。主席团给了您45分钟时间，如要延长，我必须提请全体会议作出决定。)

……

托洛茨基：我已没有时间宣读拉狄克的信了，如果我有第二次发言的机会，那时我再向大家宣读。拉狄克的信是取得我和季诺维也夫的完全同意后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最迫切的问题，而党的政治局没有给予复信。所以我只想在这里就中国革命的惨重失败造成的总的

政治后果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

意见分歧大吗？很大，非常大，非常重大！意见分歧在最近一年中扩大了，这是无可争议的。一年前，谁也不相信英俄委员会会签署柏林决议，谁也不相信《真理报》会发表关于四个阶级联合的哲学，谁也不会相信斯大林会像库西宁昨天出示他的完税标签那样出示其被挤干的柠檬。为什么事态的发展竟会这么迅速？因为错误的路线受了去年两大事件——英国的大罢工和中国革命的支配。

现在有些同志说（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听到这种说法）：矛盾激化了，这必将分裂为两个政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两个伟大的事件已向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存在着严重的向右滑的危险趋势。不过，我们要充分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和那两个伟大事件的力量，坚决果断地粉碎任何关于分裂的预言。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们掩盖了问题的最重要之点，其潜在危险是，我们不仅无法弥补已失去的东西，而且还得失去很多时间。

1. 我们不该对退出国民党的想法（这一点人家并没有提出来）一再提出警告，而是应该将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看得高于其他一切，高于留在国民党内的考虑。必须创办一家自己的日报，对国民党左派也要进行无情的批判。

2. 推迟土地革命，到军事上确有把握保持领土完整时再进行之，这是陈独秀的思想，必须正式给予批判，这个纲领是非常危险的。

3. 推迟政府的改造，到军事上胜利后再进行之，这是陈独秀的第二个思想，它对革命同样是极端危险的。武汉最高联合政府还不是革命政府。对它抱任何幻想或进行任何宣传，就等于葬

送革命。只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士兵苏维埃才能为革命政府提供基础。

当然，武汉政府必将这样或那样地“顺应”苏联，或者消失。

4. 共产党和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联合非但必须保持，而且应该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扩大和巩固。

5. 谈论工人武装，却不允许工人组成苏维埃的人并不是真心在谈论武装。如果革命继续发展（我们对此充满信心），那么工人要求成立苏维埃的愿望将会日益强烈。我们必须准备、加强、扩大这个运动，但不是像决议中所说的那样阻挠和妨碍这个运动。

6. 人们无法将中国革命进行下去，因为有人在促进相当严重的右转，并且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完税标签下贩卖孟什维克的私货——库西宁同志昨天就叫卖了一个小时之久，而另一方面，来自左派的真正革命的忠告却遭到窒息。

布哈林的决议是错误而危险的。它使得左派遭到了突然袭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硝烟中可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不可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也不能将这个决议宣布为自己的决议。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必须由整个共产国际进行坦率的客观的讨论。这种讨论（但愿它政治上也那么激烈）不应在任何恶意的、个人的攻讦和诽谤声中进行，所有文件、讲话、提纲和文章都必须向国际的各个支部公开发表。

中国革命不该遭到封锁和禁锢。

彼得罗夫（苏共）：请允许我跟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在民族革命运动的理论中作一次短暂的漫游。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的民族革命解放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对民族革命运动进行正确的理论研究，是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政治问题的保证。

……

关于土耳其，季诺维也夫指出，从前的基马尔的党在一定程

度上使人想起了今天的国民党。这一点十分清楚地证明，他既不了解国民党的也不了解基马尔党的本质。我们不能以为以前的基马尔党与国民党相类似，曾赞成与共产党的合作，总而言之，曾推行过革命政策，后来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实际上土耳其共产党人从未加入过基马尔的党，也从未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提出过土耳其共产党人应加入基马尔党的建议。还有，土耳其革命一开始，基马尔政府就奉行迫害工人运动的政策和反动的民族政策；它不仅迫害君士坦丁堡的金融资产阶级，而且迫害保加利亚的农民和士麦那省的希腊农民。基马尔政府和土耳其共产党之间从未存在过任何像国民党内的那种直接的合作。当然，土耳其的基马尔党人不是不愿意表现出左的姿态。他们甚至一度自称是共产党人，但是与真正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国际自然没有丝毫联系。

基马尔政府一方面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同时又扼杀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迫害工人和农民。我们必须懂得，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辩证矛盾，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不懂得这个辩证法。即使在今天，土耳其政府还将共产党人关在监狱里，而同时它又反对帝国主义，至今未被任何一个强国牵着鼻子走。波斯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同样也大相径庭。在中国，我们的共产党支持了而且还将支持中国南方唯一的革命政府——武汉政府……

所以季诺维也夫表明，他根本不懂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正因为他不懂这一点，所以他把波兰、芬兰、土耳其、波斯和中国混为一谈也就很自然了。季诺维也夫同志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按照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说法，中国共产党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国民党的一个附属物。

同志们，我不得不十分明确地声明，我不理解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观点。他在共产国际内是个略有名气的人，他任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主席历时七年半,而这位前执行委员会主席今天却说,共产国际葬送了中国的革命,并把中国共产党贬低到国民党的附庸地位,等等。共产国际要么是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任共产国际主席时犯了错误,要么是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离任后犯了错误,二者必居其一。

假定是后者,我们就算这些错误是在最近几个月内犯的。可是,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是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离任以后,是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的。从决议的实质看,这个决议不是共产国际的整个策略的右转,而是左转,是一条坚决的措施。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丝毫不理解共产国际的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提出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土地革命的明确要求,难道真的有人早就提出和阐述了吗?不,无论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是伍伊维奇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和他们的任何政治朋友都无权说共产国际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离任以后实行了右转。说共产国际实行了一次激进的转折,是绝对正确的,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一起经历了这个转折。这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使我们中国同志的头脑爆发了一次全面革命,向他们指出了坚决斗争的道路,使他们了解了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了解了土地革命。但是,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硬要说,在他任职期间,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政策,那么,我对他这种毫无顾忌的玩世不恭不得不表示钦佩。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指示下加入了国民党,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指示下于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指示下对国民党施展了复杂的手腕。所以说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负有完全的责任。他享有充分的自由批准他的动议。如果中国共产党确实放弃了它组织上政治

上的独立性，那么，他总有可能采取断然措施。当然，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总喜欢坐着政治威望这匹玩具马四出兜风。我们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曾反对托洛茨基，并有充分理由指责托洛茨基，说他的作用在于掩盖孟什维主义。他们曾声称，托洛茨基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这个观点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今天，在他们已与托洛茨基结成极其强大的不可分割的思想联合，实际上处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思想统治下的今天，他们仍然死抱住他们反对托洛茨基时的那一套不放。这是一件政治杰作（恕我说得温和一些），可是我们党，受过列宁主义原则教育的党实在欣赏不了这件杰作。

然而，说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推行了机会主义的、孟什维主义的政策，这正确吗？像托洛茨基的提纲那样，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全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分子，这合适吗？（布哈林插话：这是在他的露骨的提纲中说的）请允许我援引几个文件，这些文件是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和对国民党这三个最重大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经极其正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某些方面犯了重大错误，而共产国际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自然不可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反对派断言，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享有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只是让国民党左翼牵着鼻子走，而国民党左翼又让国民党右翼牵着鼻子走。这种说法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种种错误，但它仍然十分清楚，首先必须保证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必须批判和揭露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动摇和不坚定性，必须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同盟者。请允许我援引一小段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即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新启示录出笼前两年多通过的提纲。提纲中说：

“工人的组织必须建立在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它不仅不依赖于国民党，而且也不吸收任何其他组织进入自己的队伍，目

的是不致在工人阶级的觉悟上制造混乱。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因为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结束后还有自己的最终目标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阶级的组织在民族运动中必须保持独立，并时刻准备斗争的第二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而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②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看出另一方面的过火行为。共产党人在这里说，不允许国民党的组织进入工人的队伍。共产党人当时就已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为，党必须控制工人和农民中的工作，不允许国民党的组织进入工人和农民的队伍，不允许国民党在工人和农民中有立足之地。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因为国民党争取工人和农民可以加强国民党的革命左翼，为反对右翼建立一个根据地。也就是说，使国民党民主化。但是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不理解这一点。相反，他们却深刻理解了工人和农民组织保持完全独立的必要性。

在同一个提纲中还说：

“我们在工人中宣传民族革命的时候，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利益

① 此段引文与中共四大“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出入较大，“议决案”原文为：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而且实行上也在于能适应民族运动进展中职工运动易于发展，同时亦易于受民族主义者之利用的情形，力争职工运动的独立及进展，而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进行职工运动，往往容易混乱阶级的观点而发生种种弊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第283-284页）——原编者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84页。——原编者

为出发点，宣传共产主义，但不应宣传国民党的理论。^①我们将对工人们说：随着民族革命的开展，中国将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②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25 年 10 月的一次全会上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提纲中说：

“（一）现在这一中国民众革命的时期，使中国共产党负着历史上有极大意义的职任。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应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民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现在这革命斗争的时期，不但指示出运动的前途和民众斗争的政纲，而且还要极明显的对民众解释：革命民众政权，中国统一，工农商学兵代表的国民会议，国民革命军的组织等口号的意义。

（二）根据上述口号组织工人的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以集中积聚无产阶级力量——亦是中国共产党根本职任之一。同时，吸收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到自己党里来，也是最紧急的职任。结合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他们到共产党旗帜之下，根据共产主义给他们以阶级斗争的智识，这是现时共产党很重要的工作。共产党假使不能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发展和巩固，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往

^① 中共四大“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这段话的原文为：“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民族革命应根据工人阶级自身的具体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决不应笼统地抽象地宣传三民主义或孙中山个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285 页）——原编者

^② 上引“议决案”中无此句话。——原编者

前发展，简直无从设想。”^①

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的十月全会上同样为农民运动阐明了如下口号：

“中国农民运动在南部及中部诸省也逐渐发展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地主的田地交给农民。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责任。现时已经要使一般工人农民知道：到了建设国民革命政府的时候，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

我们的党应当知道：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组织农民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可是我们的责任，不仅限于明白规定农民的要求和农民运动的前途，还要注意我们对于农民的组织的组织——我们自己的党在农民运动中之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6年7月的全会决议说：

“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03—404页。——原编者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8—399页。——原编者

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所以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

接着，全会认为：“解决和国民党组织关系的正当形式问题，虽然是下次大会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必须有下列的决定：

“我们各地及广东党部的独立行动。”

“我们在现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反对广东内外的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虽然他们在中派指导之下，当然还要竭力赞助他们，我们同时应当有拥护劳动民众利益的自己的政策，而且以这一政策做赞助他们的根本条件。”^①

同志们，据此我们可以指责中国共产党，说它的个别领导人的讲话不符合布尔什维主义，可以指责它犯了错误，但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有意将中国共产党贬低到国民党的附属者的地位，在组织和政治独立性问题上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这是粗野的无耻的谎言！（伍伊维奇作了令人费解的插话）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就像你们一样，对这一点自然了如指掌。但是，事情既然如此，你们就得为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一个基本纲领。这就是你们为什么在中国问题上批评共产国际和我党的中央。现在反对派把拉狄克吹得天花乱坠，并捧他为先知。反对派说，拉狄克是唯一预见到蒋介石要举行叛变的人。季诺维也夫同志通过电台呼吁全世界的非党群众反对党中央，公开吹捧预见到蒋介石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63、64页。——原编者注

叛变的拉狄克同志的什么历史功绩。但是，同志们，蒋介石要实行叛变，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知，无论是布哈林（他在工会大厦所作的报告）还是斯大林和其他一些同志都反复谈到过这一点。

托洛茨基在他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呈文中谈到了谭平山的小册子，并且指出，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的序言表明，他过去没有理解中国事件，现在没有理解，而且将来也不会理解。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他为这个小册子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了以下几点：

“资产阶级企图夺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以期与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统治分庭抗礼，这个企图已于3月20日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种共产主义的阴谋^①再次出现的危险远远没有消除，必须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

这篇序言是在蒋介石举行行政变以前写的。多数派路线的拥护者已经预见到蒋介石可能会叛变，因此，资产阶级可能接着就会反攻。有关这一点，可以查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提纲，而反对派的同志却盗用这一切，并企图在我们面前借花献佛。

真正预见到蒋介石必然叛变的，根本不是季诺维也夫，不是托洛茨基，也不是拉狄克，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这是不容你们争辩的基本事实。

当然，谭平山的小册子中确实存在一些错误，一些错误的词句以及概念上的混乱，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已经纠正了谭平山同志的所有这些错误。反对派经常指责我们没有刊印材料。但是当我们刊印了材料（如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时，反对派立即发出愤怒的叫喊。当我们把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作为材料在《真理报》上发表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编者

时，托洛茨基同志立即跳出来，摆出一副温文尔雅的姿态，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套空话，看他那样子就仿佛他因此而揭露了共产国际的政策似的。来势如此之凶猛，就好像共产国际或我党中央委员会对谭平山、陈独秀或中国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负责似的。

关于武汉政府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断言，武汉政府还不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这就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武汉政府的位置是一种“虚构”，是一个真空。但是，这仅仅表明，反对派低估了武汉政府的革命意义。武汉政府不仅存在，不仅有自己的领土，自己的军队，而且还在进行反对张作霖的斗争，并且其内部还有共产党人，当然，叛变行为再度出现，一些重要的社会阶层、军事组织和个别军阀再度脱离武汉政府，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会忘记，武汉政府目前还接受资产阶级的某个阶层和军阀的支持，后者之所以与武汉政府结伴而行，是因为革命军进入了他们的地区。此外，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如小型工厂和小型工业企业的所有者将来也会逐步脱离国民革命运动，因为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发展感到不安，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工人罢工的直接损害。我们必须估计到这一点。但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低估了武汉政府，不懂得它的意义。实际上他们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进入革命政府。……季诺维也夫通过这种分析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反对共产党人进入武汉政府。他在提纲的某一段中说得很有干脆，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进入中国国民政府，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必须，而且可以进入武汉政府，也就是说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进入武汉政府。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武汉革命政府已属既成事实，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

你们记得，1905年我们在进入革命政府问题上同样与孟什维克进行了争论。当时，孟什维克采取一种极左立场，反对加入临时革命政府，并指责列宁的观点是“庸俗”的饶勒斯主义。列宁

同志回答说,米勒兰参加刽子手加利费的资产阶级内阁是一回事,一个印刷工人参加巴黎公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然,国民党不是巴黎公社,但无论如何不该把它看成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变革的力量,不该像季诺维也夫同志那样,把它与李沃夫公爵和克伦斯基的政府以及1918年沙伊德曼的政府相提并论。……武汉政府与后者相反,它进行反帝战争,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因此,共产党参加武汉革命政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同样,“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策”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认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策、灵活政策只适合于取得政权后的无产阶级,只适合于苏维埃共和国,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必须选择一条捷径,不得签订任何暂时的协议,不得采取任何巧妙和灵活的手段。然而,当时武汉政府必须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如果有可能挑起一个帝国主义强盗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强盗,通过订立某种独立的协议,通过运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策略和通过灵活手段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武汉革命政府就有义务这么做。中国共产党对武汉革命政府的工作负责。陈独秀同志的讲话(托洛茨基同志曾试图从中捞取一笔政治资本)中自然存在一些错误的观点。自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以后,任何人已不得再作这样的讲话。不允许再说没收土地的工作留待以后再做。这确实使人想起1917年社会妥协派的观点。社会妥协派当时说过,没收土地的工作可以留待以后去做,即等到国民议会召开,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做。而没收土地的工作必须立即坚决进行,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基本的、内在的社会经济内容就是土地革命。陈独秀的讲话必须予以纠正,而且已经由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予以纠正,决议中已没有陈独秀的错误观点。托洛茨基同志宣读了陈独秀的讲话,但不愿宣读陈独秀讲话以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托洛茨基还利用谭平山的小册子搞蛊惑宣传，但是对全会决议在谭平山同志讲话后已纠正他的错误一事却避而不谈。谭平山的小册子中所有与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一致的提法都是正确的，而不一致的地方都是错误的，都是必须抛弃的，一个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判断和说话，共产党人希望接触中国革命问题是为了熟悉它们，而不是为了在党代会之前制定一个宗派主义的纲领。伍伊维奇同志，请您学习学习。

最后我谈谈苏维埃这个口号问题。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将苏维埃视为与现政权作斗争的武器，视为革命新政权机构的萌芽形式。1905年，我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实际上已成了政权机构，它们没收印刷厂，逮捕警官，发布命令，叫人民不要向政府提供资金。所以，仅仅为了组织工会运动和没收土地而成立苏维埃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没收土地的工作可由农会来完成。只有当我们推翻一国的现政权的时候，组织苏维埃才有意义。1905年我们曾利用苏维埃反对沙皇制度。1917年我们为了推翻临时政府而成立了苏维埃。当然，如果我们从反对派的观点出发，像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所说的，认为国民党已经过时，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像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是真空，是“虚构”；如果我们旨在推翻武汉政府，那么，自然别无他途，只有立即成立苏维埃，利用苏维埃反对国民党，成立双重政府，依靠苏维埃反对武汉革命政府。但是，我们认为反对派的这个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我们认为，国民党组织没有过时，武汉政府目前还可资利用，必须通过尽可能多的共产党人进入它的机构和军队，通过改组省一级的政府机构（那里至今还有不少旧官员）给它以支持和帮助，等等。如果我们立即成立苏维埃，那么，我们因此就会把党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苏维埃上。到那时国民党就会被推到次要地位，成

为我们的累赘。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我们完全懂得苏维埃这个口号的巨大意义。但是同时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列宁曾在1906年7月反对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曾坚决反对不合时宜地成立苏维埃。尽管我们现在认为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不合时宜的，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千方百计地制定我们明天的策略。正如布哈林同志强调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当时，即1925年，理解得很正确：只有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后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才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来。但在当前，这个口号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反对它。当然，今天反对派因他们的宗派主义纲领的需要而又捡起了这个口号，以便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比我们更激进。但是我们十分清楚，反对派的拥护者是些什么样的“激进派”和“左派”。布哈林同志出色地阐明了反对派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它的各个阶段。我只想补充一点，提醒大家注意拉狄克在1927年出版的小册子中说的一段话。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现在和以后的几年内还没有力量夺取政权，如果它因现阶段革命斗争的过程而面临与小资产阶级一起夺取政权的问题，那么它必须首先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本国的经济实力。”

拉狄克的这段话表明：一、他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二、他承认，中国无产阶级如果要与小资产阶级一起夺取政权，那么就必须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本国的经济力量，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就是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我们反对派的左倾激进主义原来是这种样子。我们从他的话里就能听出你们的右倾观点。

在结束讲话时我还要说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本次全会的讲话中指责我们是现代的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说我们要帮助中国的卡芬雅克，扼杀和消灭中国工人阶级；我们是陷入考茨基异端并反对像托洛茨基同志这样的列宁主义正统观念“支柱”的

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这里我只有一点不理解：如果反对派确实能像当年列宁对待考茨基那样对待我们，那么，他们为什么至今还留在我们党的队伍里，为什么不与这种机会主义领导和这机会主义的党实行决裂呢？

如果我今天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唯一合理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出路就是立即与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同志把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说成是机会主义者）实行决裂。我深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次全会将坚决摒弃反对派的提纲，在通过主席团通过的决议后确认，现在制定的践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斯大林（苏共）：（见下文）

片山潜（日本）：我们如果研究中国革命，就必须回顾到1925年5月的炮击南京事件。当时中国工人的力量尚未发展，至今还未被世人所知。但是，这种挑衅和炮击工人、学生的事件已经惊醒了中国人，他们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方抗议这种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国工人在北京、武汉、广州向帝国主义表明了自己的力量。自那以后，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又有了新的发展。

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消灭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多次企图向中国人民寻衅。广州的沙基惨案、万县惨案和许多其他罪行，以及最后的英美海军炮击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者向中国人民进行挑衅和威吓的尝试，然而它激发了反帝斗争。但中国工人和农民变得聪明了，他们利用各种策略来对付帝国主义，如开展了抵制洋货运动——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实际上是弱小民族的最有力的武器。由于这种抵制洋货运动，英国被大大削弱了，以致远东最大的贸易城市香港现在成了一个小得可怜的死港。任何挑衅只会加强中国革命。

至于蒋介石，可以说他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他在3月20日证明自己是一块机会主义者的材料，但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在

利用他为革命运动服务。广东革命军北伐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工人和农民的力量。

当蒋介石看到这支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时，他认识到这支力量有可能从他手中滑走，于是便试图依靠右翼并派国民党右翼领袖戴季陶前往日本，与日本领袖和日本政府签订协议。这就向国民党左翼发出了开始反对蒋介石的信号，共产党同样也开始了斗争，因为它看到不能再继续信任蒋介石。3月10日武汉政府在汉口实行改组，成功地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了革命的领导权。我们不能断然说蒋介石是自愿举行政变的，因为他是被迫作出这个决定的。武汉方面于3月10日作出决议，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将不再继续与他携手合作。

但是，蒋介石为何要反对中国革命呢？是因为他害怕群众的力量。当广东革命军进驻上海并受到上海革命工人热烈欢迎时，人们把上海的大权隆重地交给了蒋介石，而他非但不赞扬上海工人的革命力量，而是决定斗争，要利用革命消灭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的力量。这就是他试图击溃和消灭上海以及其他受其管辖的城市的革命工人的原因。这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蒋介石和中国革命的钥匙。当蒋介石举行政变时，许多意志比较薄弱的人就开始动摇。他们害怕蒋介石赢得胜利，扼杀武汉政府。中国工人和农民是训练有素的。你们如果研究一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看到，中国工人和农民在自我组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手工业者几乎都有自己的行会组织，有些行会拥有几百万名成员。这些行会有良好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在有些情况下还是秘密组织。革命运动爆发时，这些团结一致、组织严明的工人总是站在前列，并参加了革命军。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引导过来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你们将会看到，他们是有组织的。在农村，他们一般都具有打土豪的实际经验。

帝国主义为了打败中国人民，试图离间中国人民，把中国革

命搞成第二次义和团运动。但是中国人民变得聪明了：我们现在不是 1900 年，而是 1927 年。

英国要进行武装干涉，而美国则相反。美国实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而英国则企图不惜代价消灭革命运动。

日本对中国革命持中立态度。为什么？不仅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且还因为它害怕中国人民，害怕中国革命，特别是他考虑到英货受到的抵制。日本非常害怕中国人。中国四万万人民可能成为革命力量。日本只要一想到中国人日后会像今天抵制英货那样抵制日货就感到毛骨悚然。这就是日本不敢进行干涉的原因。

如果说中国革命在经受了上海和广州的失败后仍然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威胁，那么，也可以说中国革命大有希望达到在北京建立政权的目的。然而危险确实存在。中国革命虽然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已经发展壮大；来自军阀和帝国主义方面的威胁没有减弱，尽管如此，中国革命正在取得成就并且定会取得胜利，因为农民和工人参加了革命，革命在壮大。

湖北、湖南两省共有 550 多万居民，受武汉政府管辖。山西和河南两省共有 500 多万居民，主要受冯玉祥将军的管辖。今天，革命政权总共可以支配 1000 多万居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湖南和湖北都是富饶地区，在这两个省，许多城市的工人都成立了自己的类似苏维埃的政权。因此，中国革命是大有希望的。我对此非常乐观。唯一构成危险的是城市居民的不可靠性。在最近几年中，中国的国内战争没有一次是持久的，间或达到半年或一年，但几乎没有持续更长时间的了。小资产阶级一向贪图安稳，他们很快就会厌战，但居民中另有一阶级即从未同军阀和帝国主义作过斗争的农民阶级现在参加了斗争。革命运动正在这个新崛起的阶层中开辟新的天地，不断发展壮大，并在运动中形成新的中心点。因此，我对中国革命抱非常乐观的态度。

布劳恩(德国)：不管是决议还是各个人的讲话都对各国党没

有充分支持中国革命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适用于我们德国支部，也适用于我们的宣传即我们没有足够有力地开展的宣传，没有与其他内政问题充分联系在一起的宣传。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尽了不少努力，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我们曾尝试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打破我们党的界限，发动群众，支持中国革命。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出版了著作（我们出版了三本关于中国事件的小册子，发行量从250册至30万册不等），而且还在德国各重要工业中心举行示威和集会。几个月来，我们还派了两三名中国同志到农村进行鼓动宣传。昨天，托洛茨基同志在讲话前作了一个开场白，在某些方面很有效果。这个开场白表明了托洛茨基同志与共产国际和列宁的观点的彻底决裂。托洛茨基同志在开场白中讲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组织问题。他说：

“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政治教育的第一条准则是，它不仅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接受的东西，而且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的东西……”

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阐述了一条新的，非常富有特色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托洛茨基同志公然将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比较，这一点就足已表明，他讲话中所说的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国际**。跨党的中共党员最关心的是将它的一切建议，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的建议，告诉中国广大群众。相反，在苏联共产党或其他某个共产党内，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恰恰相反，这种方法将会造成很大危害。如果我们传播和发表德国共产党内的六七个所谓左派在某个时期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建议、论据和各种宗派主义的文件，那么，我们就是自己在促使共产党的完全瓦解。凡是适用于德国党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更适用于苏联共产党。

如果共产党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夺取某个组织，那么，它可以接受托洛茨基的提纲，但是，在必须维护已经由共产党领导的

组织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地方，必须坚决拒绝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

托洛茨基同志继续说道：

“党的制度的日益腐化是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

所以，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最危险的不是战争，不是张伯伦和邱吉尔，而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没有将托洛茨基之流的提纲和提案向群众印发3亿份〔原文如此——编者〕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已经看到，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提出的口号：“打倒共产国际的不称职的领导。”而托洛茨基同志是同意这个口号的，他那个关于“党的制度”的发言，实际上是一个策反讲话。

托洛茨基同志说：

“如果某个地方遭到失败，我们必须忏悔……”

但是我们只能确认（如果某个地方遭到失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正在扮演制造混乱者的角色，这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只须将托洛茨基的论述与马斯洛夫的论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两个在思想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马斯洛夫在1927年4月10日的《消息报》上说：

“最大的危险不是……以张作霖和吴佩孚为首的反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右翼的披着‘革命’外衣的反革命。”

可以认为，与托洛茨基相比，马斯洛夫提问题的方式还比较隐晦。托洛茨基则干脆将党的制度看作是最大的危险。此外，托洛茨基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试图提出我们在德国反对派中经常可以发现的一点，即提出整个共产国际反对苏联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讲话中说：

“苏联的国内政策需要革命的国际政策。”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句话的意思与科尔施在德国极其明确阐述的一样，即“在苏联受到民族主义限制的时候，在苏联共产

党推行锁国政策的时候，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其他共产党的义务就是反对这种政策，从而反对苏联”。

托洛茨基同志还指责我们在组成联合政府时放弃了让共产党独立发展的政策，放弃了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那么，托洛茨基是怎样阐明联合问题的呢？他说：

“政治联合是对某种合作取得谅解的平等的双方结成联盟的代名词。”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一种政治联合起初并非一定要由平等的几方组成不可。在一些次要问题上，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阶级在利益均等的基础上可以联合起来进行暂时的共同的斗争，比如中国就是这种情况。参加这种联合的前提，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发展自己的阶级组织，维护和阐明自己的政策，争取在联合内的主导地位，同时反对共同的敌人。而这里的问题是，在中国是否能做到这一点。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正是表明了这种意愿。今天在这里作出的决议表明，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正在设法通过共同的组织形式去加强中国广大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国民党内的影响。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苏维埃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当前的问题恰恰是联合的组织形式使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加入国民党，向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过渡。共产国际的这种观点和联合组织的建立很可能在国民党内引起新的矛盾，很可能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为有些人拒绝改变国民党现在那种非民主的性质，拒绝缩小那些因自己的职务而加入国民党的国家文职人员的影响。鉴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可以将此视为在制定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阶级组织的独立政策方面取得的又一成就。我们的决议将提高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中国在实行我们的政策时犯了错误，这一点无疑每个人都是承认的。而托洛茨基则不是批评某些错误，而是把某些错误归咎为政策的错误，归咎为在整个中国政策上的路线的错误。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说：在今后的发展中，共产国际内部的矛盾激化时两个政党并存是不可能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事态的力量将有利于他们的即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就说：我们也认为两个政党并存是很不可能的。如果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继续使用他们的方法，那么，其后果必然是他们被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洪流所冲垮，而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将不顾反对派，不顾托洛茨基而滚滚向前。将来不会出现两个政党并存的局面，只会把个别同志分离出去，就像我们在德国看到的那样。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和一些支部当前的任务是，必须澄清中国革命问题，维护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和反对派的观点。（鼓掌）

佩佩尔（美国）：党员同志们，我想首先谈谈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中的恐怖制度问题。托洛茨基谈到一种恐怖制度，并说，协商与决议就是在这种恐怖背景下进行的。这显然是对事实的歪曲。现在进行协商作出决议的背景是在外交上和英国的决裂，中国革命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英法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

托洛茨基那些聪明戏言的最高峰就是他把被国民党玷污的共产国际称为国民党国际。不过这种戏言并不新鲜。

如果托洛茨基在这里仅仅使用人身侮辱的话，他伤害不了任何人。人们也不必为此激动。现在受托洛茨基的人身侮辱几乎成了一种赞扬，几乎成了共产国际荣誉军团的红色战旗。但是托洛茨基篡改的是事实，是现实。人身攻击算不上什么大罪，但篡改现实就是十恶不赦了。被托洛茨基篡改的现实是怎么回事呢？托洛茨基同志对中国的局势进行了全面分析。什么叫全面分析？如果人们读过托洛茨基的所有提纲，听过他的所有演讲，人们找不出一点关于中国的具体的客观现实。为此他辩解说他没有时间对中国革命进行历史的阐述。历史地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他没有时间做这种小事。同志们，为什么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

政治观点是根本上错误的？因为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根本上错误的。反对派怎么说呢？他们说，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而彻底，也许与大的帝国主义强国如与英美相比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上落后一点，但它已是一个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完全否认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否认旧的封建残余分子和新的封建分子。我认为这就是俄国反对派的根本错误。这显然也是德国党外部的反对派的错误。托洛茨基同志甚至声称，帝国主义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唯一严重的障碍。这就是说，在中国内部已经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所有的基本条件，广大农民已经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内部市场已为资本主义全部打开。众所周知，只有实现上述两个基本条件，才有可能发展资本主义……

托洛茨基同志和整个反对派的以及拉狄克同志的第二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把占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等同起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看到中国到处都是高利贷主和商人。于是反对派就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同志们，这完全不对。正确的观点应该恰恰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说，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统治就意味着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的观点则反之，商业和高利贷资本越是占居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越薄弱。

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理解好这个问题，我们一无法进行阶级分析，二无法了解农村的社会关系，三无法认清政治上分类的作用。这是中国革命中最根本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整个反对派都转了向。

反对派所犯的第三个原则上的错误是，这些同志以为中国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农业。尤其是拉狄克同志，他说，这一点非常明显。但我们在中国农业中看到了什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村社。不仅马克思，就连许多当代研究中国农业的学者都毫无例外地肯定了这一点。唯独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当

然我们不光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土地在法律和名义上常常属于高利贷主和城市商人等。但这是否意味着生产方式改变了呢？当然不。马克思不仅说了而且证实了生产方式不因利息、年金、地租的存在与否而有所改变。在政治上这可能会引起分化和腐败，但经济上并不改变生产关系。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在考虑资本主义农业时没有注意到，仅据利息一点并不能肯定它一定就是工业利息或商业利息。他们把二者混淆了。他们认为，哪里有利息，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农业。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真是愚蠢之极。

谈谈另外一个错误。拉狄克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一场迟到的革命。这对吗？他说，所有经济上的发展早就应该表现出来。这在原则上是错的。相反，人们应该说这是一场加速到来的革命。因为中国不仅要经历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同时还要经历反帝革命，所以经济发展大大加速了。

反对派的第五个错误是，他们把整个中国革命理解为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再现。拉狄克的演讲、托洛茨基的提纲以及反对派都经常这样谈论。他们说在美国进行的是反英的殖民地革命，在中国现在和过去进行的都是反帝革命。所以说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不是由于二者都是反封建的，而是因为二者都是反帝的。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许多同志现在都以为，美国没有封建制度。从经济上说这是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二者之间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根本区别，英国资产阶级在美国革命中千方百计阻止独立的美国工业的发展，相反，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是由外国资本创建的。

在美国我们在革命中没有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国则相反。另外，美国革命的整个历史环境正处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夜，处于正统的资产阶级全球革命的前夜。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整个历史背景也完全不同。在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职的

同一天，巴士底狱被冲破，这不是偶然的。在俄国革命之后爆发的中国革命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连这种根本区别都看不到，岂能谈论中国革命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基马尔化了。反对派说，基马尔化是可行的，国民党本来就是基马尔化的替身。我认为这完全不对。中国和土耳其的基本条件相差甚远。在土耳其我们见到的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遭到镇压。这是因为土耳其的无产阶级非常软弱。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要强大得多。

其次，土耳其基马尔化的意义在于基马尔使他的国家不依赖帝国主义。在中国则反之。中国还没有摆脱对于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所以基马尔化完全不可行。

最后一个问题是，反对派的同志们说，他们认为革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提纲也这样主张。但我认为，在两种社会主义前景之间也有原则上的矛盾。反对派之所以主张有社会主义的前景，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无产阶级已成为动力，大工业已发展起来，农业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就像欧洲某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一样正按常规向社会主义阶段迈进。这全然不对。

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前景是：中国在非资本主义因素占压倒优势的前提下开始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相当强大的无产阶级。他们将成为动力，将在工农联盟中形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当今的历史前景下，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可能通过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化时期而诞生。这就是原则上的某些差异。

楚古诺夫(中国)^①：自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以来中国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性。对这一点

^① 中文原名待查。——原编者

反对派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在谈到蒋介石叛变的问题时，他们到处大声喧嚣，甚至在无党派的群众中也散布说，我们列宁主义的领导机构即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政策，而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说它们曾经而且继续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反对派说中国共产党一无所长。真是荒谬。这完全是不了解实际工作的人在瞎扯。他们不了解苏共领导机关、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被中国的事情搞得转了向。所以他们面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企图，特别是面对中国革命的困难而手足无措，是毫不足怪的。的确，蒋介石的叛变是中国革命中的一大事件，但是中国革命遭到的这次挫折，蒋介石的这次叛变，绝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这次叛变表明至今一直战斗在民族革命阵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投入了反革命的阵营。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把革命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就企图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但是和资产阶级的意愿相反，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这使得资产阶级慌了手脚，因此，它离开了革命阵营，公开转入反革命阵营。这也就是蒋介石要叛变和资产阶级要脱离革命阵营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突变，由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向土地革命的突变。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的反对派所不理解显然也不想理解的地方。然而现在还不能断言这次大突变能顺利完成。我认为还有必要强调，蒋介石的背叛在中国革命中不是第一次，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但我要重申，这绝不是革命的失败，而是革命不断发展的结果。

为了清楚地证明反对派在国民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接着想扼要地谈谈国民党的性质。反对派从对国民党的错误的观点出发，针对中国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提出了完全行不通的策略。他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不是这个词的普通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受国际资本和封建残余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的

各个被压迫阶级自行联合而成的党。这个联盟内的力量对比发生过变化，并且随着革命的发展还将不断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在革命的第一阶段，部分地主、大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属于这个联盟。但是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即工、农、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期，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1922年和孙中山密切合作的陈炯明将军叛变了。当时孙中山险些被叛军打死。在这次叛变之后，1924年，即在改组国民党之后又有过两次人人皆知的叛乱。第一次叛乱是国民党右派反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是买办资产阶级和部分地主的代表，而他们的代表则是商团的陈廉伯将军等人。他们组织了一次反对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的叛乱。这时国民党政府的首脑是孙中山。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再次企图组织叛乱，因为他们对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群众与军队日益增强的影响惊恐不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恐惧，发生了1926年3月20日的大事变。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就是蒋介石等一伙人。但我们也知道，清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影响的企图并没有完全得逞。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允许以蒋介石为首的右翼民族资产阶级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3月20日事变之后，便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共产国际决议中所说的过渡时期。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右派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围绕着革命领导权——对国民党和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而在争夺对国民党的支配权的斗争中遭到失败的资产阶级则公开表示脱离革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阵营标志着国民党内外力量的新的改组。这就是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即国民党从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的政党变成了工人、农民、小资

产阶级的联盟。毫无疑问，这个联盟更牢固、更革命。成百万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武汉政府作为它的化身形成了民主专政的萌芽，在我们的正确领导下走上了土地革命的道路。由此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革命性质还没有丧失殆尽。在国民党周围还聚集着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种情况下退出国民党就意味着把领导成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权力交给国民党右派即资产阶级。所以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争取对它的支配权和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进行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的道路上把中国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但由于反对派不理解这条路线，所以他们建议立即退出国民党。这种路线毫无疑问要葬送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会走这条路。与反对派的交道该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走共产党国际的路线。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偏离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列宁的旗帜下中国革命必胜。(掌声)

斐迪 (土耳其)：我觉得，对经济落后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作何评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而反对派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托洛茨基同志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把落后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混为一谈。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本身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两翼的斗争乃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斗争的一种表现。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相反，落后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则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附庸。它是不具有民族性的、退化的、腐败的阶级。鉴于年轻的民族在自己国家内有陌生感这一特点，我们应当对它大书特书。他们必然要主张自己有权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本国进行剥削的可能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一旦形成，就会促使我们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武装斗争的时候，以无产阶级组织的名义直接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甚至在某些条件下，

如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十分有必要变成这样一个组织，它的直接目的就是把国家从资本主义列强和封建制度的压榨下解放出来。它应在由几个阶级组成的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联盟中占有领导席位。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可说明共产党人何以加入国民党这样的民族革命组织。作为一个正在顺利地为国家谋解放的组织，正如我们在土耳其所见（基马尔和他的同志们被视为土耳其人民的救星），它在国民的心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和盛名。所以在它尚无把握取得这次胜利的一定时期内，不可能从那些被视为解放者的人手中夺权。对共产党来说，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即使它还不能独立肩负领导斗争的重任，也要参与领导，以便在胜利的时候，在革命政权中参与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盟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当然无产阶级在这个联合领导中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的权力。

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完全可以承担运动的领导权，并且靠劳动群众的支持能够有把握取得革命的胜利。即使是这样，为了使惧怕共产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大众参加革命，利用国民党这样的组织作为共产党的替身也是有益处的。中国、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的客观条件证明，无产阶级还无力独自把民族解放斗争胜利进行到底。发动斗争的是资产阶级，而把斗争变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非资本主义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即使为了迈进一小步，列宁不是也要我们注意争取能够支持我们革命斗争的社会各阶层吗？我们在谈论无产阶级的绝对独立性，谈论由它单一领导下进行斗争的问题时，我们的态度固然非常革命，但这仅仅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罢了。胜利的保证在于对力量和行动的正确估计。

现在我谈谈第三个问题即建立苏维埃的问题。从原则上看，列宁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提纲已就此问题作了详细、缜密的阐述。苏维埃可以在落后国家的解放革命中建立。对我们来说，问

题不在于中国原则上有没有建立苏维埃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我们应决定的是,目前,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建立苏维埃,大呼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否合适。我们认为,目前在中国既然接受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那么组织苏维埃是不合适的。它只能使形势复杂化,分散对革命的领导。因为由此而可能产生的双重政府注定要导致激烈的冲突。但我相信,只要让革命朝着我们所指的方向发展,那么,几乎必然会自发地产生各种名称和形式的苏维埃。当然,我们党在这种形势下有义务扶植这些自发产生的苏维埃,设法接过它的领导,对国民党施加压力,阻止它对苏维埃采取敌对态度。党必须尽力在一个时期内把两种斗争手段结合在一起。

.....

埃尔科利(意大利):同志们,我同意谢马尔同志的意见。我们这些从西方来的同志对中国的形势缺乏详细的了解,我们不知道有什么途径可以使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的形势。但我认为,我们基本上掌握的情况足以使我们能够在会上就我们看到的两个提纲明确表态。

先就我们在中国革命这个基本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方针正确与否说几句。为了判断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忆一下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人对殖民地争取自由的革命运动应采取什么态度的讨论。

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提纲。一个是列宁的提纲,在代表大会上成了共产国际的提纲……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塞拉蒂同志针对这个提纲以完全不可理解的方式提出了另外一个提纲。他这样说:

“阶级斗争,甚至在所谓的落后国家,也只能在无产阶级绝对不依赖它的一切剥削者,甚至不依赖自称为民族革命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条件下才能发生。”

他还说：

“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建立苏维埃制度，被压迫人民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但是，靠共产党人和自称为民族革命者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哪怕是间接的、临时的妥协联盟，是不可能实现上述革命的。”

结论是：

“这种联盟只能导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蜕化，这尤其表现在与资本主义斗争经验不多的国家。”

在阐述这个提纲时，塞拉蒂甚至说，列宁捍卫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是反革命的观点。由于有一个同志提出抗议，所以这些话没有记录在案。

托洛茨基同志是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并且是捍卫列宁的提纲的。他同意塞拉蒂的观点吗？是我们不相信他？不过今天托洛茨基代表的观点正是塞拉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反对派的种种历史论据，把他们的论据同1848、1905和1917年的革命对照一下。在这几次革命问题上他们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认为适用于殖民地和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也适用于先进的工业国家资产阶级左派的运动。托洛茨基的提纲和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包含的论点就是我们在意大利让资产阶级左派用来反法西斯集团的论点。这种论点不能用在对待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态度上。我认为，反对派整个立场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此。

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的策略是绝对正确的策略，它指导我们在第七次全会上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了决议……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强调必须具备特殊的条件才能采取这种策略。所谓基本条件想必就是指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指我们能与之结成联盟的力量，而不是指我们向农民进行革命行动所需要的教育的反对者，不是指我们组织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阶级行动的阻碍

者……

第二个条件是，参加公开进行反帝斗争的各阶级的联盟难道不能使我们开展群众运动吗？对此我们只能作出肯定的回答。

现在我们看一下共产党的发展。在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有70个成员，有四个派别。正是它加入了国民党才开始成为一个大党。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不光有党内斗争，而且还有宗派思想，有怕群众、怕到群众中去、怕在大的工农组织中工作的思想。在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工作的过程中，这些思想得到了克服。

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开始成为政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结果是：1. 工会活动使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2. 加入国民党使共产党人和农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起到了革命的作用。

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考察，即从“北伐”对工人运动和群众的一般影响来考察。托洛茨基在他的提纲中作出结论说，北伐的结果使工农变弱了，资产阶级变强了。这种说法丝毫没有事实根据。我们可以用报告、记录和数字来驳斥他。我们先从组织起来的工人政权和工人组织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在一份十分详尽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下面的情况：

“自从北伐军占领湖南之后，工会（湖南）会员人数从60000增长到140000，有工会的地区从12个增加到40个。在长沙工会从18个增加到72个，会员从20000增加到800000。”

人们看了这些数字之后能说北伐使工人阶级变弱了吗？相反北伐是加强工人组织、从总体上讲加强工人阶级力量的因素。

关于农民问题，我们党的一位军事顾问在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视察后写了一份十分有意思的报告。他写道：

“北伐开始时，农村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在天津老打败仗，蒋介石的脚受了伤，他已乘飞机回广东去了。吴佩孚又占新地盘。

谣言四起时，富农就阻止农民建立农会，说：‘我在这里种地生活好多年，我不知道什么农会不农会，可我一直吃得很饱。最好不要去搞这种事情。’可是当人们听到北伐军节节胜利，占领了九江，蒋介石的脚也没有伤，吴佩孚最终被打败了的时候，人们又开始制作红蓝两色的农会标志，上面写着：农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农会必胜！等等。”

还有什么能像北伐这样对农会的建立和巩固起这么大的作用呢？我们还可以用敌人的话来作证。就在蒋介石叛变前不久，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自从北伐以来许多部队瓦解了，中下级军官野心勃勃，军纪涣散得叫人难以相信，买卖做不成，学校停了课，群众的不满在增长，许多人认为我们比北方军阀还要糟。”

我认为，在蒋介石的这篇讲话中值得注意的是，它清楚地表明国民党是一个联盟，它联合了各种力量，而在各种力量之间同时还进行着斗争。一方是资产阶级，他们很想一边保持自己的组织和买卖，一边进行革命，也就是要把和他们一起进行北伐的其他力量压下去。另一方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势力。他们准备冲破阻力，夺取军队，搞乱贸易，煽起群众的不满情绪等等。这一切表明，联盟的存在对组织和教育群众不是阻碍。它使我们有可能按照我们的方向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这也是统一战线在新形势下必然被分裂的又一个原因。

季诺维也夫在反对马尔丁诺夫的论战文章中就已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北伐和我们加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他首先对他现时提出的路线——认为我们不应把自己的力量并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应该单独行动，建立工农苏维埃，同至今一直和我们一起前进的力量实行决裂——作了解释，然后他说：“嗨！如果我们在北伐开始的时候，即一年半前就实行这种战略就好了！”

反对派的观点和建议中的原则性错误暴露得不能再清楚了。如果我们从北伐一开始就实行决裂或者极力实行决裂，那我们只会把我们降低成民族革命洪流中的一个小小的宗派。我们就决不会和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革命分子结合在一起，并且在与蒋介石的关系破裂时也就是在蒋介石投向反革命一方时，所有原来和我们在一起的人也都会和蒋介石一道离去。蒋介石将拥有国民党的多数，并能在长时间内阻止革命的发展。蒋介石投向反革命的一方之后就发现自己被民族革命运动的洪流所淘汰，今天他已经无力组织起一个牢固的国家，而我们在不断前进的革命中始终站在最前面。正是上述事实证明我们实行的战略是正确的。

现在在这里还要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预见到了前几个月事件的发展。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一段七次全会的决议。我们在决议中曾十分肯定地说，可能出现背叛，革命阵线可能会破裂。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作了精确的“预言”，而在于我们预见到在以后的发展中破裂是必然的。我们认为前进中的不同阶级的联盟本身包含着相互矛盾的因素，这些因素迟早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分离开来。这是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路线吗？是的。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大体上这样说过，我们进入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我们正向第三阶段前进。我们必须完成这个转变。我们要注意在这次转变中出现的破裂。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使破裂不给我们带来过重的打击。我们要驱逐叛徒。站在不断前进的运动之首并把运动推向前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必须检查的问题是，我们在将来是否也要遇到分裂。我们现在是否预见到有些人要背叛我们，预见到我们还要把联盟中今天还支持我们的一些人驱逐出去？这一点我们预见到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还预见到，还有一些人将背弃革命，将被我们驱逐出去。但我认为，现在和第七次全会时的问题完全不一

样了。

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首先考察民族革命联合政府的性质问题。蒋介石叛变以前的联合的性质是什么？在联合中有四个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四个阶级中哪一个力量最强呢？当然是资产阶级。

今天联合政府中还有三个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中还有一个共产党，它必须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给他们制定一条路线并争取领导权。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是最强大的阶级。毫无疑问小资产阶级在后来的革命进程中还将继续保持他们在历次革命中所采取的态度，即作为一个动摇的阶级，没有特定的阶级意识，从这一方跑到那一方，总是不停地摇摆，等等。我们完全应当小心从事，排除动摇分子，团结那些愿意继续进行斗争的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联合的性质，那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如今形势对我们来说比蒋介石分裂以前还要有利。

第二个角度是从群众运动发展来看。显然，蒋介石的背叛首先是由于群众运动的发展引起的，因为资产阶级惧怕这种发展。如今运动的发展具有什么性质和发展速度呢？从现有的报道看，运动是以极高的速度在发展，这有可能并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的分裂。但如果我们懂得及时地发动群众，懂得适时地依靠他们，在分裂出现时就能保证我们是较强的一方。

不过除了运动的速度之外，我们还要考察一下运动的性质。检查中国革命目前的性质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中国革命基本上是土地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运动中有哪些群众呢？他们反对的是那些阶级呢？这就是我们要彻底研究的问题，而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缺少某些素材，所以我们无法勾画出详尽完整的形势图。这里有几份报告描述了目前土地革命的形

势，得出结论说农民今天在受剥削。1. 受地主剥削；2. 受高利贷者剥削；3. 受官僚制度的剥削。由此人们得出结论说，土地革命有三个发展方向：反抗地主的剥削、反抗高利贷者的剥削和反抗官僚制度的剥削。我认为我们必须主要考察反高利贷者的斗争的意义。谁是高利贷者？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体现了什么？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问题是，是否还存在封建残余，封建残余在中国的土地革命中具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手头的一份报告说，高利贷者的存在表明在城市积累的大量资本被挪到了农村，并用十分独特的方式在那里投资。这些资本的所有者——城市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在农村投资，不是为促进农业的发展，而是为买进土地，然后再把土地租给贫下中农。这种独特的现象就有可能使农民起义，即土地革命部分地针对资产阶级分子，也许还要针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针对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起分裂作用的所有人。

土地革命的第三个方向是农民进行反对官僚制度的斗争。这个问题也必须予以认真地考察。因为从政治上看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革命的中心问题，所以今天中国的土地纲领还必须在最后写明“农民组织要夺取政权”。这也正是导致同各类军阀、各省的官僚以及旧的国家官僚制度的种种残余决裂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分裂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不反对分裂，而只反对分裂可能给我们造成的危险，我们能有什么保障呢？我们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即使不是一模一样但类似蒋介石这种人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因为中国革命是很复杂的事……不仅有群众战线，还有军事和政府战线。我们所处的统一战线中不仅有工会和农会，而且还有军队、政府和国民党。因此不能像反对派那样只考虑到一个方面的保障，只看到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的单方面的保障。反对派这样提问题说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势一

无所知。目前，由于我们在军界和政界的各种活动，即借助自上而下的行动，我们不能排除得到真正保证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能保证绝对不再出现分裂，而主要是为保证今天的群众运动能以各种可行的方式得到发展并尽可能向纵深发展。布哈林的提纲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阐述并强调了这种必然性，使这一点成了我们下一阶段在中国工作的重点。而反对派恰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在理论上不理解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在具体的历史观点上不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他们不去研究群众运动发展和组织的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形式，只满足于给我们以口号和公式。如果人们这样去使用这些口号和公式，结果肯定是既抽象又无意义。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提纲大谈发动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就是不谈用适合中国实际的形式去组织群众的必要性。托洛茨基的提纲谈到要“唤醒群众”，谈到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排除这种首创精神的障碍”、“革命的浪潮”一旦掀起就将席卷一切障碍等等，但当人们把这些东西和中国运动的现实进行对照时，这些东西就成了混浊不清的东西。我甚至认为，我们现在还有列宁1905年就批判的在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身上存在的那种作风和错误的残余。当时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是否有必要“发动”或“组织”群众运动。这是反对派不理解的中心问题，是他们犯错误的根源。在发动群众转入组织群众的问题上，反对派不理解我们掌握着组织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最基本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国民党这个全国性的政党，而我们的战略和行动都必须适应这种组织形式。

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和这个问题也有联系。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有一份由季诺维也夫亲自执笔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说，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我们的主要政治口号的时刻，也就是我们开始为无产阶级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时刻。对中国来说，这个时刻还没有到来。目前中国局势的特点是，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遭受了挫折，而革命后备力量即农民组成的后备军，才刚刚进入战斗，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才刚刚组织起来。如果我们此时此刻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那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会犯错误，就会破坏我们千方百计要保全的民族革命阵线。

苏维埃的问题还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即在中国的群众运动中和群众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中是否存在已经接近苏维埃组织的形式，是否存在这种政权组织的萌芽。下面我想谈谈农民组织问题。关于这些组织的存在情况，有人给了我们下列一些数字：

河南……………5204000

湖北……………1740000

广东……………1200000

湖南……………1000000 等等^①

看到这些数字，我们必须严肃地想一想，这些组织的性质是什么，究竟是工会式的“自愿”结合的组织，还是苏维埃式的代表性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我使用的所有材料使我确信，后一种估计是正确的。我们最了解的那些省份的农民组织并不具有工会性质，不以单个会员为基础，它没有会员证，没有会费，而是以集体为单位，如以家庭或村庄为单位参加的组织，也就是说苏维埃式的代表性组织。其结论是，这些组织不光局限于打仗，组织农民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还提出农民夺权的问题。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这是一条直接由农民革命通往苏维埃组织的路线。但在目前的运动发展时期，要想跨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过渡时期，把建立苏维埃作为基本政策要求提出来，而不是沿着中国革命的自然的、历史发展路线前进，那就要犯错误。

……

关于中国问题，有人建议我们放弃我们党至今执行的、也许

^① 原书未标示单位。——原编者

是错误地执行的路线，可是这条路线仍有可能使我们党取得伟大的成就。

在一般问题上有人建议我们放弃群众路线，走一条脱离群众的新路线。这无疑是在修正共产国际的路线。我们拒绝这样做。

反对派彻底偏离正确路线和政治上蜕化的根源在哪里呢？看看他们怎样提问题，怎样指责我们就知道了。唯一可以解释种种偏离和蜕化现象的只有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反对派挑起的反对党中央的派别斗争使他们背离了并且越来越背离自己的党，背离俄国无产阶级，背离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背离这支先锋队给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毫不犹豫地拒绝反对派的建议，驳回他们的攻击。

伍伊维奇(苏联)^①：布哈林同志的发言一开始就追述历史。请允许我在他中断的地方继续回顾历史。因为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并没有在北伐前夕结束，相反而是由此开始了极为重要的阶段。

首先谈谈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以前，即1926年春以前的中国政策。彼得罗夫昨天在这里依据大量的引文，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第六次全会前后所作的的所有决议和中国党的主要决议及政策是正确的。

我非常感谢彼得罗夫同志根据引文不仅证明了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6年春以前积极参加了制定中国政治路线的工作，而且还证明了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当时的所有基本决议都是正确的。

这是对布哈林同志的观点的最好回答。

令人高兴的是，彼得罗夫同志十分愿意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一起承担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前有关中国政策的责任。但是他要季诺维也夫同志承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后也就是北伐之后的中国政策的责任，那就过火了。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

^① 原书此处注有“反对派”字样。——原编译者

事实是，所有有关保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独立，保持自己本色的决议实际上由于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蒋介石的联合而受到了践踏。

彼得罗夫同志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和执行独立的政策，甚至不惜引用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彼得罗夫，大概还有马尔丁诺夫在《共产国际》第11期上对全会的决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个官方机关刊物本身也对这些决议大加挞伐，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在下一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正。现在，在蒋介石政变之后，彼得罗夫又冒了出来，借着他曾主张修正的决议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能有比这更虚伪的了。

我们在提纲中就已阐述过我们的主张，现在再重复一遍：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打算修改自己的路线，想从不惜任何代价达成的同国民党的联合中退出来，并且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中曾建议，立即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明六月全会的决议基本正确，必须立即开始执行。可惜中国共产党修正自己政治路线和纠正错误策略的各种尝试都遭到鲍罗廷同志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的严厉反对。

如果你们各位想知道彼得罗夫两个月前还谴责但昨天却在这里颂扬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那你们可以看看上海来的三位同志的信。在信中你们将对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有切实的了解，你们将会很容易地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政变能够得逞。

我们还是再回头看看历史吧。有人在这里说，反对派在蒋介石政变以前一直保持沉默，说反对派企图利用蒋介石的政变达到“宗派”目的。事实究竟如何呢？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之后，拉狄克同志于1926年6月第一次致函苏共政治局，要求回答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以便使他这位中山大学的校长能和党的政治路线保持一致。这

封信没有得到答复。在新学年开始时拉狄克同志鉴于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于1926年9月28日第二次致函政治局要求进行解释。该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下列问题要求答复:

1. 1926年3月20日之后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建立和我们对它的态度。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鲍罗廷在表面上支持他。我们干预反蒋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2. 总结国民党的农民工作。

3. 国民党要求共产党人放弃对孙文主义的批评。

4. 国民党应否在无产阶级当中进行工作。

5. 我们如何支持国民党的左派分子。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最近一份宣言的半孟什维克的问题。宣言说,我们必须进行最低限度的阶级斗争。如果把共产党的政策说成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么,这里说的就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全民族意义上的布尔什维主义。

我认为我有责任提出这个问题,并请你们派我去作报告。”

拉狄克同志在1926年6月发出第二封信后,同年9月又一次提出了这些重要问题,而政治局的唯一回答就是绝对的沉默。

1927年1月,拉狄克同志在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之邀所作的一系列报告中又重新提出了这些有关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然而事态的发展太快了。严重错误层出不穷,以致他在武汉危机之后不得不把这些问题的公开化视为自己的责任,当时他终于在共产主义学院讲了话,他是用下列方式提出这些问题的:

“中国革命的最终命运将在武汉而不是在上海决定。对革命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直接军事上的失败,而是民族革命运动内部阶级斗争的结局。蒋介石将军到处枪杀工农,准备进行最后决战。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必须鼓起勇气全力以赴地去驱逐右派,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立即武装工农,在国民革命军中组建

工农部，完成土地革命，满足工人要求，解决社会问题，这首先要确立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因为在实际中不存在这种独立性。我们必须为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领导权而斗争。”

历史学家布哈林同志和多数派的其他同志“曾预见一切，而且其预见被事实所证明”，那么这些同志对上述问题的答复是什么呢？

他们不是认真考虑拉狄克同志提出的问题，相反，表现得惊慌失措。就在这时候蒋介石的冲突解决了，蒋“屈服”了，并声明忠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是他们发出了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但是他们忘记了，资产阶级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在革命中决不屈服于决议，而只屈服于武力。

几天以后上海被占，又是一片欢呼声。

在此期间，事件的发展表明，蒋介石向上海的进军不是反对而是靠拢帝国主义者，为了和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进行勾结，为了寻找掩护并在这种掩护下为一个月以前失败的政变进行谋划。

他们为什么惊慌失措，为什么没有马上采取对付敌人的有效措施呢？因为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低估了资产阶级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如何明确地回答上述问题呢？

1. 资产阶级早想对工农宣战。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首先是反帝，他们需要工农来为他们反帝服务（马尔丁诺夫语）。

2. 为了创造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大资产阶级要消灭中国的封建主义。因此他们反对北方军阀，反对支持封建主义残余的帝国主义者（布哈林语）。

3. 资产阶级在国民党这个革命议会中居少数。他们屈服于由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多数。他们伤害不了我们，我们有种种方法使他们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然后把他们一脚踢开（斯大林语）。

我认为这三种观点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过我没时间去

进行分析。

但是我还想扮演一下历史学家的角色，首先向诸位讲一段史实，否则这段历史就无人知晓了。我要说的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4月6日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这时正是上海街头工人血流成河的时刻。在这里我冒着对斯大林不忠的风险或者说我在进行个人攻击。因为昨天斯大林并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他大概把它视为个人问题了。而我则做了详细的记录并希望尽可能忠实地再现讲话内容，以维护我过去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译员的名声。斯大林同志可以纠正一些我并非有意的疏漏，他可以向我们宣读他的速记记录。斯大林同志怎么说的呢？（我只说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帝，这一点就是它有别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的地方。拉狄克同志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速度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迅速。他缺乏耐性。他希望事态迅速发展。他不理解1917年帝国主义者虽然分成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但那时的俄国革命仍有许多困难要克服。而中国革命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结成了统一阵线，所以发展的速度就比较慢。拉狄克在这里又提出了十分革命的口号：和国民党决裂、驱逐右派——他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最最最革命的口号。但中国革命失败了。拉狄克的其他种种错误也出于对国际形势、对中国革命和革命发展速度的错误估计。国民党是一种联合，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革命议会。如果我们拥有多数，如果右派听我们的指挥，为什么会发生改变？为什么要驱逐右派？

只要老马还用得上，农民就还会留下它，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不再需要右派，我们就把他们赶走。目前我们还需要右派。他们拥有领导军队进行反帝斗争的有才干的人。蒋介石可能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并进行着反帝斗争。

此外右派和张作霖的将领的过从甚密，很会拉拢他们，使他

们不经一战就带着全部兵马投向革命。右派还和富有的商人有联系，可以从他们那里筹集经费。我们应该把这些人利用到底，就像挤柠檬一样，挤干才扔掉。

这是政变前三天讲的话。

中国革命的领导是一个庞大的革命党。它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种革命的议会。统率权属于共产党。如果共产党触犯国民党，共产党便会被动，统率权就会转到右派手中。

斯大林同志是如何看待国民党将领屠杀工农这个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无法处理的“个别问题”的呢？斯大林同志说：“这种事是有的，以后还会发生这种事。搞一次革命想要不出一问题，那是可笑的，何况这次革命已搞了两年！我们隐瞒这一点了吗？没有，这是没有的事。我们不隐瞒，但也不想在我们的新闻界夸大它。”斯大林最后十分肯定地说，除了拉狄克的建议外，还有别的路可以达到目的，虽然速度不快，但有保证。

这个在政变前几天作的讲话没有公开发表。我们对没收反对派的文章，对强加于我们的沉默表示抗议。我们有足够的民主，也对斯大林同志的沉默表示抗议。对本应作自我批评但却保持沉默的做法提出抗议。尔后我们的一位历史学家布哈林同志来了。他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5年没有预见到1927年事态的发展，对让胡汉民在1926年执行委员会扩大会上发言表示愤慨。但是布哈林同志忘了读一读季诺维也夫同志写的小册子中的一段话。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就在其中提出了武装工农的口号，可你们没有实行口号，因为你们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蒋介石的联合。如果你们及时地武装工农，革命的进程就会大为改观，蒋介石的政变就不会得逞。

的确有人在这里引用了政治局3月3日的秘密指令。如果这种方针真地意味着改变中国的政治路线，那么它为什么对我们新闻界的活动，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同志在一个月后在莫斯科党的积

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内容没有任何影响呢？如果的确认为这条路线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改变并对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采取其它措施，那么为什么有人在我们各党的内部制造混乱呢？为什么害怕承认错误呢？3月3日的指令使多数派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机构的政治责任更加重大。因为从事中国问题的是这个机构而不是主席团。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同志责备拉狄克同志，说他对首先是反帝斗争的中国革命一窍不通，说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北方军阀，过早与右派决裂就意味着毁灭革命。不能操之过急，不能相逼，因为大资产阶级听话，我们要利用他们。顺便提醒各位，不是我们利用了大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利用了我們，因为他们赶紧占领了比国民党大一倍的地区；为了实行蒋介石的政变，他们屠杀了数千名无产者。

至今还有人在为中国问题上犯的种种错误进行辩护，说鉴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是“一种特殊的战略”，适于“特殊的条件”。如今帝国主义一词完全从斯大林的讲话中消失了。在中国问题上他只字不提帝国主义，现在，土地革命取代了帝国主义，有人企图用土地革命的招牌为这个错误政策辩护，同时也为他在蒋介石靠帝国主义支持举行政变前的错误政策辩护。

但是，蒋介石政变之前究竟哪里有土地问题？土地革命不是全民族革命的基本点吗？因为在政变前你们为了维持和资产阶级（按照布哈林的观点，资产阶级是反封建和反帝的）的联合，你们推迟解决土地问题，延缓完成土地革命以及延缓武装工农。以前你们想利用资产阶级打垮北方军阀，根除封建残余。成效我们看到了。有人证明，中国大资产阶级和其他达到同样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大资产阶级一样能够和封建残余进行斗争。

同志们，现在你们又说，中国的土地问题已列入议事日程；你们主张让武汉政府进行并领导土地革命。而你们过去则说，不必

撵走蒋介石，他不会叛变；而我们则反对，并告诉你们，只有把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驱逐出国民党军队的领导才能打败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这一次在对待武汉政府问题上，你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你们认为应号召小资产阶级，说它有能力进行中国的土地革命，你们还说土地革命前不要苏维埃！只有在国民党左派完成土地革命之后，在我们充分利用国民党之后，才能在中国成立苏维埃。我们给你们的答复和对中国工农发出的呼吁是：你们决不会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土地革命。你们还在执行那种为蒋介石的政变做嫁衣裳的错误的、犯罪的政策。这一次将是国民党左派中动摇不定的领导人和武汉国民党将领的政变。

武汉政府只有保证无产阶级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才能完成土地革命。在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中树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唯一方法，不是向小资产阶级让步，因为他们始终在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摇摆，最终他们将投靠较强的一方。唯一的方法是组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并赋予其苏维埃的组织形式。这不仅能使我们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而且可以为共产党在苏维埃和国民党中争取到对群众的领导权。

同志们，你们现在的所做所为是在继续执行绥靖政策，不同的是这次的对手是小资产阶级。武汉政府自党中央上次会议之后，至少自蒋介石政变之后，究竟为实际武装工农和帮助农民占有土地干了些什么，布哈林同志举不出一个具体事实。

(纽曼：武汉政府打败了中国的北方军阀！)

纽曼同志，蒋介石也打败了北方军阀。我们衷心地祝贺这一胜利。但我们向你们重申，关键问题不是打败一般的北方军阀，而是国民军取得了胜利，唯一能真正完成中国土地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取得了胜利。

我们无法知道，今天武汉政府的将领们，唐生智、冯玉祥明天会干出什么惊人之举。你们也不知道。唐生智是一个地道的封

建主。冯玉祥不久前才加入国民党。据最近一期《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冯玉祥致电上海的蒋介石，报告他的每一次军事胜利。

目前唯一可行的组织是苏维埃。它可以动员工农群众，可以保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在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的地区的领导权。

(谢马尔：完全矛盾！)

这一点不矛盾。如果武汉政府像你们所说的是革命政府，如果它有力量完成土地革命，为什么这个武汉政府还要反对苏维埃，反对工农的革命组织呢？恰恰相反，只有当我们强大得足以把武装起来的工农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内的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时，它才会来帮助完成土地革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土地革命，否则就会跑到大资产阶级一边去。

在结束发言时我还要说一句，中国同志今天说得对，中国革命只有在列宁的旗帜下才能胜利。同志们，这话没有错。中国革命，甚至土地革命只有在苏维埃的红色旗帜下，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而不是在我们布哈林同志如此重视的国民党的旗帜下才能胜利。

曼努伊尔斯基（苏共）同志们，我要谈谈托洛茨基散布的、伍伊维奇在这里重复的种种奇谈怪论。说共产国际隐匿信件一事纯属无稽之谈。共产国际没有隐藏三位青年代表有关中国的信。证据之一是，托洛茨基和伍伊维奇对这封信的下落非常清楚。这封信到了政治局，托洛茨基看了。如果这三位青年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意见有一定的重要意义，那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会有机会看到这封信。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我们的东方部索取这份文件，了解这份文件。

伍伊维奇听说了什么党封锁了斯大林同志4月4日的讲话，企图借此在这里制造混乱，这是徒劳的。伍伊维奇按照个人记录引用讲话，且不管这个记录的确切程度如何，但仍可以说，即使根据这份记录看，斯大林的讲话中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也完全正确。

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怎么说的呢？他说，中国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它的反帝性质。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土地革命。同志们你们说，中国事件的全过程没有证实这种观点吗？共产国际的种种决议没有证实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吗？

反对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忽视了中国革命的特征。他们主张生硬地搬用我们1905、1917年革命或其他西欧革命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

中国革命和我们的革命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进行的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中国的劳动群众在现阶段首先要进行反对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的反对派不理解这一事实，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光靠生搬硬套是不解决问题的。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有关中国问题的提纲中有这样的说法：跨党的共产党人必须采取列宁向英国共产党人推荐的对付工党的立场。

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可以这样提问题吗？季诺维也夫首先不理解英国是民族压迫的主体，而中国是民族压迫的客体。其次，英国的社会革命已列入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而在中国则先要进行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第三个区别是，英国工党是英帝国主义的附庸，而国民党在现发展阶段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工具。

同志们，很清楚，如果我们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混为一谈，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相提并论，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口号和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必须实现独立的口号混淆起来，那我们所制定的路线就是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伍伊维奇在提纲中所制定的路线。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并非偶然，而是和他对中国革命的总看法有关。无数事实已证明这一点。

权且用所谓的布列斯特和约的政策为例吧。中国革命也可以实行像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时期实行的那种灵活政策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是我们面对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时，通过和其中的一方签订和约来对抗另一方，并借此粉碎国际反革命的力量。

季诺维也夫同志否定中国革命也能实行类似的政策。他声称，这种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凡尔赛政策。这又是胡说。季诺维也夫不理解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策是一种灵活政策，是利用对手内部矛盾以夷制夷的行动政策。而凡尔赛政策则是向敌人投靠的政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策是一个革命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而凡尔赛政策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

难道可以如此大胆地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凡尔赛政策和正在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革命联合的政策是同一种政策吗？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上述阶级现在则起着革命作用。季诺维也夫把这些简单的道理混杂在一起，以致他不可能形成什么观点，只有思想大杂烩。

第三个例子同样表明季诺维也夫头脑混乱。季诺维也夫在提纲中反对斯大林同志的观点。他引用我们党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闹事时采取的立场。他认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像蒋介石一样背叛了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那时对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的政策一样吗？我们武装了无产阶级，解除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武装，镇压了他们的叛乱等等。

同志们，请比较一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手里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而中国蒋介石的叛变发生在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时期。我要问，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口号

和争取革命运动领导权时的口号用完全行不通的方式相提并论吗？

因此，我们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看到诸如立即建立红军之类的高明要求并不偶然。这些要求看上去极为激进，但我们要明白，这些要求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纯属空想，是极不负责任的空谈。

什么是红军？红军是无产阶级国家用来保卫自己、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工具。要建立红军就必须消灭旧军队。1917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是怎么做的？他们首先瓦解了旧军队，把旧的战斗部队改造成赤卫队。以后赤卫队成了红军主力的基础。反对派现在能对我们发布口号，对瓦解正在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斗争的军队承担责任吗？发布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削弱革命力量，等于给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革命呐喊助威。

伍伊维奇同志说国民党仍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统治着。

这样说对吗？不对。正确的提法是，这几年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着争夺民族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激烈斗争。有哪些力量在进行斗争呢？斗争在无产阶级的代表年轻的共产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右翼之间展开。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谁能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是无产阶级善于把农民和城市贫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还是中国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孤立起来，进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伍伊维奇同志的观点违背了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他如何能够解释得了这几年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的斗争呢？我想回顾一下这场斗争的几个阶段。

第一件事发生在1924年的广州。那是所谓“商团”反对广州政府的反革命叛乱。斗争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中国资产阶级

企图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即夺取整个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谁进行了抵抗呢？

不光有工农，而且还有部分小资产阶级。是否据此就可以说，实际上资产阶级始终掌握着国民党的领导权呢？当然可以说他们掌握着领导权。但他们只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即直到上海罢工之前掌握着领导权。然而当时季诺维也夫就建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是什么逻辑呢？我们的反对派自鸣得意的成果在哪里呢？

第二个事件是1925年的斗争。它与北京的所谓“西山会议”派那次臭名昭著的会议有关。在这一阶段“西山会议”派企图利用国民党右翼统率全党，把左派从党内赶出去。历史结局如何呢？是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被赶出了党。

第三件事发生在1925年秋。广州揭露出国民党右派分子反对广州政府的密谋。国民党一位最有声望的领导人、财政部长被谋杀。这次行动也被镇压下去。

最后，1926年3月20日，我们看到了蒋介石发动反对汪精卫的事件。

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握着对国民党的领导权，那么伍伊维奇同志如何解释这次斗争的社会基础呢？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要发动这次起义想必是反对他自己的了。问题提得有多么可笑。这正好证明反对派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概念都忘记了。

让我们看一看蒋介石的叛变从阶级力量对比上具有什么意义吧。几个月以来蒋介石就在内部策划把国民党掌握到手。有一段时间这种可能性很大，特别是1926年3月20日以后。如果蒋介石能成功地从内部用“立宪的”方式在国民党内确立资产阶级对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那他就不必进行公开的政变了。蒋介石的政变表明无产阶级首先在国民党内成功地掌握了农民运动的领

导权。下一阶段的中国革命将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夺对成百万中国农民的领导权。一旦斗争进入白热化，我们将会遇到新的背叛。但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因此而绝望，因此而惊慌失措，大喊革命要失败，那只能表明我们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内部发展规律。冯玉祥会不会叛变？决不会。在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冯玉祥要首先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我的发言快结束了。反对派的种种攻击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企图要我们事先保证中国革命不会失败。如果中国革命失败了，反对派就会找我们说：“看，我们已经预见到蒋介石的背叛，我们对可能出现的失败已发出了信号，我们早已警告过了。”反对派于是可以大做文章。如果中国革命节节胜利，反对派就会事后打上他们的印记。他们会说：“很好，事情发展得很顺利。中国无产阶级胜利了，这很好。但如果听我们的话，胜利会来得更快。”

该彻底结束这种煽动了。这不是什么政治路线，而是只能引起人们深深厌恶的无耻的投机。

有一份反对派在这次会上散发的文件说：“我们建议召开执行委员会的小范围的磋商会，以同志式的态度讨论解决苏共内部纠纷和创造合作气氛的问题。”有人先把一盆脏水泼到执行委员会身上，然后再指控执行委员会是蒋介石手中的工具，说苏共为乌斯特里亚洛夫一伙人打开通路。随后他们作出若无其事、清白无辜的样子，建议进行同志式的商谈。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会有什么结果，这种外交手段不会使任何人上当受骗。

在这次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反对派尽管进行了最后的挣扎，也没有争取到一个同志，即使在西方他们也没有争取到一个人。

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群众成熟了。他们不会受任何人的煽动。他们已经认清了反对派。就在你们在10月16日的声明上签字的几天后，群众就感觉到你们十分粗暴地伤害了他们。政治上的失败只能导致政治上的死亡。

达索诺(印度尼西亚):我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的影响这一观点。根据我们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共产党必须依靠与民族组织的合作去发生影响。

同志们,我们可以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工会,可以像曼努伊尔斯基所说的那样比作一个工党,曼努伊尔斯基也说过,当然相比之下也存在不少差别。但是,欧洲的工会和国民党还有另外一种差别。我们不能忘记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西欧的工会则是很牢固的组织。我敢说,我们党争取国民党的工作比起我们在西欧的共产党争取英国工党或改良主义工会要容易得多。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两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党员从3000人增长到58000人。我们还知道国民党越来越向左转。我不同意反对派的观点,说蒋介石将军的政变是党的一次失败。蒋介石被驱逐出国民党后在南京组成新政府并宣布反对武汉政府。这些事实表明我党领导下的国民党左派的路线越来越占上风。

现在东方共产党的工作十分困难。我们不得不与目不识丁的大众打交道。为了不脱离群众,我们必须把已经存在的组织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必须在现有的组织中找到立足点。支持国民党的确是很好的方针,据此可保证我们党有进行群众宣传工作的一定的合法性,据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争取到了这么多的党员。我们不能忘记的另一事实是中国的政治家经验很少,不像我们共产党有一个国际组织,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我们党的同志之所以能够容易地在国民党内站住脚,其唯一的原因是具有国际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在进行领导。

可惜的是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这就是捍卫中国革命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都笼罩在一片反动气氛之中。国民党占据着华中地区。我们必须寻找各种办法和途径,如国民党,以捍卫中国革命。我认为,沿着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前进的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将使菲律宾、印度、印度

尼西亚的民族资产阶级走向反革命。

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不像许多同志在这里说的那样，会在被压迫国家引起巨大的振奋。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刺激殖民地国家的反革命。菲律宾、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资产阶级将勾结国际上的资本家，反对中国革命。所以共产国际必须想方设法捍卫中国革命。为此我向全会建议，尽快地在被压迫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共产党，捍卫中国革命。形势逼人，我们必须现在就建立和加强东方国家的共产党。我们不仅要保卫中国革命，而且还要和西欧以及全世界的共产党一起保卫苏联。

报告人布哈林的结束语

同志们，许多同志的发言给了反对派同志的观点相当大的打击。在这里已经提出的观点，我就不再重复了。我的辩论不是针对和我们意见一致的同志，而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关于其他几份文件的问题，我已经在第一次发言中谈过了。

托洛茨基同志在发言伊始就向我们说：共产国际不了解我们的提纲（俄国多数派的代表都是低能儿），在党和共产国际内笼罩着一种特殊的气氛（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闻所未闻的无耻文章）。有人禁止我们进行论战（虽然我们的耳朵塞满了反对派论战的语言）。有人把反对派的几个追随者在近几天开除出党了（我根本没听说这些情况）。后来我们又听到了一种所谓的“瓶子理论”，说什么不该把中国革命装在瓶子里封锁起来，云云。而这种“瓶子理论”经常变换形式，反复出现。谈完了“瓶子理论”、特殊气氛和党内多数派低能儿之后接着就是构成托洛茨基同志的思想出发点的实际政治提纲。我逐字地引用如下：

“党的制度的日益腐化是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

当共产国际大敌当前的时候，如英国政府进行挑衅，世界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大举进攻，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对派联合封建势力反对中国革命之时，托洛茨基来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在这种形势下托洛茨基提出“党的制度的日益腐化是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的提纲。提出这种提纲，把所有其他的事实视为二等危机，那我们势必要采取相应的战略方针。既然一切危险中最危险的是党的体制的不断恶化，那我们作为掌握革命路线的革命者就应该首先防范这一最大的危险，归根结蒂应反对党和共产国际！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战略方针。他对我们面临的实际危机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一切危险中的最大危险”——党的体制的恶化。

他站在这种立场上，自然就要在所有的会议、产业支部、公共集会和共产国际的会议上采取相应的政治路线、相应的策略和行动。这里面包含着某种逻辑，而这种逻辑内在的错误是它与共产国际和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由此产生了托洛茨基的种种战略方针和斗争形式以及在各种文件中有关叛变的言论。因此，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也出现了真正的低能儿。我们的具体政策是反对共产国际和世界无产阶级真正的敌人。

我们有两个主要问题要讨论。第一，历史问题，即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是否可靠。第二，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当代和未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同国民党和苏维埃等有关。我打算批判地阐明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革命前一阶段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关于我在我的报告中阐述的观点托洛茨基一点也没有谈，他没有听我的报告。这自然有失他的身份。就这个问题而言，他根本没有提出反对我的议论的意见。他泛泛地针对我们的观点阐述了他的独立观点。他说（我引用速记记录——布）：

“但是核心问题是：首先必须讲明资产阶级必然退出民族革命，但又必须讲明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领导革命和无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解除他们的武装，瓦解并残杀他们。在决议中布哈林的整个哲学就是以这两个对等的预测为基础的。但这只意味着有人想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观点之间制造根本的对立。”

我们再看看列宁是怎么谈这个问题的：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惯都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①

如此看来，这里首先阐述了两种思想，或两种估计。第一种估计，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第二种估计是资产阶级必然要掌握对无产阶级的领导，解除工人武装，瓦解并残杀工人。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让我们验证一下这种看法。托洛茨基同志把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通过的提纲解释成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这样解释确切吗？这样解释真地符合第七次全会通过的提纲吗？不。这样解释问题等于没有解释。“以后资产阶级会怎么样？是保持中立，还是有什么其他变化？”我们的提纲认为资产阶级将投入反革命阵营。我认为，托洛茨基连起码地正确解释提纲都做不到，所以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9页。——原编者注

们不允许他这样解释我们的决议。

投入反革命阵营就意味着积极地反对革命和革命力量，就意味着企图瓦解工人队伍和残杀工人。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同志的解释不正确，因为他说这种估计是指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要欺骗和残杀工人。

由此可见，第一，他没有说出提纲的原意；第二，他的解释悲观得不合乎实际。这不是好的估计，不是正确的估计。可是列宁的引语没有变，是完全正确的。而托洛茨基根本不提这段话不是为中国而写的。看来他还证明列宁的话具有普遍性并适合中国的情况。我在报告中引用了列宁的另一段话，说共产党不仅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而且还可以直接结成联盟。白纸黑字列宁的确这样写过。两段引文是明显对立的，适用于不同的形势、国家、条件、问题、阶级构成和任务。而托洛茨基完全忽视了这种不同性，并且忽视了整个具体情况。联合资产阶级可靠吗？大家把托洛茨基的讲话看上一遍、二遍、三遍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沉默了。

现在我们对事情的另一方面有了完整的了解。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在政治局曾持有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态度。(托洛茨基喊道：致闭幕词是一种特权。)不错，您也有特权反驳我的观点，可您没有使用它。您无法否认您是同意帮这个忙的。甚至您同意了您的提纲。我还要告诉您，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同意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接纳进共产国际。(喊声：在第六次全会上。)是的，在第六次全会上。托洛茨基同志说，我们的责任从一开始就不是和资产阶级走在一起，而是揭露资产阶级这个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一阶段就是屠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刽子手。实际上问题是这样：过去我们可以向蒋介石提供武器，但现在这却是犯罪。这不对吗？完全对。现在有谁会同意向蒋介石提供武器？只有叛徒。但

过去这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不理解，一个时期的口号和指示在一个时期是正确的，是真正合乎列宁主义的，但在另一个时期就是错误的，是反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

同志们，我们现在可以提出第二个问题：可以认为策略是正确的。但失败却又是事实。那么在策略正确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会失败呢？

在这里我提出下列问题：党在执行正确方针时是否会失败？当然会。我们的党在完全或几乎完全正确方针的指导下遭受了几次大失败。在第一次革命中我们失败了许多次。在第二次革命中我们遭受了像7月那样的失败。但这能证明我们党执行了错误方针吗？绝对不能。失败的实际原因是社会力量的构成和这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运动，只能是这个原因，失败的苗头一开始就存在。蒋介石政变前的中国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一般都估计到资产阶级会投入反革命阵营。这在策略上就要采取种种措施。什么样的措施呢？就是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在军内夺取战略要点和进行揭露与鼓动工作和其他组织措施。同时以群众运动为基础在国民党内执行排除右派的方针和夺取工会等组织的方针。现在的形势是，中国党的政策基本上以这条方针为准。当然有局部差错，但这不是决定性的。蒋介石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来对抗这些措施，因为力量对比日益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他。当然这是同我们进行的十分出色的工作分不开的。就在这时，蒋介石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夺取军队，还没有武装工农，并使他们有能力对付蒋介石政府。在对抗中我们失败了。在我们的七月革命中我们执行了正确的政策。我们曾试图占领所有能占领的战略要点。但是客观形势、时间的安排和力量对比使我们在7月失败了。

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批判了“马尔丁诺夫关于四个阶级联合的贫乏的理论”。在他发言时我曾向他喊：“季诺维也夫的全民族

联合呢？”根据速记记录，可找到托洛茨基这样的回答：

“我愿意在我和您都能发言的地方接受任何挑战。”

当时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没有人封住他的嘴巴。有人直接要求他回答。他回答说准备在他和我能进行各种争论的地方发表讲话。(托洛茨基：您在《布尔什维克》和《真理报》上给我一块版面!)这是另一个问题。(托洛茨基：明天我在《真理报》上给您回答!)为什么您前天不回答?(托洛茨基：因为要在这里敞开我的思想，但发言时间有限!)但您的瓶子已满过十次了吧!好，同志们，他能从中倒出点什么来呢?这也许说明季诺维也夫原来也持有相同的立场，认为反对派从一开始就有不同观点。这种说法虽然与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有矛盾，但是他没有作出任何答复，在列宁关于和资产阶级达成联合、签订协议乃至结成联盟的问题上他也没有作出答复。然而这是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一个指导性原则。(托洛茨基：答复就在您的桌上。您念一念吧。)我现在答复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关于拉狄克的观点，我从他的小册子、书籍包括前言中摘了若干段落。拉狄克现在和过去都是中国问题专家。拉狄克答复我说，他看过那些错误百出但却很乐观的报告。这是认真的答复吗?我们突然听说所有的智慧之光都来自那三位同志的报告。(托洛茨基：您没有发给我们那份报告!)我们没有发这份报告，但这显然是另一个问题。对此我们还要详谈。由此可见拉狄克的全部智慧，就我们所知，是来自那三位同志的报告，也就是说，那三位同志是真理的使者。但是我要说明一下，后来，这三位同志听到您对我党的诬蔑之后，又给我们送来了新的文件，这个署有新日期的文件具体描述了中国的形势。还是这三位同志，你们智慧的源泉，在文件中对你们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十分令人信服地说明，犯错误的恰恰正是你们的追随者。

托洛茨基同志在与会的无赖中间扮演着一个十分老实的人。

他在发言中是这样阐述这个问题的：

可见布哈林同志证实了马尔丁诺夫关于“政府不是资产阶级政府，而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一说法。

托洛茨基要在党的支部中、在他的马斯洛夫派的中央机关报上以及在各种出版物中维护这种观点。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行为。我已强调过，这种政府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

下面谈国民党问题。我们对国民党问题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解决。我们完全允许在国民党的作用、社会构成、国民党的未来等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但是无人能否认国民党的问题以及所有和国民党有关的问题在中国事务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我在我的报告中也许阐述并代表了一种错误的观点，所以我想请教这位高智商的托洛茨基同志，看看他是如何分析形势的。他的原话如下：

“国民党问题与此有密切关系。就布哈林的言论而言乃是真正的政治上的挑拨。国民党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事物，只能用迷雾二字来刻划它。一句话（布哈林：各位看，如此重大的分析只用一句话来概括。）……^①一句话，谁不理解如此复杂的独特性——它无法让人理解，它太独特了，那么他就什么也不理解。”

这是托洛茨基最重要的论点。这难道不是词语的胡乱堆砌吗？列宁同志曾一再严厉批评托洛茨基蠢话连篇，言之无物。

托洛茨基同志听我一说国民党是独特的事物就想嘲弄我。不管独特不独特，为什么要提讽刺人的问题？我认为，国民党是非常独特的，就像中国革命是一个独特的事物一样。要求独立分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常用语汇。（托洛茨基：正是！）

但是您在这里进行嘲笑，就不是一般的问题。您在这里说的并不是您要谈的问题，而是另有所指。国民党是独特的，前所未

^① 删节号系原文所有。——原编者

有的事物。这话经您一说就有了嘲讽的意味。请您举出一个和国民党具有共同性质的组织来。的确，与国民党类似的组织是有的，如印尼的工农党，它里面也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总括地说国民党是前所未有的事物。我们认定这一点，绝对没有什么可笑。

后面托洛茨基谈到青天白日旗。为此我们没有必要发表议论。这个概括词是分析的最高峰。这可能就是对国民党问题和我们的看法所作的严肃回答。

“这个党在最近一个时期没有继续体现为四个阶级的联合，而是资产阶级的统治。”

我已经说过，这样把问题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不联合其他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也能维持。这就是区别。列宁认为，在半殖民地的某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走在一起。这是资产阶级仍为领导力量时的一种统治形式。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别。我们应当区别开两种情况，一是我们党的工作有意识地面向统一战线并支持它，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党不支持统一战线。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所以对立是不对的，单纯的对立没有任何意义。

托洛茨基同志还有一个观点。他说，组成统一战线中的双方都同等重要，具有同等权力。问题可没有那么简单。联合可能有好几种。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工农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中农民有平等的权力吗？(托洛茨基插话：但没有剥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您的看法。但是您指的是政治剥削，即一个阶级从属于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利用着农民阶级。于是连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重大提纲都显得可笑了。您还有什么论点？您完全失败了。现在我们来看问题的策略方面。托洛茨基怎么说的呢？

“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提纲中政治条件详细地列成了1、2、3、4、5、6、7、8条。这是继续留在左倾的国民党中的条件。如果布

哈林主张无条件地——无论出现何种情况，无论任何代价——留下去，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这样论述的目的何在？人们会以为，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曾经主张无条件地、不惜任何代价地留在国民党内。这不是污蔑又是什么？这符合我们的提纲吗？这不是又一个玩笑吗？

下面谈谈中东铁路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指责我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地反映他的建议，他说他只主张重复我们旧的公式。我提出反对。您不仅提了这个建议而且还说，中东铁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利交通线，最好把它抛出去，当然要有一定的条件等等。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您竟指责我们在去年3月20日蒋介石政变之后（当时您还在政治局）没有揭露蒋介石。我已经告诉过您并且现在还要强调，反对派当时的唯一建议就是关于中东铁路的建议。我认为，我们不可以把揭露蒋介石的政策和关于中东铁路的建议混在一起。这就是我的看法。如果说我们当时背叛了中国革命，那么您也背叛了。您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您对总的局势有其他的看法。而我们则不必再谈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已经谈过了，而且合乎后来的实情——北伐取得了辉煌的革命功绩。这个事实政变之后就表现出来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拉狄克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我们认为北伐的确是一个辉煌的革命功绩，并且和我们的根本立足点——群众运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真正的事实。

关于武汉政府、苏维埃政府等问题，斯大林和其他同志还有我已经谈得很详细了，我只想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托洛茨基同志之所以犯方向性错误，就是因为他对国民党作了错误估计。

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如果没有国民党，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只有蓝色旗帜，蓝色烟幕，就不会产生对立或可能存在的对立这些问题。一切都会很简单，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惜事情不是这样。托洛茨基同志只字不谈提纲中的建议、国民党

的错误的民主化、与不同组织的联合、群众加入国民党、同国民政府的联合等问题。而这些都是提纲中的关键性问题。瓶子论出现了,可一次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为什么错误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完全不同的估计和完全相反的分析造成的。在这里我必须坦率地说,还要更加公开更加有力地支持提纲的内容。将来我们中间还会出现种种叛变行为,甚至相当严重的叛变行为。左派国民党领导阶层的一些人脱离我们不是不可能而是大有可能。从冯玉祥开始,那些与上层社会、商人有联系的军事首领们改编部分军队,是完全可能的。从理论上讲,我们马上进入大失败时期是不可能的,我说没有很大可能性,但并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现在就有同志说,因为执行了错误路线,所以已经出现失败。这是他们看问题的方法。

我现在来作结论。托洛茨基同志在发言中告诉我们,过去的时光是美好的,过去的体制不同,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前我们和布哈林一起参加过大型的讨论会。那才是一个大党的教育方式。形势越是困难,党内斗争就越广泛。您说那是党的教育。我认为,现在,经过一段喘息时间之后,我们也许会遇到比十月革命后更大的困难。甚至在这个时刻您还认为,我们要通过讨论(大约按照1923年的模式)来教育党。1923年是列宁主义的体制。现在是一切危险中最危险的体制,但您在这里隐瞒了一点。即列宁是强烈反对讨论的,但是他当时没有制止住。(托洛茨基:最重要的是正确的路线。)当时我们如果有党的各级组织作后盾就好了。列宁未能在具体政策和政治上控制住局势,这是我们经历的一次大悲剧。从我们这方面讲那是我们所干过的一件大蠢事。现在您想建议我们把这件蠢事和这个悲剧当作应付大事变的准备。您目前的策略就包含在这里面。像您现在提出的帮助党和共产国际的方法是史无前例的。您知道,这是在对党和共产国际犯罪。您提出了种种有关团结的建议。您首先在马斯洛夫派的——您的宗派的中央刊物

上大喊大叫,说我们叛变了,党中央叛变了。字里行间都在叫喊我们叛变了。随后您又来说,我们需要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互通有无、认真计划基础上的团结。而实际上您在您的文件结尾处提出的那个团结的口号不过是您分裂和破坏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遮羞布。今天整个共产国际都听到这个口号了。可是它不能听之任之。共产国际不允许您再使用像您在这里使用的那种语言。(热烈掌声)

主席团提出的提纲作为中国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基础以一票反对通过。

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埃尔科利:由全会选出的中国问题委员会没有重大的原则性问题要在会议上检查。

本委员会只执行已经由全会讨论确定的路线。委员会的同志没有提出与全会讨论确定的路线相矛盾的问题。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根据全会讨论确定的方针,必须把提交给你们并已由你们作为基础通过的决议作一番彻底的修改。经过种种修改和补充,现在可以说这个决议已基本上成形了。

进行修改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更明确地制定我们党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基础。

我们尽管没有收到各个代表团的建议和补充意见,但我们收到了俄国代表团的许多建议。这些建议对修改决议起了很大的作用。

决议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修改呢?首先修改了对武汉政府现在也就是在目前局势下的社会作用的分析。其次修改了关于中国政府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三在防止民族阵线可能出现新的分裂而采

取的措施和某些保障方面,也就是我们党面临的具体任务方面进行了修改。

就第一个问题,即武汉政府的社会作用,我们指出并且十分肯定、明确突出地强调,当今的重点是开展革命的土地运动。分段作了一些变动(第四条)。在论述土地运动及其发展和方法时,为了避免疑问,我们说得极为坦率:土地革命就意味着“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化”。我们还公开说明,只有解决土地革命问题,武汉政府才能真正转变为工农革命运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中心,成为工农革命专政的机关。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各方面强调指出,我们党,中国共产党当今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土地革命运动,领导农民起义,以各种可行的形式发动和组织土地革命。

但是土地革命如何进行呢?在民族革命运动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应在同一条革命战线中携手前进,“从下而上”开展运动。但我们是革命运动领导机关的即政府的成员,同时也是发起这次运动的国民党的党员。因此我们必须把现阶段的各种工作方法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起来的工作方法是反对派不理解而我们打算在提纲中加以阐述的方法。

在我们的民族革命联合中如今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部分城市资产阶级和相当广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土地运动。但是我们不能排挤有可能同我们一道前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如果我们不理解这种必要性,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投向大资产阶级一边。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在决议中作了很大的改动。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保证小资产阶级劳动所得的财产不受侵犯,必须支持他们反抗高利贷的斗争。”贯彻这一政策将有助于国民党中的农民阶层和还能同我们一道前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联合在一起。他们将成为军队干部的主要成分。

民族革命阵线中的第三种人是工人。在许多地方我们都重申

和强调,我们的党必须站在运动的前列,提出自己目前的基本要求。

第二个方面涉及中国发展的前景问题。为了消除疑问,我们在决议中十分坚决地强调,民族革命阵线出现新的分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中间还会再出现背叛,我们还会再遭到局部失败。这不仅因为和我们对峙的力量(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在特定的时刻比我们强大,而且因为同我们一起前进的某些阶层、个人和集团会离开我们,背叛我们,会公开跑到反革命一边。为什么?首先是因为土地革命的发展可能会使至今仍同我们一起前进的资产阶级分子、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军界人物惊慌失措,其次是因为这些人和帝国主义有联系,而帝国主义又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这种联系摧毁我们的民族革命阵线。

为了强调可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新分裂,我们作了许多更动。

我们打算消除我们当中就中国革命发展前途问题存在的表面上的盲目乐观主义。但同时我们并不认为,反对派的悲观主义就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在提纲中对于同蒋介石分裂的性质作了说明。我们说明,同蒋介石的分裂并非中国革命的彻底失败,而是某一时刻的局部失败。同时我们还明确指出了反对派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考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群众运动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经过这些修改,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了一种准确的估计。

我们还会遇到分裂与失败,在革命阵线的重大问题上甚至还会遇到挫折。但我们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正处在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虽然还会有分裂、背叛,但我们党的正确政策将把中国革命引上胜利的道路。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我们为应付不可避免的分裂和叛变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当然我们不可能作出绝对的保证,甚至不能在某一个方面立下保证。但是我们可以制定基本方针:开展群众运动,竭

尽全力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农民群众运动和城市工人的运动。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应付叛变、分裂和失败的基本保证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就是中国革命顺利发展的保证。

当然,还有其他一类保证措施。我们不仅必须发动群众,而且还要组织群众。我们必须首先在政府和国民党之外建立行动的立足点,同时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加入农会、城市工人委员会等各种群众组织中去,使他们在组织上有所依靠,使他们的运动成为革命的立足点,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后备军。

不过,我们必须同时利用我们在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的活动,以保证对付种种可能出现的叛变、分裂和局部失败。在附在决议后的补充条款中我们强调了这个问题。在第五款中我们首先提出:“共产党必须及时揭发一切打算同蒋介石勾结或同帝国主义勾结的动摇行为,并在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措施上采取相应的具体步骤。”

但是在政府、军队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其他组织内部我们能够采取哪些组织措施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任务,比如,“建立绝对忠于革命的部队,在革命基础上改组全军,密切军队和工农组织的联系,配备军队干部以及把雇佣军改变为正规革命军,等等。特别必须注意的是,要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绝对可靠的部队,输送共产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加入军队,清洗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并建立工人自卫军。”这些就是组织方面的措施,其目的是使革命阵线具有更强的抵抗力,保护我们在可能出现分裂和失败时不致受到损害。

关于任务,我们首先提出与军队组织有关的任务。中国革命并不是以大规模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而是作为武装斗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北方军阀的斗争发展起来的。这个事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我们没有得到有效的军事保证,我们就将与构成今天的以致长远的革命运动的强大力量割裂开来,那么我们所有关

于必须推动革命和群众运动发展的言词就仍然都是一派空话。

一方面在政府和国民党“外”积极建立群众组织,另一方面,在政府与国民党“内”开展活动,而要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就必须认真贯彻决议制定的方针。决议中说的是,要争取集体和个人加入我们将在国民党外建立的群众组织,进而改变国民党的结构。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产生了对国民党性质的评价问题。国民党的性质是什么?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还是其他什么组织?我们认为,国民党一方面是一个政党,另一方面就其特点和组织形式来看又是其他性质的组织。在国民党内,有些东西会使国民党成为类似苏维埃的“代表制”组织。我们集体加入国民党将更突出这一性质,并使我们更容易对国民党成员施加影响。

谈到我们为应付新的分裂而采取的保证措施,有必要谈谈我们同武汉政府的关系问题。我们身处武汉政府之中,和它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必须具有不同的性质。在政府外围建立我们可以依靠的群众组织将对决定这种合作的性质起积极作用。我们必须成为一种积极的因素,去推动武汉政府前进,促使它贯彻革命纲领和形势所要求的实际措施,促使它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组织中心。

委员会检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苏维埃问题。这一问题是对提纲的一项重要补充。

全会讨论中产生的路线是,今天,在中国革命现阶段提出建立苏维埃和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的口号,其结果必将是出现双重政府和推翻武汉政府。这也就意味着跨越由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体现的群众组织形式,跳过必然的历史阶段去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这条路线没有修改。但我们认为,为了不致引起同志们的怀疑,有必要强调,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将意味着向社会革命转化,在某一特定时刻有必要提出工农苏维埃的口号,苏维埃的口号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口号。

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就原则问题进行讨论,而是就我们的发展前景,就我们应何时提出苏维埃的口号等个别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承认有两种可能性和两种发展前景。一种前景是发展缓慢,使我们有时间开展深入广泛的工作,有足够的时间建立和加强群众组织。另一种前景可能是快速发展。

那么如果快速发展的前景成为现实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什么态度?在这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立即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吗?就此问题我们同委员会的一名同志和特赖恩同志进行了一次讨论。特赖恩同志认为,如果出现第二种发展前景,国民党对我们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和意义,同时,加入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也失去了意义,因而我们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把苏维埃作为革命阵线的唯一组织形式予以支持。

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特赖恩同志的观点中有一个错误,即对民族革命阵线中的小资产阶级这类成分估计得不准确。不能用看待大资产阶级的眼光去看待小资产阶级,它是一个阶级,我们不能按照它的政治倾向给它定性,要求它均衡发展,统一发展。我们已和大资产阶级决裂,但不能把这一点与我们同小资产阶级分裂的可能性等同起来。比如,我们能同样对待同蒋介石的分裂和将来大有可能出现的分裂吗?不行,那样会犯错误。必须考虑到小资产阶级是社会上明显无常性的阶级,所以他们松散、不均衡、无常性和动摇不定。他们是由各种不同的阶层组成的。这个观点比较接近我谈到的第二个快速发展的远景,对这个远景我们还必须加以考察。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必须得出结论:在和小资产阶级发生分裂的时刻,甚至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这种分裂就不仅是我们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不仅是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的广大工农之间的分裂,而且是某些仍愿意和工农一道前进的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领导之间的分裂,同时这种分裂不只是我们和小资

产阶级的不可靠的背信弃义的领导人的分裂,而且是国民党中的群众(工人、农民、小商人)与小资产阶级的分裂。我们必须按这个观点提出问题和观察问题。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就在近期出现分裂,我们肯定能够保住民族革命阵线,利用国民党的各种组织和武汉政府组织起以我们和国民党的大旗为中心的革命阵线。武汉政府也将因此被推向前进。

特赖恩同志在委员会中阐述和维护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如果在最近出现分裂,就是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我们必须摒弃与国民党的一切来往。我们必须大破大立,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我们认为,我们目前有可能继续前进,带领工农大众以及还和我们同路的一小部分资产阶级一道前进,用他们来对抗想脱离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打算使这些群众仍留在国民党这个组织中。不过我们认为,只有我们懂得如何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和组织形式,把国民党掌握在手并赋予国民党一个更新、更高的社会意义与内容,我们才有可能驱逐叛变的领导人,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

同志们,以上就是我们讨论的要点和对决议所作的修改。

我们相信,中国问题的决议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它包括的方针将引导中国党战胜困难,改变新的局部失败的局面而走向革命的胜利。

(以上四份资料均由蒋仁祥、赵小军译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记录》,1928年汉堡—柏林德文版;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1927年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斯大林

一、几个小问题

同志们！我应当道歉，今天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迟到了，未能完全听到托洛茨基在这里，在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

可是我想，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是不够的。

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基础的批判。

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

看来托洛茨基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行委员会把讨论战争危机、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我想，托洛茨基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有人喊道：“对！”)况且，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被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型的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不骂我，那对

我倒是莫大的侮辱。

反对派现在的这种派别言论是否违背了他们在1926年10月16日所承担的义务，这一点我也不多讲了。托洛茨基认定，根据反对派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他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托洛茨基要硬说声明的内容只限于这一点，这就只能叫做诡辩，不能叫做别的。

在反对派10月16日的声明中不仅说到反对派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说到这些观点只有在党所许可的范围内才能坚持，派别活动应当抛弃和肃清，反对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意志和中央的决定，反对派不仅应当服从这些决定，而且应当诚心诚意地“实行”这些决定。

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证明反对派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已经被他们自己极粗暴地破坏和撕得粉碎了呢？

在反对派的许多提纲、论文和演说中，下流地和极端诬蔑地歪曲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这一点我也不多说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断地硬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似乎过去坚持而且现在还在坚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断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实际上，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来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代替了那一个政策。

只要看看这些文件，如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的著名宣言^①、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②，以及布哈林日前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纲，就会确信这一点。

后对派的倒霉正在于他们不造谣不歪曲就活不下去。

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二、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

既然很多省份里农民收入的70%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仅握有经济权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既然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呢？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

① 指1927年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原编者

② 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9卷第199—207页。——原编者

为什么呢?

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

因为不同时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就不能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因为谁要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谁就一定要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作斗争。

因为不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打倒并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共产国际(自然联共〔布〕中央也是这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是和刚才说过的共产国际的观点正相对立的。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认中国封建残余的存在,就是认为这些封建残余没有决定的意义。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对中国封建官僚压迫的力量和意义估计过低,以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

请让我引证托洛茨基几天以前送交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众所周知的提纲吧。托洛茨基这个提纲的标题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托洛茨基在这个提纲中写道:

“布哈林借口‘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似乎起主要作用来为

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辩护，他这种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布哈林对中国经济的估计是根据经济的分析，而不是根据一些烦琐哲学的定义，‘封建残余’仍旧不能替如此明显地促进了四月政变的政策作辩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①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不仔细看这一段引文就会以为托洛茨基不是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路线，而是反对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这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这一段引文中所说的是否认封建残余在中国的“主要作用”。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是把中国现在日益展开的土地革命宣布为上层的革命，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以要把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说一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背叛共产国际路线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托洛茨基惯用的欺骗手法。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发条，而是次要的、不大的、只配放在引号里面的力量。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论调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所持的观点就是如此。

请让我指出：这种观点正是张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观点。

如果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承认张作霖和蒋介石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们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着重号已改为黑体字。——编者）

所要达到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和蒋介石的办事员的观点了。

如果封建残余应该放在引号里面，如果共产国际宣称封建残余在革命现阶段上有主要的意义是不对的，如果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关税不自主，而不是和封建残余及支持这些残余的帝国主义作斗争，那末，中国的土地革命还有什么内容呢？

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哪里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根据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土地革命能够从天上掉下来吗？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里，千百万的农民被卷进极伟大的土地革命中，农民在这些省份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卫力量，赶走地主，“用平民手段”^①制裁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封建军阀的压迫不是中国的压迫的主要形式，那末，这样强大的土地运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不承认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和军阀的基本同盟者，那末，千百万农民的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怎能同时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呢？

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现在就有 250 余万会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种会员在湖北和河南现在有多少呢？最近期间在中国其他省份又将有多少呢？

还有“红枪会”、“硬肚”等等，——难道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现实吗？

^① “用平民手段”系马克思语。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以打垮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垮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和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原编译者

难道可以真正地断言以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口号的千百万农民的土地革命不是反对真正的不容怀疑的封建残余，而是反对想象出来的引号里的封建残余吗？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陛下”的办事员的观点了，这难道不明显吗？

由此可见，我们有两条基本路线：

(甲)共产国际的路线——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线——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种错误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是新的错误。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线的极显著的特点。

低估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错误，从1905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在1917年2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托洛茨基。

请让我举出几件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主义的事实，例如举出1917年2月革命前夜的事实，那时我们正走向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时托洛茨基硬说，既然农民中间的分化已经加剧，既然目前我们这里存在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无产阶级把自己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末农民的作用就会降低，而土地革命就不

会有 1905 年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了。

列宁对这一点是怎样回答的呢?请让我从 1915 年列宁关于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论文中引出一段话来:

“托洛茨基的独创的理论(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注)是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说,农民已经分化了,他们已经变质了,他们可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可笑例子!如果说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现在正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说‘没收地主的土地’(托洛茨基继 1912 年 1 月代表会议之后在 1915 年所重复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那就是说不应该讲‘革命工人’政府,而应该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坚决精神也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带动起来(第 217 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竟糊涂到了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1905—1915 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在俄国革命中有两条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着重号已改为黑体字。——编者)

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沉睡未醒的分子，促进了农村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从1906年以来就主张农村无产阶级要单独组织起来，并把这个要求列入孟什维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城市无产阶级的接近。但是‘农民’同马尔柯夫—罗曼诺夫—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对抗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个真理是如此明显，甚至连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洋洋万言的几十篇文章也‘推翻’不了。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们的忙，这班政治家们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而这就是现在问题的症结。”(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398—399页)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点在于他看见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而看不见农民，不了解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这个特点构成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错误。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半孟什维主义”也正是在这里。

从这个基本错误中产生了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产生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提纲中的一切糊涂观念。

三、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就拿武汉问题做例子吧。共产国际关于武汉的革命作用的问题的方针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既然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胜利，既然南京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末，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

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

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

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什么。”

就说武汉是空架子吧。既然武汉是空架子，那末，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要求和这个空架子作坚决的斗争呢？从什么时候起，共产党人竟开始支持空架子，参加空架子，领导空架子呢？共产党人必须和空架子作斗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党人拒绝和空架子作斗争，便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提议和空架子作斗争，即使采取共产党人立即退出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办法呢？为什么托洛茨基提议留在这个空架子里，不退出这个空架子呢？这里的逻辑何在？

这种“逻辑上的”不对头是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对武汉指手划脚地讲了一顿，把它叫做空架子，然后又胆怯起来，不敢在自己的提纲里做出相当的结论呢？

或者拿季诺维也夫做例子来说。季诺维也夫在他今年4月提交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中，把武汉国民党估计为1920年时期的基马尔派的政府。但基马尔派的政府是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是没有而且不能有共产党人的位置的政府。看来从对武汉的这种评价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和武汉作坚决的斗争，推翻武汉政府。

具有人类的普通逻辑的普通人是会这样想的。

季诺维也夫却不这样想。他把汉口的武汉政府估计为基马尔派的政府，同时提议给这个政府以最有力的支持，提议共产党人不要退出这个政府，不要离开武汉国民党等等。他直截了当地说：

“必须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从那里组织对卡维涅克们的反击。在最近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帮助汉口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见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谁能懂得呵!

托洛茨基说武汉(汉口)是空架子。相反地,季诺维也夫却断言武汉是基马尔派的政府。由此应该做出结论:和空架子作斗争,为推翻武汉政府而斗争。然而不管托洛茨基也罢,季诺维也夫也罢,都不敢做出从他们的前提中必然产生的结论,而季诺维也夫甚至更进一步,提议“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反对派纠缠在矛盾里了。他们失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一切前途。

观点糊涂,在武汉问题上失去任何前途,——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糊涂叫做方针的话,这就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方针。

四、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或者再拿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做个例子吧。

关于组织苏维埃的问题,我们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三个决议:列宁论在落后国家中成立非无产阶级的农民苏维埃的提纲,罗易论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维埃的提纲,以及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特别提纲。

列宁的提纲是说明在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亚细亚诸国成立“农民的”、“人民的”、非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列宁的提纲里没有一句话说到在这样的国家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列宁的提纲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对落后国家的革命的直接援助是在这些国家里成立并发展“农民的”、“人民的”苏维埃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这个提纲指的不是中国或印度,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并且在这些国家里建立工人苏维埃

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先决条件；这个提纲指的是其他较落后的例如波斯等等国家。

罗易的提纲主要是指已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国和印度。这个提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显然，这个提纲对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标题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特别提纲，根据俄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这个提纲断言：“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苏维埃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对苏维埃的讽刺。”显然，在讨论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最后这个提纲。

如果同时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形势和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国民党的存在，以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后两个提纲的指示，那末，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是怎样的呢？

现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提出推翻左派国民党和在中国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口号。

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为推翻现存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出现不能不造成两重政权，而两重政权又不能不使全部政权应当归谁的问题尖锐化起来。

俄国在1917年3月、4月、5月、6月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存在着临时政府，它握有一半政权，而且也许是较为实在的政权，因为当时军队还是支持它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工兵代表苏维埃，它们也握有似乎一半政权，虽然不是像临时政府那样实在的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取消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中间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因为既要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加入这个政府。

能不能说 1917 年 3 月至 6 月俄国的形势类似现在中国的形势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由于俄国当时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现在则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由于俄国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和帝国主义的政府，现在的武汉政府则是反帝国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义下的革命的政府。

反对派在这方向我们建议些什么呢？

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作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但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不只是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它们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反对派不懂得：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只有作为新政权机关，才能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这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就会变成空架子，变成现存政权的附属品，就像 1918 年在德国和 1917 年 7 月在俄国发生过的情形一样。

反对派是否懂得现时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

我很怀疑季诺维也夫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托洛茨基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因为他在自己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说：“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号召经过两重政权的过渡制度去建立实际的政权机关。”（见托洛茨基的提纲《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由此可见，我们在中国成立苏维埃，同时就是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就是推翻武汉政府和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权。大概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拿俄国革命历史中 1917 年十月革命前一个时期的事变作样本的。当时在我国的确有过两重政权，当时我们的确推翻了临时政府。

但是我已经说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为什么托洛茨基不建议共产党人现在立即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呢？怎能成立苏维埃，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同时又加入你要推翻的武

汉政府呢？托洛茨基的提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显然，托洛茨基在这里已无望地陷入他自己的矛盾的迷宫里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他“忘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只处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府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有人向我们说：既然如此，又怎样去了解1905年在俄国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呢，难道当时我们不是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但是，第一、当时只有两个苏维埃，一个在彼得堡，一个在莫斯科，这两个苏维埃的存在并没有造成俄国苏维埃政权系统。

第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当时都是反对旧的沙皇政权的起义机关，这再度证实：不可把苏维埃看做仅仅是组织革命的中心，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和新政权机关才能成为这样的中心。

第三，工人苏维埃的历史说明：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顺利条件，也就是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顺利条件，这样的苏维埃才能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1905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苏维埃，以及1918年德国的工人苏维埃所以灭亡，不都是由于当时没有这样的顺利条件吗？

假如1905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现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组织，那末可能当时在俄国就不会有苏维埃了。但是，这样的组织当时在俄国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在俄罗斯工农中间没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俄罗斯人自己就在压迫其他民族，而类似左派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只有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因为这种压迫会把国内革命分子都集中到一个广

大的组织里去。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

但是，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

假如中国没有像左派国民党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胜利，而且不会很快胜利的现在，就把这个费了多年时间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未免太愚蠢太无知了。

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将来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且他们把这一点看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一般说来，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没有的。在我们俄国，在1917年初，也曾谈到革命有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第一、国民党不是苏维埃，说国民党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事业，并不是说国民党就能适合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事业，其实，工人代表苏维埃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合的形式；

第二、即使在1917年俄国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也是不能的；

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是那样地稀少，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那样地强大和众多，以致革命的每一推进和帝国主义者的每

一进攻，都必然会使国民党发生新的分化，使共产党因国民党的威信降低而更为加强起来。

我想，中国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想，在中国，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是不得不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因为在现今的条件下，没有工农代表苏维埃，这种过渡是不可能的。

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武汉战胜反革命，必须在各地广泛地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为将来成立苏维埃的基础，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在农民和军队中的势力，——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成立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素的工农代表苏维埃。

在中国成立工人苏维埃，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篇空洞的“革命的”演说。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轻率地看这个问题。

首先，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说要退出国民党，因为不能既成立苏维埃，推进两重政权，号召工农建立新政权，同时又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里面。

其次，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就是说要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要以类似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的那种联盟，代表现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在那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而在国民党党内结成联盟的政策是完全适合于这一点的，那末在这里，在成立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问题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要准备并建立这种政权，则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

其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使共产党人负有义务的。现在中国工人每月得 8 个卢布到 15 个卢布，生活条件极恶劣，工作时间非常长。这种情形必须立即结束，而且可以结束，只要增加工资、实行 8 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等等。但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工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他们会向共产党人说（而且他们是对的）：既然我们有苏维埃，而苏维埃又是政权机关，就不能压一压资产阶级，“稍微”剥夺资产阶级一下吗？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农代表苏维埃存在的条件下不走上剥夺资产阶级的道路，那末他们就会成为空谈家了。

试问，现在，在革命现阶段上，是否可以而且需要走这条道路呢？

不，不需要。

将来，在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而且需要拒绝剥夺资产阶级呢？不，不可以。如果以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保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那就是流于妄想，不了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中阶级力量斗争的诀窍。

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并不像某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流的极轻率的人向我们描述的那样简单。

从原则上来看，一般地是不是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之合作呢？

某些反对派以为这是不可容许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这种参加是完全容许的。

我可以举出马克思 1848 年在德国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当时这个革命的民主政党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就是由马克思主编的。

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处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内，把革命资产阶级向前推进，同时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右派同盟者的不彻底性，正像中国共产党处在国民党内应当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同盟者左派国民党人的动摇和不彻底一样。

大家知道，直到1849年春天，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脱离了这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并着手成立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由此可见，马克思甚至比作为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党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走得更远。

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在1848年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是否适当，是可争论可不争论的。例如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思不应当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这是策略问题。但是，在原则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这是无可怀疑的。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环境中参加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那末，关于这一点，我们已有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指示。大家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在工作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中是赞成参加这种政府的。大家知道，列宁在1905年也是主张容许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府的。

五、两条路线

总之，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

共产国际的路线。封建残余和依靠这种残余并为各国帝国主义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军阀上层建筑是中国现状中的基本事实。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应当利用共产党人的这种参加使无产阶级便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并促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更快地到来。

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而共产党则应成为中国新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时候，当国民党是最适合于并且最能适应中国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形式的时候，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提议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立即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促使武汉垮台，帮助张作霖和蒋介石。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中国的封建残余乃是布哈林的捏造。在中国，封建残余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原来土地革命现在在中国是有的。但它从何而来，连鬼也不知道。(笑声)

既然这种土地革命是有的，那当然只好设法支持它了。

现在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革命,即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基马尔主义(季诺维也夫)。

一方面,必须建立两重政权以推翻武汉政府,其办法是立即成立苏维埃(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必须巩固武汉政府,必须给武汉政府以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其办法原来也是立即成立苏维埃(季诺维也夫)。

照例说来:共产党人应该立即退出这个“空架子”,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可是最好是让他们留在这个“空架子”里,就是既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既然武汉是“空架子”,为什么他们还要留在武汉呢,——这实在只有上帝才知道。谁要是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奸贼和叛徒。

所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就是如此。

几乎再想不出比这种所谓路线更荒谬更糊涂的东西了。

得到的印象是:我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者打交道,而是和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办事员,或者说得好一些,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这些旅行家游历了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①之类的地方,忽略了提出中国革命基本方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中国确实爆发了什么革命,既像土地革命,又像反关税革命,于是就决定写一堆提纲,4月写了一个提纲,5月初写一个提纲,5月底又写了一个提纲,把这一堆提纲写好,就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们以为这许多糊涂的和矛盾的提纲就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

同志们,这就是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① 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是苏联高加索著名的风景区和疗养地。——原编译者

你们必须在这两条路线中间加以选择。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

我想在最后用几句话谈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派别言论在当前的政治意义和作用。他们抱怨说，没有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对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闻所未闻的谩骂和不能容许的斥责。他们抱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制度”。实质上，他们要得到瓦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自由。实质上，他们要把马斯洛夫一伙人的作风移植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里来。

同志们，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攻击党和共产国际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展开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

可能是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但是，几乎用不着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胆小的孩子。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战线”。布尔什维克历史表明，这些“战线”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决心和无比的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鼓掌)

(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发言

……斯大林在这里再次宣布他自己反对工农苏维埃，他辩解说，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令人满意的，并且是土地革命的工具。因此，斯大林设想并希望国际对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负责，他

重复了以前的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政策的负责(特别是他的4月5日发言,速记稿是存在的,当然,已经从共产国际那里藏起来了)。

我们同这种政策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愿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集团负责,哪怕是承担一点点责任,我们殷切地奉劝共产国际要拒绝对其负责。我们直率地对中国农民说:假若你们不去建立你们自己的苏维埃,而去追随汪精卫及其同伙这种类型的武汉政府的领导人,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背叛你们。土地革命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汪精卫类型的政治家,在困难的条件下,将以十倍的努力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农。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权中的两个共产党员,假如不是打击工人的假面具,就是资产阶级政权中的重要抵押品。我们向中国的工人说,假如农民把他们自己交给资产阶级激进派来领导,而不是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来领导,他们将不能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建立你们工人的苏维埃,联合农民苏维埃,打死那些反对建立苏维埃的将军们,打死将对苏维埃发动暴动的官僚、自由资产阶级,通过士兵加入苏维埃武装你们自己。只有通过农民、士兵苏维埃才能争取蒋介石士兵的大多数到你们这边来。你们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会背叛你们的阶级和你们的历史使命,要你们相信那个不超过25人(见谭平山报告)的小资产阶级的、具有妥协思想的领导者组织能够代替包括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进和胜利不是存在于苏维埃形式之中,就是根本不会前进和胜利。

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说:陈独秀同志的纲领,名义上是推迟“改组”汉口政权和没收大地主,直至战争危险被消灭,这是确实地和最迅速地走向毁灭的道路。战争的危险是阶级的危险。这种危险只能通过粉碎大地主,通过消灭帝国主义代理人 and 蒋介石,通过建立苏维埃来结束它。确实,在那些谎话中,土地革命、

人民革命、工农革命就是真正的国民革命……

(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总结（节录）

(1927年5月)

布哈林

第三 论中国革命

现在来讲此次全体会议所讨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革命问题。

我先讲现在分析中之最关重要的情形，然后说到反对派的观点在会议中怎样的表现，以及反对他的议论，第三点再讲一些最近的事变。

一、阶级力量的分合

还在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为共产国际存在的全时间采取关于中国革命的议决案，分析中国经济，与帝国主义的作用，分析并估计中国各阶级力量，估计当时显著的各阶级间力量的关系，就是预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新的阶级分合的必然现象。第七次扩大会议，曾为中国共产党指出主要的策略方针。我先从过去的第七次扩大会议讲起，以便首先证实共产国际在蒋介石叛变好久以前，就对于中国各阶级力量与其必然的分合，早已估计到了。

第七次扩大会议在其估计中，看到广大的社会阶级争斗，农村运动的高涨；与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要使自由资产阶级脱离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转入于反革命的营垒中去；因此，看到中

国整个的转入新的发展的阶段，在此发展中，国民革命战线的各阶级力量，将在工人阶级，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工业者，小商人，小知识分子）的联合基础上而形成。

蒋介石的叛变，在其严格的形式上看起来，并非别的，只是表现出第七次扩大会议所已经讲过的自由资产阶级走入反革命的营垒里去罢了。蒋介石的叛变，决不能只看做一个军官叛变的形式。这样一个军官的叛变，其本身就是阶级力量深刻分合的表现，这是由于在乡村中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城市里工人运动的高涨，所必不可免的结果。

摆在这次全体会议面前，首先就发生从过去得到那些教训的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现时环境中的策略问题。第一，要决定关于估计蒋介石的叛变问题。这个估计是：蒋介石的叛变，表示很大部分的社会集团脱离革命战线，他们从前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初期中，有最大的政治重量，事实上做了革命初期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领袖作用。全体会议认为以后一切的策略，都应由这阶级力量新的分合一点出发。自由资产阶级走入革命的营垒，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要经过一度危机。这个危机使中国革命要有部分的失败。

现在我们有另外一种情形，有另外一种社会力量的内容，一切由以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与内容所出发的一切策略上的办法，都是反革命的，都必须放弃他。蒋介石的叛变，由于许多因素决定，而最要的就是工人运动的发展，乡村农民运动的高涨，以及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帝国主义者用尽方法压迫自由资产阶级战线，促进他们从速脱离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

二、土地革命与农民运动

执行委员会以为现在如果讲到中国革命内部的动力，则其最要问题为土地革命。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乡村农民运动，分配土地问题，没收各种大的（自然，为数不很多）中小地主的土地问

题，这些要求，这些口号，这些任务都是当今中心的任务。不消说，农民在中国人民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我们更不要详细分析乡村中社会经济关系的特征。我此地只是讲一种情形，就是中国事变的发生，与农村运动的发展，完全纠正了如腊狄客同志所讲的话。他肯定的说中国没有什么封建遗迹，于是就没有方法解释中国乡村农民运动非常猛烈的事实了。关于这点，我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讲得很够，此地不再多讲。就是因此，土地革命所以为现在事变的中心。农民以非常广大的群众走上历史的政治舞台。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将来的发展上，成为最重要的群众的生力军。执行委员会已经对于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加以注意。而在全体会议上所通过的议案，十分明白，十分精要的着重于以下的一点：由中国革命发展的观点上看，今后最重要的步骤，是实际上没收土地，真正破坏旧式乡村中政权机关，实际的由下而上来分配土地都由农民自己动手，由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动手，这些组织现在已经由广大群众与日俱增的设立起来了。

这个问题必须特别着重，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员中，而尤其是国民党左派中，现在仍然有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实际上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障碍，他以为土地革命，必须取农村改良的形式，只须由上而下才能成功，或者简直是在中国没有统一以前，是不能实行土地革命的。这一幻想实在做了中国农民运动的绊脚石。这在谭平山同志——武汉政府的农政部长——的最后一篇演说中可以看出。他这篇演说辞没有一字提及关于实际没收土地的必要。在武汉政府里面，甚至在一部分的中国共产党员里面，直到现在还存有这样的倾向；以为稍稍超越了现时环境范围，用和平的办法，用法令以及类似的手续，便可以解决土地问题；在中国虽然国内战争已经开始，而这种倾向却仍然存在。这在任何革命史上是没有这样成功过的，而且也永不会这样成功的。

我们更可以提到陈独秀同志的一篇演说。在最近党的大会上他发表过这样稀奇古怪的意见。他说，土地革命必须等到革命军打下了北京把张作霖赶走之后再谈。

很明显的，无论在那一种观点上——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在与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就是蒋介石——争斗的观点上，或是在巩固与保护武汉政府的往下发展的观点上，以及在提高最大多数的生力军以与反革命力量决战的观点上——就任何观点来看土地革命的发展，是现时中国革命得到胜利之基本条件。没有群众的土地革命的发展，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就是很单纯如组织武装力量的问题，亦必然使我们知道有发展土地革命的必要，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这样，则武汉政府不能得到农民的信任，不能征集真正可靠的军队，不能在军事的观点上保证以后的胜利。因此，中心问题，中心任务，中心口号是唤起土地革命的口号。要达到土地革命的胜利，必须由农民自己动手没收土地，取消地租，在地方上在乡村里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的政权，武装农民群众，武装保障由地主所夺得的土地等等。

三、群众组织、国民党、共产党

由上种种，自然又发生组织的问题。就是：现在主要的方针，既是朝着土地革命的发展——群众运动的发展，则很明显的，我们必须努力企求一切可能的群众运动的激烈的增长，如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工人职工会，手工业团体，小商人的组织等等，而其基础，当然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农民的群众组织。因此十分明白的，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面前，就发生关于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于其初发生时，即以社会阶级非常复杂，与其特别结构见称。内中有纯粹资产阶级分子，构成所谓右派的社会阶级的基础，亦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以一切可能的军事联合做基础而发生而组织起来的。这个国民党，说他是什么都可以的，他只是没有党内的民主精神，许

多国民党领袖，非但有完全权力，且在事实上绝对超于国民党地方组织而独立的。正确的会议，正确的选举等等完全没有的。现在这种情形，必须彻底的改变，而且没有选举彻底的改变，国民党将不能有历史的作用而必然要死亡。

国民党的分裂，国民革命战线亦随之而分裂，资产阶级亦即跑入反革命的营垒里去了。国民党的分裂，于蒋介石组织自己右派自由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表现出来。在左派国民党中央，还留着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与一些资产阶级急进的知识分子，和那些有次等作用的大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者。

如果保持土地革命的方针，则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呢？我们的责任，是要这左派国民党赶快农民化，工人化，不仅是他的成分农民化，工人化，而且要使城市与地方的指导机关都农民化，工人化。

开会的第三天，有共产国际代表团中的同志从中国回来，他肯定的说：国民党左派中的上层分子的相互关系（从国民党员群众中实际相互阶级关系的观点上看），是完全不适应于国民党内部的构造的。他报告说：加入国民党或是形式上在国民党影响下的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就是在中国革命发展中有更大作用的群众力量，都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自然，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员，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甚至对共产党员要求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还是一种幻想。当我们的党初发生时，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小组，他们饱受西欧社会民主运动的马克思的经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造者，都是些有十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开头起，我们已保证了工人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生于另外一个基础上。他们由孙中山的民粹思想中蜕化出来，差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都不认识。仅于最近期间，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接触，才开始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殊来源，不应该忘记，并应加以注意。

由于发展土地革命的必要，由于发展工人运动与发展群众组织的必要，同样亦由于有利用国民党的传统，以为工人阶级直接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并领导这些力量的必要，共产国际乃确定其方针。全体会议决定国民党必须立刻坚决的将这些群众组织，如职工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军队组织与手工业者的组织等等做为基础，而将国民党加以改组。

因此，执行委员会特别注意共产党的特别任务，和其与国民党左派特殊形式的关系。执行委员会曾指出共产党屡次表现出怕群众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怕农民运动的发展。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本身的太过小心与动摇，于是对国民党左派的动摇，游移，与不坚决的态度之批评，亦就太过小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其决议案中，明白的说，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以工人阶级政党的资格，确定自己独立的性质，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能放弃其对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动摇游移的批评，无论如何必须批评他们领袖的游移动摇的态度，亦只有如此才能督促这些左派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站在更向前更坚忍的农民小手工业者与工人的群众斗争的方面来。

四、武装力量与革命

最复杂的问题是军队的问题与一般的武装力量问题。应该自己有个十分明确的知道左派国民党还远不是工农的联合，还有急进的资产阶级领袖的尾巴主义派。武汉政府亦是同样的情形。武汉政府还远不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专政。他只是可以朝此方向发展。政府里还有急进的资产阶级，可以说，他们很有可能走向敌人方面去，而且恐怕一定走向敌人方面去。如果这话对于国民党左派的几个领袖，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几个人是对的，同样对于军队机关更是可以确定这样说的。

讲到国民党，我不想现在这些人能够带走多少群众去。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党员群众里（我将国民党的党员群众与其上层分子

分别开来)实际是代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是现在在最特别的,是军队成分,军官成分绝对不是一种可靠的力量。

你们必须要知道事情的原委。我们当然都知道可以利用旧军官,但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就是在革命政权已经达到巩固地位,旧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已经破坏,这些军官的政治上独立的可能完全被剥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利用旧军官。

但是这些条件在武汉政府的领域中是没有的。我们能够说武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权已经巩固了么?不能的,因为地主,半地主及其警察与武装组织所谓民团都还没有滚蛋。一般讲起来,甚至武汉政府还不稳固,军事力量虽然有些发展,但它的根基仍是不可靠,因为军队中的忠实可靠的将领还是非常之少。这有非常大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看,武汉政府军队的结构,万万不及我们红军的结构。虽然整个的军队似乎还是拥护武汉政府,但是要保证没有多少冲突叛变,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而且,“叛变”很可能是可能,是不可免的。

因此武装力量的问题,有极大的意义,此地亦要郑重的说,如果没有土地革命的发展,无论如何不能造成强有力的绝对可靠的武装力量,亦不能由现在军队里面得到很多生力军以保证其全部的可靠。必须由武装工人与武装农民,来造成军事力量,而其基础还在提高土地革命的高潮。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一点的推测的章本。

第四 中国革命与反对派

现在来讲几句关于反对派,如托洛斯基与吴奥维契的演说,季诺维也夫的大纲等所提出与我们对抗的观点是怎样。关于这一点,我们亦有非常之多的反对派的一切可能的大纲文章,声明,文件,宣言等等,我当然不能将每个都拿出来讲,所以只讲其重要的。

托洛斯基演说的要义如下：蒋介石加中国革命失败，这是因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之“破坏的”，“罪恶的”，“叛变的”，“可耻的”策略路线。共产国际与本党中央委员会所以有这种路线，据托洛斯基的意见，是因为本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不是站在布尔塞维克的位置上而是站在孟塞维克的位置上的。托洛斯基提到列宁与布尔塞维克党在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时，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并引列宁的话，那里列宁大概是这样的说：

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以要帮助资产阶级，——孟塞维克派这样说着；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以要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布尔塞维克这样说着。

列宁这话，是绝对正确的。在1905年时，我们与孟塞维克不同的地方，是对于农民的与自由资产阶级的不同的关系。我们用工人与农民的平民联合反对“沙皇”制度与资产阶级，并反对那已变成反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而孟塞维克则援助自由资产阶级而不懂得农民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主要的分别。

然而列宁如果只写了这段话；如果中国处于1905年时俄帝国国的地位，如果中国资产阶级从1911年到1926年的这一段时间所表现的，正与当时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相似，则我们可完全享受孟塞维克的称号。但是事情的真相是：托洛斯基与全数反对派都真正不懂列宁关于本问题的态度，亦不懂得事实，所以完全没有敲到那应该走的门户。

我们应该将像我们1905年那样的革命，与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别清楚。关于这点，我们可在列宁那里找到十分明确的指示。列宁说，我们必须，或者可以与资产阶级妥协，并且在能保证我们党的独立与工人组织的独立的不变条件下，还可与资产阶级直接同盟（列宁在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这样的写着和说着）。不但是妥协，并且是“同盟”！为什么？原因

很简单：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不和1905年时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一样，1904年俄国资产阶级开始反对沙皇制度，而在1905年10月大罢工以后，自由资产阶级已公开变成反革命了。因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没有一次高声反对过沙皇制度，因为他们亦不能高喊反对；因为他们必然，并且非常之快，要转入反革命的地位——所以我们决定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策略路线。

现在，当蒋介石叛变时候，中国资产阶级是否变成反革命呢？是的，变成反革命了。然而从1911年到1926年，资产阶级难道亦做了反革命的作用了吗？谁敢肯定这话？现在他们虽走到反革命的营垒里去了，然在多年来他们曾有一种作用，为我们所必须援助，必须利用，必须和他同盟的。共产党方才出胎，工人运动正在觉醒，而资产阶级已起来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甚至做了武装争斗。并在比较不久，蒋介石未变以前，他的军队还实行“北伐”。现在要问：我们是否要援助北伐？——据腊狄客所说，“北伐”是光荣的革命事业。

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经过多年，在客观上起了革命的作用，然后乃放弃此作用。这完全不与1905年革命时的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同一政治模样。资产阶级这种作用，可由中国社会力量来解释，可由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的性质来解释。这可由许多为1905年俄国革命所没有的原因来解释。列宁固然说过，我们与孟什维克的不同，在于孟什维克援助自由资产阶级，而我们则反对与他们联合。但列宁说的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列宁关于东方革命，就有另外的说法了。

最堪刺心的是托洛斯基同志与其党徒否认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然而托洛斯基与季诺维也夫自己都屡次举手赞成帮助广东政府，……。当时他们竟没有一人说这是不对的，而现在同是这些人却于事后来说是无产阶级的“背叛”是

“耻辱”……。如果说耻辱，那么莫过于引用列宁的话而囫囵吞枣并加以修改那般可耻了。

因此反对派提出大纲，说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为不可能的话，只是直接改变了列宁的遗教。不将俄国与中国分别清楚，不将1905年与1927年分别清楚，不将俄国自由资产阶级与中国民族革命资产阶级分别清楚……，而无条件的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是绝对不正确的话。此地事实上是没有一点分析，不懂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现象。

因此，一般的说，不能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是不对的。

但是此地我们另外有一个问题。可以说：好，在某个时期以前，可以和资产阶级一块儿走；但是你们自己也承认，资产阶级终究有一天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中去。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已经说过了。然而你们做过些什么来保护无产者与农民？你们做过些什么来预防他们的失败？你们是否做了事变的尾巴主义者？蒋介石的叛变，是否使你们茫不知所措？这是不是你们与蒋介石“联盟”策略的结果？这些问题是必须提出的，是完全合理的。

且拿反对我们的最容易的驳论来看，这是说：上海工人遭受失败，就是你们的策略全不中用的表示。

然而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决然反对。在1917年俄国革命时，我们的政策是对的。在7月前，我们是否看到事变的倾向怎样？看到了。然而到7月别人终究打倒我们了。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为什么我们被人打倒？原因非常简单。我们的政策无论如何对法，我们终来不及准备自己的实力足以胜过敌人。对于当时的形势，我们还没有成熟，没有准备得充分。当时阶级势力的关系，是我们政策无论怎样对，我们总来不及达到一种力量能打倒敌人的程度。

我们中国同志，做了很多的错误，而且错得非常之厉害，如果要将这些错误逐一讨论，则可以而且必须说：毫无疑问的，为发展乡村与城市里群众运动所应该做到的事情，还未完全做到，毫

无疑义的，一部分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不管共产国际一切训令，有时且阻碍了土地革命。

然而有一点，我要坚持的说，就是即使一切可能的都做了，我们在现在的时候，亦不能与蒋介石直接冲突而得到胜利。第七次扩大会议所提出的方略，是发展群众运动，排斥国民党右派于国民党以外，占据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武装工人阶级与农民，创设工人与农民的群众组织。这个由各方来做唯一政治的保证的方针，是共产国际给我们的。但是即使一切所能做的事情都已实践了，还须看事变的情势是怎样。上海是事实的中心。在上海有各种的反革命的力量：第一，帝国主义全副武装的力量；第二，蒋介石的力量——大支军队（只有一小部分多少接近工农的军队除外）与蒋介石在以往革命时期所得到的威权；最后，北军的战线等等。

季诺维也夫同志不管这些而于其大纲中提出这样“好”的保证：上海工人阶级要开始暴动来反对蒋介石。这个据我们的意见，是最荒谬不过的政策，如果上海无产阶级直接暴动起来反对蒋介石，结果将怎样呢？无产阶级将被连根铲除。因为很明显的，在此种环境之下，各种反对工人阶级，反对继续发展的中国革命的一切力量，将都联合起来。如果上海工人起来反对蒋介石，则蒋介石，张作霖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以及一切仇视革命的力量，都将联合起来，以便根本斩除上海无产阶级的先锋。

他们说我们所实施的策略是非列宁的策略。请原谅；列宁从来没有主张过在任何时候都拿出暴动的策略来。如果肯定这个，实是无意识的。我想，当反对派说这个的时候，他们自己亦不相信这种肯定的。如果季诺维也夫以为当暴动时，欧美工人阶级会来“拯救”上海的无产阶级，聊以自慰，那真是荒谬无稽。美国除了一个小小共产党外，一切工人阶级的改良派的首领们，都是些被收买的流氓，做出卖工人阶级的事业的。你们要这样流氓来“拯

救”中国的工人阶级吗？这些美国无产阶级领袖们首先提出搜查苏联房舍，搜查一切我们文化的房舍，你们还希望他们来保障中国革命吗？

须要记得，就是欧洲的无产阶级的波动，亦不怎样十分快的。喂，在这样光天化日之下，拿出这种鬼东西做论辩材料来骗人！我们很知道，帮助怎样来的。这种帮助，不是一天两天内来的，要经过几个月或几年。要经过极大的波动，才来了这个帮助，而帝国主义却可以在武装冲突时，一天以内扫尽上海无产阶级而有余。用这种空想，来核计很快的帮助；并在这种空想的基础上，建筑起政治的方针，并用这种方针，来代替我们所提出的策略；而即因为我们不采用这种冒险的策略，就骂我们为叛变，这些都表明是陷于奸雄的怀抱中，而丧失了一切马克思的遗训和无产阶级的责任心的。

其次反对派用以攻击我们的问题，为苏维埃口号的问题。这个口号非常的急进，因此我们的英雄特别喜欢提它。他们提出立刻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代表苏维埃，而我们以为这个口号在现时是不适应的，于是他们就因此就骂我们为背叛。此地预先要注意一点。1923年，德国大事变的前夜，在工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面（不是中国那样的革命亦不是在中国那样的国家，而是在德国）在大多数人民为工人阶级而有伟大的工业中心与非常发展的工业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已经过1918年的革命，已有苏维埃的经验，而托洛斯基同志当时坚决反对苏维埃的口号。他提出自己的主见，这种主见，已由经验证其不正确，而在这口号里，没有一点所谓“叛变”。他当时这样的说：这个运动掀动了大部分群众，这个群众由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来进行，而群众运动将在工厂委员会的初期生长中表现出来，因此工厂委员会是一种现在事变前进中具体的组织形式；应该在这种工厂委员会的特殊组织形式的基础上而进行其扩充势力的事业，以后将由此产生苏维埃，或者竟

是用不到。

托洛斯基这样的说着。而列宁亦以为革命，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一定常常要取苏维埃的形式。我们屡次听见列宁同志作这样的解说：在一方面，不是每个革命——甚至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取苏维埃的形式，而在另一方面，亦不是苏维埃形式，就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譬如，对特殊情形如英国，列宁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职工会政权的形式，或者其他基本形式。列宁曾是非常小心的。

对于1923年的德国具体的环境的估量，是否对的，这是另一问题，我且将它搁在一边。我这里只要十二分坚决的着重的说，托洛斯基曾反对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夜，反对过苏维埃的口号。却亦没有人因此痛骂与鄙视托洛斯基为大逆不道，死有余辜。

这是大家都记得的。而现在因为共产国际不在中国立刻组织苏维埃为然，托洛斯基同志就大放厥辞，诬为背叛等等。难道这不是空话，……傲慢吗？

为什么我们以为现在立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不对的？我们以为在现在这样的革命基础上，如武汉政府还非工农专政，而是正在这方向进行——现在有国民党组织的特殊历史的形式，为革命发展中所自然必须的，而这种形式是一种非常可伸缩的形式；有很大革命的传统，能够联合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还有由各方面扩展的最大可能。我们现在应否说：我们丢了这个全部机器而另起炉灶呢？这个问题是必须答复的。

此地又发生策略上的歧异。现在便有人主张提出这样的策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而在另外一边组织苏维埃来反对国民党或直接与之冲突。这种方针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很明显的要丢开国民党，把国民党丢给右派，实际上就要立刻与武汉政府发生冲突，因而企图消灭他。这是一条路线。季诺维也夫与托洛斯基两同志，在其初次给我们的意见书上说，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而同时在同

一意见书里，他们又说无论如何要用尽方法援助武汉政府，使其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由此以对抗蒋介石，因此很明显的，这点同那点是不相符的。于是托洛斯基同志又在自己的意见书中（这是后来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正确些说，在其文章里，明白提议（他所谓拿出一切图画放在桌上）说，我们现在必须创设两重的政权，由组织苏维埃的中心来对抗武汉。武汉是“没有什么东西”，国民党左派是“空的”，我们应该创造两重政权，所以我们必须有苏维埃。

你们看，此地多少显著的矛盾。在托洛斯基与季诺维也夫的初次提案中同心一气的要尽量帮助武汉，然而又要创设苏维埃来反对武汉；既认武汉为革命的组织中心，然而又要来推翻他。在托洛斯基的文章里，以单纯的法术，撇去这个矛盾：武汉政府与左派国民党虽然存在，却是等于不存在。那么，所谓两重政权，真不知从何处说起了。大概托洛斯基在其提议援助武汉之后两三天内，乃得真相，于是要求公开以组织两重政权的方法来推翻这个（革命）中心。同样他亦揭开他所提出苏维埃口号的真面目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说。实际上，由各方面看，左派国民党中有各种不同的派别，然终不能否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众的组织。当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时，他写道，国民党有40万人。而现在国民党更非常的增长了。右派国民党的分裂，只跑出几个头脑，只跑出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人民群众还留在国民党内，武汉政府现正从事这种争斗。军官也许叛变，而其政府的存在，则甚至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所公认的。那么如何可以置之不顾呢？我们以为托洛斯基同志于此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正如他在1905年时所犯的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农民的错误一样。大家都知道他的“无间断革命”的理论，他在1905年的公式：“沙皇倒了，而政府是工人的”。

同样他于此亦要跳过国民党，跳过武汉政府，而这个政府在

两天以前还是“对抗加文约克”(即指蒋介石)的中心。我们以为现在主要任务之一,是要扩大土地革命的基础,组织农民委员会,各地农民协会,以及武装群众等等,使国民党大大的德谟克拉西化。自然,分裂是可以的,甚至当然的,不能否认武汉政府可以由分裂而瓦解或为敌人所消灭。由于一部分国民党左派的上层分子阻碍农村革命,不能帮助此政府,那是不免的。

这些在理论上都是不能除外的。然而决不能因此就必须要求打击国民党——这是中国群众特别的组织。托洛斯基在1923年不“懂得”德国革命的特征,他要用工厂委员会来代替苏维埃。而现在他又完全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发展的真正现实的特征。

我现在要讲中国的最近事变。

现在实际上是武汉政府国民革命军得到很大的胜利。然而武汉政府的形势,异常严重,军事危险还是很大,军队都在于不很可靠的人之手。日就扩大的土地革命,使军队中的军官及其首领起来反对。长沙的马日事变(5月21日),造成反革命的一幕戏,继此以后,当还有其他的爆发。在另一方面,财政经济情形,非常困难,只讲给养军队,已要购买。如要征税,则取之于农民,自为政策上所不可能。武汉一带,是革命运动的中心点,有大纱厂与大的矿工业。大资本家将大部分的工厂关门,而逃到上海,并向银行提取存款。中等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亦都席卷而去,于是经济生活,就枯涸了。资产阶级走了。

我们在议决案上写道,在这种情形之下,应将工厂与企业拿在自己手里来。这说是很容易,但是此时还需有流通资本,因为要买原料,要雇用工人等等。环境造成大批困难,武装政府^①必须对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善与周旋。这种经济环境,军事环境与军队的不稳固,强使你们要懂得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① 原文如此,疑为武汉政府。——编者

是些什么，与何种最复杂的问题应该解决的。

中国共产党员首先必须坚决的洗净自己内部的动摇，游移的态度。扩展农民群众运动，与夺取土地的方针，必须十分坚决去实施。现在如用别的策略是罪恶的。必须在此基础上来组织忠实的武装队伍，必须在此基础上来改组国民党。只有这个基础可以用为对抗分化，逃避，叛变，与走入敌人方面去等等的事情。为保持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保证他们的私有财产，保证兵士的土地……等，中国共产党员必须用尽方法以提高群众，加入争斗，变军队为真正人民的军队，只要力量所及，压服一切反革命的企图，靠赖群众对地主，土豪以及一概反革命者的革命的敌忾。

我不再讲其他的问题。在结语中我只要讲反对派同志的攻击，弄得太不像话，可以说甚至非常守己的人，平常不喜“吵架”等事，终究都要发起火来。绝对大多数的人，主张对反对派予以更坚决的处置，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对付反对派以后，托洛斯基朗诵宣言，内中有说：

“他们”将继续争斗到底。现在事情便发展到如此地步。既然讲到非常严重的事情，既然现在我们反对派已经出来说，不能一般的提出党的一致的问题，而是要提出“在列宁的基础上”的统一问题，而“列宁”的基础，是他们的基础。因此，不难看出我们是走到了什么样的天地。在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上，我们自己以为不仅有权，并且有决定处置反对派的义务。这个决定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议决案上所确定的。当时只有一票——吴奥维契同志的一票反对，他自身而且亦受执行委员会所控告的。

应该说，反对派曾有最自由的可能讲话。他们得有45分钟，一点钟讲话，而且不只一次。一切我所讲的文件，有几百页，全数代表都读过这些文件，亦都听过他们的辩论。我们决议给反对派争斗，因为对于我们，这种调子已经明白了，而对于有些外国同志，也许不十分明白的。我们已经实施争斗过了，在争斗后已

完全明显了，全体都坚决一致的不能再继续忍受了，必须要采取最低限度的办法了，这些办法已在执行委员会的议决案里规定的。

看呵，同志们，对于反对派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想，就是有些同志说托洛斯基个人那种“尊贵”的假面具：雄纠纠的相貌，姿势，勇于保障自己的观点等等——这个假面具都丢得粉碎了。现在没有一个人相信反对派。10月16日反对派给我们的“庄严”的誓约，现在他们对于自己对于党的诚信的话，弃之如敝屣了。10月16日反对派声明，他们严正的宣誓与乌尔邦司(Urfahng)马斯洛夫派不发生什么关系，而现在他们与此派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此派的中央机关报变成我们反对派的中央机关报了。现在反对派骂本党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为背叛，他们说在中国革命的一定阶段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及共产国际与中国资产阶级一起走着。然而任何人都知道他们自己在此时期正坐在本党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里，参加一切的工作。在最近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们于其箭筒里放出最后一支箭。武士的“德行”，在全体会议上表彰出来了，并且揭穿反对派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与吾党中央委员会时所带着的假面具了。这是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走上各国共产党领袖更坚固团结的道路的缘故。全共产国际走过内部争斗的最重要的时期，而更坚固的更确定的团结起来。不言而喻的，这种特殊的事实，对于一切人都要留些震动的印象。我们现时站在非常困难的前面，反对我们的有英国帝国主义与其一切藩王，有张作霖的势力，有断绝英俄国交的事实……等，事变以惊人的速度而发展。然而托洛斯基同志在其提案中，构成这样的形势：**一切危险中之最危险者为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中之党的统治！**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观察，如果他看见主要的危险在此地，如果本党与共产国际的党内统治是主要的敌人，那他一定要对这主要敌人进攻啊！而于张伯伦等——这已在后来计划之中，还

可稍待一时。无论反对派怎样拉我们，无论他们怎样妨碍全体会议的工作，全体会议终能专注于一切最重要的问题，提出实际问题予以解决，以供献于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所以我们能希望各国共产党的增长，我们力量的团结——1914年不致复演，1914年不致再发生。1927年到1928年，共产国际在其坚决的争斗中将说出自己布尔塞维克的话来！（掌声如雷，继以欢呼，全场起立。）

（录自《中国革命与反对派》，上海民志书局1929年9月版）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下）

时事问题简评（节录）

（1927年7月28日）

斯大林

二、关于中国

现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能给走过的道路做出某种总结，并考察一下关于检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的问题。

有几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是必须顾到的，不顾到这些原则，既不可能正确地领导革命，也不可能检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我们的反对派早已忘记了这些原则。但是，正因为反对派有健忘的毛病，所以必须一再提到这些原则。

我指的是这样的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第一个原则。在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

第二个原则。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数量众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也好；

第三个原则。一定要估计到这样一个真理：在政治上教育千

百万群众，只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

我以为顾到这些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便不可能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路线作马克思主义的检查。

我们就从这几个策略原则来考察中国革命问题。

尽管我们党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可惜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领导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实在说来，这些“领导者”不同于真正领导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衣袋里总藏着两三个现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需的”公式。顾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他们不懂得，现在，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时候，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

由此他们便企图把对一切国家的领导千篇一律化。由此他们便企图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不顾到个别国家的运动的具体条件。由此便产生了公式和个别国家革命运动之间的永远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这些可怜的领导者领导的基本结果。

我们的反对派正是这类可怜的领导者。

反对派听说中国正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他们知道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便得出—

个对中国的现成公式：打倒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共同行动，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万岁（1926年4月）。

但是反对派忘记中国和1905年的俄国不同，它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革命不单纯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掌握中国工业、商业和交通命脉，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加于中国劳动群众，而且加于中国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因此，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时期内支持中国革命。

大家知道，实际情形正是如此。如果拿中国革命的广州时期、国民革命军到达长江的时期、国民党分裂以前的时期来说，那就不能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支持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容许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条件下与这个资产阶级一起行动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结果是反对派背弃了自己的旧公式，宣布了一个“新”公式：和中国资产阶级一起行动是必要的，共产党人不当退出国民党（1927年4月）。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一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顾到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说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各国的代表在中国关税自主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反对派知道关税自主首先是中国资本家所需要的，由此便得出一个现成的公式：中国革命是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

但是反对派忘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主要不在于限制中国的关税，而在于它在中国拥有从数万万中国工人和农民身上吸吮血液的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和商行。

反对派忘记了中国人民所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支持并鼓励直接剥削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军阀、资本家、官僚等等的力量，是由于中国

工人和农民不同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便不能战胜自己的这些剥削者。

反对派忘记正是这种情况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

反对派忘记谁宣传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谁就会否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因为他把中国革命交给中国资产阶级去领导了。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关税自主实质上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纲，因为甚至连张作霖和蒋介石那样的反动头子现在都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中国的关税自主了。

由此便产生了反对派的两重性，他们企图摆脱自己的关税自主公式，企图悄悄地放弃这个公式，而转向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二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认真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说商人资产阶级渗入了中国农村，把土地租给无产的农民。反对派知道商人不是封建主，由此便得出一个现成的公式：封建残余，也就是说，农民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在中国革命中没有重大的意义，现时在中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问题。

但是反对派看不见中国经济的特色不是商人资本渗入农村，而是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条件下**，中国农村封建残余的**统治**是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相结合的。

反对派不懂得，中国现在那种惨无人道地掠夺并压迫中国农民的整个军事官僚机器，本质上就是农村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方法的**统治**与商人资本的这种结合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个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中国的大小封建主。

事实表明这一革命已席卷几千万农民并有扩展到全中国的趋势。

事实表明，封建主，实在的活的封建主，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在好多省份里掌握政权，使军队中的指挥人员服从他们的意志，使国民党的领导受他们的影响，接二连三地给中国革命以打击。

在此以后还否认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在此以后还不承认土地革命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反对彰明较著的事实。

由此反对派便放弃了自己关于封建残余和土地革命问题的旧公式，由此反对派便企图偷偷放弃自己的旧公式并默认共产国际的立场是正确的。

这就是对反对派的第三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顾及中国经济的民族特点。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公式和现实间的不协调，——这就是反对派可怜的领导者的命运。

而这种不协调是反对派违背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革命运动中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这一列宁主义著名策略原则的直接结果。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原则的：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认清同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基本的原则的任务，并且十分自觉地估计到这种斗争因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如爱尔兰等）、殖民地、宗教派别等等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对第二国际的不满到处都感觉得到，并且在扩大和增长，这种不满是由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由于它不善于或不能够创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领导的中心，这个

中心能够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指导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必须认识清楚，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规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上面^①。只要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那末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样性，不是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正确的变更，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并且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在每个国家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要调查、研究、找出、看透、抓住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②，——这便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71页至第72页）

共产国际的路线就是一定要顾到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

相反地，反对派的路线就是违背这个策略原则的路线。

这种违背也就是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倒霉的根源。

*

*

*

现在来谈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的问题。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着重号已改为黑体字。——编者）

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站着强大的敌人：大小封建主，新旧军阀的军事官僚机器，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掌握中国经济生活命脉并用海陆军来巩固自己剥削中国人民的权利的东方和西方的帝国主义者。

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

这种政策是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基本要求。没有这种政策，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认为这种政策是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但这只是说明他们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了，他们离开列宁主义是这样远，就像天地相隔一样。

中国无产阶级在不久以前有过这种同盟者吗？

是的，有过。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上，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些阶级的代表是和共产党人一起在一个叫做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内共同进行工作的。

这些同盟者不是也不能是同样可靠的。他们中间有些是比较可靠的同盟者（农民、城市贫民），有些是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则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党当时不容争辩地是人数比较众多的组织。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孤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右派),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推向左边,把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当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呢?扩大了革命地区,广州军队到达了长江;有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工会、罢工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结成了政党;成立了第一批农民组织的基层组织(农民协会);共产党人渗入了军队。

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民族资产阶级退到反革命阵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

这样,革命便失去了民族资产阶级。这对革命是局部的损失。但革命却进入发展的更高阶段,进入土地革命阶段,使广大农民群众更靠近了自己。这对革命是有利的。

当时,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国民党是不是人数众多的组织呢?无疑地是的。它不容争辩地是一个比广州时期的国民党人数更加众多的组织。

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

当时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把它推向左边,把它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当时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呢？是的，是有的。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当时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要把武汉国民党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至少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彻底民主化和国民党对土地革命的直接赞助。假使共产党人放弃实行这种转变的企图，那就太愚蠢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呢？

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从五六千人的小党成长为有五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大党。

工会成长为巨大的全国性的团体，约有会员 300 万。

农民基层组织成长为拥有几千万人的巨大的团体。农民的土地运动发展到宏大的规模，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了中心地位。共产党争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了土地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

诚然，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诚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但是以为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就可笑了。只要把我们党经历过的一系列的分裂、脱离、变节、叛卖等等历史回忆一下，就能明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国无产阶级有没有同盟者呢？

是的，是有的。

这些同盟者就是农民和城市贫民。

现时的特征是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

这一脱离的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日益发展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主对武汉领导集团的压力，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天津地区施压力，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分裂，作为容许

北进的代价。

反对派怀疑在中国有封建残余存在。但是现在谁都明白，封建残余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甚至比目前革命的进攻力量还要强大。正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在中国暂时还较强大，所以革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

革命在这一次失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也正是革命暂时失败的标志。

但是革命却把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

对于革命的好处就在这里。

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要求正确的政策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既然有苏维埃的存在，既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1905年的革命为什么还遭到失败呢？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体当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些。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既然有苏维埃的存在（苏维埃当时背叛了布尔什维克），既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什么还遭到失败呢？因为俄国帝国主义当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些。

正确的政策并不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要直接战胜敌人，不仅决定于正确的政策，而且首先和主要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于革命力量的显著优势，决定于敌人阵营的瓦解，决定于有利的国际形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才能导致直接的胜利。

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是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

件下都应当予以满足的。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

能否断言过去一个时期为中国革命的直接胜利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呢？显然是不能的。

能否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加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没有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呢？显然是不能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使广大农民群众离开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周围了。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和广州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为了扩大革命地区，形成群众性的党，使自己有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并给自己开辟一条接近农民的道路。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联盟，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组织，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国民党的领导，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创造条件。

民族资产阶级跑进了反革命阵营，和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

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土地革命吓倒，在千百万农民群众心目中信誉扫地，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了。

但是千百万农民群众却因此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为无产阶级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领导者了。

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这难道不明白吗？

只有这种政策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这难道不明白吗？

除了我们的反对派中的可怜的领导者以外，谁能否认这种政策的正确性和革命性呢？

反对派断言：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之转到反革命方面，说明

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

但是，只有忘记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并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这样说。

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直到1918年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个联盟的正确性。这个联盟的结局如何呢？结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能否根据这点就断言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呢？显然是不能的。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种联盟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的正确性。反对派自己当时（1927年4月）也断言这种联盟是正确的。现在，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脱离革命之后，怎能根据这种脱离就断言和武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是不正确的呢？

只有不坚定的人才会搬弄这样的“论据”，这难道不明白吗？

难道有人断言过和武汉国民党的联盟是永无止期的联盟吗？难道天地间有永无止期的联盟吗？反对派简直丝毫不懂得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即无产阶级要与非无产者的阶级和集团结成革命联盟的原则，这难道不明白吗？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策略原则的：

“要能战胜较强大的敌人，就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同时“一定要最仔细地、小心地、谨慎地、巧妙地利用敌人中间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各国内部各种各样资产阶级之间的任何利害冲突，并且利用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机会以获得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尽管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①。谁要是在相当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1917年4月正是在这一点上碰了钉子，那时他们过早地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时列宁把巴格达齐也夫集团的这种企图看成是危险的冒险主义，当众斥责了它。

为什么呢？

因为后方和前方的广大劳动群众还没有决心接受这个口号。因为这个集团把作为前途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淆起来了。因为这个集团冒进，使党有脱离当时还相信临时政府的革命性的广大群众和苏维埃而完全孤立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譬如说，在半年以前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不，不应当提出。

不应当提出，因为这是危险的冒进，这会妨碍共产党人去接近那些还相信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广大劳动群众，这会使共产党脱离广大农民群众而孤立起来。

不应当提出，因为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因它反对土地革命、因它反对工人阶级、因它转到反革命方面而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目中大丢其脸，信誉扫地。

我们总是说：只要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就不能采取使它信誉扫地和更换它的方针，必须让它先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然后才在实践上提出更换它的问题。

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是的，应当，完全应当。

现在国民党领导集团已因它反对革命而大丢其脸，使自己 and 广大工农群众处于敌对地位，这个口号一定会在人民群众中间获得有力的响应。

现在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都会懂得，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

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而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是做得正确的。

因为现在摆在农民和工人群众面前让他们选择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国民党现在的领导集团**，那末就要拒绝满足农民和工人群众的迫切需要，就要放弃土地革命；**或者是土地革命和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那末更换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就成为群众的当前口号了。

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要求就是如此，这个原则是有关更换口号的问题，是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新的革命立场上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是以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动、**适时地**以另一些口号代替这一些口号来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党的路线的正确性的问题。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策略原则的：

“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上，或者没有站在至少对先锋队严守善意的中立而对其敌人完全不予支持立场上的时候，单把先锋队投入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而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资本压迫的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这些群众亲身的政治经验^①**。这是所有的大革命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现在不仅被俄国而且被德国十分有力地 and 明显地证实了。不仅文化水平低的和多半是不识字的俄国的群众，就连文化程度高的和个个识字的德国的群众，也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真是软弱无力、毫无气节、束手无策、向资产阶级献媚、卑鄙齷齪，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是极端反动派（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①及其同伙）的专政，然后才会坚决地转向共产主义。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团、共产主义派别，其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酣睡、消沉、守旧、因循而没有醒悟的）群众引导到这种新的立场上，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在这些群众走近新的立场、转到新的立场的时候，善于领导这些群众。”（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73页）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意义和作用，他们不承认这个策略原则，他们一贯地破坏这个策略原则。

他们（托洛茨基分子）在1917年初就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还没有完成的土地运动（这是列宁的看法）。

他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工会的反动性，不承认共产党人在反动工会中工作是适当的，否认和这种工会结成临时联盟的必要性。

他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中国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国民党），“跳过”中国人民群众的落后性，于1926年4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刻退出国民党，而于1927年4月在国民党发展阶段还没有完结没有终了的条件下又提出立即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反对派以为既然他们了解了、认清了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不彻底、动摇、不可靠，既然他们认清了与国民党的联盟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每个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都不难认清这一点），那

^① 卡普（1868—1922）是德国1920年反革命政变——“卡普盲动”的主要领导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领，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译者注。

末,这就完全足以展开反国民党、反国民党政权的“坚决行动”了,就完全足以使群众、使广大工农群众“立即”支持“我们”和“我们的”“坚决行动”了。

反对派忘记了,在这里,“我们的”了解还远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率领群众。反对派忘记了,为了这一点,还必须使群众自己根据他们亲身的经验去认清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不可靠性、反动性、反革命性。

反对派忘记了,“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奇怪的是反对派忘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状况、认识和坚决行动的决心。

我们、党和列宁在1917年4月是否知道必须推翻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否知道临时政府的存在和苏维埃的活动不能相容,是否知道政权应当转到苏维埃手中呢?是的,是知道的。

以巴格达齐也夫为首的彼得堡的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于1917年4月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企图推翻临时政府,那时候为什么列宁斥责这个集团是冒险主义者呢?

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一部分工人、千百万农民、广大军队群众以及苏维埃本身都还没有决心把这个口号作为当前的口号来接受。

因为临时政府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使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使自己在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心目中信誉扫地。

因为列宁知道,为了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无产阶级先进集团即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和觉悟是不够的;为了

这一点，还必须使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经验深信这种路线的正确性。

因为必须经过杂乱的联合政府，经过1917年6月、7月、8月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变节和背叛，必须经过1917年6月前线上可耻的进攻，经过各小资产阶级政党跟科尔尼洛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诚实的”联合，经过科尔尼洛夫的暴动等等，才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深信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把作为前途的苏维埃政权口号，变成作为当前口号的苏维埃政权口号。

反对派的倒霉在于他们屡犯巴格达齐也夫集团当时犯过的错误，他们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宁愿顺着巴格达齐也夫的道路“行进”。

我们、党和列宁在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时候和在彼得堡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是否知道立宪会议是和苏维埃政权制度不相容的呢？是的，是知道的。

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召开这个会议呢？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敌人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自己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是不是“尾巴主义”，落后于事变，“抑制群众”，破坏“远程射击”策略呢？当然不是的。

布尔什维克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帮助落后的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并确信立宪会议的无用，确信它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靠近自己，使自己易于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关于这一点写道：

“我们在1917年9月至11月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国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们俄国布尔

什维克，在1917年9月至11月，不是比西方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国会制度在俄国是政治上过了时的吗？当然，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国会是否早已存在，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国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什么程度。1917年9月至11月，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由于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已有了极好的准备来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选举……

由此就得出完全不容争辩的结论：已经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国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无害，反而会使革命无产阶级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国会为什么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国会解散，**易于**使资产阶级国会制度成为‘政治上过时的东西’。”（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41页至第42页）

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就是这样应用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

在中国也必须这样应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不论所指的是土地革命、国民党或苏维埃口号都一样。

看来反对派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完全失败。这当然是不对的。中国革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是怎样的失败，是多大的失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可能这是近乎长期的失败，像俄国1905年发生过的那样，革命中断了整整12年，然后在1917年2月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推翻专制政体，为新的苏维埃的革命扫清道路。

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没有的。这还不是革命的完全的失败，正

像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认为是彻底的失败一样。这不是完全的失败，因为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的统一，从帝国主义羁绊下得到解放）还待解决。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当然在中国也谈不上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环境中苏维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

但是，恐怕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暂时还没有根据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没有根据，是因为反革命还没有联合起来，也不会很快联合起来，如果一般说来它有一天会联合起来的话。

因为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正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这个战争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时不能不使农民破产和更加怨恨。

因为在中国还没有一个集团或政府能够实行类似斯托雷平的改革来作为统治集团的避雷针。

因为已经夺得地主土地的千百万农民是不容易抑制和压倒在地上的。

因为无产阶级在劳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无产阶级的力量还远没有被击溃。

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说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了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

当然，这里的比拟是有条件的。我作这个比拟是附有一切保留条件的，如果注意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和1917年的俄国的差别，那就会看出这一切保留条件都是必要的。我采用这种比拟仅仅是为了大略地描绘出中国革命失败的程度。

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

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们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

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

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是“头一个”说这话的人，这就是他们叫做“远程射击”的策略。

不对，最亲爱的，完全不对！这不是“远程射击”的策略，而是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就是射近了的策略。

当反对派 1926 年 4 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时，这就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

当反对派宣称中国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偷偷地抛弃了他们的公式。

当反对派 1927 年 4 月宣称中国封建残余被夸大了，而忘记了群众性的土地运动的存在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了自己的错误。

当反对派 1927 年 4 月提出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时，这就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当时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阵营内部

的矛盾，其中一个（托洛茨基）要求采取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而另一个（季诺维也夫）相反地要求“用一切办法帮助”这个武汉政府。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中间开始把这种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的就是射近了的策略称为“远程射击”的策略呢？

关于苏维埃必须说，共产国际早就先于反对派而在自己的文件中谈到了中国的苏维埃这一前途。至于反对派在今年春天为了对抗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在当时是革命的，否则季诺维也夫就用不着喊叫“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了）而把苏维埃作为当前口号提出来，这就是冒险，就是乱叫乱嚷的冒进，就是巴格达齐也夫在1917年4月所犯的那种冒险和那种冒进。

虽然苏维埃口号在中国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当前口号，但是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对派在今年春天提出苏维埃口号不是危险的和有害的冒险行为。

同样的，虽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曾于1917年9月被列宁认为是必要的和切合时宜的口号（见中央关于起义的有名的决定），但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格达齐也夫在1917年4月提出这个口号不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冒险行为。

巴格达齐也夫在1917年9月可以讲他是“头一个”说到，还在1917年4月就说到苏维埃政权的人。这是不是说，巴格达齐也夫是对的，而列宁把他在1917年4月的言论斥责为冒险主义就是不对的呢？

看来我们的反对派对巴格达齐也夫的“桂冠”总是羡慕不已。

反对派不懂得，问题并不在于“头一个”说话，从而冒进和搅乱革命事业，而在于及时地说话，并且要使所说的话为群众所响应而变成行动。

事实就是如此。

反对派离开了列宁主义的策略，其政策是“过左的”冒险主

义——总结就是如此。

载于1927年7月28日《真理报》第169号

署名：斯大林

(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

——在联共(布)党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1927年8月18日)

布哈林

现在我想谈谈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我认为，把我们与反对派区别开来的主要之点以及我们党制定每项计划都应搞清楚的主要之点是，**中国革命不能完全按照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采取的办法行事**。如能深刻理解这个问题，那就很容易看到，我们对中国革命采取的策略是多么正确（尽管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局部性错误），而我们反对派的“路线”则是多么地不正确。反对派的路线恰恰是要求对中国革命实行我们在1905年革命时采取的同一策略。

首先我想向你们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乍看起来，反对派的论据似乎表面上尚有某些令人信服之处。不管怎么说，革命是在执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实行的政策时遭到了暂时的失败。而当某些人或某些组织和阶级遭到失败时，不免会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应当归咎于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遭受失败这一事实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倾向于对所实行的策略重新进行评价。

其次，可能给人一种印象，觉得反对派的评论非常激进，很有点布尔什维克的味道。其实，反对派讲的什么呢？他们说：有

什么必要去同各种资产阶级交朋友呢？应当实行“纯阶级性的”“无产阶级”路线，像我国那样从一开始就建立苏维埃，而不是同国民党、同诸如蒋介石之流的形形色色的将领们交好，不应该采取孟什维克那种同资产阶级实行联盟的策略，结果导致了失败。应当执行一条公开而诚实的阶级路线，不同资产阶级联盟，那样就好了。

同志们，这些话听起来非常激进，对于那些自己从未提出过中国革命特点问题的人们，对于那些从未读过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特点的讲话的人们，甚至会认为颇有说服力的。

我要重复我在中央全会上我的报告中所说的话，中国事件把半殖民国家的革命问题第一次**全部**摆在我们面前。迄今为止，我们解决了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我国革命等有关的策略问题。应当说，我们对东方革命也提出了问题，自然只是概略地，而不是具体地提出问题，还没有解决应当**如何进行这场革命**，要有哪些条件，应提出**什么样的口号**等等。

我首先提出反对派论点中核心的一个理由。大家都清楚列宁是怎样对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的。当我们同孟什维克进行辩论时，他们是怎样论述我国革命呢？他们是这样说的：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反对封建制度、反对沙皇专制政体。既然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那就是说，资产阶级应当成为革命力量，工人阶级应当支持这个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应当进行妥协，同自由资产阶级实行联盟。孟什维克根据这种观点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竞选，与立宪民主党人实行联合，提出诸如成立责任内阁之类的口号等。

布尔什维克又是怎样说的，列宁又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列宁同志提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对的，但是工人阶级应当与农民联盟，进行这场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因为我国由于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来得太晚，工人阶级

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了，我国自由资产阶级从一开始革命起就必然会进行背叛，因此无产阶级主要的任务不是同自由资产阶级联盟，而是揭穿它，不是支持自由资产阶级，而是直接同它斗争。

与孟什维克主张的无产阶级同自由党人联盟的路线相反，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主张是：工人阶级与农民联合起来反对沙皇制度和反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反对派把1905年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策略套用于中国革命，说什么：“要知道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是必须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可是你们呢？你们却同自由资产阶级实行联盟。所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你们却糊里糊涂，结果遭到了失败，宠坏了一批出卖中国革命的叛徒，因为你们执行的是一条孟什维克路线”。

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和一大批其他反对派同志的主要论点。我再重复一遍，这种论点表面看来有一切令人信服之处，而且可以用其表面的说服力博得某些人的赞同。但是，同志们，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去运用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时采用的策略对待中国革命，而是错误地、分毫不差地照搬当时的策略。

当季诺维也夫同志针对我的论点说布哈林认为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学说不适用于中国的时候，说得客气些，他在作某些篡改，因为列宁本人在对待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一条明确的策略路线，而这条路线也是我们所遵循的，我现在就要同你们谈谈有关这条路线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早就向我们提出了殖民地国家问题。列宁同志在谈到殖民地国家问题提纲时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

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卷，第210页）

由此可见，列宁同志认为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既然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最重要的，那么事情就很清楚，这种客观上的差别应当以某种方式反映于策略，所以整个问题仅仅在于采取什么方式，使用什么形式。

当时列宁是怎样阐述这种策略上的差别呢？我要回溯到很久以前的一件事，那时许多人，其中包括我，在像民族问题这样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当时列宁向我们详细分析了我们的错误。我向你们讲一件我在中央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已经提过的事。

世界大战期间，就在英国政府的后院、爱尔兰发生了暴动。你们都记得，这是一次规模很大、以后被英国人血腥镇压下去的爱尔兰起义（爱尔兰是一个受英国压迫的国家），领导起义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以著名的德·凡勒拉为首的爱尔兰激进资产阶级。虽然这次起义得到工人的支持，但它不是无产阶级起义，而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起义。

共产党人中各种不同的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事实呢？

拉狄克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爱尔兰起义是一次“盲动”，不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说此事与我们无关，说这次起义注定要失败，说起义实行的是非阶级路线，说领导起义的是激进资产阶级，如此云云。

列宁是怎样反对这种评价呢？

列宁说，写这样的文章意味着支持英帝国主义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起义，尽管这不是无产阶级起义，但它在摧毁帝国主义体系。列宁肯定地说，这种对爱尔兰起义的态度就是帮助英国沙文主义。他说，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应当支持这次起义，因为这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

如果我们再回到中国问题上问一问：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差别首先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那么，我认为我们应当说，具体表现如下：由于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这个国家阶级力量的分布在一定情况的革命时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国家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相似**。我或者说得更通俗、具体一些。在我们这里，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也嘟嘟囔囔说几句反对沙皇政体的话，但是它没有能力采取坚决的行动反对沙皇政体。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什么时候拿起枪杆反对过沙皇制度？从来没有过，自由资产阶级什么时候敢对沙皇政体提出过哪怕是坚决的抗议呢？也从来没有过。像我们1905年10月罢工那样的群众行动就一下子把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吓跑了。连这样的行动就使它感到害怕了。

现在请你们来看中国革命的形势，不仅看看目前发生的事，而且也看看1911年发生的情况。请你们回忆一下从推翻中国帝制政权以及孙中山建立第一个共和国以来所发生的情况，回忆一下随后的发展阶段——成立广州第一届政府时期。再回忆一下北伐时期。请问，我们是否应当以客观地分析阶级关系为出发点呢？中国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它在一定的阶段帮助罢工运动，拿起武器反对封建主，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这种看法对还是不对？我肯定地说，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是有过这种阶段的。这是事实。广州政府没有像拉狄克所写的那样成为“工农”政府，也没有像拉狄克所写的那样成为“工人的朋友”。但是屠杀工人的刽子手蒋介石以前曾经进行了整个北伐，局部地和首先地反对过中国封建主和局部地反对过支持这些封建主的帝国主义分子，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大致从1911年起，中国革命就存在过这样一个阶段，即中国资产阶级起着积极的革命作用，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因为军队是资产阶级统率的。进行北伐的蒋介石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并不是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者。这个资产阶级在好

几年内起了革命作用，可是后来成为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于是开始起着反革命作用。

在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中国的这个革命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差别呢？有的。

现在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因为在俄国我们是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在中国我们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强烈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桎梏。因此，十分自然，**我国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很容易被群众行动吓住，而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群众发动要大得多，才能吓倒他们，使他们投入反革命阵营。**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中国资产阶级在许多年内起着积极的革命作用，只是到后来才变成了反革命势力。有人会说，应当事先就预见到叛变等等。那么让我们回忆一下俄国革命史上的例子。社会革命党人是否曾经起过革命作用？起过的。是否允许同他们联盟呢？允许的。我们在1905、1906和1907年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联盟。而如果现在有哪一个共产党人建议同社会革命党人结盟，那我们会怎样说呢？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懂得，在中国正因为那里是半殖民地国家，所以资产阶级能在许多年内客观上起着革命作用。因此，在关于对待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态度与对待我国1905年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态度应有所不同的问题上不是别人，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以下的话：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的妥协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4卷，第275

页)^①

列宁甚至还阐述了什么时候可以实行妥协，建立联盟。他明确地指出，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行妥协。他写道：

“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4卷，第334页）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是指：

“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同上）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辩论时对我说，这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应理解为农民，而且整个奥妙就在于此。这是胡说八道，因为从论述实行妥协和建立联盟的条件的这段引文中明显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在资产阶级代表不会妨碍我们教育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情况下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可见，我们要教育农民，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有可能阻碍或者相反，有可能允许我们用革命精神教育农民。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而且有责任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建立联盟。

难道这是列宁提出的适用于帝俄的那种策略吗？当然不是那种策略。

有一位反对派的英雄，你们所熟悉的萨法罗夫在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中曾经写道：“在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态度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他忘了他写过这句话，但这是白纸黑字印在萨法罗夫的小册子上的。乍看起来，反对派的立场非常激进，而实际上不管它多么激进，在

^① 这段话布哈林系引自《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而在俄文版第4版和第5版中已将括号内的字删去，因此《列宁选集》中文本中未译出这几个字。——编者注

这方面仍然具有社会民主党人的倾向，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是这样评论的：“瞧你们忙忙碌碌地搞民族运动，可是殖民地国家的这种运动并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等等”。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我们指的只是必须利用一切反帝运动，因此即使在这种运动发展的最初阶段是由非无产阶级分子领导的时候也应非常关心它，正如当年爱尔兰资产阶级引导爱尔兰工人和农民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我们曾经关心过那次运动一样。我们之所以关心这种运动，是因为它**使帝国主义机器发生动摇，因为这在客观上对发动人民革命的力量是有益的。**

哪怕是魔鬼，只要它反对帝国主义之神，那我们也应当向它说声谢谢。(笑声)。但是，同志们，生活要比通常的理论更为复杂，中国问题的整个复杂性就在于事情开始时，中国资产阶级起先是引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解放人民力量起了促进作用，它帮助人民走上独立的舞台，我们在革命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策略理由就在于此。这种妥协表现在哪里呢？最近几年这种妥协表现在共产党支持蒋介石从广州到上海的北伐。我们从这一行动中大有所得。在这支广州军从广州向上海挺进的过程中，自由资产阶级允许我们用革命精神把群众组织起来，因此在广州军向北挺进的同时，革命力量和群众运动都得到了空前罕见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赢得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时期内工会有了巨大发展，农民运动也在这个时期内迅速扩大，其中组织起来的达1000多万人。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支持了这支反帝反封建的广州军。当时，资产阶级没有阻碍我们对工农进行革命教育，因此在这次北伐中一直在进行着组织工作，这项工作使人们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信任。这是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当我们现在读到中国革命的失败时，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胜利：第一，尽管蒋介石开始枪杀工人，帝国主义分子也未能改善其在中国的地位；

其次，我们唤起了极其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果我们不支持北伐，如果我们不实行像列宁同志所说的暂时的妥协，我们就不可能唤起群众。

请想一想，如果蒋介石进行这次北伐，军队从广州向北推进，而我们都起来反对这支广州军队，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公开宣布对它进行残酷的战争，不同广州军队实行任何联盟，难道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吗？当然，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当时必须重新振奋起来支持广州军。不这样我们就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

这就是列宁同志向我们指出的策略。但是，当这支力量上升得如此迅速以致把曾经是我们盟友的资产阶级开始吓坏了的时候，当已开始看清楚这个资产阶级明天就将投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预先准备好新的斗争条件，准备好新的跳板，使人民对发生这种叛变行为有所准备，并揭露叛变者的面目，这些我们都做了。遗憾的是，当时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在俄国报纸上写的比我们实际做的要少得多。作为对这一叛变行为的反击，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口号。

同志们，这样我可以把涉及总方针的各种观点分成几类。这里可能有三种路线：（1）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同资产阶级妥协；（2）反对派的路线，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3）真正的、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即在一定阶段支持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因为它是真正革命的。这个运动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它允许我们向群众，向工农群众进行真正的革命教育。因此，如果你们用这种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进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按照列宁的原则行事的。

我们曾经同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同蒋介石妥协过，那是在他们这一伙人允许我们按照我们需要的那样去教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群众的时候。同志们，不应忘记，当这个自由资产阶级

向相反方向的转变已成定局时，我们就先改变了态度。

当然，正值失败的时刻要证明我们采用的策略的正确性是很困难的。

不用说，在1905年普列斯尼亚街垒战斗中我们被击溃时或是在1917年7月我们遭到失败时，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但要想证明布尔什维克是对的，那也比在胜利情况下证明其正确性要困难得多。

关于中国最近的事态，报纸上只有一鳞半爪的介绍。你们知道，在武汉政府转向反革命阵营以后，上层中有一些极其左倾的国民党人分裂出来，而在下层中分裂出来的人数当然要多得多。他们的姓名你们未必都感兴趣，但这里面有孙中山的夫人和其他许多民族革命著名活动家，其中还有共产党人，正如你们从报纸上看到的，他们举行了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成功地团结了近两万人的部队。他们占领了南昌。他们的计划是离开被敌对势力包围的南昌，开往广东，这样由北向南，沿途“滚雪球”般地吸收农民和工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战斗拳头。他们已经宣布自己是红军，顺利地开始南进。他们有可能会获得某种成功。他们已组成了新政府，我不知道这是第几个政府（好像是第四个），这才真正是工农联合政府，因为它公开地在旗帜上写着“没收土地”“用刺刀挖掉地主的老根”，并且毫不客气地对待农村和城市的土豪劣绅，不久前湖北也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人数虽少得多，但性质是相同的。农民群众、工人、游击队等等都团结在这些组织的周围。当然，如果它们被打垮，那就坏了，但是从这些组织的出现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的影响吗？这支新成立的军队将成长为真正的红军，这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已经进行的这一拼死的尝试，如果发展下去取得某种成功的话，那对我们的策略将是最好的论证，因为一切动摇分子那时将比在我们狠狠挨揍的情况下更快地理解我们策略的正确性。

在检查我们对中国革命采取的策略的经验时，必须承认我们存在某些局部性错误，但凭心而论，我认为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策略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我认为，在其他殖民地国家完全没有必要把中国策略全部照搬过去。我们在共产国际中讨论过印度问题，那里的情况不同于中国，尽管它也是殖民地国家，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的资产阶级更紧密地同英帝国主义勾接在一起。所以它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未必能成为客观事实。不要机械地把中国经验搬到印度。至于中国，在仔细研究分析问题以后你们会看到，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是我们党和共产国际所捍卫的观点。

我还要谈谈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问题。

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迄今存在着一个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它由于蒋介石的叛变而分裂了。国民党是一个群众性组织，它从党内产生出政府。武汉时期，国民党左派组成的政府，在它还没有成为反革命，还允许我们进行工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支持这个政府的。如果我们在那时就建立苏维埃，那会意味着我们采取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直接走上推翻政府的道路，而这个政府是我们有责任予以支持并且应当予以支持的。

现在，当这个政府已转到反革命阵营以后，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方面，我们才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们那时必须作最后的努力把国民党的基层全部争取过来，推翻左派国民党上层的汪精卫，等等。我们当时所以发出这样的指示，因为在所有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组织中，如在农会、农民委员会、工会中我们都有极大的影响。所有这些组织都与国民党组织有联系，所以我们应当(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策略)提出“发动国民党左派基层组织反对上层集团”的口号。另一方面，我们那时应当清楚地看到在最近期间我们将面临的前景。也许拥有军事实力的敌人会转而对国民

党所有组织采取迅猛的全线攻击，使国民党成为我们再也无法利用的组织。有一些国民党省一级组织是共产党人或接近共产党的人领导的。这些委员会都被查封，委员们被绞死，尔后便指派其他委员会，任命一些反革命分子为领导人。这就叫国民党的“改组”。因此，不足为怪，当军事力量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中，当这支军事力量被用来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来不及发动国民党的群众通过选举来推翻国民党的上层集团。如果国民党彻底崩溃，那我们应作最后的尝试，发动国民党的基层反对其上层的。现在，所有国民党的优秀分子都将走苏维埃的道路，因为国民党组织正在分崩离析，因为很可能我们来不及发动左派国民党的基层来反对其上层的。这就是我们提出加强宣传苏维埃这一口号的原因，如果革命发展到高潮，那必须从宣传这个口号转为直接组织苏维埃，从而把这个口号变成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最迫切的口号。

必须这样地理解我们在最近时期提出的一些口号。

(录自《苏联报刊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第一辑，安徽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译)

对反对派的批评意见*

(1927年9月27日)

斯大林

现在谈谈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反对派最倒霉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这里胡扯的是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中谈到中

* 摘自1927年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

国的政策,但是他不肯承认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没有过任何路线,任何政策。反对派有过摇摆不定,有过犹豫不决,有过反复无常,但没有过任何路线。在关于中国的三个问题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问题、苏维埃问题和中國革命性质问题上,我们发生过争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反对派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过任何路线。

关于参加国民党问题。1926年4月,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赞成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决议后一个月,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为什么呢?因为被蒋介石的第一次袭击(1926年3月)所吓倒的反对派实际上是要求附和蒋介石,想使共产党人从中国各革命力量所进行的斗争中退出来。

但是反对派表面上说,他们要求退出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人不能够参加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而国民党不能不算是这样的组织。可是一年以后,1927年4月,反对派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难道国民党在1927年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了吗?这里有什么路线,哪怕是路线的影子呢?

关于苏维埃问题。在这方面,反对派也没有过确定的路线。1927年4月,一部分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组织苏维埃以推翻武汉国民党(托洛茨基)。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反对派也要求立即组织苏维埃,然而这是为了支持武汉国民党,不是为了推翻它(季诺维也夫)。这就叫做他们的路线!并且两部分反对派,托洛茨基也罢,季诺维也夫也罢,都要求组织苏维埃,同时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参加执政党。真是天晓得!要建立苏维埃,同时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执政党即参加国民党,——这种蠢事是再蠢的人也想不出来的。这也叫做路线!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共产国际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土地革命。而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的意

见怎样呢？他们对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过确定的意见。有时他们断言中国不能有土地革命，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封建制度；有时他们宣称中国可能有而且必须有土地革命，但是他们又不承认中国的封建残余有重大意义，这就教人不明白，既然如此，又从哪里来的土地革命呢；有时他们断言中国革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真是天晓得！

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几个争论问题上的所谓“路线”就是如此。

这不是路线，而是犹豫不决，一塌糊涂，完全没有路线。

这些人居然也来批评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立场！同志们，这岂不可笑吗？

托洛茨基在这里讲到了广东的革命运动，讲到了贺龙和叶挺的军队，责备我们似乎正在成立新的国民党来领导这个运动。我不来驳斥托洛茨基这种无中生有的诽谤。我只想谈南方革命运动的一切事件，如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从武汉出发，向广东挺进，同农民革命运动结合等等，——这一切事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发动的。托洛茨基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呢？如果他多少有些知识的话，他是应当知道这一点的。

如果这个运动获有进展，如果中国革命新的高涨成为事实，那末，谁来领导这个运动呢？当然是苏维埃。从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可是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获得进展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即使革命的国民党再次出现于舞台。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设想既可成立苏维埃，同时共产党人又可参加国民党。把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苏维埃的本性和使命。

(录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节录)

(1928年6月)

(四) 过去斗争的经验

一、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在相当的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呢?

我现在要说到下部分的问题,即关于过去的教训与机会主义的问题,在中共的许多真正机会主义错误之后,“机会主义”之名词,已成了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且造成了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同时对于所有一切不正确的意见,也加上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名词。我们知道,在真正作政治上的分析时,应与滥用名词和名实不符的说话奋斗。故中共的机会主义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比较确实说明一下的必要。

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以为首先应把关于中国革命在过去时期中一个策略的中心问题提来说一说。这个策略问题,照一般的说,是在中国革命相当的阶段上,能否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呢?或者是否因中共与受其指导的中国工人阶级曾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因为有这样的事实,所以才发生中共策略路线上根本错误,致使革命后来的各阶级都受这种错误的影响呢?这是第一个最普遍的问题,我以为对于这问题应有明确的回答。无产阶级政党可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以反对封建和反对外来的敌人呢?或者说这是不许可的;因为这可以埋没阶级性,因为这是违背阶级斗争的策略。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固然是民族资产阶级,但它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

仍是无产阶级。若果说是许可的，若果说有理由可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那末，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合作，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呢？这个问题在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中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也不是从中国革命时候起才发生的。这个问题在布尔什维克中曾经过激烈的讨论（战前，特别是在战时讨论得详细）。

很奇怪的，西欧工人运动中，我们右边来的敌人（即社会民主党），对于上一问题，拥护民族革命发展的可能问题，他们抱着不赞成的态度，且他们不赞成的理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很激进的。社会民主派曾屡次提出这样一些理由以反对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他们说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样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所以民族运动的时候，拥护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事情，不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反之，对于这样的民族运动，对于这种幼稚而按历史过程发展的资产阶级，应持中立的态度。就表面上看来，这个理由似乎是很激进的，似乎比我们平常对于这问题的解释，比我们平常的策略路线还左些。当然，社会民主派的注意点绝不是在这里，他们的注意点是在于拥护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正受着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威胁。英帝国主义首先就受着印度和中国民族运动的威胁，法帝国主义首先就受着亚非利加和安南民族运动的威胁。欧战时，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受了爱尔兰暴动的直接威胁。拥护和宣传“自己”资本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派，当然应该造出各种形色的理由，以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以拥护帝国主义国家组织之完善，提防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方面的武装自卫。社会民主派实际上的目的在于能直接帮助帝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他们对工人说：“你们不要拥护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因为无产阶级不应拥护资产阶级。”但同时，社会民主派却在自己的国家里很坚决拥护着“自己的”资产阶级。德国的社会民主派拥护德国的资产阶级，法国的

社会主义者拥护法国的资产阶级与法帝国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拥护大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总之，社会民主党人是拚命的坚决的拥护着最无廉耻最狡猾最侵略人家的资产阶级的。而在民族革命运动的时候，他们却说“拥护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这种手段，这种口调是很显明的。

布尔什维克却不是这样来观察问题的。他们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都应当用种种方法（直至用武装的援助）拥护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在这些时候，这种力量是破坏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因此，凡是真正革命的工人们都应该拥护这种运动。而骗人的社会民主派，实际上不过是拥护自己帝国主义的国家罢了。

布尔什维克对于这问题的态度是这样。我们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在领导这一运动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都应当拥护，但是并不是说，在各种情况和各种条件之下，都必须拥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不是在各种情况和各种条件之下都应该拥护民族资产阶级的。

民族革命的这一名词的本身，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观念，就拿现在中国的事来说吧，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反革命了，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他现在与帝国主义要妥协，也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不能说，这个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已毫不表示抵抗了。在某种情况之下，它是能够表示相当反抗的。近来中国的事件，一部分资产阶级已对日本表示相当的反抗，诚然不错，这种反抗是很没有力量的，它的前途，妥协的成分是多过于斗争的成分的，但这些都是表示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甚至在现在都还有彼此冲突和意见分歧的相当事实存在。然而任何一个健全思想的人也不能说，我们现在应该拥护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在上面所举的一例中，可比较容易了解我们不拥护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些条件。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是革命的斗

争。这种斗争是没有用丝毫革命方法来实行的，它甚至连革命的口号都没有。现在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提出“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它所提的口号，是妥协的口号，它没有向民众宣传“大家起来，把帝国主义从中国驱逐出去吧！”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宣传和鼓动完全依另一种形式来实行的。现在的资产阶级，并不准备与帝国主义作革命的斗争，这是一个事实。工人阶级应否拥护民族的社会集团呢？如果这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而言，并且如果这个民族资产阶级不与帝国主义者作真正的革命斗争，而与之妥协，如果这个资产阶级在这很多时候，尚且拥护那些帝国主义者以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农民——工人阶级应否拥护这样的民族的社会集团呢？很显明的，工人阶级对于这样集团万不能予以拥护。

第二个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问题，这里可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关系，这也是很明白的。甚至于半殖民地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它不许可工农群众的革命组织，如果它妨碍共产党建立工人阶级与农民的阶级组织，妨碍共产党作革命的宣传等事，那末，纵算它还在那里与帝国主义奋斗或半奋斗，工人阶级与其政党是不能拥护这种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否拥护民族资产阶级，要依两个主要条件来决定。如果某个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作反帝国主义的真正的革命斗争，如果这个资产阶级许可工人阶级有独立的革命组织，许可共产党有独立革命的存在，许可在广大群众中作宣传工作，许可共产党的行动独立，如果我们的党同时还有完满的自由以批评自己的同盟者——如果是这样，即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应拥护或可以与民族的革命资产阶级合作。在这些条件之下，重要点还在于我党的独立性，在于我党批评的自由，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自己的阶级任务明白了解。问题不是在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共产主义亦是民族联合战线的附庸工具。恰恰相反，我们共产党工人阶级

同意与资产阶级合作，为的是要在一定的时候，利用这一全部时机。按着自己的道路，经过相当的历史时期，再去反对资产阶级，反对那个在革命的相当阶段上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资产阶级。我们试问一问自己：“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相当时期内，曾经有没有允许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相当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呢？”我们回答：“曾经是有过的。”

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确有一个时期，曾经有过民族革命的作用。它曾经拿过武器在手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曾经拿过武器在手去反对封建势力，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它曾经抛弃与反革命合作的半封建派别，如反对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等的斗争，就是好例。很明显的，这种情形对于一般的政治局面，与斗争的一般结果上有过影响。我可以拿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即这一时期的完成阶段——北伐来说。虽然在北伐的时候已经表现了情形的转变，即资产阶级转变到反革命方面，但这个北伐却引起了群众的大动员。这个北伐引起了农民运动的大高涨，引起了工人运动的大高涨，促进了群众在思想上的大变动，使这些群众在自己生存的全部历史上第一次表现是一个一定的政治势力，头一次暴发起来，头一次建立了自己最大的群众组织，会员数目达数十百万，如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工会等等都是。

工人的政党，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是曾经能够存在的，并且他是一个完全力量独立存在的。

二、共产党以前加入国民党是否错误了呢？

这里可以提出第二问题，即能否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拥护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的附带问题，这问题就是：如果一般的说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可能拥护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那末共产党加入这一般的组织，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是否这是一最大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一错误上又发生了后来许多

机会主义的错误，最后促成了我党严重失败的根源呢？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因为我们的错误，不是在这里。我们的错误或中共的错误，不是在于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在那一个时候曾经是一个最特殊的政党，在共产党方面适当的正确的策略之下，对于国民党曾经可能把它完全改组，把地方上的群众组织收集到国民党中去，取得这些组织中的指导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广大无边的组织，同时在这个团体中努力的工作，且在革命的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与资产阶级中的左派激进分子联合战线。曾经可能把国民党这空葫芦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的民主激进分子来充实它。保证激进分子中的力量，同时扩大阶级运动的倾向，移动国民党组织内部的力量重心点，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们自己共产党力量的源泉。这种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这种希望是曾经完全切实的一种希望。但是这希望的现实，是曾经以共产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然而这种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产党方面却差得很远，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为什么共产党方面没有政治手腕的能力，我所谓没有政治手腕的能力是指什么呢？我所谓没有政治手段的能力，是指曾经存在于共产党内的三个最大的缺点，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三、机会主义的三种主要错误

（一）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

第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共产党缺乏独立性**。我们已说过，拥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一，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完满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首先要表现于什么呢？它首先应表现于我党的政治路线之明显，表现于我党的特殊政治面目，表现于我党的特殊的共产主义路线，表现于这样一个政治面目，这个政治面目又应表现于口号，要求，斗争的方法等。这个政治面目使政党成为一特殊的政党，不和其他的团体的政党一样。这个政党在群众面前应表

现自己这一特殊的，单独的，有自己特殊的阶级任务，自己特殊的政治面目。此外，这个独立性还渐表现于一点，就是党对于自己的同盟者，甚至对自己最接近的同盟者，时时持着批评的态度，党对于自己的同盟者说：“我是在某种某种条件之下拥护你的，我与你在一块作一件共同的事情，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的，是在这样的范围之内的，如果你动摇起来，我就要无情的批评你；如果你要中途不进，我就要舍弃你；如果你要作离开我们共同目标的事情，我就把你看作是卑鄙污浊的东西，开始作反对你的争斗。”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有结合政治同盟的可能。我们曾经屡次走过这种道路。我可把俄国布尔塞维克党来作证，这个党有些时候，甚至曾与孟雪维克在一个党里，但它没有特别加入过人家共同的政党。我党在1912年前是与孟雪维克在一个共同的党的。我党曾与孟雪维克合作（虽然不是共同在一个党里）经过1905年的革命，两派分裂后的联合代表大会是在1906年开始的，即十二月暴动（1905）失败后开始的。我们曾经过或分或合的时期。但我党曾经明显的认识孟雪维克这个敌人（即党里的另一派别）是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当我们甚至与孟雪维克在一党（社会民主工党）里的时候，我们是曾经时刻保持着自己批评的自由的。我们曾经数次与他种政团作政治上的联合，我们在十月革命中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但我们没有一次拒绝批评自己最接近的同盟者之动摇，徘徊，不彻底和不正确的倾向。固然，我们曾与这些同盟者缔结这种或那种政治上的协调。因此，我党永远曾有过自己的政治面目，自己的政治特殊路线。它在群众面前说话时，是一个特殊的政党。

在中国是否也遵守过这个条件呢？没有遵守的。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在武汉时期，或武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没有充分坚固的政治面目。固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鲍罗庭也在内）在这一点上要负很大一部的责任，不过这是另一问题，我等

一回还要讲到的，但事实是说我党没有过充分的独立性，对于国民党这个同盟者很少批评的态度。不特如此，而且常常把自己的政治路线来屈从于自己的同盟者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时期中之政策最主要的一个根本错误。

(二) 不了解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

第二个最大的政治上的错误（这个错误直至与武汉政府分裂为止，其后也有过）是**不了解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从一个政治和策略口号到另一政治和策略口号的过渡。如果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能与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合作，那末，从最初起就己很明显，情形并不是永远不变的。群众即将起来，运动即将扩大，农民运动即将高涨，革命即将发展到必然的爆发，那末，必将发生有力的重新汇合。关于这一点，在共产国际适当的训令中与扩大会议的决议中，不知说过几次了。

很明显的，当我们自己预先看见从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时，当我们自己预先看见我们的同盟者明天就要成为我们的敌人时，我们对于这个已经预见的危险，不仅应当用适当的方法，计划力量以图防止，而且应当积极的准备起来，以走上这个转变的关头。我们应当看见我们的同盟者明天就要成为我们的敌人时，即应当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过渡时间内，配好自己的力量，围住敌人，采取防卫的办法，准备进攻，俾不致受敌人的“出其不意”的攻击。我们应当事先准备反攻的力量，俾能在这个过渡的阶段上得着胜利。在中国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与同盟者或半同盟者的关系是很不稳固的，这个同盟者明天就可变为敌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战斗能力，党的迅速转变方针的技能是战胜敌人或保存势力（至小的损失）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这一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最后叛变的前夜，和武汉政府变到反革命方面的前夜，都没有的。中国共产党那时没有对于转变的了解，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以图反攻。甚至已明了看出敌人正在开始攻击，而

要与敌人作抵抗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却只是谭平山式的那种退出武汉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是最可耻的一种文件。因为本应该说：你们已是卑鄙的东西，我们要和你们决裂，要向你们宣布无情的战争了。本应预先采取办法，配好自己的力量，俾敌人不至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来攻击我们。但谭平山没有这样做，只声明说：我去了，因为生病不能维持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对于谭平山这种行为，不是当时中央的一切同志都应负责的，但是，在那个历史的阶段上，和上海暴动的前夜，与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的前夜，党在指导上一般的路线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类似的例证，还可举出许多来，证明那时党的指导不了解由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没有预先采取适当的办法，没有准备党的群众走上这个转变，为事变弄到慌忙了，舵从手里失落了，而一部分同志也来发通电，采取谭平山那种策略上的办法，其后更按照那条策略上的道路继续的走下去了。

这就是第二个主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所在，这个错误我名之为由一阶段到另一阶段转变的不了解，对于党必须积极的准备走进下一阶段的不了解，对于政治手腕必要等等的不了解。

(三) 党没有成为广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

第三个错误是与上面两个错误有联系的，就是**党在政局转变的时候，在最扼要的时候，没有成为扩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反而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这一点首先即关系于土地革命，同样也关系于城市的工人运动。如果要把民族统一战线划分开来，或把我们的党与工农群众划分开来，那末，那种对于我们是比较危险些呢？那种对于我们比较好些呢？很明显的，革命的发展需要群众一天多似一天的动员起来，就是说革命的发展，要使我们与我们那个临时同盟者的联合发生危险。这个同盟者之所以为临时的，就是因为它阻止群众运动的更大的发展。

如果这个临时的联合要以阻止群众运动发展为条件，那末，我

们就应把这种联合抛到九霄云外去。因为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于团结群众，吸引他们参加运动，以最大的努力来发展广大的群众运动，这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要尽可能的歼除封建的力量，肃清封建残余。如果不使广大的群众加入革命运动，怎么可以打倒封建势力呢？如果一切民众不起来，广大的平民群众不起来，那怎么可以打倒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呢？很明了的，运动的发展一达到这样的程度时，便不仅应牺牲那个临时的同盟者（在这里也无所谓牺牲），并应发展群众运动，因为发展群众运动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党的指导在武汉时期以前，特别在武汉时期内，作出了几个很明显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我们简直没有法子来解释，如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征服长沙（谭平山那时要到长沙弹压农民暴动）等都是。这简直是一种纯粹社会民主派的政策。因为在取得政权前，工人政党的代表公然出马以压服那所谓“意外的事变”。这是第三个政治错误，或正确点说，是一个全盘的政治路线的错误。

这三个主要的根本错误是：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不了解由这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转变，阻碍了各方发展的群众运动。从这三个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或正确点说，从这三个机会主义的路线出发，便形成了一贯的机会主义的策略上的系统。

我再要严重的说一句，就是我们派出的代表，这些代表中首先就是鲍罗庭，是有许许多多过错的。这些过错首先就是在于把我们这里寄到中国的训令没有告诉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我们曾检查过这回事，这是绝对的事实，但当然不能把这点来解释一切。这里当然还有某种深切的根源，致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从客观方面来观察，从中国现在的阶级力量来观察，从中共本身及其指导人材方面来观察，那末，我们要说，这里表现了一种相当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的影响。但是从这点却不

可作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把指导中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若果这样，是一种绝对的笑话。有些很好的知识分子是革命运动时所绝对需要的，那种对于每个知识分子的乱骂，对于知识阶级的一味非难，工人运动中是不能许可的，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在特殊的中国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还在长大的时候，他自身是从民族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的许多负指导工作的同志都是从左派资产阶级学生运动中出身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仅仅开始萌芽，在这些特殊条件之下，当然造成了这种情形，就是指导分子的社会成分，依自己的社会联系与生长，都曾经与那些左派知识分子的阶层很接近。指导分子中曾经表现得差不多完全没有理论上的认识，没有相当的经验，党还十分幼稚，它不得不经过了特种严厉的条件，以补充锻炼上述的缺乏。

俄国的布尔塞维克党获有西欧的经验，它在理论上获有多量的知识与精华。这是在中国所没有的。中国的党需要严厉的经验，使党触着一定的政治路线，来建立一个确定的政治主张。

四、总结

我要结束报告的一部分了，现在且来总结一下。

中共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错误不是在于共产党在一个时候曾经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也不在于共产党曾经加入国民党一般的组织，成为其组成的一部分。这些错误是在于中共没有充分的独立，在于它要批评自己同盟者的时候没有批评，在于它没有了解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转变，没有准备群众走上这些转变，刚刚相反，它有时候曾作了完全不可许可的事情，就是障碍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没有把自己成为一个发展工农群众的因子，反而成了一个阻碍这个运动的因子。这些深刻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少数当过我们同志的人走到了政治破产的地位，例如谭平山等，现在所谓第三党的一部分人都是。但是叛党的人，离

开了革命的群众运动，拿最大失败和机会主义错误的代价，只不过是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如果党曾经有一正确的策略上的主张，那么实际上将怎样呢？我们绝对不能否认说，没有这些大的错误，在客观力量对比之下，甚至有正确的策略，我们或者也遭了大失败。1905年的俄国党曾有正确的策略，但也遭了大的失败，因为那时客观力量的对比是如此，因为工人起来罢工，农民没有起来，以致不能支持，且不可以支持。到工人们被击破的时候，农民运动却起来了，工人与农民运动的分离，致1905年俄国革命中我党和其他一切的革命集团都遭了失败。

或者中国在另一种策略之下也要遭失败，这是很难说的，这里只能提出一种理论上的推论。或者在正确的策略下也要失败，因为无论如何，那时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帝国主义国家可集合充分数量的大炮以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但有一点是无疑义的，即在这种场合之下，我们的党从失败中跑出来，要比从现在的失败中跑出来较巩固些，我们的主张比较要明显些，群众所处的情况比较现在所处的情况要好些。因为他们可以明白运动的目的与道路，而这些道路是不明显的，蒙混的，甚至连我们自己党的党员现在对于这些道路都还不明白。这是要明显指出的。如果我们能正确的运用政治手腕，那我们就应该怎样办呢？当资产阶级拿武器来反对封建势力的时候，则拥护资产阶级，同时要批评资产阶级之不彻底性，暴露其弱点，自己则把较好的分子都聚集到共产党里来，建立我们的机关报，依我们自己特殊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说话。拥护国民党，但同时要批评国民党，在由这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同盟者要作更紧张的批评，把自己的人要多量的送到国民党中去，训练他们，教育他们，予他们以一定的口号。当你看见敌人在那里转到别方面去时，就要和他宣战，或者把自己的军队整个的从战场上退出来，但不是被破坏了而退出

来的军队，而是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有一定政治思想，使自己的军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阶段上都不会成为国民党的尾巴，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群众革命运动的障碍物。这样一来，我们的结果便完全是两样了。

我要再三的说，主要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于共产党缺乏独立性，在于不明了由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转变，在于障碍群众的革命运动。

同志们，我们已分析了过去历史时期中中央最主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所在，机会主义根源之所在。这些问题在现时说来只有间接关系，这些问题都是过去的问题了。

拿现在的资产阶级来说，是连要不要与他合作和能否与他合作的问题都没有了。资产阶级及其最激进的派别，如汪精卫等，都已最后的变到反革命的营垒方面去了。因此，很明显的，对于现在的时期，尤其是将来的时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就是：资产阶级已是我们的敌人。打倒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是中共与中国工人阶级最必须的任务。这问题我们已说过了，用不着再讨论。

(录自《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
在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

——它给东方各国及全共产国际的教训

(1928年6月8日)

托洛茨基

因为分析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错误及其趋势,而最后便形成了布尔塞维克,孟雪维克,德国的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分析中国革命的经验,现在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同样的意义,但此种分析现在不惟没有开始,且在被严禁之列。官场的文章只是仓猝的列举些事实,硬去适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其企图之全无价值已显而易见。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力求截断中国问题之重要部分,而在基本原则下仍继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错误路线。最伟大的历史过程放弃不去分析,而我们看见的,还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系统的文章。

一 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本质

纲领草案中说:“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妥协,仅在民族资产阶级不妨碍工农革命组织和它能进行真正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之下才可以的。”此种意见虽然是预先想好将它排于附带词句之列,实际上,这是纲领草案中心的主张之一,至少对于东方各国是如此。草案中主要词句当然是说:“将工农从民族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解放出来”,然而我们不是讨论修辞学,而是讨论政治,而是依据经验来讨论政治。因此我们说:主要的词句此地只是附带的,而附带的词句正是最主要的。概括言之纲领中的这个意见是最模范式的孟雪维克主义,对于东方的无产阶级恰是一条绞绳。

此地所说的“暂时妥协”，是什么一种意思呢？在政治界亦如在自然界一样，一切都是“暂时”的，或者此地所说的是临时发生的某种事件中单纯的实际协定吗？对于这些有某种固定的目的，范围极狭，纯粹事务性的协定，我们自然不能预先反对，例如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或与中国商人合作救济租界罢工的工人等等，如此的事件虽在中国的将来亦非例外，但在此地为什么要有一个一般的政治条件：“在民族资产阶级不妨碍工农的革命组织和它能真正的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呢？一切与资产阶级成立个别的实际的事务的和有一定时效的协定之唯一条件，就是无论直接间接一时一刻都不能混乱组织，混乱旗帜，须将红色与蓝色分开，丝毫也不要相信似乎资产阶级真正会准备或者能够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不妨碍工农。在事务的实际的协定上，我们完全用不着此种条件。此种条件只是有害无益，妨碍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之总路线。此种斗争，即在协定的最短期间内亦不应该停止。早已有人说过：单纯的实际协定，如果人家丝毫不来束缚我们，在政治上亦丝毫不来限制我们，只有当时于我们有利，我们与魔鬼亦可以缔结。然若因此要求魔鬼可由此而变为基督教徒，不用他的角来反对工农而实行善事，这便是十分的荒谬。若我们依据这种条件行动，实际上便是为了魔鬼作保镖和请他做基督教的天使。

纲领草案既用这种荒谬的条件去掩饰资产阶级，所以他们说的很明了清楚是长期的政治联盟（虽然他们将此种意思放在外交的不重要的附带词句之列），而非短时期的，某次的或为某实际问题的事务性的协定。然而这种要求资产阶级的“真正”斗争而且“不妨碍”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否我们向资产阶级提出这些条件要求它公开的表示呢？这已不知有过若干次！资产阶级甚至派遣代表来莫斯科加入农民国际，以国民党资格参列共产国际，光顾职工国际。一言以蔽之，应允它一切，使它能在我们帮助之下，更

容易的更完全的欺骗本国的工农，蒙蔽工农的耳目，直到第一次的上海惨剧。

或者此条件的意思，是要资产阶级方面作此种政治的表示（我们重复的说：此种政治表示若能将我们变作他们在群众面前的保人，他们自然甘愿且不吝惜的）吗？或者此地所说的是对某民族资产阶级“客观的”“科学的”估量，事先对他们的潜伏的“真正斗争”和“不妨碍”的能力施行一种社会学上的测验吗？看呵！新鲜的经验告诉我们，此种事先测验的专门家，事实上自己变成了蠢才。倘若单是他们是蠢才，倒还不甚紧要呵！

无疑义的，此地所指实质上是长期的政治联盟。至于一事件之实际协定，这用不着在党的纲领上来规定，只在目前任务的策略的决议案上规定已足了。此地所以这样写的，是想宽恕昔日对国民党的政策，而要在纲领上替这个政策加一重保障，这个政策已断送了中国的第二次的革命，而且还要不止一次的断送。

布哈林（草案的真正起草人）的思想正是寄托在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真正斗争”和“不妨碍”的整个估量之上。这种动力照他的意见不是出于资产阶级本身的意愿而是依据于“社会学的”体系，换言之，即十足的学院主义的和特为机会主义主张而立的一个机械系统。

为要更明显证明此点起见，我们在下面征引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估量。在引证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内容和列宁主张（引证是完全不合的）以后，布哈林说：“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几年的（非几月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很大的在客观上的革命作用，但是以后，它便枯竭了，这完全与俄国1905年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变化无常，不可以同日而语。”这段话自头到尾完全是错误的。

列宁曾经再三的申说，要将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同压迫人的资产阶级国家分别清楚。从这里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例

如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战争的态度。若是由一个和平主义者看来，这种战争同其他战争没有什么分别，但是由一个共产党员看来，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战争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列宁特别是在1905年以前提高民族解放运动，被压迫民族的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或战争，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置于同一的水平线上；但是列宁从不曾像如今的布哈林一样，将民族的解放战争置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上去，布哈林将角度转移到过一百八十度的地位去了。列宁再三申说，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清楚；但是列宁从来不曾且从来不会发这样的问题：仿佛在实行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要比非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来得进步些革命些。理论上既说不过去，而在历史事实上亦未能证明。不论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如何的可怜，不管他的左半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孟雪维克是如何的混杂，但终究不能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俄国的革命些或是高超些。

以为殖民地的受压迫，必然要发生一个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了解就是留恋于孟雪维克主义的基本错误；孟雪维克以为俄国的资产阶级完全是革命的，因为它受了专制的封建的压迫。

资产阶级的本质及其政策问题，须视进行革命斗争之所在国家的整个阶级内部构造情形；斗争发展之历史时代；民族资产阶级对整个或部分的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依赖程度；最后（而且是主要的）须视该国无产阶级的活动，及其与世界革命的联系等情形而决定。

民主的或是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可以给资产阶级以扩大或加深其剥削的机会。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独立的行动则有恐吓资产阶级并消灭其任何剥削之可能。

让我们来看几个事实。现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不断的反复的

说：蒋介石实行过“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而克伦茨基（俄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主席——译者）是同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的，所以应该反对克伦茨基，而帮助蒋介石。

克伦茨基与帝国主义之联合是毫无疑问的，或者更回溯从前可以指出来说：俄国资产阶级“推倒”尼古拉第二（俄专制沙皇——译者）是得了英法帝国主义赞助的。不但是米留可夫克伦茨基帮助了路易乔治与普因凯尔（大战时代法国的内阁总理——译者）的战争，并且路易乔治与普因凯尔亦帮助了克伦茨基与米留可夫的革命，起初反对沙皇，继而反对工人农民，这些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1911年中国已经过了“二月”革命，这一次的革命是在帝国主义者直接参加之下成立的，但确是一个进步的伟大的事件。孙中山在他的“孙文学说”最后一章上曾经写到他的组织如何的依赖日本法美的帮助。固然，1917年克伦茨基主张继续的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但中国的“民族”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曾拥护过威尔逊（美国当时总统）参加欧战的主张，企图籍此得到协约国的帮助以解放中国。1918年孙中山对协约国政府宣布其国际发展中国的实业计划，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理由可以说：中国资产阶级反满清的斗争比俄国资产阶级在反沙皇斗争中之表现实际上要革命些；或者说：仿佛蒋介石与克伦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中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于是共产国际执委说，蒋介石总实行过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样的想象，简直是愚鲁的隐蔽了一切事实。蒋介石曾进行过反军阀即反某一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战争，但与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完全不是一件事。这一点，连谭平山都懂得的。谭平山在其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1926年末）曾以下列的话说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的策略：

“在外交政策上，他只有完全消极的态度……他愿意只同英帝国主义斗争，至于日本帝国主义，他在某种情形之下，是准备同

它妥协的。”(大会记录第1卷406页)

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在最初本就不是革命的，而是纯然妥协的。赶走或打倒某个帝国主义的经纪人，而回头来便同某几个帝国主义者妥协，缔结比较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条约。国民党的希望仅止如此。

但是这种观察问题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只估量某一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一般的态度，而应估量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对于该国历史任务的态度。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压迫他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推翻农奴制的沙皇，在旧俄是一个进步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同对工人农民的态度上，并不见得比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同工人农民的态度上要革命些，或者也可说中国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反动，还要下贱。我们只能这样的观察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是很实际的，并且很能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面目，它知道假如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时，则必定要提高革命的群众，这首先便是对它本身利益的一个危险威胁。假如推翻满清的斗争比较推翻沙皇是历史上的一个较小的任务时，则现在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便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了。假如我们在开始活动时，告诉了俄国的工人，叫他们不要相信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能够推翻沙皇制度，打倒封建势力；那末，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工人面前，从最初的时候起，即应不放弃宣传这种不信任的精神。斯大林布哈林所宣称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内在”革命性之绝对错误的论调，这不过是将孟雪维克主义翻译成中文用到中国政治上去，其结果只是在中国被压迫的地位上，帮助中国资产阶级，于国内政治舞台上更增一重力量，以反对受三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

但是纲领草案起草人斯大林布哈林说：蒋介石北伐曾唤起了强大的群众运动。这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哥起可夫和布希尔夫，将尼古拉第二的退位书带到彼得格勒时，这个事件不也是引起了革命的作用吗？不也是唤起了那些饱受践踏的群众吗？昨日还是一个劳动派的克伦茨基，忽然变成了内阁总理兼总司令，这个事实不也是唤起了士兵群众吗？这个事实不也是引起他们去开会吗？不也是引起农村中反对地主吗？这样的问题可以更广泛的提出来：资本主义所有一切的工作不是唤醒过群众吗？他不是如共产党宣言内所说的一样，将他们从农村生活的痴态中引导出来吗？他不是调动无产阶级队伍于斗争的舞台中去吗？难道我们因一般的对于资本主义客观作用的估计，因为见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行动，就改变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行动之积极的阶级的和革命的态度吗？机会主义的政策，总是以这种非辩证法的，保守的尾巴主义的“客观主义”作基础；而马克思主义者则非指出以下的事实不可：就是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愈能保持它的独立，若它对资产阶级愈能戒备，不替资产阶级粉饰，不过分的估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与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和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则由革命所得的结果（这是资产阶级无可奈何的）才更充分，更坚决，更无可疑义而更不易动摇。

无论理论上，历史上，或者是政治上，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估量，是经不起批评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了纲领草案所采用的估量，恰好就是布哈林的。

*

*

*

一个未发现和没纠正过来的错误，时常引起以后的错误，或者是准备其他错误的发生。若是昨天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算在革命的统一战线里面，则今天确已宣布它“完全跑到反革命方面去了”！我们很容易的看出这样的说法，是如何没有根据，完全是一种官样的文章，一丝一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营垒，完全不是偶然的，轻率的，而是受了阶级利益压迫，这是非常明了的。随后因惧怕群众之故，资产阶级就逐渐离开革命，公然表现其对革命宿怀的敌意。但是资产阶级完全彻底的转入反革命的营垒中，即是不需要再“拥护”革命或与革命周旋应酬，只有在它以革命的或其他如俾斯马克的方法，满足其基本的阶级需要以后。

这里我们试回想起 1848 年到 1871 年的历史。我们试回想起俄国资产阶级之公然叛变 1905 年革命，其原因就是在于它在革命中得了国会，这就是说它得了机会直接可以去影响官僚阶级与之谈判和妥协。但到了 1914 年到 1917 年大战争，证明这个统治制度无力保证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时，资产阶级又转过头来，且比 1905 年还要突然些的转到革命方面来。

可不可以认为 1925—1927 年的中国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基本利益已经局部的满足了呢？没有。中国像 1925 年前一样距离全国的真正统一和关税自主尚远；至于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保护此市场以抵制廉价的外货竞争，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死的需要，其意义仅亚于维持着对于无产阶级及贫农的统治的问题。另一方面，英日的资产阶级也需要维持中国使其成为一个殖民地的国家，此种需要等于中国资产阶级需要求得经济之独立。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倾向于左的政策。对于那些喜欢联合战线的人们将来还有许多引诱的机会。如果今天告诉中国共产党员说：1924—1927 年，你们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完全是正确的，但现在它已经彻底的跑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了，所以现在不适用了。这种说法，完全是于将来客观的环境转变及资产阶级的必然左倾的状况中，将要第二次解除中国共产党之武装（即是使我们无法应付将来再向左转的资产阶级）。蒋介石现在所实行的北伐战争（他叛变以后的北伐——译者），亦已经充分的推翻纲领起草人的机械系统了。

假如我们还记得沙皇时代的俄国是一个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的一个混合物,这就是说它包含大俄罗斯人同其他许多民族,在这些许多民族人当中,有许多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情形,——假如我们记得这个事实,国际路线原则上的错误将证明得更明白,确切。列宁不只是要求极力注意沙皇时代的俄国各民族的民族问题甚至于——反对当时的布哈林及其他人——认宗主国的无产阶级的天职,为帮助被压迫民族的自决运动,以至于使他们与宗主国脱离。然而党是否因此就得出结论说:这些被沙俄压迫的民族如波兰,乌克兰,鞑靼,犹太,亚门尼亚等——的资产阶级比俄国的资产阶级要进步些,激烈些,革命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波兰的资产阶级虽然是受沙皇专制的和民族的压迫,确实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反动些。在国会里不是倾向立宪民主党而是倾向于更反动的“十月党”。这些事实在鞑靼的资产阶级中也是一样的。犹太人虽然毫无条件的受压迫,然而他们的资产阶级比俄国的资产阶级更懦弱反动与卑劣,或者爱司多尼亚,列多尼亚,乔治亚,亚门尼亚的资产阶级比大俄国的会革命些么?我们怎样能忘记这些历史的教训呢?

或者事后我们应该宣布布尔塞维克主义当时是错误的吗?因为它号召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沙皇下被压迫殖民地的人民,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尚在开始时,即要与其他阶级脱离组织的关系,而建立一个工人独立的阶级组织;不但是彻底与自由资产阶级的组织上分立,并且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分立,要在与他们的斗争中,夺取工人阶级并经过工人夺取对农民的影响,——布尔塞维克是这样的来反对犹太工人联合会(资产阶级的御用机关)与波兰的社会党,难道当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吗?难道当时我们是超过了在同这些被压迫民族以及最落后民族的关系上的国民党式的发展吗?当时若要造出一种理论说波兰社会党与犹太工人联合会,因为是反对专制与民族压迫,所以

是各阶级联合的必须的“特殊”形式之组织，是如何的容易。这些历史的教训怎么忘记了呢？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中国三年来事件以前已经很明显的可以看出——现在就是一个瞎子也明白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内部生活上是一个直接的因素。这使中国的米留可夫与中国的克伦茨基结果比俄国的还要卑贱！我们党第一次宣言中便宣布：愈走到东方，资产阶级愈是卑贱，其作用也愈是微小，而无产阶级的责任愈是重大，——这完全不是无意义的。这一个历史的“定律”可以完全应用到中国去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以工人应该帮助资产阶级——这是取消派营垒中毫不中用的政客们这样说的。我们的革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工人应该揭示于人民的眼前，叫他们当心资产阶级的欺骗，告诉他们不要相信资产阶级政客，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武装——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说的。”（《列宁全集》14卷上部2页）

列宁这个指示，整个东方是必须遵守的，无论怎样应该置于共产国际的纲领中。

二 中国革命的阶段

国民党在第一个时期是在所谓“四个阶级联合”的招牌掩饰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着党。第二时期是蒋介石叛变之后中国克伦茨基“独立”统治的试验时期。假如说俄国民粹派与孟雪维克的短命的“专政”是采用一种公开的两重政权的形式，则中国的“革命民主派”的专政还没有成熟到这步田地。因为历史是不能预先定做的，那末，我们可以说除了1925年之国民党专政外，就不会再有“民主专政”了。无论在将来最近时期中，国民党能维持半统一的中国，或者重新分裂瓦解，都是如此。革命的发展，已使其他各阶级消竭了他们的能力，紧接着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

引导被压迫的城市乡村的无数百万贫困人民。但正当此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却提出一个民主的（即资产阶级民主的）工农专政的口号来了。广州的暴动，便给了这个不正确的口号一个回答。广州暴动虽有其时期不成熟和领导者的冒险等缺点，然而开辟着一个新的时期，更确切点说：开始了中国的将来的第三次革命。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加以研究。

领袖们企图隐蔽自己过去的罪恶，乃顶奇怪的于去年年底去勉强加速事变之发展，于是有广州的“流产”。虽然即是一个“流产”，也可以将母亲的机体与胎产的过程予我们以许多的教训。广州事件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之伟大的理论的重要意义，便是我们在这里将大规模的运动经过了一次试验室中的试验，这是在历史上及政治上少见的事实。我们为此费了巨大的代价，因而我们更须仔细的理解其教训。

广州暴动的战斗口号之一，如《真理报》（俄党报）第31期所述，便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标志都被扯碎践踏了。然而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汪精卫叛变以后（他们不是叛变了他们的阶级而是叛变了我们的幻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犹堂皇宣言曰：“我们将不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广州工人则禁止了国民党，宣布国民党各派都是非法的。这就是说要根本的解决民族的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没有产生一种政治力量或政党或政治派别，使无产阶级的政党可以与之携手合作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问题的关键在此：就是领导贫农运动的任务已经完完全全的落在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肩上了。而要真正解决革命的任务，必须集中一切政权于无产阶级的手里。

关于短命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真理报》的记载说：“为工人的利益起见，广州苏维埃命令宣布由工人的工厂委员会来监督工厂，并将大工厂，交通机关，银行等等收归国有。”

以外还有些办法，如：“没收大资产阶级的房舍供工人使用

……。”

当时广州工人取得了政权，而政府是真正属于共产党。新政权的政纲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在广州一般都存在的），不仅工人监督工厂，而且还要将大工厂交通机关和银行收归国有，更要没收资产阶级的房舍及其财产以利劳动者。现在我们试问一下：假定这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方法，那末将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又是怎样的呢？虽然共产国际训令并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虽然广州比较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中心区域更带小资产阶级性，然而革命潮流一趋于反对国民党，则自然要走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其初步就因为受了情势的压迫，使它不能不采取比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时更激进的办法与手段。这种事实，虽然其外表为难解，而实际上乃是由于中国社会关系与其整个革命发展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结果。

大中地主（按中国的规模）与城市资本（外国资本也在内）是有最密切关系的。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主阶级。农村中的一般的最广泛的而极残酷的剥削者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即城市银行资本的经纪人；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封建的同时亦是反资产阶级的性质。我们的十月革命的初期是富农中农贫农携手前进反对封建的地主，甚至有些地方，是富农领导。这在中国是不会发生，或者差不多不会发生的。土地革命在起初发展时将不仅是反对几个真正地主或官僚之暴动而已，更要反对富农与高利贷者。假如贫农委员会在俄国仅在十月革命之第二时期1918年中发生，在中国则土地革命只要一进展，贫农委员会就得采取各种方式而发现。铲除富农将在中国十月革命之初期，而不要等到第二期了。

然而土地革命不是中国现在历史斗争之唯一内容：最极端的土地革命，如平分土地（自然共产党要拥护它到底）其本身仍不是经济的出路。现在中国所紧要的，就是要有国家统一与经济独

立，就是关税自主，或更正确些说：对外贸易的独占。这对于中国即表示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因为中国现在仍是帝国主义财富的主要来源及生存之资料，并且也是今日之欧洲明日之美洲资本主义内部爆裂危险之保险的活塞。这就是决定中国民众将来参加的斗争，范围非常伟大，争斗非常紧张，而且今日凡参加过革命的人们已感觉到斗争潮流的深度。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有非常的作用与影响。在防卫其强盗式侵略中，帝国主义直接依靠它自己本国的枪炮，此种情形使工人监督生产之政纲在中国甚至比俄国尚少真实性。直接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因而及于本国资本家的企业的事实，在其斗争的进程中多半将在暴动胜利之翌日举行。

发动俄国革命（十月）之客观社会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将以更复杂的剧烈形式表演出来。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相互敌对，就一般可能讲，将要比俄国当时为更不可能调和之状况，因为在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是直接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的工具相勾结，而在他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在其最初已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建立了关系。中国农民之成分比俄国占更大的数量，然而受国际的冲突矛盾所挤压（他的命运须依此冲突之向那方面解决而定），使中国农民比俄国农民还更少领导作用的能力。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预言，而是各方面都已经完完全全证明的事实了。

这个根本的不可争的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不仅是证明民主专政的公式已经寿终正寝，而且这第三次革命（虽然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些）连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1917年11月—1918年7月），而将于开始时就要坚决的动摇，而且推翻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

自然这样远景的观察，是和那些诡辩的学院的及机械系统的对经济与政治间相互关系的观念（即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译者），不相符合。这种远景的观

察与旧日成见之不相符合，曾受了十月革命一次利害的打击，现在此等成见又重新复活坚固起来。然而负此不符合的责任者，不应该是“托洛斯基主义”，而应是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此地的情形正用得着这种规律。

假使认为中国共产党于1925—1927年当中，能按照布尔塞维克政策进行，就一定会得到政权，这自然是不聪明的迂腐先生之论。然而假如说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这也是可怜的庸俗之见。工农的群众运动之激剧及统治阶级的崩溃，为取得政权，是十分够了。民族资产阶级派遣他们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等到莫斯科，并经胡汉民之手来扣共产国际的门，正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民众面前表露出非常薄弱，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而想找到保险者。假使我们不推着工农群众跟着民族资产阶级后面，则工农决不会跟着他们后面走。假如第三国际采取稍为正确点的政策时（站在共产党夺取群众的出发点上），中国无产阶级必拥护共产党，而农民战争将必然援助中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这是可预先断定的。

假如我们在北伐开始的时期，即在已“解放”的区域中组织起苏维埃（而群众得以其全力为此而斗争），则我们已得到必要的基础及革命的起点，我们已得到农民暴动团结于我们的周围，我们将已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将已瓦解了敌人的军队。则虽然中国共产党尚为幼稚，如得到共产国际正确的指导，将于此非常时机迅速的成熟，而取得政权，虽不能即时得着全中国，至少可以占领大部分的区域。最主要的我们当时要有一个有力的政党。

然而，在领导上却发生了一种怪现象，简直是历史的悲剧，他们用苏联，布尔塞维克的党和共产国际的威权，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共产国际将列宁最基本政策，蹂躏践踏，并将幼稚的中国共产党折筋断骨，遂使中国的克伦茨基压倒了布尔塞维克而取得胜利。然后中国的米留可夫战胜了克伦茨基。继而日本美

国帝国主义又战胜了中国的米留可夫。

中国从1925年—1927年间所发生事体的意义尽在于此。

三 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的扩大会议，关于在中国的经验（广州暴动也在内）作如何的估计呢？如何的指出其将来的前途呢？成为纲领草案中关于此问题之关键的二月扩大会议（1928年）对于中国革命这样说：

“认中国革命为‘不断革命’性是错误的（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的主张），主张跳过（！）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同时（！）估量革命为‘不断’性的革命的倾向，正与1905年托洛斯基所犯的错误的是一样的。（？）”（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

自从列宁离开领导地位以后，即从1923年以后，共产国际理论上主要生命，就是反对所谓“托洛斯基主义”，特别是“不断革命论”。在主要的中国革命问题当中，何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甚至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特别是受共产国际训令的领袖，都陷入这样的错误（为改正此错误，已有几百人被充军于西北利亚或监禁在狱中）？！为中国革命问题而争论，已经二年有半了。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旧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之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在当时是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无疵的。鼎鼎大名的谭平山于全体鼓掌之下，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大声的说：

“当托洛斯基主义初次表现时，中国共产党及共产青年团即刻就全体一致通过决议案来坚决反对托洛斯基主义。”（记录205页）

虽然有这种“成绩”，然而当事变展开其悲哀逻辑，引起革命始而遭第一次失败，继而遭第二次更惨的失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在24小时内从模范领袖而改称为孟雪维克并予以撤

换了。同时又宣言新的领导是完全代表共产国际路线。然而当着第一二次严重探试到来时，原来中国共产党新中央又错误了，它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实际上已经采取了所谓“不断革命”理论了。站在此观点上，更有共产国际代表。这种可惊奇而不能信的事实，只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与革命的实际变化间显然有剪刀式的“参差”。

我们在这里并不谈关于1924年拿出1905年的“不断革命”的神话来混乱黑白的情形。我们只限于分析为什么这种神话反映到中国问题上来。二月决议案的第一节（上面我们已引出其中一段）陈述其反对所谓“不断革命”论的理由说：

“中国革命目前阶段是民主革命的阶段；不论从经济的观点看来（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从反帝国主义民族斗争的观点看来（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从政权的阶级性的观点看来（工农专政），中国的民主革命都未完成。”

这种说法，充满了错误和矛盾。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告诉过我们，必须保证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这只有革命不停留在仅解决民主的任务，而要从这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才能够达到。这就是说必须不断的发展下去，才可以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论”的意义。怎么能一方面说中国革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而另一方面却又否认革命的不断性质呢？然而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解释说：不论从土地革命的观点，民族独立反帝国主义的观点看来，革命都没有完成，因此而有现在中国革命的时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结论。实际上，“现时阶段”是反革命的阶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似乎要说新的革命阶段即中国第三次革命，根据1925—1927年第二次革命既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亦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所以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是这样的解辩，这样的判断，是完全由于不明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

命的经验与教训而来的。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对于引起此革命的国内外问题都没有解决。如农村中的封建制度，旧官僚阶级，战争与经济的破坏等；当时不仅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维克，就是我们党内上层的大部分领袖，都根据此点而在列宁面前说：“现在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的基本观念，仅仅是将1917年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意见，重复缮写一遍罢了。

其次更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从经济和民族观点上，而且从政治的阶级性（工农专政）观点上都证明没有完成。”这只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在未实现“真正的”民主政府以前，不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但不幸没有指出从何处去取得这种民主政府。

混乱更甚的莫过于苏维埃的口号，此口号两年来在中国均被否决，仿佛是因为苏维埃只有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的理论）时才可以组织的。但当着苏维埃革命暴发于广州，其参加者得出结论说：这是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过渡时，又被骂为“托洛斯基主义”，难道是可以这样的去教育与帮助党解决重大的任务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挽救其绝望的立场起见，举出其最后的论据（与其余思想系统是毫不相干的）：帝国主义。原来“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倾向，更有害处，因为这样的提出问题，便忽视（？）了中国革命为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民族特点。”这几句话的唯一意思是说帝国主义的压迫，可以不用无产阶级专政，只可用别的专政来推翻。这就是说：此最大民族特点，只是为的想于最后时机中引用，以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粉饰而已，此外不能有别的意思。然而这唯一的意思，我们已在“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本质”一章中讲的很多，现在无需重复。

中国将还有一个恐怖的剧烈的大流血的长期的斗争，以肃清亚细亚方式的奴隶关系和解决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这些基本任务。但所有这些，经过已往的一切事实告诉我们，以后的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甚至于半领导都没有可能，中国的统一与解放现在已成为国际的任务了。此国际的意义之重大，不亚于苏联之存在，这种任务只有由被压迫的饥饿的受摧残的群众直接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之下进行，不仅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而且反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作经纪人的本国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与其有关系的民主资产阶级也在其内）的死命斗争，才能解决。——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自1917年4月起列宁向骂列宁为已经转到“不断革命”论的那些反对者解释说：“工农专政”已在两个政权时代部分的实现；继而又解释说：1917年11月到1918年7月苏维埃政权时期，更进一步的实现工农专政了。当时工人与农民共同完成了土地革命，工人阶级还没有进行没收工厂，不过只是监督生产而已。关于政权阶级性的部分，则社会革命党与孟雪维克的民主专政给予我们的已经够了。这便是两重政权的流产。关于土地革命的部分，它只造成了一个健强的孕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做了产婆。换言之，工农专政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则是分成数部分。民主专政的空壳，只附托在当时苏维埃暂时的拥护克伦斯基与柴来特里的身上；而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果实的获得，只在工人阶级的胜利以后。这个民主专政辩证的分化，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没有懂得。他们自趋于政治的死路中，机械式的诬责“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而企图用通告的方式来领导历史的过程。假使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说由“民主专政”来完成土地革命的话，那末，除了十月革命那样勇敢的“跳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没有别的道路，我们能责备十月革命不应如此完成土地革命吗？

何以在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事实，在俄国为布尔塞维克最高的表现时，而在中国就说是“托洛斯基主义”呢？很明白的，这是因为二十年来被俄国布尔塞维克主义所攻击的马尔丁诺夫（孟雪维克——译者）主义，现在被称为适用于中国了。然而是否可以将中国与俄国比拟呢？我们这样答复：由共产国际领导者所创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其与俄国的比拟完全是用形式与类比方法，而不是用唯物的历史方法。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门路，则中国与俄国的比较是完全适当的，而且这个比较早为列宁所运用，非事后而且事前的，好像他已预见到将来不肖门徒的错误似的。十月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敢于在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取得政权，列宁对此是千百遍的拥护。列宁回答：正因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没有完成并正为完成此任务，无产阶级才取得政权。至于那些以为俄国经济落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成熟，此在列宁认为是“无疑的”。对于这些反对夺取政权的迂腐先生们，列宁于1923年时答复道：“他们从来不这样的思索一下，例如俄国处于文明国与因此次战争（帝国主义大战——译者）而开始卷入于文明范围的一切东方的国家两者之间，可以而且应该表现一些特点（自然它是建筑在世界发展总路线中的）异于西方各国过去的革命，而于转到东方各国的过程中带入一些新的东西。”（《列宁全集》18卷下册28页）

这个使俄国近于东方各国的特点，列宁认为正是幼稚的无产阶级应该早期拿到政权的扫帚以清除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切野蛮的封建的残余和各种障碍之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假使将中国与俄国按列宁主义的类比出发，则我们必须说从政权性质上看来，凡中国由民主专政所能得到的东西，已先试验于孙中山的广东时代，及后来自广东到上海并以上海为结束的北伐时代，随后又试验于武汉国民党时代，当时武汉国民党真如化学上一般的纯净，即是说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

令，是所谓土地革命的组织者，而实际上却成为土地革命的刽子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应由将来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初期来完成的，不仅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就是“民主政党”的作用已经完全试验过。“民主政党”在将来斗争中执行刽子手的任务比以前将更为残忍，若再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即间接又更产生出一个国民党的新花样，而且替无产阶级安下一个陷阱。

我们尚记得：对于那些将社会革命党孟雪维克的经验认为不是民主专政口号之实现的布尔塞维克党员们，列宁对他们很简单的说：

“谁如果仅仅说‘工农民主专政’时，谁便是时代落伍者，实际可由此而转入反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方面去：这种人只好放入于布尔塞维克革命以前的博物馆中（也可以叫作老布尔塞维克的博物馆）。”（《列宁全集》14卷上册29页）

这几句话在今日仍在生动的响着。当然这并不是要马上号召中国共产党起来暴动，起来夺取政权；其时期完全是要看环境而决定的。

现在革命是向低落方面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欺骗式的决议案，以无数人民被杀戮及工商业的大危机，而认为革命高潮近在眉睫的梦呓，只不过是轻率之罪恶而已。经过三次的大失败后，经济恐慌不能唤起无产阶级，反而能征服已流血殆尽的无产阶级，“杀戮”只是毁灭政治上已削弱的政党。中国革命已经趋于一个低落时期，因而我们是在党的深研理论与自己批评与教育时期，在此时期中我们要在工人运动的各方面建立并巩固起基础及组织上的联系，建立农村支部及领导并统一工人贫农各地的零碎斗争，先进行防御战，后改为进攻战。

那末，新的群众高潮将怎样开始？什么环境能给予那领导成千百万无产阶级先锋队以一个必须的兴奋呢？这是不能预言的。或

者仅仅国内内部发展已够，或者须靠外部来的推动，这到将来才可以知道。

但我们有相当根据可以断定，直接由于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中国革命失败，将给予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以或多或少的克服目前可怕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当然是靠牺牲工农的血汗。在此“稳定”阶段中，将重新集合团结工人，恢复其阶级的自信心，以与他们的敌人在将来更高的历史阶段中，作更激烈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进攻战已到来的条件之下，才能够谈得到土地革命的远景问题。

第三次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是否得以别样更缩短的形式重演过去的“全民战线”。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一时期，将只是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按即列宁于1917年4月回俄国后所提出的大纲——译者）于民众的面前，就是说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

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对此怎样说呢？

“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此地指中国），只有经过许多准备阶段（？）即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整个时代。”上面这段话，换言之，就是将以前所经过的“阶段”完全置之于不问了。凡已经走过，在后面的，纲领草案看着还以为是在前面。这完全是尾巴主义的言论，又为国民党政策开了一个新试验之路。这种掩蔽的错误，必然又准备下了新的错误。

新的高潮将比上次于更快的速度中进行，假使那时我们又拿出已经失了效用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与计划时，那末，无疑义的，第三次革命将与第二次革命一样的被断送。

四 冒险主义为机会主义的结果

共产国际二月会议决议案第二段说：

“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第一浪潮，即大半在共产党口号及领导

之下的浪潮，已经过去。结果是工农在革命运动的许多中心地受了严重的失败，共产党员及一般工农革命运动的干部受了屠杀。”

当浪潮高涨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过，这种运动完全在青天白日旗帜国民党领导之下，甚至说以国民党来代替苏维埃的地位。正因如此，所以使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正因如此，所以革命才遭受严重失败。现在当已经承认其失败时，又想把国民党抹杀，如像过去没有国民党存在，好像共产国际没有宣布过青天白日旗是自己的旗帜似的。

过去在上海在武汉都没有失败，只是革命过渡到“更高潮的阶段”，这就是共产国际所教训我们的。现在这些过渡的阶段之总和，“意外的”忽然宣布为工农的严重失败。然而为要相当的掩饰这些预见和估计之空前政治破产起见，决议案的结尾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训令各国支部反对社会民主党及托洛斯基主义者说中国革命已经消灭(?)的‘诬蔑’的话。”

决议案的第一段话告诉我们说：托洛斯基主义就是承认中国革命的不断论，就是说：从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的段落。而在最后一节，则说按照“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意见，是“中国革命已经消灭了”。怎样一个“消灭”的革命，会又是不断革命呢？这就是整个的布哈林。唯有一切不怕的和完全不负责任者才会说出这样矛盾的话，根本的摧残了革命的推理。

假如我们说革命的“消灭”，是指工农的进攻已经被打退而遭流血，是指群众已处于退守或低落的形势，是指新的高潮未到以前，除其他外，群众中间要发生许多酝酿和原子的变化，须要经过相当的期间，时间的长短不能预先决定；假使“消灭”二字是这样的解释的话，那末，这和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不得不承认的“严重失败”毫无区别。或者是从“消灭”的字义上来了解，就是说中国革命真正的“消灭”，或者说中国在新的阶段中已无革命高潮之可能性及其必然性呢？假如真是这样的郑重说，而不是混乱

耳目的时候，唯有在下述两种条件之下才有可能——或者是中国永久衰败或完全毁灭。然而这又是没有根据的；那末，或是中国资产阶级不用革命方法已能解决中国革命根本的生死问题。是不是主张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家，强迫中国共产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理论家，将这种意见加在我们头上呢？

历史正在重复的演。不懂得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程度的瞎子们，在将近一年半期内，诬蔑我们为德国革命的取消派，关于此点的教训，共产国际所付的代价非轻，他们仍不觉悟。现在他们又来玩旧套，不过将德国换作中国。是的，他们目前有找寻“取消派”的要求，实在比四年前时还要重要，因为这一次大家都明白“消灭”中国二次革命的人就是“国民党式”政策的作者。

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在于有先见之明，在这一点，反对派可以经验证明其所指出的是绝对正确。最初关于整个国民党问题，其次关于左派国民党及武汉政府问题，最后说到第三次革命的“预测”，即是广州“暴动问题”。在政治上投降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路线本身，已使革命之最初两个阶段遭到“严重失败”；到了第三时期，乃采取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而更将失败完成。假如领导者不想慌忙的在昨日跳过他们自招的失败阶段，那末首先就应该向中国共产党解释说，胜利不是一下可以得到的，其中有一个时期奋力的不倦的猛烈的斗争，获取工农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才能够走向武装暴动之路。

1927年9月7日我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上说：“今日报载革命军队已经占领汕头，贺龙叶挺的军队已经前进好几星期，《真理报》称此军队为革命军，——但我问你们：革命军队占领之汕头，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前途有何影响？运动的口号是什么？政纲是什么？其组织形式应为何如？《真理报》上于7月所忽然（只一天）提出来的苏维埃口号到那里去了？”先前没有使整个共产党与国民党对峙，没有在群众中做拥护苏维埃与苏维埃政权

的鼓动，没有在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解放的口号下独立的动员群众，没有在当地创立扩大及巩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则贺龙叶挺的暴动，即令他们没有机会主义的政策，也不能不是独立的冒险及假招牌的共产党行动，除了被打散以外，别没有其他道路；结果正是被打散了。

广州暴动是比叶贺冒险更高更深的冒险，其结果还更悲惨。

共产国际二月决议案反对中国共产党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反对儿戏的武装暴动的倾向，然而并没有说这些倾向是1925年——1927年机会主义政策的反动及为目前从上而下发有如军事命令的必然结果。只是“改变步骤”，没有考查过去做了什么，不公开的重新估计政策基础，没有清晰的前途。贺叶南征与广州暴动在此条件之下，不能不是盲动的前驱；真正的反对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只有很清楚明白：领导工人贫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设革命的专政的责任，从今后落在中国共产党双肩之上。假如彻底的明白这一点，便会少想轻易武装袭击城市，或武装暴动于农村，也不会卑贱的跟在敌人旗帜后面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目前只用些非常抽象的讨论，说不应该超越阶段，更说盲动的危险，但却避免说到广州暴动的及由此产生的短命苏维埃制度之阶级内容；像这样得出来的决议，是毫无效果的。然而我们很明白就是一种冒险亦依某种法则发展，是受社会结构所支配的。因此我们在广州暴动中找出中国革命将来阶段的特征，这种特征完全适合我们在广州暴动前所作的理论上的分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既然承认广州暴动是整个斗争之链中正确的合宜的一环，那末他的天职当是如何明了的分析广州暴动之阶级内容。但是二月全会虽然在广州暴动之后，而决议案对此无一字提及，这是更坚确的证明现在共产国际的领袖，坚持错误的路线，宁有闲情逸致搜求1905年及其他年代之所谓错误，而不能决定去研究1927年的广州暴动问题。广州暴动的意义已完全推

翻了纲领草案所给予东方革命的那一机械系统。

五 苏维埃与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决议案中责备共产国际的代表 N 同志“及其他人”，认为广州没有选举的苏维埃做暴动机关，他们应当负责。这种攻击，我们认为是最坦白的供状。

《真理报》根据很可靠的报告叙说（第 31 期）广州已经成立苏维埃政府。但该报并未指出广州苏维埃不是选举的机关；既非经过选举，便不是苏维埃——因为那里有不是选举出来的苏维埃呵？！这是我们从决议案中才知道的。且让我们回想一下这事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诉我们，在暴动时需要苏维埃，而决不是在暴动以前。暴动的日子决定了，但是没有苏维埃。需要成立一个选举起来的苏维埃，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呵！这必须群众从经验中懂得什么叫做苏维埃，明白它的形式，他们又预先学得选举的经验，然而这在中国以前从来没有这一回事。因为这个口号正当其应当成为全部运动的神经系统时，反被称为“托洛斯基主义”的口号了。到后来匆忙决定暴动的日子，以便掩盖他们的失败，乃不得不临时指定一个苏维埃。假如我们不将这种错误揭破到底，那末，苏维埃的口号将会变成革命的绞绳。

列宁曾向孟雪维克解说，苏维埃成立以后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或帮助组织夺取政权，以便在胜利的翌日，就可以变成这个政权的机关。那般拘泥成法之徒——不是门生而是拘泥成法者——便因而得出一个结论，说苏维埃只有在暴动的时候才可以组织。他们根据列宁这个广义的说法而事后写出短收据，这不是利于革命而是促其死亡。

在布尔塞维克的苏维埃于 1917 年 10 月革命夺取政权以前，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维克的苏维埃存在已 9 个月了；在此 12 年以前，还有第一次革命的苏维埃存在于彼得格勒及莫斯科以及其他

许多城市。1905年苏维埃未普遍到首都各工厂作坊时，莫斯科印刷工人罢工便组织代表苏维埃。更在以前几月，1905年5月在伊万诺夫，伏斯纳森斯克地方群众大罢工时，有一领导罢工委员会，已经包含了苏维埃的诸种特征。在第一次成立代表苏维埃与大规模苏维埃政权成立之间，经过12年的长时期；当然这个长时期，不是说各国都应该一样（中国也在内），然而要想中国工人根据短篇的解说（代替列宁的广大的说明）来组织苏维埃，便是以琐屑与迂腐之见来代替辩证法式的革命行动。苏维埃之组织，不应在暴动之前夕更不能在即刻夺取政权之口号下组织。因为既经到了夺取政权的时候，假如群众既经准备着暴动，而还没有苏维埃，那末这就是说一定已经有别种组织形式或方法，做了能够保障暴动的准备工作，此时苏维埃的问题已变成次要的了，而其本身只变成组织技术上的问题了，或者仅为名词上的问题了。苏维埃的任务，不仅在于号召暴动或产生暴动而已，他的主要任务是在领导群众经过必须的阶段走到暴动。苏维埃应先聚合群众，最初不是以武装暴动的口号，而是以部分的斗争要求的口号，然后逐步的引群众入于暴动，不至于半途溃散，亦不至于让先锋队脱离其阶级而陷于孤立的地位。苏维埃的发生大都在罢工斗争的基础上，此种罢工将来发展有趋于革命的形势，而当时则仅限于经济要求。群众在行动时必须感觉并且真正明白苏维埃是他们的集合力量以进行斗争抵抗自卫与进攻的机关。他们之能感觉到及明了这一点，在一般讲来不是一天或一次行动的经验就够的，而要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几年的经验——间断的或不间断的——才可。所以只有不肖门徒的官僚的指导机关才能够于群众热狂醒觉起来，全国伟大革命高潮到来，工人及贫民已有夺取政权（虽然仅为以后发展之阶段，而在当时仅为少数人所认识）远景的时候，妨碍组织苏维埃。我们是永远的这样了解苏维埃。我们认苏维埃之可贵，乃因其为一种广大而富伸缩性之组织形式，能为正在革命行动初期醒

觉起来的群众所了解，能将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不论在该阶级中已经明白到夺取政权任务这一点的工人有多少部分。

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文字证明之必要呢？例如：列宁在第一次革命时代论苏维埃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论革命运动高潮发展的程度如何，决不放弃利用一些非党的组织如工人代表苏维埃之类，以为巩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并团结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列宁全集》13卷215页）

我们可于《列宁全集》中引出如此许多话来。不肖的门徒，舍此不顾而将苏维埃变为阅兵时的制服。党在夺取群众的前夕，就将此制服披于无产阶级的身上，但我们知道苏维埃不能于24小时内发一命令可以预定的组织以为直接武装暴动目的。这种试验必然要多一种幻想，只是以苏维埃外表仪式掩蔽其没有必要条件而夺取政权的内幕而已。这是广州发生的情形，苏维埃不过指定用来做点仪式罢了。这就是不肖的门徒如此提出问题所引起的结果。

在中国事件争论中，反对派被骂为有如下的所谓矛盾：“自1926年以来，反对派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而当1923年的德国，反对派的代表反对苏维埃的口号。”也许再没有比这个更明显的表示他们的学院式的政治思想了。是的，我们曾在适当的时机于中国提出创造苏维埃在革命的高潮阶段，以为工农独立的组织。当时苏维埃的重要意义，是在提出来与国民党资产阶级和其左派国民党对峙。中国苏维埃的口号作用，首先就是打破可耻的自杀政策的“四个阶级联合”，并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所以这口号之重心，不在于单纯的组织形式，而在于阶级的政治路线。

1923年秋间之德国，乃仅是组织的形式问题。由于共产国际与德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非常消极落后与迟缓的结果，将号召组织苏维埃的时候放过，而工厂委员会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到1923年秋天时为下面群众所压迫，占据了一种地位，此种地位，假如当

时德国共产党有大胆的正确政策，毫无疑问的会为苏维埃所占据，而且会得到更好的成绩。

当时的形势急迫已达极点，再失时机即是完全放弃革命形势，以后终于决定暴动，但是时间已极短促。在此情形之下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绝大的教派的愚蠢。苏维埃不是能够救济一切的护符。在那样的环境中，匆忙建设苏维埃，使与工厂委员会并立，必然要褫夺工厂委员会的革命作用，而将他交与新创立的毫无权力的苏维埃，而此时是什么时候呢？此时正是每天都不可放过的时候。这样做法无异弄有害的组织儿戏，以牺牲革命工作。

至于苏维埃组织形式之有非常大的重要意义，这是毫无争论的。然而只是在正当的时机和表现正确的政治路线时候才可。反之，假如把苏维埃变成空幻护符与万应药，却会有不少的负的意义。在1923年秋的德国，为临时创造苏维埃，则在政治上没有一点好处。只不过将组织弄糟杂罢了。在广州则更坏些。急忙建设起来的苏维埃，只不过用以做盲动的仪式而已。我们事后才知所谓广州苏维埃，不过像中国古代的龙，只是画在纸上的。傀儡登场和纸上画龙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是反对于1923年9月用电报通知德国去成立苏维埃的，我们主张1926年在中国创立苏维埃，我们也许会反对1927年在中国广州成立假冒的苏维埃。这里没有一点矛盾，这里正表现对于革命运动及其组织形式之发展的理解，有一种深刻的统一。

苏维埃的职任及其意义问题，在过去数年来理论上实际上都被人曲解，弄不清楚和隐晦起来，然在纲领草案中毫未加以说明。

六 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无产阶级——领导农村贫农——专政的口号，与将来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仅历史会重演，而且错误也会重复，因为人们会以其错误与历史的需要对抗，所以

我们今日已经听到反对的话说：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尚未成熟。但是这样的观察问题是抽象的死板的。假如将俄国孤立来看，难道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了吗？按列宁的观察是没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却是成熟了的，因为这是解决不能延迟的国家问题之唯一方法。

无产阶级专政的总命运是由国际发展的趋势来决定的。当然此并非说，我们无需正确的政策，我们正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政策为前提，巩固与发展工农的同盟，一方面适合于一国的特别情状，他方面适合于世界发展的道路，此亦完全适用于中国。在《论我们的革命》一文中（1923年正月16日），列宁指出俄国的特征是与东方各国家发展的路线相似的。他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议论，说我们尚未成熟到社会主义，我们尚未具备如一般“学者”先生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必需的客观的经济基础，他（列宁）称此种意见为“极错误的”意见。列宁嘲笑这一般“学者”先生，并不是因为他承认俄国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存在，而是由于我们不能因无独立完成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得结论说放弃夺取政权，如有一些迂儒和庸碌者流过去及现在所想像的。列宁在这篇论文中千遍万次的回答第二国际的那些英雄们的强辩说：

“这个无需辩驳的论据（关于俄国尚未成熟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点）……不是估量我们的革命之决定条件。”（《列宁全集》18卷下部118—119页）

这一点是这次纲领草案的作者所不了解，而且也不能了解的。中国如俄国一般地位，经济上与文化上的不成熟——中国当然较俄国落后——的论据是无需辩驳的，但决不能因此而放弃夺取政权的思想，假如国内革命形势与整个历史环境必需此种夺取的时候。

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和现实的问题，并不在是否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已经成熟于“一国的”中国，而是在是否无产阶级专

政已经在政治上成熟于中国。这两个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假使没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那末二者方可以合而为一，此规律在此应用正为合式，有此规律因而反映到经济政治间之相互关系上。因此我们要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已经成熟于中国？只有斗争的经验，才能对于这个问题给我们以确定的一个答案。同样的，只有斗争才能告诉何时及何种情形之下，将真正的实现中国统一解放与使中国复兴？要说无产阶级专政尚未成熟于中国，这就是不啻声明中国第三次革命将要延迟到多少年度以后了。

当然，假使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判断的，认为中国真正统治者封建残余，那便无望了。但幸而就一般言，残余是不能占统治的地位。纲领草案不曾矫正这点过去所犯的错误，而还以一种含糊的与轻浮的色彩重新加重它。草案中说：

“中世纪的封建关系在中国国内经济中和其上层政治建筑中都占统治地位。”

这是根本的错误。什么叫做统治？按照受支配的人民数量而定吗？抑或按照在中国经济上起统治与领导作用而定吗？建筑在包罗全国的商业与银行资本基础上的国内工业，非常迅速的发展；重要农民区域之完全依赖市场；对外贸易之伟大与日益增长；中国农村之在各方面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些都显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封建与半封建的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其发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一部分乃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农村人口过剩，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影响等等而新形成的。然而这并非“封建”的（更正确的农奴及一般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统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统治。正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占主要地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的远景，否则，岂不是首尾不相顾吗？

“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都远超过于其在全国人

口数量中所占的地位，因为经济上无产阶级统治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系统的中心和主脑，而且因为在政治上经济上无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下广大劳动群众的真正利益。因此，无产阶级虽于其全民中占着少数时（或者自觉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全民中之少数时），能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从半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吸收许多同盟者到自己的方面来，这些小资产阶级于先时是不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统治的，而只有在以后继续的经验中，才使他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正确性及自然性。”（《列宁全集》14卷，158页，于1919年写的）

中国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早已极大了。在最近几年，此种作用必然继续增大，即在政治上的作用，据历年事变的证明可算为极伟大的。但是领导机关的政策，如我们已说的，却全趋于反对无产阶级取得领导作用的方面。

纲领草案说及中国顺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于获得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直接帮助的条件之下才是可能。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党对于俄国常常主张的原则同样应用到中国去了。但是如果中国没有独立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内部的力量，那末按照斯大林与布哈林的理论，中国无产阶级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夺取政权了。或者苏联的存在可以合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直接帮助的条件吗？那末，我们就要证明苏联的技术程度，已经不仅在苏联足够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也可帮助中国，即是说在包括六万万人民的两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了。或者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可能和必然，乃因为专政在世界广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锁链中，不仅为其一环而且是其动力呢？这正是列宁十月革命的中心思想；十月革命的“特征”，即在他乃循照东方国家发展的路线而进行的。这样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修正派的理论，在1925年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对于重大的新的革命问题之应付处处破产了。

纲领草案循此路线更走远些。他将中国与印度和1917年的俄国，波兰及其他各国(!)对立起来，以为在俄国与波兰等国“都具备相当的最低限度的工业，以作顺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或者更正确的说(同时已就更错误了)，它们乃具备“必需的或足够的物质建设基础，——以完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此地简直是一种对列宁的辞句“必需的足够的基础”作字句上的虚伪的不可恕的游戏，因为列宁估计政治与经济的前提时，是很确实的包括技术，文化与国际前提。但问题是：如果是两个经济系统，两个社会制度间在国际上发生不断的斗争，而我们在此斗争中的经济基础又较敌人为弱得多，我们如何可先知的决定好完全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工业呢？

如说就经济的情形言，很清楚的，苏联尤其是在中国与印度远不如国际资本主义的有利，但整个的问题是由二个制度间的国际革命斗争来决定的。假使有真正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的优势是在我们一边，更正确的说，是一定在我们的手中的。

在《论我们的革命》那一篇文章中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相当的文化程度”这句话后，列宁解释说：“虽然谁也不能确定的说相当的程度，究为如何”。何以没有人敢这样的说呢？因为这问题是由斗争来解决，由二个社会制度二种文化的国际斗争来解决的。纲领草案则完全置列宁的此种正确的意见于不顾，而居然说：“俄国在1917年已经恰恰具备了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术”(自然文化包括在内)，草案的作者正企图在纲领中说事先“谁也不能确定的说”的话。

在整个问题须由国际关系来决定时，要在民族范围内(1917年之俄国)寻找“能够建设的最低限度的”标准，是不仅不应该与不可能，而且是非常愚蠢的。在此种谬误臆造的闭门孤立的狭隘的民族标准的基础上，造成了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政策的理论根据，必然成为民族改良主义及社会主义爱国派的前提。

七 论东方各国“工农两阶级政党”的反动思想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教训，同时也就是整个共产国际尤其是东方各国的教训。

凡为了辩护在中国革命中的少数派理论而提出来的论据，若信以为真，既可以适用于中国，一定可以适用于印度。印度是一个模范殖民地，帝国主义在印度之压迫，自然比中国更可怕和更直接了。印度的封建与农奴关系遗迹之留存，自然比中国更深且巨。然而因为或者“正因为”这些原因，如果把那些摧残中国革命的政策也适用到印度去，其结果一定断送印度的革命比断送中国的将更为利害。要消灭印度的农奴制度，推翻英印合璧的官僚政治和大不列颠的军国主义，只有群众的翻天覆地的巨浪，以所向无阻的猛力向这些东西进击才行。然而正因为这个浪潮的力量过大，正因为这个浪潮有国际的任务及国际联系，所以不能受有任何半调和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共产国际在印度所做的错误至今已不止一次，环境还未发现此错误像在中国那样的酷烈。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事件的教训，能使我们乘时赶紧纠正正在印度和其他东方政策领导的错误。我们这里的中心问题如任何时任何处的一样，还是共产党的独立问题，它的完全的独立，它的不妥协的阶级性。这条路上的最大危险，就在给予东方各国的所谓“工农政党”。

在1924年的时候——这一年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许多基本主张被公开修正的一年——斯大林替东方各国提出了两个阶级构成的“工农党”的公式。这个观点的基础是藉口于民族压迫，其为东方的机会主义的掩蔽物如资本主义“稳定”一名词之在欧洲一样。俄国报纸所载从印度来的电讯，以及从没有民族压迫的日本来的电讯，于最近常报告各省“工农党”的行动，表现他对共产国际之友谊及接近共产国际之组织。从这些消息看来，仿佛这些

团体就是共产国际“自己”的，而对于他们的政治面目一句具体的话都没有。总之，这些报告的精神就与在不久以前关于国民党的报告绝无二致。

尚在1924年时的《真理报》载：

“逐渐有组织的高丽民族解放运动，合而为创造工农党的形式，已有规模。”(1924年3月2日《真理报》)

当时斯大林告诉东方共产党员说：

“共产党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之政策转到工人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之政策。在这些国家中同盟形式，可以采取统一的政党，如国民党式的工农党。”(斯氏著《列宁主义问题》264页)

由此而谈，共产党的独立性，只是一副假面具罢了。我们深刻的认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应该指出这种双关说话之危险而不容许它再现。此地所论者，乃是在党的根本问题上及阶级关系上，完全为新的谬误的整个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问题。

关于共产党有加入国民党之必要的问题，人们曾用了以下的话来辩护说：“国民党的社会成份是一个工农的党。国民党中十分之九——此数目的反覆重复过千百次——是倾向革命而可以与共产党携手并进的。”然而在上海武汉叛变以后，这些十分之九的革命的国民党便如泥牛入海踪迹全无了。在这时候，那些主张中国阶级合作的理论家，如斯大林布哈林等，也不来费一点力去解释：工人的，农民的，革命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十分之九的国民党员，究竟匿迹在什么地方去了。然而，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些斯大林所创的“两个阶级”政党将来的前途，这种答复是有重大的意义的。这个两个阶级政党的思想的本身解释，使我们不但倒退到1919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以前，并且直退到1847年共产党宣言以前去了。

要了解那些有名的十分之九那里去了的问题，第一我们必须先了解两个阶级政党存在之不可能，就是说同时代表同时表现两

种相互排斥的历史路线——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党存在之不可能；第二必须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决不能有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就是说不能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而不依赖于资产阶级也不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农民政党。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农民和无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们的绝对一致利益全是虚伪的。农民只有同意于无产阶级观点而放弃其私有观念才能加入共产党，这是马克思的见解而为我们布尔塞维克党所接受的。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农联合，也并不能消除这个主张，只是在另一种形式之下确定了它。假如他们不是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利益，便无从说到联盟了，这种联盟只有在农民归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纪律范围之内，才与社会革命相容。因此在专政之下，不允许有所谓农民协会之存在，因为凡有趋向于全国的带有政治主张的“独立”农民组织，必定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

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取名为农民党的组织，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另一种变相。农民假使没有从私有者的观点改变到无产阶级观点，在许多政治根本问题上，他们必然要趋向资产阶级。实际上，每个资产阶级政党依靠或是想依靠农民或就可能及于工人阶级，他必然要戴上两个或三个阶级政党的色彩的假面具。这个有名的工农党的观念，好像是故意特别为那些需要农民或工人帮助的资产阶级政党造出的面具。今后，国民党要在历史中成为这样一个政党的模型。

资产阶级社会的构造，即在于使那些贫苦的不满意的或被骗的下层群众在下面，而满意的欺骗的在上面。凡是一个有相当群众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其构成的原则也是这样。在有产阶级的社会内，剥夺者欺骗者或武力所有者总是少数，所以每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其内部关系上，必须表现和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因此在每个有群众的资产阶级政党内，下层群众总是比上层的民

主些，“左些”。德国中央党法国急进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是如此的。所以斯大林布哈林不断的埋怨说：领袖不受下级大多数“十分之九”左派国民党群众的影响等等，是无可原谅的幼稚。在你们认为奇怪的不适意的暂时不好的现象，可以用组织方法通告训令消灭的，事实上，这乃是任何时资产阶级政党根本的特点，特别是在革命的时期。

我们应该从这个观点上去审查拥护各种在英国或在中国的机会主义联盟的纲领草案作者的重要答辩。他们认为和上层领袖的友谊便是纯粹为群众的利益。大家都知道，反对派是赞成退出国民党的。“试问是为什么呢？”——布哈林说——“是不是因为国民党的领袖动摇(?)呢？但是国民党的群众又是怎样呢？他们是驯羊吗？何以对群众组织之关系能由上级来决定呢？”（《中国革命之目前问题》）

在革命的政党内有这样的观点存在，事实上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国民党群众又是怎样呢？”布哈林问：“难道他们是驯羊吗？”是的，他们当然是驯羊。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虽有程度之分，然而都是驯羊。我们的群众是否驯羊呢？不是的！正因为此，所以我们不敢驱群众于资产阶级的手中，藉工农政党的名目来隐蔽资产阶级。正因如此，我们决不敢使无产阶级政党受制于资产阶级政党，而必须步步都使无产阶级政党与之对抗。布哈林带着轻蔑的态度所认为不重要的暂时的次要的国民党之上层领袖，事实上这恰是国民党的灵魂，国民党社会的本质。自然资产阶级只构成党的上层，如同构成社会的上层一样。但是这个上层以有资本，知识，各种联系及常能依靠帝国主义帮助等等原因，所以是强有力的，尤其因为有政府的和军事势力，这些政府和军事势力都直接和国民党领袖相结合。制定反对罢工法，压迫农民运动，禁止共产党活动，剥削其自由，最多只许其占三分之一，置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主义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等等，做这些事的正

是那般上层人物。下层群众被他们所玩弄，与莫斯科在一起形成其左翼；军人买办帝国主义同时形成其右翼。不视国民党为资产阶级的党，而视之为征取群众的中间阵地，以下层群众十分之九的左派自为吹嘘，以掩蔽谁是真正主人的根本问题。此种只是为巩固上层政权的功臣，助其变广大的群众为驯羊，而在有利于他的时机到来时，使其容易准备上海事变。斯大林布哈林具此两个阶级政党的反动思想，而认为共产党可以与左派联合在国民党中得到多数，因为中国政权是在国民党之手，便以为可以藉此多数而取得政权。换言之，他们以为仅只用国民党大会上之简单的改造方法便可以得政权从资产阶级之手转给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党内民主”幻想，还有比这种想法再生动感人的吗？要知道资本官吏印刷报纸军队等等，都在资产阶级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党的有权力的统治者。假使这些“十分之九”的“左派”不侵犯资产阶级的军队官吏报纸资本的时候，资产阶级上层是可以容忍他们的。资产阶级以这些强有力的工具，不仅使党内之“十分之九”的党员服从它，而且使全国国民受制于它。阶级联盟的理论，国民党是工农党的理论，最好的帮助了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后来与群众冲突时，以至于枪杀他们（工农）时，当此两个真正力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冲突时，有名的十分之九的羊鸣之声也听不到了。可怜的民主幻想，于阶级斗争之实际血泊中，消失得无踪无迹了。

这就是东方两个阶级政党（工农政党）的下贱的政治手腕之唯一可能的结果，别的可能是没有的。

虽然两阶级政党理论是根据于民族压迫为理由，仿佛马克思论阶级之学说会因此关系而被消除；但是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日本，也发生有“工农党”的混杂物。而且事实上不仅限于东方，“两阶级”的理论想应用于全世界。关于此方面的最滑稽明显的一幅画图便是我们所已说过的，美国共产党在总统选举时，曾企图

拥护资产阶级“反对托拉斯”的一个参议员拉福莱特为总统候选人，希图用此方法，而使美国之富农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善用手腕的理论家白白尔曾因不注意匈牙利农民，而葬送了匈牙利的革命，现在显然为挽救其过去起见，注意在美国又以广大的企图想将美国党（共党）融洽于农民中而葬送它。白白尔（共产国际中的极右派——译者）的理论，谓美国资本主义的额外利润将美国工人成为了广大的工人贵族，而农业危机使美国农民破产却推进他们走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因共产党的几千党员为移民成份，故应该（据白氏的意见）经过资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接近。组织两个阶级政党可以在被额外利润所腐化的无产阶级消极或中立的状况之下，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此种理论在共产国际中的上层得到了同情者或半同情者。在几个星期之内，这些领袖们在两个意见中摇摆，终于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浅观念让步（他们在背后将此最浅观念说成托洛斯基主义的成见），迷失方向的美国共产党不得不脱离了拉福莱特党的圈套，因为这个党比其创造人（即拉福莱特——译者）死得还早。

初为东方新发明的修正主义，继而移入西方去了。假使白白尔想在美国藉助于两阶级政党以鞭笞历史使其前进，则据最近消息，国民党的经验在意大利也找到了模仿者。他们极力强迫意大利的党接受那荒唐的口号：建立在工农委员会基础（？）之上的“共和会议”。在此口号中，蒋介石与希尔费丁（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译者）两人的灵魂拥抱在一起。难道我们真是到这一步田地吗？

* * *

在结论时我们当回忆一下，工农政党的意见在布尔塞维克党历史中曾煽起一切与民粹派的争斗，没有过这种斗争就没有布尔塞维克。此种历史斗争的意义在何处呢？列宁于1909年论社会革命党时曾说：

“他们(指社会革命党)政党的基本理论,完全不在于需要无产阶级及农民联合力量,而在于两者之间,并无阶级的鸿沟,在于两者之间不划分阶级的界限;他们(社会革命党)认为我们社会民主党所说小资产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是不同的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列宁全集》11卷上册198页)

换言之,工农两阶级政党是俄国民粹派的中心理论;只有在反对此种理论斗争中才能在农民的俄国中生长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

列宁在1905年革命时,再三不倦的说:

“对农民应有不信任的态度,应在组织上与之分立,应准备与之争斗,当农民的行动带反动或半反动时候。”(《列宁全集》6卷118页)

1906年列宁又说:

“最后的劝告:城市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们,你们单独的组织起来,虽然是很小的私产者及“劳动”的私产者,你们都不要相信他们,不要相信任何的私产者,我们拥护农民运动到底,但我们要了解,这是别个阶级的运动,不像我们的运动可以完成社会革命的。”(《列宁全集》9卷410页)

这种意思在列宁的大小著作中说及不知多少遍。1908年他说:

“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联合,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党之合并或看作是不同的阶级的合并;不但合并,而且即是短暂时期的协定,也足以破坏工人阶级的社会党,而且会减弱革命民主的斗争。”(《列宁全集》11卷上部79页)

还有比这些话更严酷的无情的斥责工农政党的理想吗?

斯大林则说:

“革命的反帝国主义同盟,可以(但不是永远(?)必定(?))采取统一的工农政党的形式,带有形式的(?)统一的政纲。”(斯

氏著《列宁主义问题》265页)

列宁告诉我们说：工农联合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进行统一的政党。斯大林对列宁作了唯一的一个让步，照斯大林的意思：虽然阶级联合应采用统一政党的形式，有如与国民党相似的工农党，但此非永久必须如此的。即是这样，我们也要谢谢斯大林。

列宁用此不妥协态度再将问题提出于十月革命时期。综合俄国三次革命之经验，列宁自1918年起，无一时不重复说：在资本主义关系系统治着的社会，两个力量（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决定一切。“农民不跟资产阶级走，即跟无产阶级走，并无中间的道路。”（《列宁全集》11卷219页）

而工农党就是想造成中间的道路。假如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未与农民分立，假如它未进行无情的反对农民之充满小资产阶级的浪漫色彩之斗争，将已融化于小资产阶级之浪漫中，经过社会革命党或其他工农党，而必然使其本身受制于资产阶级之领导了。为了要去与农民作革命的联合，这不是口说可以做到的，必须首先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整个工人阶级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解放出来；达到此种目的，只有锻炼了的不妥协的阶级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愈幼稚，则其与农民之血族直接联系愈近。农民在全国居民中所占之数愈多，则战胜一切两阶级政党之政治炼金术士之意义愈大。在西方各国此种工农政党之理论是滑稽的；在东方是致死的；在中国印度日本，此种理论不但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争取领导的主张之死敌，而且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最原始的独立的要求，根本不能相容。工农党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基础，其盾牌及其掩护物。

最不幸的是这些对东方的根本问题中，目前的修正派只是重复了革命以前旧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错误。欧洲社会民主党之大多数领导者，认为我们党反对社会革命党及坚决反对两党合并

的斗争是错误的，认为对于“东方”的俄国，正需要工农政党。假如当时我们听从这些劝告，则工农联合何时都不会存在，更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了。俄国的工农两阶级的社会革命党，成为且不能不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经纪人。换言之，这个政党想实践国民党的历史任务而没有成功；而依照中国“国情”产生的国民党，感谢布尔塞维克党内的这些修正派，将这些任务成功的实践了。

假使不无情的攻击为东方而设的工农党的思想，就不会有共产国际的纲领。

八 从农民国际得来的教训应该加以研究

攻击反对派最大理由之一——纵不是唯一的重大理由——就说反对派对于农民估量得过低。在这一点上，在国内国外都有事实的证明，在对农民的各种关系上，负责的领袖就患了小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错误。我们讲一讲在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苏联政策上，他们所犯的根本错误。自1923年以来，就是对于苏联全国国民经济和与农民联合的两点上，轻视了在无产阶级的管理下的国家工业的重要。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在不懂无产阶级对农村革命的伟大而确定的作用。根据上述的观点，我们党得有考察与估计农民国际工作的作用之必要。农民国际自设立以来，不过一个试验而已，而此试验需要一个谨慎周详和原则上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他的理由是不难知道的。

农民在历史上，在其生活情形上，是各阶级中最不国际化的阶级。所谓民族的特点全发源于农民。吸引农民（只是其半无产阶级群众部分，即贫农）实行国际的政策，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是可能。别的办法，都是与各阶级游戏而已。这种游戏，只是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

一国的农民，只有由无产阶级的领导，将其从资产阶级的影

响下解放出来，而且在此过程中训练他们认识无产阶级不但是他们的同盟，而且是其领袖；只有在此情形之下，农民才可以走到国际的政策路线上。想越过无产阶级，不经过该国的共产党而企图组织农民为独立的国际组织，必然失败的。最后的结果，只能阻碍该国无产阶级的夺取农民中的雇农和贫农的斗争。

自从 16 世纪的农民战争以来，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中，农民都有过大的作用，但从来不是独立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农民总是帮助一种政治势力反抗别种政治势力。农民本身从来不是独立的政治势力，有其自己的全国政治纲领。在财政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端对抗，比以前资本主义时代相离愈远，这就是等于说，农民相对的重量是减少的，并不是增加的。无论如何帝国主义时代的农民，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更缺乏独立的国内政治行动的能力，更说不上国际政策的独立。美国今日农民的独立的政治作用，没有 45 年前的大，在那个时候，“民众派”运动的经验已经指示出来，他们是不能组织一个全国独立的政党。

由大战后经济恐慌与衰落的结果，使欧洲暂时的农业化了。这个暂时尖锐的农业化，造成了一种幻想，以为“农民的”（即资产阶级的假冒）政党作用是有可能，因为他们当时是以激烈的言论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抗。假使在大战后农民扰乱不安的时候，可以组织农民国际，作冒险的尝试，来试验无产阶级和农民，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现在已经到了来做一个总结工作的时候，就是概括农民国际五年来理论和政治的经验，揭示他的缺点和指出他的利益。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等落后国家农民政党的经验和国民党的（血尚未干的）新经验以及各先进资本主义国的零碎的经验，而特别是美国的拉福莱特和白白尔的经验，总总证明在资本主义灭亡时代，比在资本主义兴旺时期，对于反资产阶级独立的农民政党更少希望。

“城市完全不能和农村对比；在现在时代的历史条件之下，农村不能和城市对比。城市自然领导农村，农村自然跟随着城市。唯一的问题是城市中那一个阶级可以领导他在后面。”（《列宁全集》16卷44页）

在东方革命的农民会起一个很大的革命作用，但这个作用既不是领导的，也不是独立的。湖北广东彭加尔（印度）的贫农在国内和国际有政治作用，但必须在他们帮助上海汉口广东和加尔各答（印度）的工人的条件之下。这是唯一的道路，使革命的农民上国际舞台。企图直接组织湖北和加尔各答的农民，或将巴拉甲，埃及和美国的农民组织在一起，是一定无希望的。

但是政策的实质，是这样：假使政策不能直接有用于自己的目标，必定会变成别一个目标的工具，常常为反面目标的工具。当着资产阶级依靠农民，在农民本身不能加入共产国际以求掩护，为避免其本国共产党之攻击时，总愿在相当时期内加入农民国际，以达此目的。正如批塞尔在职工运动方面藉英俄委员会的掩护。难道这样的例子，我们还没经验过吗？假使拉佛列特（美第三党领袖）没有加入农民国际，那只是因为美国共产党势力太小，不惧怕的原因。况且美国共产党白白尔领袖，在那时已凭空去拍他的马屁了。但匈牙利的克鲁希亚富农的银行领袖拉狄奇在他未入阁前，还觉得有顺便走拜农民国际之必要。国民党则更进一步，不但得到了农民国际和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之掩护，并且也还请求加入共产国际，这个请求在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通过时，只有一票反对。

取消职工国际的提议，盛行一时（职工国际的名字，在苏联工会章程上已经删去了），而对于农民国际成绩的疑问，尚未有人提出来，这是近年来领导者政治情绪中的一个严重的现象。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来考查与研究农民“国际”的工作，现在正是要以马克思主义计量这个试验的结果。这个结果的计量，应该放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去。现

在的草案，对于农民国际的存在及其几千万的群众都没有一字提及。

1928年6月8日

(录自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
世界文化研究社出版部 1930年2月10日初版)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929年12月10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自从1920年(民国9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劳动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任何时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我绝对不愿为要拥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正当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的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苦经验埋殁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不但不愿掩护我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无情的批评，只要不是附会造谣，我都虚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机会主义；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如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

耻的机会主义；像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自满，一旦自满，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进步。就是反对派的旗帜，也决不是张天师的灵符，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本去掉，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系统没有深刻了解并坚决参加斗争的分子，若仅仅站在这一旗帜之下骂几声斯大林李立三的机会主义，便以为机会主义的魔鬼永远不会近身，这便是妄想。我们要真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在同志相互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①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陷于以前机会主义的复辙。

本党创立之初虽然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1921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

^① 斯大林说：“多数派在1905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确呢？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有了苏维埃的存在，有了多数派的正确政策，1905年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呢？这是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运动的力量强大些，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过去没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亲密无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和没有增长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望呢？很明显的是不能这样说的。”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之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却是失败之主要的保证。若以为敌人的力量如果强大些，虽有正确的政策还是不能胜利，则俄国1905年的失败都是命定的了。我不愿意斯大林为中国党有这样的辩护，我更不愿意借斯大林的话为我自己辩护。

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1922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伤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庭，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民国13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1923年）和“五卅”运动（1925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

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1926年)蒋介石的3月20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员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5000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3月20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

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响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向农民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介石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

我于4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疏远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现上好像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始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部国民党公开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

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阁，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幼稚之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就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 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的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之。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 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 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5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有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 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

能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革命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党犯了以上这样一贯的根本错误，别的大小不可胜述的枝叶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的发生出来。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现在的中央说我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国际好躲避自己的责任，这简直是笑话。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犯过机会主义而永远取消他批评上级机会主义及他自己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权利，同时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机会主义政策之来源出于上

级机关而有躲避自己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之自由，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像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然而现在中央开除我的党籍之理由是：

(一) 说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被开除了。

(二) 说我“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够受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三) 我在8月5日致中央信中有下列诸语句：“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的崩溃，”“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它当

作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白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即过渡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中央把这些语句似是而非的改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并且每个语句都加上引号，好像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这也算是开除我的理由。

（四）我在10月10日致中央信中说：“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根本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我和彭述之同志在10月26日致中央信中说：“目前即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必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作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中央说我们是“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党籍的理由之一。

（五）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之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还有民族偏见时，广大民众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口中东路问题而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中央说我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六）我写给中央几封信乃是党中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延搁

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已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七)“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10月6日(距开除我的党籍只40天)，因为我几次发表批评中央继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他们为准备开除我的手续，才忽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八)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斯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只拿中国的斯大林派李立三等对于我们的造谣，便可证明)。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同志们，中央现在竟勉强制造以上这些无理的理由，将我们党籍开除了，并且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们对于这件事多半还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们自己也说：“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们竟公然在有些同志还在莫名其妙的状态中将我开除了，说我反革命了，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我为反革命呢？我真正为他们的巧妙手段哑口无言。这正是现代中国人为攻击敌人而发明的武器。例如国民党漫骂我们共产党是反革命来掩饰自己的罪恶，蒋介石挂着革命的假招牌骗民众，把自己捧为革命的化身，并把反对他的一切人们当作反革命和反动分子等，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许多同志知道，中央以这些无理由的理由，剥夺我的党籍，这

一切都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其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政策，成为他们眼中钉之故。

世界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都存在着封建残余，并实行剥削的方法（黑奴和南洋群岛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封建奴隶制度）有些国家甚至还存在封建势力，中国就是其中一例。我们在革命途径上固然不能忽视它，但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却一致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封建残余仍然占优势，并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们竟把封建残余当作革命的目标，并认为是压迫革命的当前仇敌，即轻视了资产阶级势力，把资产阶级的一切反动行为归之于封建残余。他们好像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在求革命，他们是永远不反动的，一反动就不能称为资产阶级。因为这样，他们不承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从而下结论：中国在将来或目前，在国民党之外，或南京的国民党之外，必须存在一个不反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在当前策略上，以及在实际行动上，走上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的尾巴；在政纲上，则主张将来的第三次革命。至于其革命的性质^①又限于资产阶级及民主革命的阶段，并在将来的革命途径上反对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如此始终一贯的对资产阶级的留恋和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显然是过去机会主义的继续，而且比它更加深入，从

^① 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目前对于反革命的民主运动，只有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于改组派倒蒋运动，只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冲突，根本连民主运动还谈不上，只有民众运动高潮发展到推倒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六次大会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事实上应该是指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他们承认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所以产生出思想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即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这正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混合物。

而必然造成将来革命的更可耻的，更悲惨的失败。

如果要把“建立苏维埃政权”当作行动口号，起码要在革命高潮和客观条件完全成熟的时期，而并不是在任何时期都可以随便提出的^①。过去当革命高潮之际，没有提出“组织苏维埃”和“建立苏维埃”等口号，是主要的错误，将来革命一旦起来，必须立刻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而斗争。当然，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决不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当前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大众的革命运动没有高潮的时代，不管任何角度来看，“武装暴动”和“建设苏维埃”的客观条件是没有成熟的。在目前，把“建设苏维埃”仅仅当作宣传教育口号，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行动口号，将来要纠合工农运动煽起实际行动，为“建设苏维埃”而奋斗之时，势必无法争取群众的响应。因此在目前行动上，应该采用最民主主义的口号，如“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这一运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目前，可以仅仅用这一口号推动广大群众，从政治暴露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进而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可是，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中央派却完全与之相反，他们认为革命复兴的气运已经成熟^②；并指责我们认为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自然他们认定目前已经是行动口号了。所以，不断地以命令强迫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以命令强迫罢工，每个小的日常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政治斗争，以至工人群众甚至党员同志更加和党脱离了。并且最近在江苏代表大会上，竟

^① 1917年4月，巴格大梯夫为首的一部分多数派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尚且公开的责骂他们发出这一口号太早，说他们是冒险。

^② 最近国际训令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训令时尚疑成熟二字或译文有误，后交宣传部查对原文，译文并未错误，目前在江苏省代表大会中，多数代表对成熟二字也一致怀疑，群起争论，后经中央出席委员极力坚持，终于决定中国革命复兴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成熟了！（大概他们以为改组派倒蒋就是革命复兴）

至议决了“组织大的罢工运动”和“地方暴动”。自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上海工人起来一些小小斗争的萌芽，一露头即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了，今后自然还要继续铲除，江苏省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如果真去执行，更要大大的铲除。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现在的中央，忠实地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①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革命。无论是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护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权威，箝制党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每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不应该害怕在群众面前公开的自我批评，党只有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方能够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反之，像现在的中央这种掩护自己的错误，则真要失掉群众。全党大多数同志，对于党这样的错误与危机，没有不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我们只要不是简单地生活费混饭吃，只要自己有一点觉得对党对革命不肯放弃责任，任何同志都应该站

^① 第六次大会所决定之破产的路线，用白纸黑字写在议决案上的，如“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实现工农民权独裁制”，“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革命运动现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新的革命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等等。中央所忠实执行的，正是这些破产的路线。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调和派，以为六大议决案没有错，只是中央执行得不对，这是表现出这班调和派不但不懂得我们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并且也不懂得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他们自己更是没有路线。

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实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未纠正，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

自从“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好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不是高涨，国民党政权也不会很快的崩溃，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应该改变政策，在日常斗争中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当时的党中央以为普遍的武装暴动是纠正机会主义之绝对正确的新的路线，主张要估量暴动的条件和计较成败，便是机会主义。当然对我的意见，不但丝毫不加考虑，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说这是我仍旧没有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之证据。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而未能积极的超越组织对中央的毁党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致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这也是我应负责任的。其后经过第六次大会，我还是怀着错误的见解，还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未必盲从国际的错误路线到底。我自己仍是继续消极态度，不欲独持异议，致引起党内纠纷，虽然我对于六次大会的根本路线十分不满，直到经过蒋桂战争及五卅纪念运动，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明明是不会自己改变的了，非有自下而上党员群众合法的公开的讨论和自我批评，是不能纠正领导机关严重的错误路线了。然而党员群众都在组织纪律的拘囚与箝制之下，一时陷于“敢怒而不可言”的状况。此时我实在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严重错误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而出，自从8月初起开始向党发表意见，以尽我的责任。此时有些同志还劝阻我说：“中央的人们把他们少数领袖的利益，看得比党的利

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们坚决的企图掩护自己的错误到底,决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评。像你这样不避忌讳的批评他们,他们将来会借故开除你的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的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计到我个人利益的道路。

国际及中央一向是反对算旧帐的,一直到现在看见我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们才忽然想起来说:“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几句话正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写照。其实,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没有决心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并附和他们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他们必然还要借重我老机会主义的笔和口,来攻击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希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更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和社会恶势力奋斗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①,不愿意正确的去认识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想躲藏到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其实,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发表的文件中,他所指责我个人的话,比斯大林、布哈林更严厉;然而我不能因为他指责了我个人,便不肯承认他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宁愿受任何同

^① 李立三对于机会主义,不愿探本溯源的使全党认识机会主义整个的路线之错误,而且想利用党的宣传机关与权力,把那几个人造成机会主义的象征,以集中全党同志的视线,形成群众心理,好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自己除外了。他们对于盲动主义的宣传也是这样,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动主义的象征,好把自己他们除外。其实,在汉口时代,瞿秋白在农民部通告上大骂农民“过火”,运动是流氓行动,命令各级党部须顾到国民政府一般政策。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鲁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嗓门抗议道:“鲁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汉口总纠察队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请问这些都是表现什么意识,什么主义?杨殷以罗绮园都曾亲自告诉我,李立三在广东省委负责时,他所表现的盲动主义,比全党任何同志都厉害。

志任何严重的批评,而不愿使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埋没下去;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志们,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群众有开除我的意思。我虽然被党的上层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群众丝毫没有有什么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终坚决的跟着斯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手为无产阶级服务。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自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争辩)来解决。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此 致

无产阶级的敬礼!

陈 独 秀

1929年12月10日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原文注释均为作者所加。)

〔附〕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29年12月15日)

(托陈取消派纲领)

一 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

自从列宁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产国际及联共领导机关，发生了机会主义的绝大危机，即是在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结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之孟塞维克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

了苏俄的大危机。在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失败最惨的，要算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

1925—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其行动的历史上，在其三民主义的政纲上，在其建设中国实业计划上，在其上层领导成分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自始即带有不少的反动性（如希求帝国主义的帮助及不主张没收土地及大贫小贫论）；至于其中的下层群众含有不少的工农分子，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不乏此例，决不能因此改变其党的资产阶级性；无论如何口头上主张世界革命，拥护工农利益，和联合苏俄，凡在一个革命运动高潮中，羽毛还未丰满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一部分迎合无产阶级的口号，甚至于拿出社会主义的幌子，以猎取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拥护，这是资产阶级的常态，是在欧洲革命运动史中所常见的。无产阶级在没有独立的政党时，常常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常常的是简单的替资产阶级服务，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统治，而马上即被资产阶级践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幸也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错误的幻想的政策领导之下，不自觉的做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简单的工具，以苦力的资格替它们推翻了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北洋派的统治，以与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刚一抬头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残它们的昨日的拥护者——无产阶级。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的大批屠杀和它的政权意外巩固。

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1924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许国民党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监督我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凡国际所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该委员会看过；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政变，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和苏俄视察团的卫队枪械，逮捕大批共产党党员后，复以国民党党务整理议决案的形式，令共产党及青年团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禁止我们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令我们同志退出军事学校或退出共产党；这些事实已经是资产阶级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而不是什么联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际的政策不但不因资产阶级进攻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加独立起来，反而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不缔〔音〕自己正式宣告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大屠杀，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继续拥冯拥汪，说冯玉祥是工人出身，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并且在蒋介石叛变以前，曾命令我们以劳资仲裁代替罢工斗争，命令我们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曾命令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我们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最后，全部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还命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直到南昌暴动，还是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这样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了国民党约束工农的工具；这样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一贯的空前未有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分明是卖阶级的政策，完全不是1905年布尔什维克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独立的领导农民，

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大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级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难道除了这些实际问题外，还有悬在空中的独立吗？！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这样破产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对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关系之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以团结中国国内进步的各阶级，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便是国民党，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它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商品与资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的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商业竞争，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冲突更为不可调和，更易于爆发阶级战争。资产阶级最初参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图利用能够在它们控制条件（过去国际的政策正是对资产阶级担保这种条件）下的工农群众声势，向帝国主义做买卖，好取得于它们自己阶级的那几种利益，一看到工农群众根据其本身利益，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革命时，资产阶级便马上感觉到工农革命比帝国主义对它更是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快的反对革命，乃是其阶级性之必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帝国

主义的压迫，只有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加紧，决不能因此促成阶级联合和缓阶级斗争。国民党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利用民众的工具，用抽象的“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我们不进行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状况之下）麻醉住工农群众意识，不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武装，而只是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夺取江山，资产阶级独享胜利之果，而且马上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我们加入及留在国民党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经过国民党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与它联盟，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模范的表现之一。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固然，无产阶级随着革命发展之现实的环境，要团聚一切革命势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着眼是在群众，尤其是下层劳苦群众，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所领导的民主政党。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自己方面来，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要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鲜明的旗帜。有时可以甚且必须在一定的明确的行动纲领上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联盟；但这个联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去揭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与欺骗，以夺取广大劳苦群众在自己的政治影响方面来，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迁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组织上与它混合起来，以“集中革命势力”！从前第二国际即主张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合并，他们常说：不懂得在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分而为三。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德国 1848 年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尚保持和劳动者同盟对封建党及大资产阶级的党作革命的反抗；马克思在 1850 年 3 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共产主义同盟的信，严厉的指出这一同盟者的危险性，指出它们号召一切民主派联成一大反对党之欺骗，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独立政党，

他说：“即为对付共同敌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组织，对敌直接斗争时，两党利害一时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时的结合。”过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而是采取了从前第二国际的意见，特意把国民党装成一个狮子灯，我们都钻在里面去舞。像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则遇事掣肘和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经过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并且要丧失我们自己阶级的群众。

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即城市乡村的贫民联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苏维埃，即是由工农贫民兵士的广大群众选举代表组织的苏维埃，它的任务是武装群众及指挥群众的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机关。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高潮中，为要跟着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是“过火”，在组织上把农民协会及店员小商人的组织工作通统交给国民党，不许组织苏维埃；他们竟至说：“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革命的作用与1905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作用是一样”“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和张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斯大林）。“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布哈林）。他们的错误，完全由于迷信少数派的阶段论遮住了眼睛，不去观察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内容和当时民众革命斗争急激进展的环境，以至盲目的反对建立苏维埃；它们完全不认识不但南京的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已日渐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马日事变后，他们和蒋介石张作霖已经没有区别，此时国民党资产阶级（凡是剥削劳动者的大小资产阶级都包含在内）参加民主革命的历史已经告终；同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国民党一致承

认“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打破了各阶级联盟，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开始由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革命性质已经开始转变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至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即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在北伐开始时就应该在北伐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苏维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变后即应建立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由二重政权进到推翻反革命的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始终拘泥民主革命的阶段，始终迷信国民党，始终想用大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代替了工人与乡村城市贫民群众的苏维埃。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争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推翻国民党的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通告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一直到国民党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运动已经一败涂地。此时反而突然想起用苏维埃的口号，作夺取政权的冒险尝试。

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但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守，上海广州长沙汉口的共产党党员及工农群众相继被屠杀后，没有一点有力的反攻，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已完全走到反动营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都已经结合起来，革命分明是失败了，此时即应马上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做改守为攻的准备。当时党的政策恰与此相反。联共及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布哈林此时企图以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政策之绝望，以抵制反对派的非难，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国，以国际名义包办“八七会议”，在此会议中，既未便根本的系统的指出改正机会主义（仍旧说留在国民党有四大理由，仍旧主张站在国民党左派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又加以从莫斯科带来的事实：“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中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

形势”，经过翻译员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之手，造成了盲动主义。当时党的领导者，以为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的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如有同志对于革命高潮及中央政治路线表示有一点怀疑，对暴动有一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严重的打击，严厉的命各级党部改组并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所谓“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凡不赞成此新的路线者即不许其登记，甚至开除已登记的同志。不仅命令党部，而且命令群众，命令他们无条件的乱动；以至盲动的情绪和大大小小的暴动普遍了全国所有我们党有组织的地方。从“八七会议”到“六次大会”乃是整个的暴动时期，在此时期中，党的领导机关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用中央绝对正确的路线，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党的本身更加溃散，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堕落，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

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大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

二 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

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机会主义的批评，并未曾把中共中央在革命高潮中所执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之根本错误（没有及时退出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没有组织苏维埃等）指摘出来，因为这样便要侵犯到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之本身，而只是指出中国党三种主要的错误（一、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二、不能了解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三、党没有成为广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这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共产国际所指示的六次

大会所议决的新的政治路线：将来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的政权性质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应联合富农而不加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他们虽然口头上大喊反对机会主义，而这些实际政策，仍然没有转变到另一阶段，仍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对于盲动主义的批评，虽然口头上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也同样因为要掩护国际自身的盲动主义，未便指出中国党在革命失败后，按照当时全国总的形势采用暴动政策是根本错误，而只是指摘中国党对暴动政策机械的应用，没有事先组织好，玩弄暴动等等，这也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暴动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公开地说：“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走向革命的大道。”并且更说：“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六大决议案）“我们的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国际代表的政治报告），所以第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通告，开口便说“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国际更进一步训令中国党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这分明是国际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极力供给中国党以盲动主义之前提。对于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探本溯源的把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指摘出来，便不能得到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因此现在党的政治路线，仍旧沿着机会主义进行；对于盲动主义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没有正确的估量，便不能了解目前的革命形势，因此现在党的工作路线，仍旧沿着盲动主义进行；政治路线工作路线，事实上日益证明破产，因此现在党的组织路线，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联共的现行党制厉行官僚主义，借以箝制党员群众的异议，来保持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国的国货，都是斯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没有相当时期经过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斗争锻炼的中国党，自己本没有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过去及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

国际。但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应该负责任的；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仍旧继续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经反对派明白指出，依然毫无觉悟，而且自觉的掩护错误，这简直是罪恶了！我们对于过去革命之失败，只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错误，彻底的改正错误，并且坚决的参加反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斗争，对于革命才有实际意义，这才是我们正当的道路。

现在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国际及中共中央一致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理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中国还是封建势力的统治，并且中国还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势力占优势。现在的国内战争还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战争。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因为他们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势力。第三党最近发表的政治主张说：“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社会，而掌握国家政权的便是封建势力，支配社会关系的，……最显明的亦是封建阶级的剥削。因此，分明的表现，中国革命还没有通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动统治势力的政治中心便是下级的封建势力，构成反动势力大联合”。“社会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而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中国目前的革命运动，如果不针对着封建势力，可以说绝对收不到集中革命势力的实效，必归失败。”这些话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及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没有两样。

我们以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

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自国际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并且全国一切形式的经济之最高统治，都在本国的15000万元以上银行资本依赖外国的58万万元以上银行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乡村主要部分经济都直接间接隶属于市场，因此城市经济绝对的支配了乡村，因此一切封建残余的政治势力都不得力求资本主义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种个人私有的资本而不是封建的领土，地主已资本家化，城市及乡村所遗留一些封建式的剥削，乃是资本主义袭用旧的剥削方法（以前美国的黑奴及现在南洋群岛的猪仔，还是封建前奴隶制度）；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乃是生产停滞，农村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国共有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产物；若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中国不占绝对优势地位，则只是常识的判断，而不是科学的观察。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经过两次革命，已经掌握政权，社会阶级势力之转变，更是异常明显。在民众斗争发展上，已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火”；并且广州上海汉口的工人和两湖的农民，已经有过相当的二重政权的形式，广州暴动中且出现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开始了社会革命的行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1925—1927年中国革命已经是将来第三次中国大革命的预演，在第三次革命中各阶级的行动与变化，给了我们许多丰富的材料，使我们能预测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远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及土地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取得政权，才能彻底完成，换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城市及乡村中都与帝国主义经济及现在的土地关系有很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它决不能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以土地给贫农，而且当革命高潮时必然坚决的反对工农运动“过火”，无产阶级没有与他们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二日即应进行没收中外银行及大工厂企业，打破私有财产制。在农村中，因为土地在资本家化的地主之手，富农多兼高利贷与商业剥削者的资格，是贫农与雇农仇视的中心，是农村贫民革命的对象，当然在乡村中更无与富农联合战线之可能；我们应该领导贫农，反对富农，使中农中立。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而不是为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站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民主专政奋斗。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了一种反动的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依据这样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和政治路线，已经演了过去可耻的悲惨的失败，现在又在准备重演将来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现在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所表现的是：不承认资产阶级是胜利了，不承认过去的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前提之下，强迫罢工，每个小的经济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斗争，不断的命令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召集小组或支部会议时，都照例不讨论政治问题，不讨论日常生活斗争的工作方法，只简单的传达上级机关命令上街示威，散传单，贴标语；无处无事不采用盲动政策，无处无事不实行“自己失败主义”，弄得党内党外群众都感觉没有一点出路，党的下级干部同志都感觉着在中央路线之下无法工作，党内工人同志都一天一天感觉着党的政策和行动绝对不适合工人群众目前的需要与可能，尤其是盲动的命令逼得他们一批一批的与党无形脱离，因此各生产机关的支部已凋零不堪，党员数量及无产阶级的基础已削

弱殆尽，像汉口，长沙，广州，这样重要的中心都市，连党的组织都没有了。党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更等于零；铁路，矿山，纱厂，丝厂，五金等重要产业工人都没有群众的组织，就有点组织也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海员方面也仅仅有点线索，在这样状况之下，革命高潮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以为：自从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盲动主义根本破坏了工农组织，减弱了工人阶级之阶级斗争的力量，形成了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我们在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我们的党，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恢复和工农群众的联系，恢复群众的组织，以积聚自己阶级的力量；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即因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和经济相当恢复而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与其政党军人间之冲突，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间之冲突而开始的民主立宪运动之趋势，我们应利用这种趋势，而力争彻底的民主主义做我们目前过渡时代政治斗争形式，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缩短反革命的现阶段，开辟新的革命环境，走向将来的第三次革命。民主要求口号，现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工人群众还需要，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身，也须有相当的政治自由才能够实现其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之民主集中制。因此，我们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即力争由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必须如此才能够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公开的现实政治斗争，不断的扩大斗争，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拥护劳动大众——全国多数民众权利的苏维埃政

权。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主张积极的号召及参加，力争其彻底民主化，而不主张消极的空喊苏维埃来抵制；因为“苏维埃政权”必须由“武装暴动”来产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而不是行动口号。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做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党的力量。同时，我们更不是主张用国民会议来代替苏维埃，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斗争来发动广大的下层民众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走向“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

现在的中央，一面大喊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大喊苏维埃政权，大骂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人，大骂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的人是取消派或反动派，并且发出“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和“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同时一面又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这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没有号召群众行动的政治号召，只有盲动，只有继续长期的离开政治舞台。

最近党的政策，不但极力发挥国际对于中国现局势盲动主义的观察之谰言，丝毫不了解民主运动在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机会主义的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不断示威，双管齐下，表面上说是采取失败主义，实际上是命令同志帮助改组派做“反蒋运动”，并且在香港参加各派的反蒋会议。不领导民众做公开的政治斗争，而跟随改组派将军们做军事投机，这不但是离开政治舞台，而且是葬送党的政治生命！

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所表现的是：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莫克拉西，以夸大的虚伪的报告，从国际直到中国党各级机关，上下互相欺骗，以欺骗群众。团结无原则的系

统，如周恩来所领导的黄埔系，项英所领导的全总系，拥护个人的势力，各自庇护私人，互相排挤，任意摧残有政治自觉的党员；以大批开除党员的手段来解决党内的政治问题；置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于全党全阶级的利益之上，以借口“敌人进攻”，“时局紧张”，“秘密工作”，“铁的纪律”，……等，箝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布尔什维克热烈争辩的精神为官僚的盲目服从，从支部到国际活像君主专制之下从地保到皇帝一样，只许说一声“是！”，否则马上便有不测之祸，因此所有党员都不敢说一句心中所想说的话。

现在党的统治机关的官僚们箝制党员之最大的武器，要算是“铁的纪律”；党员也因为迷信这一武器自己束缚了自己，对于官僚们的统治，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我们以为：“铁的纪律”自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铁的纪律之基础“第一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之觉悟及其对于革命之忠诚，能自主，勇敢牺牲；第二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和无产阶级以至半无产阶级广大的劳苦群众融成一片；第三是极广大的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它的策略与战略是正确的，没有这些条件，一切要创造这个纪律的企图，都必定变成废话，矫饰，欺诈。”关于服从组织纪律的限度的问题，列宁又说过：“我们曾经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以无产阶级，若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的统一。所以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永不应该忘记有非常严重的原则之违犯，竟至逼令我们必须与一切组织的关系决裂。”现在党的官僚们的所谓“铁的纪律”，恰恰和列宁的遗教相反，恰恰是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已经明知党的策略与战术是错误的，而他们还不顾一切的继续执行，恰恰是不容许党员对于他们错误的策略与战术有讨论和批评的自

由，恰恰是官僚们用为掩护自己错误和维持官僚统治的工具；这样的“铁的纪律”，除废话，矫饰，与欺诈而外，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的党，始而在机会主义指导之下，未能使全党党员群众参预到党的政治生活及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因此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非常之低；继而又在盲动主义指导之下，党的组织弄到残破不堪；第六次大会后，更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交互错杂，不能进前一步。处此情形之下，党的领导机关要想恢复党的基础，形成党的纪律，必须根本改变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实行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产生能够使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是正确的策略与战术，以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必如此，才可形成真正的行动统一，抵御敌人的进攻。现在党的官僚统治机关，反而利用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之低落，党员群众对于党的生活之隔阂及党的组织之残破实行任意操纵，欺骗与威吓，实行以金钱维系党员及空洞的工会机关和雇人示威，实行制止党内的讨论和批评，以国际威信和党的威权强迫党员强迫群众相信“中央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胆敢凭借敌人进攻做护符以恐吓党。这样的领导机关如果听它们仍旧存在下去，我们的党，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必然要名存而实亡，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的党从堕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

三 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略）

四 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略）

五 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反对派的责任是在使全体党员明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摆脱机会主义的领导，而回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真正民主集

中的党中,党内政治不同的意见本可由公开讨论的方法来解决,不但不会使党分裂,并且使党更加巩固。反过来,官僚主义的压制与蒙蔽,势必使党崩坏与分裂;反对派为拥护真正无产阶级的路线,为实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统一,不能不与机会主义的领导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机会主义已迭次在中国宣告其可耻的破产,中国无产阶级已付了过重的代价,直至近一年来方产生反对派的斗争,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受第三国际长期机会主义的领导与蒙蔽,直到现在才接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我们下列签名的人,认为我们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根本反对斯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国际的苏联的中共的现行政策和党制,都需要根本改变。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反对派运动得到党内多数同志同情时,斯大林也会采用反对派一部分主张和口号或更换一部分领导者,以图统驭群众的左倾;但是我们所争的乃是整个路线之根本改变,而不仅不是一时策略上的曲折,更不是简单那几个人问题。我们认为中共受斯大林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之害最为酷烈,应当是国际各国党中站在最前线勇敢的反对现在国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因此,我们提出下列建议,希望全党同志一致坚决的要求并督促中央以中共名义向国际并直接向各国兄弟党提出;同时我们应该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为下列各项奋斗到底:

- 一、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对派,释放在监狱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等处的联共及其他各国反对派同志,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斯基同志的领导工作。
- 二、公布五年来反对派对联共及国际政策发表的各种文件,公布列宁遗嘱及其他被斯大林派隐藏着的列宁遗著。
- 三、重新审查五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

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政策。

四、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并立即公开的讨论根本政治问题。

五、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

六、改组联共及国际与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

王阿荣	王永庆	王芝槐	王视民	王畅	王绍华
王季平	王大昌	尹宽	左斌	史文学	江鸿生
汪常师	江又容	李果夫	李季	李轩	李静涛
朱崇文	朱继熹	朱天章	何炳根	何资深	杜谦
杜发义	杜琳	汪泽楷	汪复兴	汪复盛	林金生
余伟	吴季严	吴若萍	吴琢辅	岑舜乡	马玉夫
马图	徐竹林	段浩	段震亚	孙平州	高语罕
梁筱山	庄季贞	陈洪	陈碧兰	陈独秀	陈其昌
张虚	张以森	张素秋	张胜秋	张阿宝	屠景山
屠维纳	陆沉	程裕和	汤正	彭桂生	彭桂秋
彭述之	单直夫	叶录堂	董江素	刘右山	刘静真
刘伯庄	刘毅	刘逢鼎	潘希真	潘伯华	蔡振德
郑重	郑超麟	蒋石甫	钱又萱	薛农山	罗世藩
韩治臣	顾幸到	顾满			

(附记) 以上是我们签名者今后的集体意见，以前个人所发表的言论，概由个人负责。

(选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

四、附 录

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

(1929年9月)

立 三

一 引 言

一 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在国际上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托洛茨基已经成为张伯伦的朋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认识托洛茨基反对派是帝国主义反苏联反世界革命的工具之一。过去已经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只要不愿成为反革命的，都已经回复到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一致奋斗了。

二 托洛茨基主义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已经经共产国际批评得体无完肤，毫无重新讨论的价值。可是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正确的去认识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想躲藏到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误。他们的口号是：“中国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任”，“我们固然错了，共产国际也错了的”；

* 本文系李立三为《中国革命与反对派》一书所写的代序。

这样自然接受了“只有托洛茨基主义才是正确”的结论。

三 中国的机会主义其所以归结到托洛茨基主义，当然不只是一个简单躲避责任的观念，而是在他们理论的基础上有他们的共同点。所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他们理论上的共同的错误点。

四 现在托洛茨基反对派其所以会成中国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机会主义的思想与他们汇合起来的原因，所以我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一定要同时指出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反对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然后才能根本肃清反对派的思想。

五 现在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自然主要是思想上的斗争，但是反对派如果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布尔塞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当然要遵照共产国际对反对派的决议，坚决的执行党的纪律。

六 中国党过去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艰苦斗争，所以还不能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内容，所以在大纲上不能不从基本的理论说起——从驳斥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说起。

二 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中国 机会主义之不同的理论基础

一、列宁主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策略

(一) 俄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封建阶级有极强固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极幼稚。1905年的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了他的妥协动摇；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因受着惨酷的农奴制度残余的剥削而迫切的要求土地；在客观上就是要彻底摧毁封建势力。所以列宁主张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策略应该是：

“引导民主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使之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绝缘，促成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并推动群众彻底摧毁一切农

奴制的残余（连地主经济在内）的斗争。”

（二）所以列宁主义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中总的口号是：“推翻封建政府，建立工农政府”。

（三）工农政权“不是秩序的组织，而是战斗的组织”（列宁）。这就是说工农政权的任务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在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反对妥协动摇的资产阶级，很快的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胜利。

二、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基本策略

（一）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策略，是整个世界革命理论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主要的特征，就是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都征服在他的垄断与财政资本的统治之下，于是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生存发展的主要的支柱。所以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在客观上都是帮助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所以无产阶级的策略应该把殖民地从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中夺取过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二）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落后的国家中，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应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妥协或合作，但是绝不能与之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虽然这种运动尚在萌芽的时候。

（三）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当中，应极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假如资产阶级在与帝国主义斗争中失掉了他的革命精神时，无产阶级应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使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并保证无产阶级在农民斗争中的领导，以领导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之彻底完成。

（四）落后国家得到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帮助，能转入苏维埃制度，经过一定的发展的阶段到共产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五）这就是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基本策略，其所以

采取与资产阶级暂时协作的策略，是站在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观点上，而不是采取了俄国革命中的孟塞维克的策略，这是很易于了解的。

三、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不断革命论。主张推翻封建政府直接建立工人政府，超越资产阶级性的工农政权的过渡阶段。

(二)不断革命论并不是托洛茨基发明的理论，马克思在1850年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就提出来了。他说“当民主的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大部分民主的要求，即欲结束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利益，我们的任务就在使革命不间断的继续下去，直使富有的阶级失去统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的本意是主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应当一步一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各派，最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爆发革命于一切国家，这与列宁领导俄国革命进程中所实现的完全一样。

托洛茨基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 and 名词，却把他的理论基础修改了，涂污了，主张推翻封建政府以后直接建立工人政府。

(三)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是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革命的顶点，而托洛基斯的不断革命论则以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这里就发现着托洛茨基主义忽视农民在革命中伟大的效能。不知道无产阶级必须尽量的发挥农民革命的效能以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不知道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取得农民，决不能战胜资产阶级而领导革命的彻底完成。所以托洛茨基主义完全没有实际策略的意义，只是“口头的革命家”。

四、中国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二次革命论。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中，革命的动力一定是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夺

取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只有帮助资产阶级，而不应参加政权，同时准备自己的力量（事实上便不会准备自己的力量），做将来第二次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把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中间建造了一座人为的万里长城，而不知道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就是完全的孟塞维克的理论。

（二）孟塞维克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中主张与资产阶级联合，同时反对参加临时政府，主张积聚力量，准备坚决斗争以反对资本主义，列宁嘲笑他是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

（三）中国的机会主义者看见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中与资产阶级暂时协作的一点，而没有认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经过工农政权领导革命彻底的胜利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条整个的路线。因此把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策略变成了孟塞维克的策略。

五、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机会主义的共同的错误

（一）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机会主义者不认识农民的革命作用，所以主张拥护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而不认识联合农民去建立工农政权；为着求得资产阶级的谅解而极力阻止农民的土地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因为不认识农民的革命作用，所以主张工人阶级孤独的去革命，所以主张推翻封建政府以后直接建立工人政府。

（二）不明白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关系，机会主义者以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时候，革命的动力一定是资产阶级，所以主张推翻封建政府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而托洛茨基主义以为无产阶级只应做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主张推翻封建政府直接建立工人政府。这都是认革命的性质与动力有互相决定的关系，而不知道革命的性质是决定于革命的客观的任务，而不决定于革命的动力，这就是说，革命的动力并不能直接决定革命的性质。所以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动力来完成，而无产阶级在资产

阶级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无产阶级常常要执行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因为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之彻底胜利，就是转变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三) 因为托洛茨基主义与机会主义有这样共同的错误点，所以列宁常常讥笑托洛茨基主义是半孟塞维克主义，所以中国的机会主义的思想也可以与托洛茨基主义汇合起来。

三 中国大革命问题的争论

一、根本路线的争论

(一)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完全是依据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积极的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很明显的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作用，所以无产阶级应当与资产阶级暂时的协作，形成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推进这一革命更有力的向前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在这一民族联合战线中要力争革命的领导权，使这一革命不致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半途失败。

国民党原来就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他成为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所以共产党应该加入进去，并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加入进去，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同时保存共产党的独立的的活动，极力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以监视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

这样可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更快的发展，在客观上便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很好的助力，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在这一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可以很快的壮大起来，而渐次夺取并巩固在这一革命中的领导。

(二) 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认为资产阶级对革命是妥协的，无产阶级开始活动，便应当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决不应与之协作。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所以不应加入，而应该反对，就

是根本不同意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这是完全不了解应当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的后备军中夺取过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这一重要的策略，中国革命历史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一观点的错误了。

托洛茨基表面上用列宁主义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的策略来反对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策略，这已经是错误的了。实际上还是用他的不间断革命的理论来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因为他始终没有注意到中国最严重的农民问题，同时还造出中国没有封建剥削关系的奇怪理论来证明他之不要农民的观点为正确。

(三) 中国机会主义的路线，执行了共产国际与资产阶级暂时协作，加入国民党的一点，但是根本不了解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整个的路线。不只是不知道加入国民党应当保存共产党的独立活动，并且主张一切工作都归国民党，甚至认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只是不知道无产阶级应当毫不放松的对同盟者的资产阶级的动摇给以严厉的批评，力争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公开的主张对资产阶级让步，牺牲阶级的利益去服从民族利益。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当时有一种所谓左倾的意见，认为共产党可以加入，但应保留工人群众不加入。他们的理论基础一样的是二次革命论，一样的不了解争夺领导权的策略，所以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的表现。

所以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是无疑的正确的，而中国的机会主义者开始执行的时候，便把他修改成为孟塞维克的路线了。

二、武汉时期的争论

(一) 共产国际的路线，认为在实行联合战线的开始，便应一点不放松对于资产阶级妥协动摇的批评，到了北伐的过程中，便应积极准备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是决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已成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更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极力深入土地革命，使

广大农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与无产阶级亲密的合作，并且要尽可能的武装工农群众以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同时对于还留在革命方面的资产阶级，应以坚决斗争的精神去领导他，对于他的妥协调摇，也是要毫不让步给以严厉的批评与监督。

因此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分子不断的排除出国民党去，引进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使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实联盟，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准备着进一步的排除动摇的上层的小资产阶级，而转变到工农民主政权，继续着便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形式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实行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

共产国际在1927年2月第七次扩大会议便提出了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口号，在5月第八次扩大会议，便提出了工农政权的口号。同时指示应当坚决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参加武汉政权，极力武装工农等。当时中国党执行的策略却恰恰与这一路线相反。

(二) 中国的机会主义是一贯的孟塞维克的路线，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怠工。在北伐的过程中固然没有准备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在蒋介石叛迹已露，上海的三次暴动，还是采取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不只是没有积极去领导土地革命的深入，而且跟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实际上就是跟着南京派的尾巴，谩骂工农运动过火。不只是没有积极去武装工农，而且自动的命令解散工人纠察队，禁止湖南农民以暴动来反抗马日事变的屠杀和叛变革命的将军。对于引进广大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始终没有执行；对于参加武汉政府始终怠工，劳工和农民两部成立数月之久没有进行丝毫的工作。很明显的这一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相反。所以中国革命失败主观方面的错误，完全是中国的机会主义违反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决不是共产国际根本路线的错误。

(三) 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当然是依据他的一贯的路线，认

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决不是什么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以主张在武汉时期应当建立一个苏维埃的政权来与上层的国民党政权对抗,就是要以苏维埃的政权来推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结果自然是要举行一次革命的暴动。

许多同志在根本上不同意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而对于托洛茨基主张在武汉时期两重政权的策略,却认为是对的,这是不正确的观念,这是没有正确的了解共产国际的路线。如果承认武汉时期应该有两重政权的对立,便要承认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决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更谈不上革命政权内部的转变了。这就是承认共产国际根本路线都错了。

所以两重政权,与革命政权内部转变之争,根本上就是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或者是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之争。如果承认共产国际要使国民党成为民族革命各阶级联盟,进一步转变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路线是正确的,那么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是无疑义的正确,而托洛茨基主义的两重政权再来一次革命的路线便完全错误了。至于因为镇压武汉政权下的一些叛变将军如夏斗寅许克祥等事变的军事行动,自然需要工农武装做中坚,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联盟中的领导,但决不是推翻当时武汉政权再来一次革命的武装暴动,而是不断地将一切动摇在妥协的上层小资产阶级领袖和叛变的将军以至资产阶级的残余断然地排除出去,而更顺利地转变到工农民主政权的实际中去。

四 现在革命问题,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革命机会主义的观点完全一致了

一 中国革命的失败,是整个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失败,而不只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失败,因为土地革命没有完成,帝国主义的统治特权并没有消灭,而且在革命失败以后,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统治都恢复起来了。所以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驱

逐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所以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托洛茨基主义与机会主义因为有了共同的忽视农民革命作用的观点，所以对于土地革命没有完成的重要事实，完全没有注意（本来他们根本就否认中国有土地革命的存在）。因为都不了解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关系，所以看见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便以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而不知道资产阶级并不是因为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政权，而是投降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势力，得到了一部分的政权，所以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政权，而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并未完成，所以无产阶级目前的任务仍然是要坚决的继续领导这一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彻底完成，以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

只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一点没有完成，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根本矛盾，一点没有消灭，所以必然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第二次的革命高潮，现在客观事实的发展，充分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的机会主义的观点都认为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矛盾完全消灭了，因此他们说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不会再有革命了，或者说中国革命从广州暴动以后便完全死灭了。现在革命已经死灭了吗？这是每一个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给他一个否定的答复的。

二 所以机会主义转变到托洛茨基主义，是因为他们根本观点上有他们共同点，完全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想努力把这些走上了歧途的同志从托洛茨基主义泥坑之中挽救出来，使他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一致的奋斗，单只能评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是不够的，而且要指出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以及他们所以会走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原因，然后才能使他们得到彻底的认识与了解。

五 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危险

一 中国是比俄国更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农民问题，比当时俄国还更要严重。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决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再不然就只有等候资本主义消失了这一过渡阶级的农民群众，再来举行革命，这就是所谓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才有革命高潮的根本观点吧。实际上这一观点已经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只有工人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才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了。所以托洛茨基主义忽视农民革命作用的观点，对于中国革命是更加危险的倾向。

二 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主要是封建势力，所以不消灭中国的封建势力，决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同样不驱逐帝国主义决不能根本消灭封建势力。所以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是现在革命两个最严重的而且是不可分离的任务。现在反对资产阶级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力的保障者。托洛茨基主义，只要反帝国主义与反资产阶级，而不要土地革命，这就根本无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第二个严重的危险。

三 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完全失败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得到重新的恢复与巩固，所以中国革命的根本危机一点也没有解决，而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决不能解决危险，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到来，决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政权稳定的时期。托洛茨基主义认为革命已经死灭了，所以完全放弃对于这一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领导，坐待社会主义的到来，这就无异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统治的延长，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第三个严重的危险。

四 托洛茨基主义在革命性质的估量上似乎是很左倾的。在革命形式的估量上完全是到极端右倾的方面去了，所以到了斗争

的实际的策略上,更完全成了坐待革命的不动主义。如提出一些他脑筋中空想的“议会运动”的策略等。列宁批评托洛茨基主义只是口头的革命家,真是一点不错的,我们号召走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同志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做一个实际的革命家。

(录自《中国革命与反对派》,上海民志书局 1929 年 9 月出版)

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论*

(1929 年)

罗 易

国民党的分崩离析,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急剧的转折点。民族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过程(一个同革命运动同时发生的过程),达到了它的顶点。国民党在几年时期内,联合一切反帝民主力量的作用,证明已经完结。阶级斗争以其最尖锐的形式同民族斗争交织在一起,而最后,国民党背叛了国民革命。国民党不仅抛弃了它在几年之内曾经维护过的民主自由原则,而且在严酷的阶级冲突中,它本身也陷于四分五裂。

革命在不同阶段的转变期中,遭受了一系列相当严重的挫折。这些挫折引起人们怀疑在革命最初阶段对待国民党政策的正确性。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及其在各国的追随者说,共产国际错误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招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回答下列两个问题,就可以消除上述怀疑,同时可以证明那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原系罗易为他编的《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一书写的前言。——编者注

1. 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就是说,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之联合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

2. 共产国际是否预见到了革命发展所造成的局势?它在这种局势中是否掌握了正确的政策?

本书对第二个问题所提供的答案是:

1926年底,共产国际对北伐战争后出现的局势已有充分的了解。共产国际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国民革命军打垮了北洋军阀,从而在整个南方严厉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威风;但同时,它清楚地预见到随着军事胜利而来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共产国际预见到资产阶级将背叛国民革命,并提出了组织革命民主力量作为革命发展新阶段的基础的对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案对新形势概括地提出了总的切实可行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后来的一些决议又将这些指示具体化。然而,仅有一个明确的前途和正确的政策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要有将这些政策付诸实现的工具。本书所载文件提供了详尽的论据,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其政策的工具本身的缺陷,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任何一个国家,共产国际之所以能够对局势施加影响,首先是通过它在该国的分支机构。中国共产党不了解共产国际决议的全部意义,不能按决议行动。还有,在危急时刻中共领导人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招致失败固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客观因素;然而,决定性的因素是党在革命危急关头所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缺乏应付紧急局面的能力,诚属可悲,但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党太年幼,在完成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时,难免不犯错误。党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如果谁忽视了(事实上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党的年幼,党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不成熟,以及在革命危急关头指导上的弱点(这是决定性的因素),那就只能说明他低估了党在革命中的作用。本书说明了上述各种因素对时局的影响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中国共

产党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刚刚渡过两个年头，就直接面临着领导千百万人民进行革命的任务，它的敌人是世界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包括资产阶级）的强大联盟。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0年（原文如此——译者注），然而直到1924年还是一个狭小的组织，对全国政治生活影响甚微。同样，这个狭小团体对大革命的思想准备也未能起什么明显的作用。除了这个与群众没有什么联系的知识分子小圈子外，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中国实际上是无人知道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传统。1925年和1926年间，党在数量方面获得巨大进展，其政治影响尤为增长。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有55000名党员，共青团员为33000名。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完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共产党员在全国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最积极的因素。但是，党的领导未能跟上这种组织上的骤然发展。这是很自然的。由于党非常年幼和缺乏理论准备，它没有造就这样一批干部，从中能够产生应付紧急局面的新的领袖。党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斗争时期中发展起来的。在上海五卅运动、香港海员罢工、经年累月的省港罢工和对外经济封锁、北伐战争、上海武装起义、攻占汉口等等这样一些斗争中，党吸收了新党员和扩大了政治影响。结果，党经历了一次真正的质变。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小组织，突然转变为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党，领导着参加这场大规模革命斗争的250万有组织的工人和大约900万有组织的农民。然而，党的领导仍然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被事变的发展弄得不知所措，不能驾驭局势。几乎所有共产党的第一流的领袖都来自国民党队伍，并带来国民党的改良主义传统，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同时，党太年幼，不能从自己队伍中提拔新的领袖以代替老的领袖。

共产国际在中国借以开展工作的工具就是如此。本书对于这些无法回避的困难作了明确的交代。由于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的顽固对抗，一项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的正确政策是不可能贯彻下

去的。另一方面,还是由于这个具有改良思想的领导集团的干扰,虽然党在本质上是健康的,群众也有斗争的决心,但同样对局势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长沙的反革命政变立刻激怒了农民,他们从四面八方方向长沙城进攻。在城里,驻扎着为反革命军官指挥的大约2000名士兵;向他们进军的,大约有22000个部分武装了的农民。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省委接到中央委员会的密令,禁止进攻长沙,要农民撤退并解散,说什么唐生智自己能够控制局面。内政部长(共产党员谭平山)拒绝发文批准武装8000农民,中央政治局亦不坚持谭平山采取这一行动。人们能够举出无数同样可悲的事例来证明领导集团的软弱无能、机会主义和半国民党性质,证明党的领导未能使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可能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共产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来源于共产国际先前在中国的政策。那就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就是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同国民党联合的政策是否正确?

这项政策的一切后果表明,回答必然是绝对肯定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任务,同在一一切殖民地国家一样,是动员一切可利用的力量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非常明显,组成反帝队伍的各阶级不可能全部动员到共产党的纲领之下。因而,必须寻找一个达到这个目的的更加广泛的基础。基此理由,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出发点,就在于支持国民党,给它人力和物力的援助,以期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多年以来,国民党仅仅在名义上存在着。它是由一些分散的团体和从事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的社团所组成的一个(非官方的)无定形的联盟,主要接受海外富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国民党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其政纲极端模糊;其组织异常涣散;其活动多半带有阴谋的性质,依靠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军事集团,利用

一些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国民党的运动在群众中没有根基。但是，由于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事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留下了一些民主的传统。总的说来，国民党的纲领就是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国民党恰当地、有力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对外国奴役的憎恨。

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支援下，国民党成为一个具有革命民主纲领和具有率领有力的反帝斗争所必需的组织形式的政党。国民党已经抛弃了过去的阴谋外交和单纯军事行动的传统。它开始面对群众，认识到群众的积极参加是反帝斗争胜利的首要条件。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加入国民党，正是在国民党改组的时期。在此之前，共产党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主要由急进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同全国政治生活没有什么重要的组织联系。为了共产党的发展，首先必须摆脱这种孤立状况。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能同民族革命运动取得组织联系，并有机会对运动施加影响。

实行这个策略的结果，民族革命运动就成为在国民党旗帜下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共产党普遍深入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中，并成为他们的领袖。如果共产党不作为国民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把劳动群众动员到反帝斗争中来。这就是革命的第一阶段——广东阶段。国民革命的党组织起来了。这个党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共产党在相当范围的地区内，得以自由地、合法地建立强有力的工农组织。为群众所拥护的国民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打退了帝国主义从香港发动的进攻，并粉碎了同一帝国主义所鼓动和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军事行动。还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总之，国民革命有了足够强大的基础，并行将向全国其他地区发展。接着，北伐战争开始。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共产国际的政策仍然是支持国民党，以便将国民革命推向其他省份，铲除北洋军阀，他们正以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身份统治着上海和整个长江流域。北伐战争给共产党一个千载难逢

的时机,使其能够在许多省份的群众中进行革命鼓动。千百万至今尚未接触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不仅卷入了运动,而且在共产党的单独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军事上的进展增强了国民党中封建资产阶级的力量,他们后来背叛了革命;但与此同时,革命的群众基础也极大地扩展了,足以抵抗来自右派的任何危害。封建资产阶级领导的军队所取得的胜利,对他们自己来说,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北伐战争的胜利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革命胜利。北洋军阀在长江流域遭到的毁灭性失败,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及在整个远东的势力和威风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和上海工人(他们察觉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正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的起义,是革命发展的最高峰。

国民党右翼封建资产阶级分子懂得,革命正在威胁他们自己,共产党人支持他们只是为了发展革命。实际上,1927年3月发生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的背叛,共产国际早在1926年11月就预料到了,当时它预见到革命的发展将进入第三阶段〔见文件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第五节和第六节〕。曾经设想,在第三阶段,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将放弃革命,革命将建立在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基础之上。在这个阶段,革命必须在没收土地和民主专政的口号之下进行。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概述了中国革命的这一发展过程。

当封建资产阶级分子背叛革命的时候,支持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包括叛变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机关的国民党左派,尤为必要。中国城镇人口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国社会极重要的因素。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充满坚决的反帝情绪,他们支持国民党。农民运动是在国民党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在农民中有相当的权力。即使是在工人群众中,国民党仍然享有很大威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队伍中,并使国民

党成为一切革命民主力量团聚的中心。这就是武汉时期的策略。这时，国民党仍然是国民革命的党。共产党不能同国民党破裂，因为它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攻击。群众仍然信赖国民党，同国民党破裂将在群众中造成混乱。

在武汉时期，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在于使它永远摆脱已经背叛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影响，把它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专政机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以投降代替联合。他们的机会主义阻碍了群众革命行动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土地革命的发展，而土地革命是能够粉碎反革命势力的。假使土地革命得以开展，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革命将不受阻碍地继续发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但是，实际情况是，正当革命的发展应该超越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时期，革命却遭到一系列的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客观条件，即力量组合的不平衡。然而，共产国际在此后革命发展过程中所执行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已经创造了非常巩固的群众基础，如果在那个紧急时刻，有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是可以使力量转为平衡的。这样，革命就会在持续高涨的运动中发展，并将取得最后胜利。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 1930 年学术讨论会记录^①

1 月 25 日会议

主席

现在由科穆纳尔同志作报告。

科穆纳尔同志：

历史往往会重演。在 1905 年的俄国，我们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三种不同的战略计划：一是布尔什维克观点，二是孟什维克观点，三是托洛茨基观点。

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问题上，也有这样三种不同的观点。这就是：共产国际各项决议和各种文件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孟什维克观点即陈独秀路线，以及托洛茨基观点即托洛茨基于 1926 年—1927 年提出的托洛茨基路线。

首先，我们来分析陈独秀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陈独秀是怎样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呢？他说：“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两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② 那末，请

* 这份资料的注释均为原编者所加。

① 本文经过删节。——俄文编者

②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新青年社版）第 33 页。

问，这种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非资产阶级革命呢？陈独秀的回答是，这种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说：“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到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① 在中国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其意思是，在中国，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

陈独秀还说：“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②

为什么陈独秀就中国革命的性质所下的定义特别引人注目呢？因为，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仅仅在于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谋求若干政治自由。他只字不提土地革命。陈独秀不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实现土地革命。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是与共产国际的决议背道而驰的。共产国际在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不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要知道，民族问题本身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凡是有民族压迫的地方，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充分发展起来，因而农民必然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我们可以援引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怎样说的呢？他说：“……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也说明农民是

①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新青年社版）第 34 页。

② 同上，第 33 页。

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① 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文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陈独秀不懂得这一点。他没有把土地革命的任务视为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只要分析一下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动力论述，就可看清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他认为，既然是国民革命，资产阶级就应当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他这样说：“……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的统治阶级。”^②

这段话，不仅说明他对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估计，而且也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看法。他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就应当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因为，如果我们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革命就会失去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当然，没有社会基础的革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绝不主张一个阶级代替另一阶级去完成革命，陈独秀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应该代替资产阶级去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一窍不通。当然，必须指出，布尔什维克不能机械地把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策略搬到中国革命中来。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其特点是：它发生在半殖民地，除解决土地问题外，还得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这一方面它不同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如果不了解这一区别，机械地把俄国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硬搬到中国，那就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歪曲。

① 《斯大林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61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1984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256页。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认识：既然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革命的主力就应当是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完全不是这样认为的。共产国际在自己的决议中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出了如下论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是革命的，起到革命的作用，但革命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此外，在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寻找支持，但到革命的第二阶段，当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这一革命的动力就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是明确而清楚的。

陈独秀在谈到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时，把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认为这三部分在中国革命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哪三部分呢？第一部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这是在自身发展中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阻挠的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如海外侨商、长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第二部分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他们依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陈独秀把这部分资产阶级称作官僚资产阶级，用我们通常的术语称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三部分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把什么人算作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呢？小工商业家。他认为，他们没有扩大经营的企图，也没有政治要求，所以对革命采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些小工商业家在中国整个小资产阶级中占绝对的多数^①。这就是说，依他看来，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只有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能起革命的作用。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阶级。这显然是以孟什维克和自由派的观点来理解各阶级的作用。

陈独秀是怎样评价中国工人阶级的呢？他在论述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时这样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

^① 参见《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57—58页。

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的环境绝缘，……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①

陈独秀就是这样评价中国工人阶级的。他甚至说：“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也并不是少数。”^②

陈独秀不是根据该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只是根据其文化和觉悟程度来分析各个阶级。很显然，他的这一观点，与孟什维克的、自由派的关于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整个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毫无二致。那末，陈独秀给予如此评价的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能做什么呢？他说：“经受贫困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当然应该参加殖民地革命，只有参加殖民地革命才能获得某些经济的、政治的自由，例如罢工、出版等自由。”^③按陈独秀的观点，工人阶级不可能是中国革命主要的、独立的动力。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这一革命变为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更值得

①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44—45页。

② 同上，第45页。

③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中相关的一段（第46页）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译者。

注意的是，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他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年甚一年，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使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①我们认为，陈独秀在评价农民时，没有看到封建压迫在广泛范围内为帝国主义所扶持。在他看来，农民有可能参加革命，也有可能不参加革命。农民有可能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们深受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但也有可能不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们文化低下，易于迁徙，畏难苟安。陈独秀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广泛扶持的封建残余的压迫。他又说，农民没有参与政治的愿望。此外，有些农民是小地主型的农民，他们不愿意参与政治，只盼望有圣明天子、太平盛世，等等。他对农民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与俄国孟什维克的想法毫无区别。为了说明这点，下面援引俄国孟什维克分子阿勃拉莫维奇的话。

阿勃拉莫维奇说：“城市资产阶级要比自发的愚昧落后的农民更接近我们。”另一个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切列瓦尼也这样说：“农民是政治上不起重大作用的自发势力，不可能成为起义的可靠同盟军。他们在感情和信念上是君主主义的，一旦真要推翻君主制度的时候，就会成为反革命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孟什维克与中国孟什维克陈独秀非但论据和见解相一致，而且语言以至表达方式在许多方面也十分相似。陈独秀根本不想懂得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即主要问

^①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42页。

题。他把农民视为文化低下、思想保守的阶级，认为它有可能参加革命，也有可能不参加革命。从这样的革命动力观出发，陈独秀没有把土地革命的任务看作民族解放的任务。他断定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只是为获取必要的政治自由；在他看来，农民起不了大作用，因为他们在情绪上是保守的和君主主义的。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考虑的只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那么，这两个利益互相矛盾的阶级，怎样才能协同行动呢？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解释的：在中国，似乎经济尚不发达，阶级差别不太明显。资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而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因此，这两个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击败共同的敌人。他建议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作一些让步，而无产阶级最好对资产阶级也作某些让步。这样，这两个阶级就会共同行动。陈独秀的主要助手彭述之也有同样的说法。彭述之说：“国民革命乃是各阶级合作之革命，除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农民……知识阶级……。”^① 陈独秀也这样说：“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以自由派的观点来解释各个阶级。对于阶级斗争，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解释，也可以用自由派的观点加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与自由派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张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引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直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陈独秀则全然不是这样认识。他认为在中国，阶级冲突不那么尖锐，各阶级可以和睦相处，资产阶级可以对无产阶级让步，无产阶级也可以对资产阶级让步。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各阶级合作的革命。这简直是多么美妙的前景！他以无产阶级

^①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39页。

的名义建议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缔结协定。他竟然说：“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明显，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它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①他就是这样理解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的阶级斗争的。他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性，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而是站在渴求民族解放的左翼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种阶级合作的观点势必会使无产阶级受自由资产阶级的摆布，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很清楚，他既然如此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如此低估工人阶级、漠视农民，就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着重指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思想，这对陈独秀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显而易见，他把资产阶级看作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即便他没有公开这样说，可是从他评价资产阶级的言论中可以直接得出结论：陈独秀承认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他说：“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②既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工农集中，那中国革命显然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思想就无须考虑。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觉悟太低，大多数工人不但没有认识到政治斗争的重要性、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甚至连本阶级的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也未认识到。不言而喻，像陈独秀所描绘的那种工人阶级是难以领导革命的。他在《前锋》杂志编辑部文章中更加露骨地阐述了革命领导权的问

①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 23 页。

② 同上，第 39 页。

题。他写道：“我们（指共产党员即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不是领袖，不是先头部队，而只是想在战斗中冲锋陷阵。”

如果只谈一切革命的最主要问题是政权问题，避而不谈革命胜利后该建立怎样的政权，这样看问题未免太不全面了。陈独秀在他题为《造国论》这篇纲领性文章中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写道，我们要求组织国民革命军，创建共和国。这种提法很不明确，因为共和国有各种各样的共和国，有社会主义的，也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共和国自然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他说：“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① 陈独秀完全不懂得共产国际第七次、第八次全会决议中所阐述的工农专政的思想。陈独秀认为，胜利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后的政权自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如出版、集会等自由。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与俄国孟什维克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毫无区别。这里我援引《两种专政》一书中的一段话：“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未实现社会革命之前，不能参与国家政权。”^② 还可以援引俄国孟什维克分子苏哈诺夫的话，他说：“替代沙皇制度的政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③ 总而言之，革命胜利时政权将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夺取政权，分享政权。陈独秀口口声声说他代表工人阶级，可是按照他的观点，革命胜利后该怎么办，即如

①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50、60页。

② 《两种专政》（俄文版）第396页。

③ 《革命札记》（俄文版）第17页。

何完成社会革命呢？他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无关紧要，我们不必谈它。”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一番颇为有趣的描述。他在《造国论》一文中写道：“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①这就是说，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难以坚持独厚于本阶级利益的经济制度，而无产阶级将坚持国家社会主义，所以，在这种制度下，工业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这就清楚地说明，在陈独秀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把国民革命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没有进一步实行社会革命的思想。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将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将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方式发展，这岂非咄咄怪事。后来，他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的所有上述论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和性质的看法。

此外，有必要谈谈他对国民党的看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断定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党。而陈独秀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正因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所以它不可能只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应当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应当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然，就不成其为各阶级的合作。^②也就是说，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它既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斯大林同志则完全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联盟的党，我们之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第2卷第208—209页。

^② 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第2卷第517页。

所以着重指出联盟这一形式，是因为其他阶级除参加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它们自己的政党。

总之，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是为了谋求自由，农民有可能参加革命，也有可能不参加革命。革命的领导权将由资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胜利后的政权将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它同时保卫几个阶级的利益。由上述言论得出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孟什维克的观点。谁都不想说，中国革命应当像1905年的俄国革命那样搞法。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根据资产阶级在革命初期能起革命的作用，而无视资产阶级力图达到独占性地剥削中国工农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这一革命的动力应当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力量，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过，在工农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以后，陈独秀略呈“左倾”，他的言论有所收敛，假如我们不指出这一点，那是不公正的。

我在上面所述陈独秀的言论，都引自他在1923—1925年所写的文章。上海五卅运动及其他一系列民众运动开展起来之后，陈独秀确实略略左倾。1926年，他与戴季陶论战时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①这已经不同于他以前所说的话了，但与此同时跳到了另一极端。他在《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一文中说：“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它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②

在这里他走上了另一极端，竟然说中国资产阶级是世界反动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这只是陈独秀的特定言论，因为当时他处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第3卷第87页。

② 同上，第120页。

于革命情势之中，深受革命工农群众和党员群众的压力。当时，他的言论虽有所收敛，但其观点在实质上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仍然坚持以前的观点。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唯一策略是：让步，让步，再让步。在三·二〇事件中，主张让步，当蒋介石步步进逼时，仍然主张让步，他以蒋介石是民族要人为由，坚持认为，如果蒋介石离开革命，就会削弱革命。

他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本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在俄国虽已实现，但在中国不可能很快实现，因此，各阶级人士必须开诚合作。”^①他着重强调的是，关于建立代表受反革命迫害的各阶级利益的民主政府的思想。他甚至说，我们共产党人渴求地方安宁，秩序井然，完全赞成与各阶级人士合作共事。在这一宣言中，陈独秀重复了他于1923—1925年说过的话。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提出了所谓东部和西部的理论，其目的是想回避工农运动，回避土地革命。为了远离帝国主义和富有革命情绪的工人群众和农民，他号召到中国西部去。他还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等等。

我再谈谈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异同。乍一看，似乎这是两种严重对立的思潮，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另一种是极左思潮，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比如对革命性质问题的看法。托洛茨基在题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国内生产力

^①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第3卷）中相关的一段（第651页）是：“无产阶级独裁制，……在俄国虽然实现了，……依照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译者

的发展取决于为世界帝国主义所操纵的中国关税。”他认为，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这一革命的目的是争取关税自主。这种看法与陈独秀的看法几乎不谋而合。看来，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陈独秀比较全面地论述革命，而托洛茨基只是论述关税自主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与陈独秀分子的观点也是相同的。拉狄克同志当时也曾这样说：“半数农户是佃农和半佃农，并且地租不是半封建地租，而是资本主义地租，所以，地主是商业资本家、官僚、商人，他们拿自己的钱在农村放债。”“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的工农联盟要比我们1905年那时候有力得多，因为这个联盟要打击的不是两个阶级，而是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没有封建残余，不必进行土地革命（陈独秀也这样说，无视封建压迫）。当然，拉狄克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比之陈独秀要科学些。拉狄克把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区别开，他以为他发现了一个中国庄园式的美国，但遗憾的是，陈独秀早已发现了这个美国，早就说过中国没有封建主义残余。

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但做起来又确无把握。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把陈独秀视为他们的先驱，因为陈独秀曾建议汪精卫派代表去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这一意见。托洛茨基主义是俄国孟什维主义的一种表现和补充。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看到的也完全是这种情况。

我不想以此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主义之间毫无区别，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对土地革命即对农民的看法的一致，足以说明陈独秀现在为什么会在中国革命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如此容易地站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由于时间关系，对于陈独秀当前的立场，我不想再谈。

共产国际同陈独秀主义及其变种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共产国际在各项决议、指示、电报中对危害中国革命的陈独秀路线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不仅在理论上展开了斗争，而且对陈独秀主义采取了组织措施。^①

最后，有必要谈谈陈独秀主义的社会根源。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有不同的阶级基础。如果说在西欧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工人贵族的话，那末，在资本主义不发达、没有工人贵族的国家，机会主义则有另一阶级基础即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像俄国的孟什维主义、中国的陈独秀主义，就是这样。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帝国主义者忙于战争，中国工业取得长足的发展。接着，开始了所谓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陈独秀是这个运动的领袖之一。启蒙运动的主旨是以欧洲文化代替中国半封建的、半宗法的文化。陈独秀曾极力反对儒家学说，反对旧封建思想，反对封建道德，等等。他作为唯物主义者极力反对儒家的唯心主义。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大战刚结束时），他高度评价欧洲文化。无可怀疑，陈独秀在这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启蒙运动在中国起到了进步的作用。陈独秀曾经致力于创建新文化，等等。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究竟持什么政治观点。他的政治观点，只能归结为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在这一时期，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中华民族日渐衰落，必须振兴，而要振兴中华，只有采取发展欧洲文化的方法，换言之，只有采取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法。当时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919年，他在《新青年》宣言中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说，“我们……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至于政党，他承认这是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活动方式。但是，他认为：

^① 参见《党的机会主义史》，载《蒙和森的十二篇文章》（198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2—110页。

“我们……，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那末，当时他主张什么呢？他认为，中国应当发展自然科学，发展欧洲文化。他反对宗教迷信，拥护实验哲学。他怎样理解民主制度呢？他认为，民主制度必须以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为基础，一村一镇均应实行自治，而这种自治应经普选产生。这种自治以及这些同业联合即工人、职员、商人按自己职业分办的同业联合将是民主制度的基础。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各行各业的组织。这就是整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基础。陈独秀还反对阶级斗争。他说：“我们不情愿阶级斗争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斗争。”

我已说过，崇拜西欧的理论家陈独秀所主张的发展欧洲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他曾经这样说：“发财致富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个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均取决于扩大经营的条件。”

他所说的发财致富显然是指发展资本主义。他甚至明确指出，我们反对在中国搞旧式的发财致富，我们主张新式的发财致富。他所说的旧式的发财致富是指商业资本、高利贷和地主的剥削，而新式的发财致富则指发展资本主义。他在一篇反驳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文章中写道，马尔萨斯所提出的那套办法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发展工业、运输业和科学（他说这话是在1920年，当时已转向共产主义）。但是，他却认为不能按阶级来划分富人和穷人，主张资本家和工人均分劳动产品。他认为，刚开始时这种平均分配的办法肯定难以实行，但我们终究能使资本家拿出部分剩余价值来兴办医院、托儿所，等等。

总之，我们认为陈独秀是一位资产阶级教授，热衷于欧洲文化，难怪他向诸如实用主义思想家美国哲学教授杜威、英国社会党人罗素学习。陈独秀深受罗素的影响，有时甚至在书信中向人探问，这位英国人对某一问题持什么看法。他甚至受叔本华及其他人的影响。陈独秀来自知识界，总以为他们只要以民主主义方

法就能解决种种问题，并且能达到共产主义。他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孟什维克。陈独秀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产生了严重后果，1925—1927年革命中我们之所以犯一系列机会主义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陈独秀的理论造成的。不过，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遭到了革命工人和自觉按照共产国际所指引的方针前进的党员群众的抵制，因而他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论。尽管陈独秀在理论上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他本人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根据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确定的。

现在，陈独秀提出取消主义纲领，这不足为奇。陈独秀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孟什维克。他始终是这样的人。他来自知识界，所想的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中会把诸如陈独秀这样的同路人清除出党。

讨 论

张彪^①同志：

陈独秀在最近致中共中央的三封信中，在中东路问题上充分暴露了他的政治面貌。他在信中说：“苏联以保卫中国为由对中国转入强硬的攻势，可见，苏联采取了进攻的政策。这样一来，苏联，也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会开始争夺中东路的战争。”^②这就是陈独秀的逻辑。

陈独秀本人的历史发展进程，是人所共知的。他投身于民众

① 张彪为张国焘。——译者

② 此处按文直译。在《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5册中所载的《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有关一段是：“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争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译者

运动，反对中国的旧制度、旧文化、旧学。陈独秀先生无疑是一位声名显赫、激进的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众所周知，他领导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是反帝运动，是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所以，十分清楚，陈独秀当时作为自由资产者参加反帝运动，但显然是不彻底的，总之，他不是真正的反帝斗士。

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他即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就反帝运动而言，是一位举世闻名的革命家。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思想严重不纯，夹杂着某些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

中国共产党是在1920至1922年间形成的，当时它在工人中间已开展工作，但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我们知道，直到1922年中国共产党才第一次发表政治宣言。但在这之前，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前景已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曾经说，在中国约需五年时间即可实现社会主义，“倘若我们先在闭塞的四川省建成社会主义，尔后夺取其他省份，逐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好了”。他在入党前就没有阶级斗争观念，他的许多言论足以说明这一点。1922年，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向我们指出，中国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即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结为联盟。但陈独秀怎样理解这一指示呢？他把这一指示理解为中国工人阶级无力进行革命。他说，我们应该同几个阶级结为联盟，进行反帝革命。甚至到1923年，尽管中国共产党已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陈独秀对革命仍然感到迷茫。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失败，促使他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势力，无力进行中国革命。在他看来，中国资产阶级要比无产阶级强大得多。他认为，中国

将进行两次彼此截然分开、互不衔接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他根本不懂得这两次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认识到由第一次革命过渡到第二次革命，不认为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中应当掌握领导权。

陈独秀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什么样的呢？他说，1922年后的所有罢工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这是民族斗争，因为在中国当前形势下，任何斗争只能是民族斗争。例如，上海工人运动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帝国主义的，铁路工人罢工的矛头也是指向帝国主义分子的，指向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铁路罢工纯粹是民族运动。中国工人身上也有封建余毒——行会习气。甚至工人的先进部分也极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

依陈独秀之见，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阶级自觉呢？他认为，要达到阶级自觉，必须彻底进行民族革命。只有提高民族自觉之后，工人阶级才能阶级自觉。只有当民族斗争完全取得胜利之后，才能谈得上阶级斗争。这就是陈独秀在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

现在谈谈另一个问题。陈独秀怎样评价国民党呢？他对国民党几乎总是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他的公式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科穆纳尔同志的报告详细评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看法。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内或多或少含有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份是理所当然的，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应成为大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他的公式是：不退出国民党，就得充当国民党的尾巴。我想大家都很了解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运动的理论。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党应当参加民族运动，但这并不是说它应当充当尾巴，而是说它必须领导民族运动。我们共产党人领导农民的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陈独秀持什么观点呢？他坚持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应当由

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只有等革命结束后即资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只有当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民族工业才能迅速发展，工人阶级从质量上和数量上才得以提高。共产国际怎样看待国民党呢？共产国际非常明确地指出，国民党是不同阶级的联盟，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提高工农在国民党内的比重。可是，陈独秀则持完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观点。科穆纳尔同志较为详细地指出了所有这些问题。

陈独秀认为，统一战线就是阶级合作，民族革命就是体现阶级合作的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不能脱离其他所有阶级而处于孤立地位。假如无产阶级要求独立和独立领导，那它就会自陷孤立。阶级合作就是彼此让步。他说，我们应该对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同时争取资产阶级也作出让步。他关于国家的概念是异常模糊的。他无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脑子里只有农村这一笼统的概念。他说，农村是落后的，而城市是进步的，先进的；城市是集中的，而农村是分散的。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土地革命。诚然，他偶尔也谈论土地革命，但他这些随便说说的见解，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毫无共同之处。对于农村，陈独秀也有他的统一战线理论，他把绅士分为良绅和劣绅两部分。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提出了“工农兵联合”的口号，并以工农兵联盟的名义发表了宣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苏维埃的雏形。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而当时陈独秀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呢？他害怕无产阶级被孤立，害怕资产阶级反对赤色分子，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味强调必须保持和巩固统一战线。他既不考虑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也不考虑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的联系。1925年，国民党左派著名领袖廖仲恺惨遭杀害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出现了严重分化，各阶级的力量发生了变化。陈独秀被吓得惊慌失措，深恐这种阶级分化迅猛发展。他认为，共产党应当作某

些让步，以保持统一战线，巩固统一战线。我们可以举一系列事实来说明陈独秀是怎样把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例如，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初试叛变，陈独秀未能与之斗争。在武汉时期，他一味指责工农运动过火。1927年，当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时，他坚决反对。

武汉政府叛变后，陈独秀与一位同志的谈话值得大家深思。他对这位同志说，中国革命完蛋了，不知何时才能东山再起。他说：“我待在家里，对革命不抱希望了。”

可见，陈独秀在一系列问题上，即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这些问题上，持与众不同的见解。

武汉政府叛变后，他断定革命完蛋了，因为资产阶级已不再领导革命了。

陈独秀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呢？他入党后的主要错误是：过低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远比资产阶级强大，而陈独秀却坚持相反的观点。第一，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只不过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无产阶级的任务绝不是领导中国革命，深化中国革命。这就是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独特观点。第二，我们看看，他在中国土地革命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应该领导农民。如果像陈独秀所说的那样，中国无产阶级本身应充当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那它还能领导农民吗？当然不行。

陈独秀曾经一度以工农商学妇广泛联盟的口号替代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我们知道，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领导农民。而陈独秀却坚持另一观点。正因为如此，他在武汉政府叛变后便认为革命毫无希望了。

在国民党问题上，他认为我们加入国民党不是要垄断国民党，而是应当支持国民党内的左派。他所说的国民党左派，是指民族

资产阶级。

在武汉政府时期，他提出了一个“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独特公式。他的观点是，要想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就得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不然，干脆退出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曾提出过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口号。所以，大家可以看出，陈独秀自始至终也坚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因此，他认为，共产国际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

陈独秀当前的一些观点，值得关注。同志们大概已看到他给中共中央的三封信，也知道中央的回答。

再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分析陈独秀的整套观点，能不能说陈独秀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呢？科穆纳尔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陈独秀作了正确的评价。关于能不能把他看作社会民主党人，这我有如下看法：在西欧，社会民主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工人贵族，而工人贵族只能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才能产生。至于陈独秀，大家知道，他并没有工人贵族这一阶段基础，因为中国不存在工人贵族。较为确切地说，陈独秀是殖民地国家的孟什维克的典型代表人物，其观点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他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左翼，而这个左翼是托洛茨基主义藉以建立的基础。他完全像托洛茨基分子那样，惯用左的漂亮言词。比如，他评价中国革命的性质用的是社会主义词句，但却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敢于赞成这一口号的不仅有陈独秀，还有改组派和托派。目前，事情很清楚，尽管一切反党派别——托派、陈独秀和改组派——有所区别，但他们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有可能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陈独秀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全盘吸收托派的观点。

1月29日会议

斯特拉霍夫^①同志：

科穆纳尔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全面而详尽地剖析了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但他的报告有不足之处，没有同陈独秀当前的言论联系起来。当然，要想通过一个报告把中国党的所有历史问题统统阐释清楚，那是做不到的。由于陈独秀主义一直代表着我们全党，所以，陈独秀主义问题涉及我党的每一页历史。

我只是想谈谈我们讨论会理应更详细阐述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现实的独特现象，是独特的中国孟什维主义。科穆纳尔同志所作的分析，使我们对独特的中国孟什维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这里我要指出极为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景问题上，如何回答陈独秀。科穆纳尔同志的报告未能涉及这一点，这是美中不足。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景和发展趋势问题，不仅对1927年而且对当前形势具有巨大的意义。大家知道，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一问题即非殖民地化理论上有过重大争论。这种理论在中国党内早已存在，只是没有被及时揭露。陈独秀的整个孟什维克策略正是以这种非殖民地化理论为基础的。大家只要回想一下科穆纳尔同志援引的引文，就不难明白，陈独秀的基本观点正是以非殖民地化理论为依据的。我想援引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篇文章。该文的中心思想是：“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他作了如下分析：“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

① 斯特拉霍夫为瞿秋白。——译者

同时又遭遇……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不难看出，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看法是：越往后，中国工业越发达，而中国资本主义越发达，中国资产阶级就越革命化。这是贯穿他全部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一根源，即可明白，为什么他现在鼓吹中国资产阶级掌权，因为他在整个中国革命时期，曾竭尽全力使中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最近两三年来，他总是力图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资产阶级足以掌握政权的程度，尽管资产阶级暂时还未掌握政权，但它愈来愈革命化，而当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准备“第二次社会革命”。

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问题：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外国资本进行斗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该怎样行动？陈独秀十分明确地回答说：在半殖民地，包括中国，总的说来无产阶级非常软弱，它不可能是独立的政治势力。所以，如果说西方社会民主党或俄国孟什维克的任务，是阻止无产阶级掌权、阻止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话，那末，中国孟什维主义陈独秀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它很幼稚、落后，根本谈不上有掌权的要求。总之，陈独秀认为自己的任务即中国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任务是，一开始就得遏制、抹杀无产阶级的自觉，不但阻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且阻挠民主革命的全面实现。这就是中国孟什维主义的特点之一，因为中国孟什维主义不仅仅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且是中国绅士的代理人。

第二个问题是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我们已经指出，陈独秀孟什维主义的表现不仅在于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而且还阻挠土地革命。现在我们来分析他对农民的看法。我不想引用他早在1923年发表的那些反映他妥协甚至背叛思想的言论。我只援引他特别“左的”说法。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说，农民有很强的“私有观念”。他写道：

“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不但与农民的利益，而且与无地之佃农是根本冲突的。他们反对地主，无非是反对地主私有，而是要自己私有。”^①他的结论是：“所以，只有到中国工业蓬勃发展起来，全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候，农业无产阶级才能发达集中起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农村才有可能实行社会革命。假如我们现在提出不适合该阶级的口号，就会给民族革命带来重大的损失和危害。”^②显而易见，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不必没收土地，不必采取过火行为，等等、等等。他当前的观点是，中国的中农是不革命的，除贫农和雇农外，谁也不希望土地革命。这大家看得一清二楚。由此可见，陈独秀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整个世界观业已发展到背叛、反革命的地步，发展到直接激烈对抗、敌视党和共产国际的地步。

我要补充科穆纳尔同志的报告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党的“学说”问题。陈独秀关于党的学说，已自成系统，与列宁的学说迥然不同。他的组织原则完全是孙中山的那一套，因为我们知道，他在组织我党中的实际工作是选择他所认为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识渊博、能提出并执行某种“革命计划”的人物，这很像“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这个公式。他要选拔的是既精通书面计划又不能使之实现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大多不可能来自工人、企业和农村，等等。他认为，这种“富有才干的领导人”只

^①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相关一段是：“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力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译者

^②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相关一段是：“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译者

能在“大学生”中间寻找。所以，他总是极力反对选拔工人。实质上，他反对在企业中建立党的真正基础。他就是党！因此，我们把这称之为家长作风。到1927年年中为止，全体党员一直把陈独秀的言论和文章奉为圣经，谁也没有表示任何怀疑。“他怎么说的，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办”。但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遵照他所写的那样去做的。党的各地方委员会的书记往往自行其是。在1923—1926年期间，我们在北京就有按自己意图行事的北京委员会。在武汉、上海等地也是这样的地方委员会。这一切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党的组织基础，也许，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大组织是个例外。凡是派往各地的人，他认为，都具有领导当地革命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按照他的指示搞革命。

但是，请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彻底拥护中央集权制即集中的人。当他发现他的权力和威望开始下降时，便转到另一方面，转到所有反对者颇感兴趣的民主这方面。他高谈所谓民主并主张，既要实行民主，就得让每个党员、每个共青团员都按自己的观念行事。这时，党的任何纪律对他来说早已不复存在，因为他认为“纪律影响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7月28日讲话之前，同诸如王独清等靠拢党的人士有过几次叙谈。他对他们说，要是布哈林派获胜，“我也许会在党内重新工作，要是右派照现在这样节节败退，我什么也别想干了，因为现实的失败，说明斯大林的专制。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所以，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的。”

这种家长制式的组织纪律以及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都是陈独秀主义的组成部分。

上述三个问题，我认为刚开始讨论时有必要提请同志们注意。当然，这不是我在此所要谈的全部问题。下面谈谈关于陈独秀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具体表现问题。

科穆纳尔同志过于匆忙下结论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略呈左

倾。假如可以说陈独秀当时业已“左倾”的话，那只能说他在五卅运动后表现出了巨大的“积极性”。但是，他积极的目的是要尽快使蒋介石、贺耀祖、陈调元、郭松龄等人掌权。这是他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实际情况是这样：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陈独秀在莫斯科。当时，我们在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这两个问题上，同他有过争论，但到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开始急剧转变。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转变。他的这种转变就是开始公开藐视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当时，他公然说，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太弱，所以我们应该加入国民党。1923年夏，在我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的基本思想是：否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争取群众，以便通过无产阶级争夺斗争的领导权，使我党锻炼成强大有力，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政党。他认为，加入国民党势必是实际取消我党的开端，与其说取消党本身，不如说断送我们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途。他开始做国民党的工作时坚持如下观点：共产党员应该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从事工会、学生会等工作，以帮助国民党成为越来越革命的党。他认为，假如说中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革命的话，那它会日新月异地愈来愈革命化，国民党愈来愈左倾，肯定会取得政权并促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我们在60年或100年后，就有可能在所有乡村进行“真正的共产”革命，因为到那时候，在所有乡村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两种势力，不会有什么地主。在这时期他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何需要共产党》的社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他说，目前我们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但将来终究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是必不可少的，但他认为，为了“纪律和教育”，一切政治事务暂由国民党处理。1924年期间，陈独秀把全部精力用于发展国民党本身的工作。由于他实行这样的政策，结果使我们广州、武汉、上海的优秀工作人员都效忠于国民党。工会

几乎不复存在。共产国际的决议，只有与他进行严肃斗争之后才得以贯彻。1924年，党的上海五月全会上就作过这样的斗争。五月全会前后，陈独秀进一步主张我们务必争取“非党人士”和“纯粹国民党人”参加工会工作，以免工会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会，从而“挽救我们的运动”。陈独秀说：“要是所有工会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会，它们就会被取缔，罢工将得不到社会舆论的同情”，等等。这是陈独秀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

陈独秀的上述论调之所以未能起到毁灭性的作用，只是因为当时运动还处于初级阶段。1925年，当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爆发时，陈独秀机会主义越来越引人注目，他的所作所为对后来的武汉时期产生了极坏的后果。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独秀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北方的冯玉祥和南方的胡汉民身上。他和彭述之总是引导党去执行这样一种方针：应由国民党“新三头”（胡汉民、廖仲恺和汪精卫）代替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领袖。1925年，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先是二月大罢工，接着是上海五卅总罢工，尔后是广州罢工。起初，他对这些罢工的态度是，必须把这个运动纳入单纯经济斗争、抵制英日等国的轨道，不准说革命已经开始。依他看来，这不是革命，只是游行示威！当时，他建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服从上海警备司令的命令，自动解散。我们坚决反对，而陈独秀却说，革命尚未到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漫长的革命发展时期。他说：“要利用这些事件来组织从事经济斗争的上海工会。”

当时，围绕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展开了一场长期的争论。陈独秀关于革命不会那么快到来这一预言未能应验，历史并没有使国民党“新三头”而是中国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袖。当时陈独秀不仅被迫研究经济斗争，而且还发表了一些“高论”。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戴季陶主义。戴季陶发表他那本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之后，我们党内生活中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我们同陈独秀争论，戴季陶主义是代表小资产

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当时陈独秀认为，戴季陶主义是民粹主义，不是民族改良主义。

第二件事，是我们要求批驳、揭露民族改良主义，而陈独秀却在给戴季陶的信中这样说：“你们想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然而这样的资产阶级在中国还没有，所以，最好还是进行协商，也许我们会同意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①等等、等等。他对西山会议派的态度是由此而来的。陈独秀采取千方百计争取戴季陶为国民党和革命出力的方针，恰恰是在戴季陶发表反共小册子之后。陈独秀致函广东区委，建议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延期召开，等待戴季陶、孙科和叶楚傖返回广东。当时，举行了重要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我们同意不再反击戴季陶分子，等等。这就是陈独秀那封表面上“反对”戴季陶的信的真实意图。这封信的观点是：在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买办资产阶级，大家务必同心协力地跟它作斗争。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设法使国民党左派围绕在自己周围，以便进一步排挤和打击右派。陈独秀当时认为国民党内大体上有三派。一是右派即冯自由；二是左派即共产党员；三是中派即蒋介石和戴季陶。对于国民党的这三派，我们应采取如下策略；打击右派，但无论如何要保护中派，即保护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鉴于上海谈判的意图在于迫使国民党左派向中派让步，所以这一策略虽然尽是革命的词句，实际上有助于中派分子蒋介石握取国民政府的权力。这一策略一直执行到武汉政府垮台时为止。甚至在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件前夕，还有人试图

^①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所载的《给戴季陶的一封信（1925年9月11日）》相关一段话是：“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根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译者

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我记得，国民党二大后，即发生1926年三·二〇事件时，陈独秀曾短暂地怀疑过自己的路线。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曾说：“我们送孙科、戴季陶和叶楚傖回广东，也许是个错误。这有利于‘孙文主义学会派’势力的集结，有利于他们反对黄埔军校的左派，有利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势力的形成。”但时隔不久，他自己回答自己说：“不！光我们，肯定什么革命也搞不成。”他的这一回答是与他当时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密不可分的。陈独秀怎样估计1925年10月至1926年3月20日这段时间的形势呢？在他看来，1925年10月后，革命开始低沉。他说，在革命低潮时期，我们应该退让，所以我们的让步策略是完全正确的；而三·二〇事件，正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冒进造成的。3月20日后，陈独秀认为革命浪潮继续低落，所以不能北伐，他的明确的政策就是由此而来的。他还建议固守一省，在该省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广东将是我们进行改革的“极好”省份。下一步我们暂时无须考虑。当时，他开始谈论“独立自主的”党，但他所认为的独立性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即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可以批评资产阶级，批评广东政府，因为它们不进行自由主义改革，而是想以“**纯武力手段**”来完成北伐。他认为，问题在于广州方面往后应更巧妙地笼络群众，善于把自己装扮成民族的救星。资产阶级应当向商人表明，国民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广东要“井然有序”，以使其他省份对此羡慕。当上海的罢工运动猛烈发展，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陈独秀当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他对这些运动作了如下评价：“这是赤色分子进攻反赤色分子的运动”。可是，陈独秀认为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虞洽卿也是一位“赤色分子”。在他看来，只要我们同这样的人协同战斗，我们就能推动中国的革命和工人运动前进，但绝不能指望农民，因为农民异常落后，不管怎么说，他们要比虞洽卿落后。这一时期，在怎样支持北伐和提出什么样的政权形式等问题上，我们党内展开了重大

的争论。1926年，在中共中央上海全会上，我们具体争论的是，在北伐期间，要不要组织国民代表会议。只要看看全会就这一问题，即就我们要不要号召工农夺取政权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决议，就可明白，其提法仍然是含糊不清的。在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你们可以看到如此可笑的提法：一方面要发展群众运动，另一方面一定要维护“乡村联合战线”。

现在我谈谈武汉时期。大家知道，武汉时期是以宣布中国无产阶级放弃专政和整个共产主义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的发表为开端的。发表这一宣言的目的是要解救汪精卫，从而寻找解决宁汉之争的途径。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武装起义之后，当时上海2000工人已掌握武器，拥有一些机枪，且与当地驻军取得密切联系。正是这个时候，中共代表未经中央讨论，竟擅自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宣言中写上了他所说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妖魔，爱护地方安宁秩序”^①之类的话。这就是武汉时期的开端。武汉时期之初，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呢？“五大”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指示，但只字未提陈独秀的路线，既不指责他的政策，也不为纠正旧领导机关的路线、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提拔无产阶级干部作任何工作。不但如此，现已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罗易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宣称，由于中国正在开展重大的斗争，所以国内不会有什么孟什维主义。既然大会这样的发言，通过这样的决议，既然中央的工作获得了大会的一致“赞同”，武汉时期的整个“美景”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记不清陈独秀当时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因为他当时身为“一致”推举的“共

^① 此处按俄文直译。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所载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相关一段话是：“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译者

产党代表”，独断专行，对谁都不报告工作，连极重要的政治问题也不经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讨论。甚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也没有设立共产党党团组织。今天，我们没有充分时间详谈整个武汉时期。

我只能大体上谈谈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在武汉时期所起的作用。顺便说一句，我只能凭记忆谈，也许会把最重要的问题遗漏掉。我所记得的，也许在你们看来并不重要。比如，第一个问题，即他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1927年5月1日，武汉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此次游行示威的不下50万人。当时，儿童团员、青年团员和工人纠察队都以城市主人公的姿态出现在街头，特别是把守会场入口处，不准穿长袍的人进入会场。他们提出了“谁穿长袍，谁就是劣绅”的口号。这件事被陈独秀知道了。我记得，他对当时任武汉工会主席的向忠发同志拍桌大骂道：“你们搞什么名堂？这是胡闹，这是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不能穿长袍？我也穿长袍嘛。”当我替向忠发同志辩解时，他把我推出门外。他如此恼火，大发雷霆，似乎这一“过火行为”会葬送整个革命。

第二个问题是土地问题。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在土地纲领中犯了重大的错误。陈独秀非但不纠正这一错误，反而在“五大”后不久，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为了开展土地革命，即没收大地产，多少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宣传时期。实质上，他想把没收大地主土地这一条抹掉。当时我们同他进行了争论，争论得异常激烈。此次争论后，我们难以跟他商讨问题，每次开会最终都成了争吵。陈独秀对土地革命即土地问题的这种态度表明，他最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平民百姓”即农民自行造反，破坏沿袭千年的中国土地关系，因此，无产阶级有责任去领导这一运动，但这势必导致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建立。这是他最害怕的。武汉政变前后，他曾寄希望于“汪精卫的民主制度”，一味主张我们应当对武汉政府让步，以使汪精卫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认为，我们退

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也就是我们以此使汪精卫便于“行事”并帮他组织纯粹国民党政府即非赤色政府后，我们通过这一途径确保我们所期望的、汪精卫因我们退让而给予的自由后，才能建立一个政党，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群众性”政党，但我们现时还在国民党内，所以我们不是独立自主的。当我们及其他许多中央委员反对这样提出问题时，他不听大家的警告，甚至也不私下商量商量，竟擅自找汪精卫，声明说：我们共产党人也许是想退出国民党的，但由于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宜向莫斯科提出这一建议，否则人们会怀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您汪精卫纯属国民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避嫌，要是您提出这一建议，斯大林肯定会同意。

对于这件事是绝对不能调和的。从此，我们只有同他进行公开的斗争。

假如我们现在提出陈独秀主义是什么东西，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明确地说，那种以为陈独秀主义是未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有工人贵族做社会基础，而且只有在财政资本占统治地位、拥有超额利润的地方才会出现。那种认为陈独秀及其一伙将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的见解是错误的，因为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必须设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第二阶段。我认为，陈独秀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中国资产阶级，部分人与买办资产阶级密切关联，与自由职业者、大学生等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还没有摆脱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

不妨举个例子，中国某大学有位女学生，在清党中声称自己出身于中农，当有人问她，她父母拥有多少土地时，回答说：300亩。这是什么中农？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人士原本出身于地主豪绅

阶层，他们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与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了革命，在某个时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当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当谁拥护起义，谁就拥护无产阶级，谁反对起义，反对土地革命，谁就必然投入反革命营垒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的时候，这些小资产阶级人士必然会同民族资产阶级一道背离革命，成为反革命。

我们说俄国爆发革命前，有一个过渡时期，因为布尔什维克虽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但他们共同处于地下状态，共同反对沙皇制度，可是在我们中国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过渡时期。

我再谈谈关于为党而斗争的问题。因为，令人奇怪的是，陈独秀是我党的创始人，然而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孟什维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完全可以用他1923—1924年间所写的文章来加以证实。当然，人们可以责问我们：他写这些文章时你们上哪儿去了？对这个问题要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表明，它虽然是在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起初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小组。所以，要想建立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党，一开始就得同小资产阶级任何微小的动摇展开斗争。可是，我们未能及时完成这一任务。

诚然，当时党内锻炼出了新领导人，但无论在武汉时期以前还是在武汉时期，我们都不能说我们为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严肃的斗争。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应当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这是我们共同的错误，它一直起着非常不幸的作用，我们至今还感受到这一错误的后果。

现在谈最后一个问题，即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和动摇问题。我们已经把陈独秀及其一伙清除出党，这是件好事。陈独秀加入了反革命托派集团，这也是正常规律。那么，

我们党内反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否就此结束了呢？没有。中国的机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特征是，其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因此，陈独秀和彭述之的言论有区别，一个高谈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另一个则强调“天然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我们从某些同志批判陈独秀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比如对革命高潮，农民战争的意义等问题，尽管有别于陈独秀，但往往是接近机会主义的。

现在我要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正如某些同志为回避正面回答非殖民地化理论而提出的：中国革命正在发展，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整个世界革命也肯定会到来，等等。但这一新的革命高潮何时才能到来，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当前，在我们中国只有动乱、军阀混战，而不是新的革命高潮”。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对待中国农民的态度问题。我们对中国农民的作用估计过低，这完全是机会主义规避正确路线的表现。尽管官府实行残暴的恐怖手段和派兵征剿，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内战仍然持续不断，这是不能否定的。至于我们在这种情势下该怎样具体行动，那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像欧战时期号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那样提出。但不能说，既然你们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那就要马上在沙皇军队中策动兵变。甚至有这样的同志，他们以为谁赞成和发动农民战争，谁就是叛乱分子。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党的作用和“党的制度”问题，至于党的制度问题，我们用不着多谈，因为那些反对党的制度、反对所谓官僚集权制等的人，其本身就反映了中共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千方百计地瓦解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他们善于巧妙地回答党的作用问题，说什么“很好，革命高潮必不可免，肯定会到来，但它只有在我们

党进行充分发动的情况下才能到来，而我们党还脱离群众，革命高潮不会自行到来。”因此，他们认为，不是组织任务应当适应革命形势，而恰恰相反，是革命形势要求我们组织起来。这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这种思想观念同中国的绅权制度休戚相关，因为绅士拥有文化知识，似乎他们理应为人民搞革命！他们自诩为“良绅”，似乎理应组织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小组，要是没有来自“良绅”的共产党员，革命就休想到来。

所以我们的任务在于，不仅要研究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而且把过去的陈独秀机会主义同当前的机会主义倾向联系起来。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同陈独秀取消主义展开斗争，把我们党引上布尔什维克化的康庄大道。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左右倾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时刻记住，所有这些倾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与陈独秀主义都有一定的联系。

鲍罗廷同志：

同志们，我来这里不是为参加讨论的，而是要倾听那些近来从事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同志们的意见的。但我一到这里，他们便建议我参加这个讨论会。我必须承认，近来我一直为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紧张工作。要说明这个问题，最大的困难是能否收到在苏联难以得到的中国资料。我希望经过一两个月的准备后，再向大家作报告。

今天我简要地说说：首先我同意科穆纳尔同志关于陈独秀主义问题的提法。我认为，科穆纳尔同志的报告精辟地阐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混合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主义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

我想就陈独秀主义再谈一点看法。陈独秀主义与西欧孟什维

主义有没有区别呢？我认为，在业已发展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欧洲孟什维主义与中国孟什维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那种把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和欧洲孟什维主义看成一码事的见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等于说，我们承认在中国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已掌握政权（这完全是不正确的），孟什维主义已在中国起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作用。不能断定中国孟什维主义已发展到欧洲社会法西斯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必会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不能说中国有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在中国，不可能是陈独秀及其追随者所设想的那种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所设想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的：资产阶级肯定会掌权并发展实业，因而无产阶级会同时发展壮大起来，而他们将像社会法西斯分子那样对待无产阶级。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即中国孟什维克，休想在中国起到像其欧美兄弟——帝国主义国家的孟什维克——所起的那种作用。换言之，中国孟什维克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当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孟什维克不会带来许多麻烦，不会构成某种危险。不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他们现在都在共产党内。陈独秀虽被开除出党，但这不等于他在党内的流毒已被肃清。这种流毒仍以陈独秀主义形式，以右倾机会主义形式或托洛茨基主义形式时时出现，仍在危害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务必同这种流毒进行重大的斗争。

同志们，我已说过，陈独秀主义或中国孟什维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我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也认真思考过，研究过，并得出了一定的结论，这在以后适当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我想这个时间是不会太久的。

现在我要指出，我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我与陈独秀之间虽发

生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分歧（关于这一点我曾多次谈过和写过），但没有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要是把这些分歧引向与陈独秀的公开斗争，中共领导就不会长期掌握在孟什维克手里，也不会出现遭受公开批评的这种局面。但据我所知，除共产国际批评陈独秀外，除八月会议决议、科穆纳尔同志的精采报告以及斯特拉霍夫和张彪同志的发言批评陈独秀外，陈独秀孟什维克领导还未遭到如此深刻剖析和尖锐批评。

我要在我的报告中指出，自1923年国民党改组起直至武汉时期末，中国革命中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上海路线即陈独秀路线，这是货真价实的陈独秀路线，因为他和孙中山一样，孙中山是国民党的领袖，他是中共的领袖；另一条是广州路线。这两条路线互相矛盾，甚至在武汉时期发生了冲突。倘若我们在广州时，把我们与陈独秀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冲突，武汉时期的历史也许会有所改变。我们未能看清陈独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地道道的孟什维克。

我们在广州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革命将以土地革命取得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我们在广州最先建立了农会，同半封建残余势力展开了斗争。可见，我们实际上走的是革命道路。我们逐步克服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障碍。然而，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他们的宣言、决议以及《向导周报》的文章中，把中国革命视作反帝革命，没有把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同摧毁帝国主义在华基础的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反帝斗争本身无须人们大喊大叫，但如果它不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就难以取得胜利。事实上，广州党组织走的是土地革命道路，而上海的陈独秀实行的是反帝、反军阀斗争，根本不提土地革命。这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主要错误之一。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广州党组织在

理论上未能弄清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他们在搞农村斗争和城市阶级斗争中，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工农专政道路。广州党组织的这种革命实践，在上海陈独秀的思想指导下是找不到的。我们搞的是革命实践，而上海宣传的则是削弱这种革命实践的思想。我从未听说陈独秀的哪篇文章，哪个文件，哪次讲话是根据我们广州的革命实践提出领导权问题的。陈独秀说，要反对国民党的右派，但不能与左派发生冲突。依我看，陈独秀是在帮助左派，或者说，帮助现代改组派。现在大家都知道，反革命营垒并没有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两大阵容。民族资产阶级身处反革命营垒，却在革命阵营内部争夺领导权。这就是某些同志要使之变为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陈独秀一味热中于帮助这个以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把它视为理应成为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

因此，当广州无产阶级领导广东农民进行斗争，力图夺取革命领导权时，没有得到陈独秀的支持。相反，他总是想方设法挫伤他们的意志，如果你们研究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即可发现“共产党员不要标新立异”这句话，此话的意思无非是要阻止工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建立专政。你们可以看出，在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所有重要问题上，比如在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和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两条路线：广州领导集团的路线和上海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路线，即孟什维克路线。

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广州路线是坚定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广州党组织走的是革命道路，但广州同志要正视自己所做的一切，要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问题。这是广州同志的不足之处。上海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根本不赞成广州党组织的做法，一味批评他们左倾。在武汉时期，中国党由于中央领导集团早在武汉时期以前和武汉时期屡犯错误而吃尽了苦头。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现在已着手消除中国共产党内的陈独

秀主义。消除陈独秀主义是夺取胜利的必要条件。要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以使党内不残留一个陈独秀分子，使党与陈独秀主义彻底决裂，否则，当下一次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党还会遭受失败。

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以便更有效地、更好地清除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障碍。

维经斯基同志：

陈独秀沉默两年之后，站出来就中东路冲突问题发表意见。老实说，这最能说明他的真正立场及其错误的真正性质。陈独秀就中东路冲突事件表态说，中国党正在犯错误，因为它向工人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他说，这样的口号难以深入群众，不可能为群众所理解，我们最好提出“南京政府误国政策”的口号，这更便于群众理解。同志们，陈独秀的这番话充分说明了一切，既说明他对苏联的态度，也说明他对世界革命的态度。这种提法说明了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他总是看资产阶级的脸色行事，每当该怎样对工人宣讲时，首先考虑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见。所以，这也说明了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的一贯看法，尽管中国无产阶级经受了中国大革命的考验，一直在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拚死搏斗。他对所有这些主要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什么呢？陈独秀并没有把这次冲突事件看作事关世界革命的问题，他无视与此相关的一切问题，而是从自由资产者的角度看待一切。这究竟为什么呢？事情很清楚，在中东路问题上，他只能说“保卫苏联”的口号不便于工人群众理解，只能说这不是广大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坚持阶级立场，而是坚持自由资产者的立场。

陈独秀深恐人们怀疑我们“为卢布而卖身投靠”。谁会怀疑我们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工人群众不会怀疑，因为他们懂得当今世界已经分为两大阵营。所以，归根结底是过低估计工人阶级。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处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

中东路问题揭示了陈独秀主义的整个根源，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斗争的道路。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把陈独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加以比较并联系起来。社会民主党人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一举夺回了中东路，完成了统一国家的历史使命，所以苏联发动攻势，要求重新归还路权，是带有侵略性的，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并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发表看法。应当公正地说，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意见很不一致，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不在托派势力的中心，已流亡土耳其。所以，托洛茨基分子几乎都假借某种理由以社会民主党人的身份发表看法。他们说，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有权利……。苏瓦林则毫不隐讳地发表看法。托洛茨基在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似乎也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军阀，但同时指责苏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以盲动手段来发展革命。就这点而论，陈独秀的立场跟所有反革命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是陈独秀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他怎样看待正在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呢？陈独秀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是这样论述战争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方式与欧洲不同，欧洲资产阶级是比较自由地发展起来的，等等。他甚至夸大其词地说，中国资产阶级受欧洲资产阶级的压制。他说这些，无非是认为当前在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起着推动和冲击的作用，将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陈独秀力图把这场战争视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所以，他认为从历史角度看这是进步现象。

陈独秀不是像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所有革命者那样提出

问题。近两年来，任何一个因美国试图插手该问题而看清中国的企图的革命者，都会认为中国现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反革命势力土崩瓦解、局势无法稳定的表现。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陈独秀过去对资产阶级的评价和现在的评价是有直接联系的。要根据具体事实来证实这种联系并非那么容易。但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系列问题并弄清楚这种联系。只有这样，才能阐明陈独秀对待革命问题、对待同中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问题的态度。

请允许我列举两三个也许能说明这种联系的事实。这能说明陈独秀 1925 年五卅惨案后对待国民党的态度。上海大罢工后，即广州革命斗争时期，中共在秘密情况下召开了中央全会。全会讨论了许多问题。这是中共建党以来首次提出极为重大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于革命蓬勃高涨，这个问题也就被一再提出。当时，陈独秀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他说，要是我们留在国民党内，怎么能说共产党的独立性呢？如果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就谈不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因为国民党领导革命，它是各阶级合作的政党。国民党的政策是革命的政策。他又说，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请问，陈独秀是怎样提出关于退出国民党这个问题的呢？他是从无产阶级本身能夺取胜利、没有国民党也能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角度，还是索性由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看它搞成什么样子后再说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呢？现在可以肯定，陈独秀在这两条路线之间举棋不定。后来，他的整个实践证明，他最担心的是无产阶级被孤立。被谁孤立呢？被农民孤立吗？不是的，是怕被资产阶级孤立，在他看来，只要资产阶级不离去，革命就不会遭受失败。由此可见，他最近发表的言论与他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另有一个事实。北伐期间，许多同志反对北伐。起初，我也

反对北伐。陈独秀一开始反对北伐，继而犹豫不决，但是北伐事实上已经进行时，他却采取如下观点：现在不能与国民党发生摩擦。既然不允许与国民党发生摩擦，这时他自然就轻视发动土地革命的问题。诚然，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土地革命，也没有说什么反对土地革命的话。他确实没有说过这类话。但实际上他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毕竟是领导者，所以，他未提出发动土地革命的方针，并慈父般地袒护支持其观点的同志（我要指出这一点）这是很自然的。总而言之，他对土地革命正是持这种观点。这也就是说，他承认资产阶级是领导者，认为它是领导革命的动力。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就另一问题发表几点看法。

我想谈谈陈独秀当前的观点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及其在中国的作用。有的同志认为，他们尽是胡说八道，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他们的能量很大，必须同他们进行坚决的、重大的斗争。现在事情很清楚，诸位也已经知道，最近中国的托派分子写信给流亡瑞士但丁堡的托洛茨基，他们的信虽很简短，从信中难以发现他们的行动纲领，但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求援，希望组织起来。看来，他们已经振作起精神，准备进行重大的斗争。托洛茨基是怎样回答他们的呢？托洛茨基在回信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以供那些愿意参加这个反对派并希望成为真正托派的人进行尝试。从他所提的问题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庞大的托洛茨基纲领，它既能容纳托洛茨基分子，又能容纳所有的人——从这些托派分子直至谭平山的第三党等人。这个纲领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纲领的第一部分指出，要坚决攻击中共的整个路线；第二部分是他的经验总结；第三部分是关于未来的巨大计划。例如，他着重提出关于召开中国立宪会议的问题。我觉得，无论是陈独秀分子和托派分子，还是谭平山分子，乃至改组派，都完全有可能根据这一纲领坐到一起。托派将高唱革命的词句，吹嘘这不是一般的立宪会议，而是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夺取胜利的会议，等

等，等等；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准备。陈独秀作为孟什维克派的人，善于搞这种把戏，在他看来，现在还未到为别的什么而战斗的时候，但这改变不了问题的性质。实质上，这是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战斗。我认为，就社会基础而论，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官吏，受国民党影响的无产阶级极端落后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教授之流。

自1929年夏以来，特别是当前的情况，很值得重视。中国的托派分子蠢蠢欲动，开始组织起来，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一现象同中国资产阶级为平息业已高涨的革命浪潮而试图改组的情形，极为相似。陈独秀分子和托派分子正在倒向这一营垒，积极活动，从另一极端强调新的革命浪潮即将到来，这值得注意。

最后，我要指出如下一点：托派分子纷纷致函托洛茨基，建议成立托派亚洲联合总部，而托洛茨基的回答是，这值得考虑，但他还不完全明确表态。对此，我们要密切注视，这也是中国反革命分子与苏联的敌人准备联合起来的一种动向。成立托派亚洲总部这一口号将得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因为戴季陶这个人很值得注意，他曾主张成立既不属第二国际又不属第三国际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第四国际。

萨法洛夫同志：

同志们！研究陈独秀主义的根源势必会涉及中国革命的一些主要问题。比如，如何评价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以及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动力等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陈独秀主义是中国革命具体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产物。为了分析这种影响的真正性质，必须提出有可能存在并事实上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两条路线问题，因为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

导致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公开冲突。一条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代表工农群众的、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路线。这个问题报告人已作了非常正确的阐述，但我们有必要更确切地揭示这两条路线相互作用的奥秘。资产阶级利用中国业已掀起的强大的反帝运动，这是必然的。同封建主义即封建地主豪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随着革命的发展，随着各阶级革命斗争的深入，势必会暴露出反革命的面目，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在阶级斗争的发展进程中，无产阶级试图实现其领导权的倾向，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建立在反帝运动和农民土地革命基础上的斗争）也就越来越明显地反映了出来。资产阶级不愿意也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要它反对地主豪绅的利益，那是办不到的。资产阶级已由斗争转入与反革命的妥协，而无产阶级试图夺取领导权，以实现工农联盟（两个主要革命动力的联盟）的倾向则显示了出来。因此很清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产生影响，是必然现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孟什维克实行背叛，这首先表现在孟什维主义听任资产阶级的摆布，把农民土地革命置于次要地位。孟什维主义一味否定、抹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只看到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中国孟什维主义的主要倾向，也是必然倾向。在中国革命中还出现过另一倾向，它一开始只是一种倾向，可到后来成为一种敌对的反革命势力——托洛茨基主义。这种托洛茨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历史补充，因为在我们俄国，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是孟什维主义的补充。孟什维克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掌权，既然由资产阶级掌权，那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是矛盾的。托洛茨基主义试图从不断革命论中寻找出路。他们的出路是，放弃土地革命，提出无法实现的不断革命论。

正是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两种倾向。既然我们这样提出问

题，就得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现阶段，这两派即两种倾向（尽管各阶级或多或少地分化为各个阶层，分散在各地，尽管各自的阶级力量已最后形成），在反对土地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这两个问题上，其意见归根结底是一致的。这两种倾向都反对苏联。在东方，整个殖民地斗争由于苏联取得成就而蓬勃发展，可是他们绝不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攻击共产国际，攻击苏联，从殖民地革命的角度贬低苏联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谈谈过去，澄清过去的错误，我们的看法也许要比鲍罗廷同志确切得多。

鲍罗廷同志说，是该谈错误的时候了。这完全正确。在陈独秀犯有错误的那页历史上，也有其他人的名字。但有必要更明确地说说。当然，我将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鲍罗廷同志的报告，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忽视鲍罗廷同志今天的发言。中国共产党已认识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能使它成长为布尔什维克党。它这样做是为了克服自己的错误。而鲍罗廷同志并没有吸取这样的教训。中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根除孟什维克的动摇现象。所以我认为，我们理应听到在1925—1927年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鲍罗廷同志更明确的看法。鲍罗廷同志说，中国革命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才会胜利。这是重复普列汉诺夫的论调。必须指出，中国革命的最近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鲍罗廷说：对）。鲍罗廷同志，需要说的不光是对，而是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这是对的。

农民土地革命是在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无产阶级领导下以苏维埃形式发展起来的，这是初级阶段的革命，它能否取得胜利呢？我们深信，它会胜利，会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革命民主专政的形式取得胜利。苏维埃将是革命民主专政的形式。所以，仿效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看法难以阐明问题的实质。

另外，鲍罗廷同志有这样的说法：他说他们坚持的是工农领

导权。^①对不起(笑声),这我无法理解,我们提倡的是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工农领导权这一说法太离谱了。坚持农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很好的布尔什维克提法。我们何必要臆造,忽而仿效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忽而编造新的提法(笑声)。我觉得很为难,鲍罗廷同志,你有多少错误,就承认多少嘛!难道你不知道该抓住什么错误吗?鲍罗廷同志所说的是工农并重的领导权。这显然是不了解陈独秀主义的根本错误。我还不明白中国的广州与上海这两地是对立的(笑声)。照此说来,问题完全是由于一人在广州,而另一人在上海造成的(笑声)。当然,这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性困难,但毕竟不能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夸大到如此程度。把整个问题归结于地理原因是不对的,因为凡是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同志,或多或少是关心中国革命的,对这些事件是深有感受的。他们知道,事情经过并不是这样,认为运动中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错误,是因为中国的运动如同所有殖民地国家一样,需要同时完成两个进程。一方面,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直接形成一个阶级,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控制;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应以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是基本规律,也是俄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国。小资产阶级抹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这是陈独秀主义的基本原理。

诸位都听到鲍罗廷同志一再说,广东即广州的土地革命开展得相当顺利,然而我们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这一阶段在广东开展真正的农民土地革命,那北伐的情景肯定有所不同,通过三·二〇事件,我们也未必考虑北伐。主观见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总之,在这里,我们觉得他根本无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用俄语讲,恰恰相反,这叫否认自己的错误。我们不妨看看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鲍罗廷同志说,广州党组织只是在理论上没有弄

^① 鲍罗廷同志在审阅速记记录时修正了这一说法。——原编者

清领导权问题是像他所说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意思是说，广州同志事实上已懂得主要问题，似乎只是未能从理论上阐述这些问题，尽管事实上一切都搞得很好。但是，如果事实上一切都搞得很好的话，那怎么会出矛盾现象，出现先锋队脱离阶级斗争这一落后现象呢？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落后现象是由孟什维克倾向造成的，是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令人不解的是，鲍罗廷同志为什么要在这里作广泛的总结，而不在广州，要是在广州作这种“精采的”理论总结，那对中国共产党人是大有好处的。常言说得好：“雪中送炭嘛。”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反革命营垒中的改组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派。^①这难以理解。请问，蒋介石代表谁？难道不代表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显然会产生误解，以至得出错误的、极有害的结论。我们必须同贬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孟什维克否定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倾向进行重大的长期的斗争。

殖民地革命的整个情况是这样：广大工人阶层一开始就不够坚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乘运动刚开始便把他们推上了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我们在殖民地国家所拥有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与众多的农民群众相比，可谓微乎其微。

即使在印度，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很少。但在那里，孟买无产阶级曾是促使革命高涨的真正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挑起了提高为数不多的整个无产阶级的重担。这个20万人的无产阶级竟狠狠地打击了掠夺印度的英帝国主义，它是印度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真正先决条件。印度无产阶级虽然人数很少，但它是一支强大的爆炸性力量，因为它善于充实自己，善于揭露种种社会矛盾，不仅揭露资本主义工厂中的矛盾，还揭露深受封建主义、官吏和高利贷压迫的悲惨农村的矛盾。殖民地农民革命是在这些

① 鲍罗廷同志后来修改了速记记录中的这一说法。——原编者

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无产阶级则是揭露矛盾的核心力量，因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种种矛盾。就这点而言，如果用列宁的话来说，他们已成为“全国的”代表，成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代表，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由劳动者组成的。但与此同时，会不会出现错误和孟什维克动摇现象呢？会的，这就是贬低无产阶级运动，贬低无产阶级的地位，散布关于无产阶级太软弱的种种言论。有人会说，只有几万人的无产阶级怎么能引导几千万人呢？这是一切孟什维克言论的主要论点，这种言论在托洛茨基的声明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比如，在美国出版的最近一期《战斗者》周刊中，即在托洛茨基致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中，他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发动是一种盲动政策，他认为，这种动人的姿态正是俄共中央所需要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卷入了盲动主义。这显然是对蓬勃高涨的中国革命采取公开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态度。

同志们，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再补充一点。我和同志们私下交谈时，不得不跟大家争论如下问题：在现阶段，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不应有任何怀疑。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考虑这些人曾经如何如何。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了阻止革命高涨，为了扼杀甚至哪怕是遏止革命，肯定会散播种种论调，散播它所需要的一切论调。

总之，同志们，概括地讲，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两条路线斗争是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如果我们要弄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整个革命情况，我们认为，只要弄清中国革命所发生的一切，就足以了解所有殖民地国家的情况。这会大大推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稳定发生危机，这势必会增强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所以，我们绝不能低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们应当指出，愈往后，第二国际将愈来愈成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直接媒介。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这两国

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将通过第二国际来培植自己的走狗兼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这是东方各国阶级斗争的新情况。陈独秀主义与这有着密切的联系。

2月6日会议

吉德科夫同志：

我觉得，我们的讨论会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在这里发言的同志大多只注重往事。然而我认为，陈独秀主义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对于今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第二，同志们在提及往事时，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可是，业已高涨的中国革命要求每个党员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只有通过对自己以往的机会主义错误作无情的自我批评，才能持久地保持下去。这对于在此发言的中共负责同志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同志曾是中共的负责人，目前也还是负责人。

我认为，第三点不足是，同志们在揭露陈独秀主义时，未能把它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危险——党内的右倾危险联系起来。斯特拉霍夫同志说得对，光讲反对陈独秀主义，不提右倾危险，那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错误。

对于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表的奇谈怪论，大家是无法保持沉默的。同歪曲共产国际路线的这种奇谈怪论作斗争，是与对陈独秀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为此，我认为我有权利谈谈鲍罗廷同志的发言。

必须指出，鲍罗廷同志的发言也有肯定的方面。鲍罗廷同志是唯一要求总结自己过去经验的同志，他试图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惜，他这方面做得很不够。鲍罗廷同志不是布尔什维克式地、明确地承认错误，而是掩饰错误。他在讨论会上发言说，“我的主要错误在于，我和广州的中国同志，与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的中国同志之间虽经常发生分歧，甚至是极严重的分歧（关于这一点我

曾多次说过和写过)，但我未能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鲍罗廷同志在萨法洛夫发言后，把速记记录中他所爱用的“主要的”这几个字删掉，代之以“错误之一”等字眼。当然，我完全赞成这种极重要的修正，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鲍罗廷发言时把上海路线和所谓广州路线对立起来，他说，上海路线是机会主义路线，而广州路线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必须指出，在上次会议上，萨法洛夫同志未能很好领会鲍罗廷的意思，因为萨法洛夫同志说：“把上海和广州对立起来，这就是看作地理上的矛盾。”我认为鲍罗廷同志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广州和上海，是指鲍罗廷同志路线和陈独秀路线。（萨法洛夫：我指的是人）。噢，这么说来我没有听清萨法洛夫同志的话。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指出，用地理原因进行解释，只能掩盖鲍罗廷同志的主要论点。

但这种自我辩解显然是非常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两条路线是：共产国际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即陈独秀主义路线或称中国孟什维主义路线。鲍罗廷同志在此并没有把这两条路线对立起来，而把广州路线和上海路线对立起来。这种把广州和上海对立起来的提法，其意图是否在于否定共产国际路线？是的，是这个意图。鲍罗廷同志显然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所以他说：“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广州的革命的实践路线，另一条是陈独秀路线，或叫上海路线。”他说，广州路线实际上是革命的，但“在广州，我们还未能从理论上形成路线”。因此，我们出现了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从实践看是革命的路线，从理论看是不革命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或叫未定形的路线。这种提法多么可怕。要知道，马列主义常识告诉我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实践”。（笑声，掌声）难道鲍罗廷同志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当然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出这一结论。只要看看他的其他说法，就非常清楚了。他说，中国革命只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胜利”，又说，“在中国，我

们不是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而是为工农领导权而斗争”，等等，这难道是政治上幼稚吗？所以，萨法洛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要求鲍罗廷同志正视这种提法并指出：“要按照布尔什维克方式说：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现在鲍罗廷同志在速记记录修正本中删去了这一提法，而代之以“工农专政”的字眼(鲍罗廷：对！)。我记得，在上次讨论会上，当萨法洛夫批评这种提法时，鲍罗廷同志也当场说：“对”。这无疑是他想说，他的话是偶然说说的。可惜，这并非如此。这种提法他重^①不是偶然的，因为第一，鲍罗廷同志在发言稿中曾三次提到这种提法^②，复这一提法时，显然明知这很像谭平山的口号，即第三党的口号。第三党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它提出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贫民众阶级领导权”的口号。谭平山自1923年国民党改组之初起就与鲍罗廷同志共事，实际上他是鲍罗廷同志的学生。(笑声)自1923年起，鲍罗廷和谭平山几乎形影不离，经常指导和帮助他。因此，如果说现在谭平山已背叛革命并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而鲍罗廷同志至今还在听众面前大讲“工农领导权”的话，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学生向老师学习的，或者说，是老师向学生学习的！(笑声，掌声)这绝不是偶然，因为第二，鲍罗廷同志在重复这一奇谈怪论时，曾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同“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对立起来。他说：“作为孟什维主义的陈独秀主义就是把这一资产阶级视为理应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广州党组织、广州无产阶级和农民虽然就其斗争性质而言是力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陈独秀及其同志们的支持。”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他想以作为革命民主资产阶级的农民的 leadership 代替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所以，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只能说是

①② 原文如此，疑为重复。——编者

关于哪个革命资产阶级理应充当领导者的争论。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之间的争论，而是孟什维克路线和民粹派路线之间的表面争论。（笑声）

现在，鲍罗廷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这很好，但还不够。鲍罗廷同志虽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但还应承认他在指导广州政务期间，事实上并没有为夺取这一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看来，他不想承认这一点。他千方百计地向我们证明，广州路线是正确路线，是布尔什维克路线。他总是说：“我们在广州首先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将作为土地革命而取得胜利的问题。就实质而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然而，中共中央领导人——主要是陈独秀及其他人——主张把反帝斗争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他还说，“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大家可以看出，他在这里含糊糊论述的仍是“工农领导权”的思想。

我认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每个普通党员都清楚，绝不能把反帝革命同土地革命对立起来。中国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解放革命，同时就其客观内容而论，又是势必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反帝斗争是与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分不开的。反帝斗争是与反对地主、军阀……的斗争分不开的。鲍罗廷同志不懂得这一点。这说明他什么也没有学到。

把上海路线和广州路线对立起来，说什么广州把土地革命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而上海则相反，把反帝革命视为**主要**问题，这说明他们陷入了另一极端，如果让这一极端任意发展下去，我们会陷入新的机会主义。

可是，鲍罗廷同志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看法。他说，这种发展土地革命的路线只是实际执行的路线，而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因此，诸位不妨看看，鲍罗廷同志在实践中是怎样进行土地革命的。首先必须指出，鲍罗廷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说得不对。实际情况有

所出入。1925年，广州工人群众的反帝斗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当然土地革命在鲍罗廷同志领导下也有所进展，但不是那么彻底的。我记得，在广州时期，国民党政府军往往保护地主，而广州区委对此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没有站出来保护农民。后来在武汉时期，土地革命已采取群众造反的形式，农民自行没收地主土地，出席湖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鲍罗廷同志却提出了如下土地纲领：

1. 规定每个农民应得的最低土地份额。
2. 争取减租。
3. 实行农民地方自治。

这是什么纲领？这是土地改革纲领，而不是土地革命纲领。鲍罗廷同志提出这样的纲领，要求规定份地，要求农民自治等等，这本身就抹杀了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鲍罗廷的土地纲领简直是立宪民主党的纲领。这就是所谓广州路线即鲍罗廷同志路线的实践。（笑声）

关于对待国民党问题的情形怎样呢？我应当指出，鲍罗廷同志在三·二〇事件上是真正反对陈独秀的，甚至同陈独秀作过斗争。他认为把领导地位让给国民党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对的。但要知道，共产国际的策略不仅仅局限于上层领导。共产国际路线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国民党的民主化问题（**鲍罗廷**：没有提出）。这是诬蔑。问题在于鲍罗廷同志不明白共产国际有关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路线。所以，他实际上没有执行这一路线。此外，鲍罗廷同志至今还不了解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意义，尽管他吸取了后来一些事件的经验教训；他说：“现在我已非常明白陈独秀追求的是什么，我认为他就是中派主义的代表人物，实质上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营垒。”（**鲍罗廷**：请按照速记记录念。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这我在原来的发言稿中也提过。）要知道，我也是按照速记记录念的。当时你是这样说的，而现在却

改变了说法。(笑声)

假定说速记记录中写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那更坏。难道我们就认为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吗？所以，当时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路线是右的表现，而鲍罗廷同志不理解共产国际路线是左的表现。(笑声)

我们在A·巴库林的《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出版)一书中读到一则可笑的奇闻。1926年12月12日，鲍罗廷同志在一次欢迎宴会上对蒋介石说……(鲍罗廷：该书作者没有出席这个宴会，他没有听我的讲话。请同志们不要提此事，因为我的讲话在该书中被严重歪曲)。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跟巴库林同志争论。(鲍罗廷同志：作者歪曲了我的讲话。出席这个宴会的同志可以证明这是胡扯。)

这本书毕竟是出版物，所以我认为可以向大家引用。即使同志们向我们证实巴库林同志歪曲了事实，但书中就是这样写的。鲍罗廷同志对蒋说：“蒋介石同志！我与您共事已经4年，如果我明天死去，国民政府务必料理我的后事。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很穷。我不是某个将领的顾问，而是全中国被压迫人民的顾问。我一直和你们一起为革命南征北战，以前我们对付反革命，而现在不得不以另一方式提出问题。如果某些人不愿意听我们的忠告，我们还有愿意听我们忠告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鲍罗廷：这里全被作者歪曲了。我当时的意思是说，假如你们不跟我们一道去对付反革命，到时候会有别的办法的。大家都明白，这是针对蒋介石讲的，当时还没有跟他破裂。这里全被歪曲了。)

同志们，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段引文是不准确的，认为巴库林歪曲了鲍罗廷同志的讲话，那我很乐意接受，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篇讲话糟糕透了。(笑声)我觉得，尽管鲍罗廷同志一再解释，但还有必要问问，为什么他不认为有必要直接号召中国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却为了跟蒋介石共同对付反革命而通过蒋去办这件事，

难道这也是共产国际路线吗？(鲍罗廷：你们为什么不反对蒋介石？我在他的专列中率先反对他。)(笑声)

同志们，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谈论这种令人发笑的声明了。现在我想谈另一个问题。鲍罗廷同志刚到武汉时就发表了一个纲领性演说，其大意是：必须统一国家，以保证为民众建立廉洁的财政制度，提高工资，减少捐税，改善贸易和取消不平等条约。3亿农民是一个很大的购买力，必须把他们提到这样的地位，必须把他们的产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国家的总的商品流通领域，从而保证人民的福利。这篇演说中哪里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即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哪里提到土地革命的问题？哪里提到要跟那些不愿意听从我们劝告的反革命将领作斗争？难道这也是鲍罗廷同志要我们相信的广州的革命路线吗？从这篇演说中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出什么革命性。因此，我认为鲍罗廷同志的路线非常清楚，他的路线本身就是孟什维克路线，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别于陈独秀主义罢了。在当时的革命阶段，鲍罗廷同志有时也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笑声)但这绝不是广州路线。我们讨论陈独秀主义问题时，应该研究的不是广州路线和上海路线，而是应该弄清楚共产国际路线和中国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区别。要知道，我们研究陈独秀主义不是抽象的，研究陈独秀主义的目的是要更好地理解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的路线。

所以我认为，鲍罗廷同志要是能稍稍改变问题的提法，要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我们一道总结经验，那就太好了。鲍罗廷同志是中国大革命中的一位大人物，主持过重要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假如他不善于按布尔什维克方法研究、分析自己的经验，我们就难以享用他丰富的经验。

不理解共产国际过去的路线，不了解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就使鲍罗廷同志无法正确评论当前的陈独秀主义。鲍罗廷同志说，“在业已发展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欧洲孟

什维主义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孟什维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这毫无疑问。但他接着说：“中国孟什维主义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危险。我认为，步改组派后尘的陈独秀主义还会起重大的反革命作用，它将朝这一方向发展，有朝社会法西斯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已起着法西斯主义的作用，只有瞎子才否认这一点。鲍罗廷同志装出一付反对陈独秀主义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攻击共产国际路线，散布种种谬论，提出错误的估计，试图使我们放弃对陈独秀主义的斗争。

维经斯基同志：

今天，我本不想发言，但有人告诉我，讨论会即将结束，而且鲍罗廷同志在谈话中说，只有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其他同志没有承认错误。我认为，如果不想真正承认错误，最好别承认，鲍罗廷同志就是这样，他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一发言就犯新的错误，总而言之，尽说空话。

首先，我应该提出一个具体问题：我们如何理解无产阶级领导权？自1925年起，即自中国革命高涨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有哪些实质性错误？在回答该问题之前，必须指出，陈独秀所犯的错误与其他许多同志所犯的错误，远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应说明一下，在1925年，我和许多与我共事的同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看法是这样的：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逐渐成为领导者，而1925年的运动是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开端。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由于当时无产阶级与客观上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联盟关系，所以在具体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即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以及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中国面临的是武装的帝国主义，中国党缺乏经验，等等。

但正如我说的，也有我们自身的错误，这些错误表现在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即共产党的作用问题上。我们往往走两个极端，对于在国民党内做工作这个问题总是犹豫不决。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应当是独立的。我们知道，独立性意味着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也就是说，在思想上应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在组织上应有自己的政党，有自己的干部，等等，同时在国民党内也必须有批评的权利，有批评国民党的权利，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我们在理论上是懂得这些的，如果分析一下中共中央历次全会的一系列决议，即可得到证实。但在书面决议和实际执行决议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某些同志不愿意执行这一路线，而是因为某些同志，包括我，不善于在实践中执行这一路线，尽管大家深信这完全是必要的。我们虽在纸上写下了这一路线，但事实上未能在中国具体条件下贯彻执行，因为当时整个国家乃至无产阶级支离破碎，连党组织本身只是几个不同组织的联盟。我们不知道在这种条件下该如何执行这一路线，实际上也没有贯彻执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错误。

假如回顾一下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解决五卅惨案后即上海和广州两地反帝大罢工后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情形，假如看一看中共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当时所做的一切，即可发现，我们在具体执行本身无重大错误的决议时，步调很不一致。

我们应当谈谈鲍罗廷同志所说的两条路线问题，他说广州和上海执行的是两条不同的路线，广州执行的是正确的革命实践路线，但理论未能同这种实践联系起来，等等。同志们，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鲍罗廷同志说，在他工作的地方执行的是正确策略。应当说明一下，我不想反驳他，而只是想指出，陈独秀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区别必须加以肯定，否则就无法了解中共是

怎样的一个党，会以为这个党似乎是由这些机会主义者操纵的，以为它不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个党在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崩溃，它依然是革命的参谋部，它的干部，除一些人离去、牺牲和少数人当叛徒外，其余人仍然是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共就是这样的党，否则，共产国际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会上，怎能说，它是一个不坏的共产国际支部呢？为了着重指出这一点，必须说明，在一些主要问题上，陈独秀和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曾跟他作过斗争，开始不太明显，后来越来越公开化。总之，绝不能说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是一码事。为了强调这一点，我要从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所作的报告中援引一些足以说明他如何理解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言论。只要仔细研究共产国际历次全会就这一问题所作的决议，并把它们同鲍罗廷同志的看法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决议中的提法和鲍罗廷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犯一系列错误，是因为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无疑是对的，但不能把它称作陈独秀主义的党，不能把陈独秀和党等同起来。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鲍罗廷同志与陈独秀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请看鲍罗廷同志的如下言论：

“……共产党员以代表资格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所通过的纲领确定了孙中山的三大原则并指出，只有吸引工农群众参加革命运动，满足他们日常的需求和整个经济政治需求，才能实现这三大原则，因而，国民党的方针理应首先面向工农群众，这本身就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敞开了大门。”^①

这么说来，只要我们参加国民党，只要我们帮助国民党制定

^① 引自《1927年10月23日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俄文本）。

相应的纲领，这本身就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敞开了大门。用不着我们去组织独立自主的党，开辟通向领导权的道路，而是通过国民党去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如果你们想进一步了解鲍罗廷同志怎样评价国民党的斗争，怎样评价他“率先举旗”反对的蒋介石，以及当蒋介石统率军队时他想从蒋那里获取什么，那末，请看他的如下讲话：“……蒋介石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捍卫者之一，一开始秘密支持，后来公开支持。尽管他高唱革命词句，但自1924年被重用之日起就捍卫民族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权。他始终没有变。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但只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能从他那里得到一切。我们知道，在中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就等于完成了一场变革，而这场变革势必会把政权转移到工农手中。”^①

同志们，这就是他本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真正看法，即对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真正看法。照此说法，在当时情况下，只要有像波拿巴分子这样的人领导革命，把革命推向前进，革命就能完成，而我们只要求他把革命进行到底，以后他会自动把政权转交给工农。我们从这段引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共中央的任何会议，任何全会，从未提出过诸如此类的看法，从未讨论过这种看法。

下面，我谈谈北伐时期。你们想知道鲍罗廷同志就北伐的原因说了些什么吗？请看如下讲话：“……北伐的目的是什么？广东群众运动已发展到如火如荼的程度，因而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在革命的主要问题上的势必会发生决定性的战斗。我们无力同三月

^① 引自《1927年10月23日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俄文本）。

派^①进行这场决战。我们即使同左派联合，也势单力薄。必须把其他省的群众吸引到革命中来。因而，联想起了我们俄国关于取道华沙远征欧洲的说法。”^②（鲍罗廷：这完全是胡扯。有人喊道：鲍罗廷同志，这是你在自己的报告中说的。）

这是比喻北伐。

另一方面，请大家注意，从鲍罗廷同志关于北伐的原因的这段话中，即可看出，他是以北伐作为他后来整个路线的起点的。这与远征西北属于同一概念。其意思是指，当形势在某省发展到真正土地革命时，必须转移到另一省，因为在该省不能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当时我们还不主张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的民主专政，当时我们仍坚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还没有提出实行土地革命的说法。”^③（有人喊道：这是在广州路线以前。）

当时，本应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然而鲍罗廷同志却说，要放弃根本性变革，以便继续向北推进。在这个问题上，即在北伐问题上，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所以，我指出鲍罗廷同志的看法，这并不是想说明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我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我曾反对过北伐，因为我认为，北伐如同鲍罗廷同志所说的那样，就是不想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但我犯了错误，不了解北伐的客观意义，不懂得利用北伐来争取群众，从而与群众共同对付国民党。我未能看清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直接前景。我不知道谁的错误要大些，但情况就是这样。我犯错误是与我们不能卷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一看法密切相关

① 指1926年3月20日广州反革命事变的参加者。——原编者

② 引自《1927年10月23日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俄文本）。

③ 同上。

的，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有组织地反击国民党。我只是清楚地知道，业已形成的北伐就是蒋介石的讨伐，他企图利用北伐来削弱中国的革命运动，所以我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北伐。我犯了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把无产阶级置于仅仅是反对派的地位，这本身就承认了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可我还是认为，我的错误看法和鲍罗廷同志的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鲍罗廷同志的看法毕竟贯穿整个武汉时期。他的看法是这样：我们只要面向全中国这个大舞台，利用军阀之间的争斗，夺取新的地盘，群众运动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我们同意这一看法，但我们总是把赌注押在以这一军阀倒另一军阀上，没有把真正的希望放在巩固和发展土地革命方面。相反，我们阻止群众越出鲍罗廷同志所允许的斗争规模。

国民党领导集团，包括鲍罗廷同志在内，竭力制止群众的过火行为，想方设法保持平静。鲍罗廷同志在谈到他在中国所犯的重大错误时说：主要错误是，我们本应先攻取南京，尔后北上，然而我们改变了进军路线，这是致命的错误。当然，我不否认战略战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不能认为工农政策取决于战略战术。诚然，战略战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能说这就是制定某一工农群众政策的基础。

看一看鲍罗廷同志是怎样评价国民党左派的，这极为重要。其实，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早在4月份就投降了。他们那时已经背叛革命，尽管不由自主地同南京进行斗争，但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那儿多好，那儿可以镇压工人，而我们这里尽是过火行为、骚动，等等。”他们虽然不由自主地仍在同南京斗争，但实际上已在向南京看齐了。

请看，鲍罗廷同志是怎样评价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他说：“我们失去了这个以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民主派，因为它已不再相信

我们的力量。当时它惊恐万状，由于惊慌就开始分崩离析。”^①

原来，国民党左派之所以倒向反革命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南京斗争不力，而不是因为掀起了土地革命。但由于我们未能及时领导土地革命，所以土地运动愈发展，国民党左派愈动摇。我们本可以拉住国民党左派一个时期，只要我们不是对南京草率开战，而是实行坚决的土地政策——这是成败的关键。

同志们，现在谈谈我们的实际工作，即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内和对国民党方面所做的工作。必须指出，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作为有批评权利的独立组织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各项原则，关于反对国民党改良主义倾向的各项指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坚持执行，有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共愿意以独立组织出现，应该说，它在国民党内始终没有被溶化。中共毕竟坚持了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在思想意识方面糟糕透顶了。很明显，中共对陈独秀主义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国民党虽进行了批评，但很不认真。

中共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经历布尔什维克的锻炼。对这一切应负责任的不光是陈独秀，还有我。当然，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他眼中这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我也总是不强调这些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不言而喻，中国党所犯的某些错误和重大错误是由错误的领导造成的。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由于处在国民党内，它的辩证的发展进程非常复杂。中共的发展进程要比其他国家复杂得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派的辩证发展进程是这样的：他们所遇到的明显的敌人始终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他们直接的、公开的敌人。然而，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保持组织上

^① 引自《1927年10月23日鲍罗廷同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俄文本）。

的联系，它往往看不清自己直接的敌人，主要错误就出在这里。共产国际预见到了这一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东方问题所通过的总决议中好像指出过，中共要警惕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因为在中国具体条件下，这种辩证的发展进程是十分艰巨的。

不过，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经验，只要是根据事实，根据中共党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得出的经验，只要是从各方面分析研究得出的经验，应当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其他殖民地国家的极其丰富的学习材料。中国共产党在对付资产阶级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学习。

萨法洛夫同志：

鲍罗廷同志的做法很不对头，他没有再次发言。想回避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不行的。无论是谁都没有要求鲍罗廷同志道出什么“秘密”和“令人震惊的看法”。但大家都想知道，鲍罗廷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究竟是怎么想的。

最重要的是，应当弄清我们在1925—1927年革命中所看到的那些异常独特的错综复杂现象，即反帝斗争与阶级斗争首先是与土地革命互相交织的现象。民族战争即反帝斗争与阶级斗争即土地革命互相交织这一现象成了许多人前进的障碍。反帝战争与土地革命互相交织这一现象，对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来说是非常典型的，它是导致托洛茨基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错误的原因。在任何革命中，我们必须善于把自上而下的行动和自下而上的行动结合起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针对马丁诺夫的观点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善于把革命引向胜利，使之达到革命专政的目的，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它不能放弃“自上而下的行动”，不能不参加革命政权。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斗争是在反帝斗争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通过这种反帝斗争势必会进行土地革命。对于无产

阶级来说，放弃反帝斗争就等于放弃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另一方面，放弃土地革命势必会导致屈服投降，导致反帝斗争的失败。这两种倾向无疑都是机会主义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是过高估计自上而下的行动，把整个运动引向仅仅是清一色的反帝斗争，而反帝斗争只能通过民族革命战争途径即借助于军队来实现。托洛茨基党内反对派则否定自上而下的行动，试图放弃中国革命的反帝任务。

鲍罗廷同志强调广州与上海的对立，这是枉费心机。我们有必要看一看某些事实。由于鲍罗廷同志不愿意再发言，我也就没有福气再引用他的讲话，只得援引巴库林同志和其他同志的记述。如果“真理”保持沉默，那些提供重要事实的所谓“诽谤者”就要发言。我们看看蔡和森同志^①是怎样描述广州的？他在指出广东区委的错误时断言，这个区委极端害怕所谓流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群众运动。陈独秀和鲍罗廷同志对群众的过火行为总是感到非常不安。恕我直言，我还未见过1925—1927年大革命期间其他活动家像他们这样滔滔不绝地、不负责任地谈论农民运动的所谓无政府流寇现象。凡是研究1905—1907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同志都知道，列宁的功劳就在于他理解这一运动的整个具体情况，理解这一运动的自发性。我记得，1910年在国外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曾批判列宁发表在《争论专页》上的文章，指责“列宁是无政府主义者，袒护无政府主义”，因为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农民在1905年烧毁了2000座地主庄园，可惜，他们没有烧掉的，比这要多15倍。孟什维克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鲍罗廷同志也反映了这种“不满情绪”。他不懂得，一旦运动扩及真正的底层群众，就难免有自发的破坏行动，难免有“过

^① 参见《党的机会主义史》，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火行为”，难免随意采取种种斗争手段。我们伟大的十月革命也有这种现象。要全面地理解革命。群众运动是由反帝运动发展起来的，而有些人不去领导它，反而轻视它。有的不善于提出适当的发动群众运动的口号。有的不但不领导群众运动，反而采取更糟的行为。有的以自由主义的敌视态度对待群众运动。然而，布尔什维克就不能唉声叹气说：“唉，流寇，唉，无政府主义”；作为布尔什维克，就应当考虑到“流寇主义”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11月30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某些同志丧失了革命嗅觉。他说：“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量愈强大。”^①

斯大林同志在这一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了另一危险。他说：“我认为在提纲中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拉费斯问道：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面向谁——面向国民党的左派还是中间派？奇怪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面向无产阶级，并使中国解放运动的活动者都面向革命。”^②鲍罗廷同志不理解这一点。他的主要错误见解也就在这里。他不懂得所谓流寇主义即贫民惩治地主是土地革命的具体表现。因此，有的人认为过火行为的表现就在于农民过分贪求土地；有的人则认为错误在于工人强夺商人的财产，等等，等等。很显然，所有这些同志都认为，中国革命应像儒家所教导的那样，搞得彬彬有礼，人民不能自行夺取财产和土地，应先由官方没收，然后再行分配。列宁曾讥笑过这种观点。他教导我们说，应当赶走官员，自行夺取土地。他指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30页。——译者

^② 同上，第332页。——译者

出：“我们没有官员也能搞革命，要实行革命的专政。”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鲍罗廷同志却忘了这一起码的革命道理。他之所以忘掉这一起码的革命道理，是因为对中国农民采用孟什维克观点。革命一旦掀起，工厂工人和苦力势必会提出反映群众不满的要求，不愿意为微薄的工资而卖命，他们会接连不断地提出“大量”要求，因为他们不甘心再当殖民地奴隶。鲍罗廷同志不能不承认有人曾草拟过“政治性没收”土地方案。遗憾的是，我们的讨论会没有提及这个非正式通过的方案。请允许我谈谈实际情况：汪精卫总是含糊其词地发表意见，要求规定大地主的界线，建议没收超过50亩的地产。邓演达根本不敢多发表意见，深怕招致别人的强烈反对。我们共产党员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湖南同志和俄国同志一致主张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谭平山摇摆不定，发表一些非实质性的意见，忽儿谈土地税问题，忽儿谈赎买土地问题，最后，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与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达成协议，提出了人所共知的“政治性没收”方案即只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地产。^①

我们为了探讨陈独秀主义的根源，有必要谈谈“政治性没收”。政治性没收可以代替土地革命！据巴库林写的《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书描写，某些国民党将领对工厂、田庄和房屋实行所谓“政治性没收”，显然出于贪污的目的。不能否认，“政治性没收”的口号是陈独秀主义的根源之一。鲍罗廷同志参与制造了这些“根源”。但是，我们再听一听他说的话吧。鲍罗廷同志说，“表面上中共应当承认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权。”^②

如果群众不讲理，搞流寇主义，不等官员来到就自动夺取土地，那你将怎样领导群众？他认为，不能领导“不讲理的”群众。由此可见，鲍罗廷同志显然出过荒唐的“主意”！

^① 《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史》，载《中国问题》（俄文本）第1期第80页。

^② 同上，第32页。

他不明白两种革命道路之间，即主张发展革命的人和主张取消革命的人之间正在进行斗争。他忽略了这一重大问题。

对以中国农民为代表的所谓中国流寇的不满，终于导致在行动上明显的游移不定。我们在此不能不谈夏斗寅叛变后特别委员会的湖南之行。鲍罗廷同志参与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是查明反革命将领为什么要反革命的问题。(笑声)调查结果，他们毫无收获，不得不解释说：某些将领之所以反革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反革命分子！(笑声)这纯粹是虚伪的、可笑的、无主见的举动。对土地革命的错误态度，即对农民群众的错误态度，导致了思想上的混乱，为汪精卫之流所摆布。党曾要求由全民阵线转入土地革命，可是鲍罗廷同志却置之不理。

要不要北伐，该不该像反对派所建议的那样退出国民党？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需要北伐，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群众斗争的基础。维经斯基同志引用鲍罗廷同志的话说：“我们知道蒋介石主张资产阶级革命”，而“我们想迫使蒋把革命进行到底”。鲍罗廷同志至今仍不懂得反帝斗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懂得在同帝国主义发生公开冲突的形势下，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一方，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斗争。

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鲍罗廷路线和共产国际路线混为一谈。列宁写道：“捣毁”地主庄园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因为革命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既可按立宪民主党的方式，也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进行，既可戴着白手套干，也可用大老粗的方式干。领导农民群众，反对地主，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是不行的。鲍罗廷同志！您过于从“流寇主义”的危险性这一角度考虑一切，您过分强调群众有无教养，而不去分析革命中的阶级斗争。

我听了鲍罗廷同志上次的发言，就想不妨援引马克思致恩格斯信中就埃德加尔·鲍威尔所说的一段话。马克思说：“埃德加尔·鲍威尔先生虽然承认阶级矛盾”，但用的是“柏林方式”。鲍罗

廷同志也是这样。他承认中国 1925—1927 年的阶级矛盾，但用的似乎是“广州方式”。（笑声）

我们的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不管哪位同志犯了错误，都应当剖析错误，应当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说说自己的观点。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言时，理应谈谈无法掩盖的东西，谈谈本应向大家真实说明的情况。不定哪天，他可能会弄清楚，中国革命首先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取胜。也许他会恍然大悟，农民革命绝非区区小事。它具有这样的辩证关系：假如不仔细研究农民革命，就会一无所知，一无所获。列宁教导说，革命不是一列普通的特别快车，可以平安正点抵达车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还没有，也不会有。事情很清楚，我们必须投入反帝斗争，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反帝斗争基础上才能夺取全国革命的领导权，我们越是广泛深入地投入反帝斗争，就越能使农民革命更好地走上轨道。必须懂得这一辩证关系。我们认为，关键就在这里，基础就在这里。不是去当家庭教师，光谈文化教养，而是要同情“商人心怀不满，工人没有学问，苦力没有文化”，等等，要按布尔什维克方式猛烈开展农民革命。

对维经斯基同志还有一点意见。我认为只对错误策略作出解释是不够的。要作出比我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把实践问题同我们党在某一时期关于转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联系起来，同共产国际的警告联系起来。共产国际早已指出，如果我们不引导起决定性作用的农民后备队投入战斗，不领导农民进入夺取土地的斗争，那么反帝斗争的内容将会丧失，将会落空，反帝斗争将在群众中失去意义。陈独秀主义的成长，靠的是一部分人不愿意和另一部分人不善于把反帝斗争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这在我们许多过于相信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同志身上都是存在的，除鲍罗廷同志以外。应该懂得武装斗争与阶级斗争相互关系的辩证法。顺便说说，红军的整个策略应以阶级斗争为依据，红军应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建立

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人不懂得这一辩证法，应该懂得它，应该把整个问题归结于同将领们的联合上。不能像鲍罗廷同志那样说：“蒋介石会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只能是工人领导下的农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当利用国民党和北伐。应当借助于反帝斗争的成果动员农民，用斧头武装农民去对付地主。

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的观点来指导革命实践。

科穆纳尔同志的总结发言

陈独秀主义是个很大的题目，要讲透它，用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或甚至开一个讨论会，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讨论会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的机会主义和中共从成立起到1927年的历史。所以，有人认为我的报告不够全面，这完全正确。

在这里，我要补充几句，谈谈陈独秀当前的纲领。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纲领。陈独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纲领所依据的前提，就是把中国目前的形势视为民族资本主义可以大发展的形势。陈独秀分子以此为依据，否定新革命高潮赖以发展的基础。换言之，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分子。尽管这样，他们仍在玩弄左的词句，以欺骗工农群众和个别不坚定的党员。他们说，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将是社会主义的，这一革命胜利后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的左的言论。可是，现在他们提什么口号呢？现在，他们提立宪会议的口号。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在他致共产党员的信中写道，在反动时期，我们应当提普遍民主的立宪会议的口号。在托洛茨基分子的纲领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应该提立宪会议的口号，由它（立宪会议）解决国家内政外交的主要任务，比如，没收土地，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

这一托洛茨基纲领即陈独秀纲领的反革命取消主义性质是什么呢？它就在于纲领制定者企图使运动倒退。他们想以立宪会议的口号对抗“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是宣传的口号，而不是行动的口号。同时，他们又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例如，中国托派分子给托洛茨基写信询问：由谁召开立宪会议，是统治阶级还是人民。“聪明的”托派分子应该懂得，立宪会议只有在人民推翻现有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才能由人民召开。也就是说，只有革命才能保证人民召开立宪会议。既然是这样，那这跟他们关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有何相干？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何必要召开立宪会议呢？中共一贯向群众说明，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统治集团不能抱任何幻想。相反地，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却散布并加强这种幻想，以使群众不起来反对反动统治，并阻止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在这方面，他们的反革命本质暴露得明显得多。列宁早就指出，俄国伯恩斯坦分子的改良主义本质要比德国人暴露得明显得多。我们可以同样地说，中国托派分子的反革命本质要比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暴露得明显得多，清楚得多。他们一面提出似乎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一面极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主张召开立宪会议。这本身就揭下了他们的假面具。

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之所以高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其目的是要否定早在1925—1926年间曾被他们否定过的土地革命，是要全部取消革命。他们抱住立宪会议的口号不放，而这一口号已失去其民主主义的意义，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旗帜。

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作用是什么呢？他们的作用就在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用刺刀来镇压工农运动，需要用别的武器来镇压和压迫人民群众。而这一武器就是陈独秀分子和

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力求利用左的似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从内部瓦解工农运动。这种作用和“资产阶级工人党”的名称完全相符。

由于中国的阶级斗争始终在发展，所以资产阶级工人党如果不采用社会法西斯的斗争手段就难以维持。它对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卑鄙无耻的反革命诬蔑中伤手段。陈独秀在他最近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不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而是这一运动的摧残者。当然，对共产党采取这种斗争手段的，只能是社会法西斯分子。

现在我想谈谈同志们的发言。首先是鲍罗廷同志的发言。他安慰我们说，在1925—1927年革命中，以鲍罗廷同志为首的广州组织曾反对过陈独秀机会主义，广州组织有正确的路线。他说，他们执行的是无产阶级夺取土地革命领导权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的方针。他认为，他的错识仅仅是没有把同陈独秀的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他没有犯其他任何错误。然而，鲍罗廷同志聪明过头了，他以为其余共产党员都是1928—1930年出生的，根本不知道过去的事。玩弄这种把戏很不好。鲍罗廷同志爱作修正，一再补充说明，讲一些诸如说明之类的话，可是大家都知道，畏首畏尾，不敢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机会主义者固有的本性。鲍罗廷同志还提出了这一看法：广州组织的整个实际工作是颇有成效的。他说，他们只是在理论上还未仔细研究这些问题。这就出现了一幅有意思的图画：他们在实践上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在理论上则是机会主义者。实际情况是这样，他们尽说漂亮话，在理论上完全正确，而在实践上则按机会主义行事，世上没有反过来行事的傻瓜。请问，我们有没有不同于陈独秀所领导的中共中央的路线的广州路线呢？没有这样的路线。广州路线是中共领导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发挥和补充。

鲍罗廷同志指望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纯粹是孟什维主义。由这一路线产生的主要策略观点是，我们应当及

时让步，免得妨碍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既然这样，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土地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问題。鲍罗廷同志认为他从未有过任何幻想，可他却指望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在他看来，把这种革命进行到底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把政权夺到手。

鲍罗廷同志的发言有何意义呢？鲍罗廷同志曾是广州组织的领导人，执行了中共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时，他又想提出这样一件事：他是第一个“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这无非是想暗中维护陈独秀主义，因为广州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完全适应整个机会主义路线。

现在，陈独秀公然反党，而党日益布尔什维克化，群众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可鲍罗廷同志仍不想承认自己过去同广州路线有关的错误，试图掩盖自己机会主义的往事。

某些同志可能认为，这纯粹是历史问题，对于任何一个领导人当前的观点来说，毫无现实意义。这种看法不对，因为他们不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就不可能在当前的政治问題上采取正确的路线。在反对陈独秀主义这一斗争中，我们应该揭露对陈独秀主义的任何形式——公开的和隐蔽的维护。我们应当清除中国孟什维主义的一切残余，首先，我们应当揭露广州路线及其捍卫者的这种理论。

关于维经斯基同志的发言。他提到了这样一件事：上海中央委员会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是在实践中未能贯彻执行。你们只要看看1922—1927年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在这一时期的决议，即可发现机会主义观点比比皆是。在维经斯基同志本人的文章中这种东西也是比比皆是。

最后，我们应该作出总的评价。陈独秀虽然由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者即资本主义捍卫者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他加入中共之初起，实际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

者，“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陈独秀宣布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同陈独秀主义的斗争应当全面展开。我们要比以前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产生孟什维克理论的客观形势，总结过去的经验，以免现在和将来重犯错误。

我希望我们的讨论会能成为推进这一工作的动力。

(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 革命中的错误问题

(1930年)

维经斯基

中国革命正在经历着一个最艰难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对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领导问题。

革命的主要困难在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于帝国主义拥有优势力量。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集中力量强行破坏城市革命无产阶级的运动同千百万暴动农民的运动之间的联系。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党是革命的政治和组织因素，它的作用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了。党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和策略措施都必须彻底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与集团的一切微小影

响。只有坚决地、毫不妥协地经常同自己队伍中这种影响作斗争，党才能坚持革命阵地，排除万难，完成自己争取与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一历史使命。

当前，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右倾危险，这是一种露骨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陈独秀主义的倒退观点同中国的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同流合污，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

虽然“左倾”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盲动主义成分，正如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决议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党的队伍中代表“左倾”危险，还仍有影响，但上述一切客观困难，如同中国共产党过去遗留的错误一样，主要是助长了右倾情绪的发展，使右倾危险成为主要危险，因而主要火力必须对准这种危险。

所以，不仅揭露现在的陈独秀主义，而且揭露过去的、主要是1925—1927年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势在必行。但不能仅此于此。还应当挖出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一切主要错误的根源，这样才有助于党同当前的右倾危险作坚决斗争。

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必要对我在中国研究所讨论陈独秀主义时所做的发言，加以补充。这里我还应当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下面引述几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5月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这表明，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之初是如何教导中国共产党的：

1. 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2. 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何种考

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全部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

3. 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此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取消苛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制；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等等。

4. 必须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并利用关税收入、盐业垄断以及部分财政操于外国资本之手等等事实，使全体贫苦农民懂得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只有给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根据，我们才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胜利。

5. 当然，领导权应当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运动最近发生的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全部重要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6. 共产党必须不断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只有通过这条途径，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这个军队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

这个指示清晰地描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基础。

再进一步叙述就可以看出，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这就导致违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列宁主义方针，实际上没有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在中国革命浪潮增长时期，特别是从1926年夏起，陈独秀主义已彻底暴露。

这不是说，陈独秀的一套观念仅仅是在这一时期才形成的。恰恰相反，陈独秀的孟什维克理论和策略，正是在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在各阶级力量营垒分明的革命阶段，开始原形毕露，陈独秀的全部观念和整套观点必然会形成这类理论和策略。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谈陈独秀主义的发展历史。第一，因为中国革命自开始北伐时期后，中国孟什维克主义的意义和作用已尽人皆知；第二，因为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科穆纳尔同志和其他中国同志的报告，已充分阐明了陈独秀主义的历史，而我和这些同志的看法没有分歧。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要谈两点意见。第一，陈独秀的观点在北伐之前就在党的政策上反映出来了，经常是以一种对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表示怀疑或提出疑问的方式反映出来的，而我斗争不力，没能使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理论，也没有把同他的争论拿到党内。起初，陈独秀的观点还处于萌芽状态，这同共产国际的明确方针并不抵触。在这一点上我有过错。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

我认为，陈独秀的错误是不久前才成立的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的，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革命历史，它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革命传统，只是刚刚开始走上学习马克思学说的道路。基于这些原因，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我想，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

在回顾分析这个现象的时候，应当说，我对待陈独秀的观点和方针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是调和主义的，因为正是有了上述原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极为薄弱），对这个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对陈独秀）在方针和观点上的微小错误就要特别警觉，必须把这些观点公诸报端，召集会议教育全党，与之进行原则性的斗争。

不言而喻，对陈独秀这样一个党的领袖的观点持这种态度，就不可能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斗争，也就是放松了极为重要的原则中的一条原则，这些原则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独立自主、争取中国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进行斗争的依据。

但是，“不进行这种斗争，不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共产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战略目标——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实现”（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第二点意见，就是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无疑，陈独秀在党内影响很大，但还是同他的观点作了斗争，虽则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也缺乏应有的尖锐（这里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普遍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家长制习惯，也起了不小作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开始迅速形成了针对陈独秀的反对派，尽管当时没有得到我的支持。

虽然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多年影响，虽然中国革命惊人的迅速成熟，以致没有充裕时间培养革命干部，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革命惨重失败后，仍然很快恢复了元气。这个情况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当然，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也同陈独秀一起离开了，但保留下来的老干部同共产国际和党一道，吸取了1925—1927年暂时失败的教训，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道路，并善

于引导党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所以，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共产国际和苏联当然对中共现有干部有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由于中国革命的经验更加强了，这就使党摆脱了陈独秀分子的影响。

只有持这种看法，才能理解，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尽管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叛变之后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下基本走上了正确道路，不仅有力量转而采取新的政治路线，认清新的革命阶段，而且以惊人毅力在战略和策略上贯彻执行这条路线。

说完这几点意见之后，现在来谈中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我在内）在1925—1927年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根源这一问题的实质。

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

只有从这个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各个阶级力量的阵容，以及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等方面来说明这个革命的各个阶段，才能剖析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

中国革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完成北伐告终。当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正在重新改组，这一方面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背离革命，另一方面则标志着土地革命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武汉政府时期，其特征是，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进行联合，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国内封建军阀分子的联盟。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无产阶级加强了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个别非剥削阶层的影响。在这个时期，由于土地革命发展和我们参加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争取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激化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以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害怕土地革命扩大和帝

国主义进逼而叛变革命为开端，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了同盟。在这个阶段，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不断发展。这个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标志，就是直接争取实现以苏维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有两个时期，这就是1919年至1925年（上海事件）和1925年至武汉时期之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革命最初时期。在此期间革命是**全国性的**。除帝国主义的直接工具——封建军阀集团及与其勾结的官僚、显贵、地主、买办外，各阶层人民都投身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运动。孙中山一派，特别是他本人，如果能够正确地参与和领导这个已经爆发的全民运动，是非常有可能成为国内最大政治因素的。

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含混不清，自相矛盾，但基本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压迫的愿望，因此，已广为流传。当时，各阶层人民在孙中山思想中添进了自己的内容。这种情况说明了孙中山及其一派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同封建军阀集团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武装力量。

但是，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和领导，孙中山一派，即当时的国民党，是无法利用这些客观条件的。

共产国际的功绩正是在于，它依据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译者）提出的原则方针，考虑到建立一个能组织全国运动的军事政治中心对中国革命今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如果建立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族革命政党，孙中山一派是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必然要采取依靠苏联的方针，因为这是由全国反帝运动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在这个革命阶段，各阶级力量配置基本情况如下：一方面是

中国军阀和封建地主，受各种帝国主义势力扶持利用的买办和官僚上层，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即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和小商人。

不言而喻，这个全国性的反帝战线内部有阶级斗争。由于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阶级斗争的道路也随之扫清。几十万工人和数百万农民参加了斗争，后来就在中国工商业中心城市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强大策源地，并使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阶段。

几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是革命运动的表达者和这一阶段的初期组织者。他们在城市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商人资产阶级行会和公会范围内，并在其帮助下，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抵制帝国主义商品的运动，还赢得了除买办阶级外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

在紧接着世界大战后的这段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没有参加反帝运动（无论是抵制洋货运动，还是反基督教运动），而是专干军事投机，企图利用广东省内军阀的局部斗争，其目的是联合某一军阀或军阀集团夺取广州。至于反帝斗争，则孙中山集团只是从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利用日英矛盾，而且依靠日本。

这就表明，国民党对于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以后国内爆发的运动根本不理解，国民党和孙中山如同其他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和派别一样，还处于美帝国主义所散布的和平主义幻想的影响之下。在抵制洋货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时期，学生组织曾向孙中山发出呼吁，但没有得到他的支持。

因此，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反帝运动，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统治全国的安福系的斗争，国民党都没有参加。

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开始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矛盾加深（华北发生的两次战争：1920年夏直奉反安福系的战争和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的直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和苏维埃俄国对华和对东方各国人民政策产生了影响；只是这些情况才推动孙中山一派寻找参加和领导解放运动的道路。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人数很少的组织，其中主要是在学生中从事宣传的知识分子，而且刚刚开始同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的工人建立联系。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开始日益影响中国产业和手工业工人群众，推动他们去争取自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

在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等大城市发生了带有明显阶级内容的群众性罢工（如香港海员罢工，上海制烟、印刷、纺织工人的罢工，以及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共产国际纲领有如下一段话最深刻地说明了当时工人阶级状况及其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的初期高涨（约在1919—1923年）同战后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高涨有机地联系起来，其特点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服从于当地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斗争利益。”

1922年1—2月间的香港海员罢工和京汉铁路罢工都是阶级的罢工，同时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这些罢工显然向前推动了民族革命运动。孙中山及其广州集团只是在香港罢工之后，才有了雄厚的基础。而京汉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则直接转移了吴佩孚和英帝国主义者对广州已经准备就绪的打击。

因此，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始于全国反帝运动高涨时期，尔后成为民族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因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互依存的关系就是如此。

这些罢工过后，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还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全民阵线的军事政治中心,但是,如果有共产党的帮助,它能够成为这样的中心。

应当看一看,1923年底这个民族革命政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之际,国民党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情况。追随孙中山的中坚派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派别”,就其成分而言是手工业者、小商人和知识分子。此外,国民党内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反映了本国工业的利益,赞成民族运动,同时又代表着一种摇摆不定的、倾向于妥协的特殊派别,这个派别可以称之为民族改良主义”^①。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一部分华侨商人也属于这个派别。国民党对工农群众,尤其是广东的工农群众中的一定阶层是有影响的。

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正确?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是否一方面需要力争由这个军事政治中心来领导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在这个军事政治中心通过共产党人的影响来确定反帝斗争的策略和战略,而另一方面又帮助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呢?中国共产党尽管犯了错误,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后来几年的经验仍完全证明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条件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原则,也就是说,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必须保持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和有批评国民党的权利。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应当在整个民族阵线内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各种小资产阶级派别划清界限。

至于说到加入国民党的前提,也是完全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所确立的方针的,因为国民党确实是反对统治当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它在自己的地盘内并不阻挠共产党人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

^① 摘自《共产国际纲领》。——作者

但是，我们没有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利用这些提供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坚定地提出这样的任务：通过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城市贫民和农民。

1925年五卅惨案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

五卅惨案是标志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新阶段的历史性事件。这个事件中最为主要、意义最为深远的是，中国大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首先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反对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军阀的英勇斗争持续了几年之久，这就为**建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全国阵线创造了条件**，而在这个阵线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说，只是在五卅惨案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才有了中坚力量。在这一事件的基础上，国内各派力量进行了大改组。帝国主义者则全力反对革命运动，然而他们之间在中国的矛盾也加深了。所有这一切说明，中国革命的主力开始冲破束缚初步发动起来了。

由于这一事件，民族革命运动基地——广州的作用较之从前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影响第一次遍及全中国，香港工人抵制性罢工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

五卅惨案后，苏联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极大地增长了。广大城乡人民群众热烈同情苏维埃国家。中国当局不得不对苏联表示友好态度。

这一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并开始同中国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因为小资产阶级和大部分无产阶级仍处于中国资产阶级影响之下。

在此政治形势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就是要认清五卅惨案的意义，理解到这个事件开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其特点应是反帝运动和土地运动相互联系。必须认识到，没有千百万农民群众参加土地斗争这个基础，革命

就不可能前进。

应当说，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上述指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提出了农民问题，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在内，没有正确地理解，业已发生的事件究竟有什么意义和多么深刻，也没有正确地理解，将来在革命中土地和农民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全部显露出来并使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成为反帝的土地革命时，前途究竟如何。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如在上海发动了总罢工，而且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者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上提出了基本正确的口号和正确的战略、策略。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包括我在内，由于对业已爆发的革命的性质和规模有了上述不正确的看法，以致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当时上海总罢工开始几个星期以后，曾经参加抵抗运动和在物质上支持上海 50 万无产阶级罢工的中国资产阶级就开始动摇，叛离而去。当时，尽管如此，罢工仍坚持了约两个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却错误估计了国内的总形势。民族资产阶级的叛离，说明了全国阵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开始扩展到也反对中国资产阶级），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逃避对革命的资助和利用有利于商业（由于抵制洋货）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始认为，这是**革命低沉的迹象**。

这种估计说明，没有看清运动的发展前途，没有充分理解运动的规模，而这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却估计过高。的确，共产党当时的方针主要是，发动和组织无产阶级，实行维护全国阵线的政策，并要十分留心资产阶级的微小动摇，但对土地运动发展问题，对提高和发动农民群众问题，却没有足够的注意。

这种情况在广东省这个国民党影响和力量的中心，尤为突出。而且必须着重指出，1925 年广东省的农民运动在全国最为先进、

最为重要。

不言而喻，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作用有了上述的错误估计，就必然导致在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问题上，并进而而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采取孟什维克的方针。

除上述能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面貌的特点之外，还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通过坚决揭露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办法，在思想和政治上与其划清界限。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一条基本组织原则。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某种“家长制的集中”。在此情况下，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未被吸收来参加领导工作。各省党委和下级党组织常常各行其是。全体党员在一年内（1925—1926年）由900人发展到5—6万人，他们还没有团结在政治和思想上经过考验的共产党纲领（当时还没有党纲）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足够明确的布尔什维克方针来对待工会运动和对待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建成的工人群众组织。许多地方的产业和手工业工人行会组织，依然在国民党官僚，甚至是在买办阶级走狗（如广州机器工人工会）的影响之下。我们共产党却对这种状况安之若素，不去争取这些组织中的群众，也不把行会组织改造为产业工会。

青年和妇女工作也很薄弱。这方面的客观条件，很少去加以利用。

但能不能像1926—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叫嚷的那样说，中国共产党是孟什维克党呢？当然不能。

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是在各个革命阶段迅速更替、各种社会力量迅速改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在社会经济过程刚刚出现，随后又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党犯了错误，是一回事；在资产阶级地主俄国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孟什维主义，或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孟什维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再者，陈独秀的观点不断向孟什维主义发展，是一回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犯有错误，但他们能克服这些错误并进一步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则是另一回事。党的无产阶级干部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而陈独秀恰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把这一切混为一谈，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光荣的革命斗争道路，并继续锻炼自己和实现布尔什维克化。

北 伐

1925年五卅惨案和北伐(实际上是1926年7月开始的)之间这段时期的特点是：革命运动总的来说是在发展，但发展极不平衡，北方各省落后于全国运动，农民运动落后于城市革命运动。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决定性斗争已经开始。起初，是国民党以外的那些敌视革命的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如陈廉伯之流)开始组织起来。嗣后，1925年秋国民党右翼同这些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合流，企图在封建军阀反动势力的中心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西山会议标志着反动势力的麇集过程，而其基础要比封建军阀集团更为广泛，投靠他们的有：买办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反动的上层知识分子。不言而喻，各帝国主义集团扶持和促进了这一活动。

在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迅速形成了具有更为鲜明的反革命色彩的右翼。国民党右翼形成，反动势力聚集华北，两者南北呼应，同时并进。

1925年秋，戴季陶写的一本书，就是正在组建的右翼在思想上的突出表现。

这本书的主旨是要证明中国不可能有、也没有阶级斗争，也就是要证明，必须维护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戴季陶

的其他言论也是这个思想，其中主要有：必须使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因为他们“承认”阶级斗争，必须成立既独立于第二国际也独立于第三国际的东方各国人民的国际。

这本书当时就已经提出了国民党反革命派的未来纲领的思想：反苏和以屠杀共产党员的方法实行国民党的“清党”。

此时，帝国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在准备武装干涉和支持反动势力的同时，依靠民族改良主义者制造民族革命阵线内部的分裂。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上述形势下所采取的行动（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是反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和反对国民党左派的，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全中国范围内“约束革命”，“限制革命规模”的一次初步尝试。

这里我不再谈怂恿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直接原因，而只要说明下面的情况就够了。广州政府军队战胜国内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之后，蒋介石以及与其合流的军事政治集团加强了地位；此时，在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基本上是担任国民党的上层组织领导，而在忠实可靠的工农群众之中却没有广泛的组织联系。中山舰事件就是上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它暴露了共产党在组织上巩固其巨大政治影响方面的弱点。

我们不会利用革命运动巨大发展的局面，用我们的口号去团结城市群众，把他们集聚在共产党的周围。

中山舰事件是对中国共产党最严重的警告：由于革命过程的发展，资产阶级正准备叛变，无产阶级必须全力加强同农民的联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正确地理解中山舰事件。从上述各种现象来看，对此事件的全国意义也没有足够深刻的估计。因此，也不懂得，在此事件后仅同国民党左派保持较密切的联系是不够的（即使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乃至全党都动摇过），而这种联系本身就应该有利于发动土地革命，组织农民群众和武装工

农这一主要目标。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国民党左派，保卫广州政府，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正确的原则策略方针，但只能从属于上述主要目标，即发展土地革命和武装群众。然而，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认真去实现自己的主要任务。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互关系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执行维护反帝统一战线这一基本正确政策时，开始犯机会主义错误。这是因为它不理解，只有迅速发展土地革命并由共产党领导这个革命，以及在国内有决定意义的城市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内部矛盾，以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势力量。

但要做到最后这一点，就可能、而且必然同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共产党没有应付将来可能和必然要出现的局面的方针。

如上所述，蒋介石3月20日的行动，说明民族改良主义者要争夺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也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与此同时严重地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与农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商业高利贷资本有联系）。以蒋介石为首的民族改良主义者一方面对自己能否有力量反对工农运动仍然非常没有把握，另一方面也还不放弃反帝斗争。3月20日以后，蒋介石以中派的面目反对国民常右派（广州的同志们把蒋介石及其信徒称之为**新右派**）和他在4月30日发表声明，说他仍忠于孙中山关于支持联合苏俄和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遗训，已经证明了上述情况。

蒋介石在3月20日以后知道，打击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决裂，而同时又进行反帝运动是不可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如此之高涨，以致蒋介石要贸然反对这个运动，而又不冒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风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他在中山舰事件后举棋不定和施展伎俩的原因。

当然，中国共产党没有轻信蒋介石的声明，而是清楚地认识

到，应当准备同这个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作斗争。但如何斗争？仅仅通过把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党左派周围的途径吗？还是靠广州政府支持其他左派将领的军事力量来反对蒋介石，或者不仅用这两种方法，而主要是用迅速组织自己的力量，在广东及其相邻几省发动和组织土地运动，并竭尽全力武装工农群众的办法，这就是当时的主要策略问题。应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共产党只重视前两种方法，而且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运动去揭露蒋介石和向广大群众戳穿他的反革命实质。

如上所述，在3月20日之际和北伐之前，我们在城乡的组织工作还很薄弱。广州有几万工人连续罢工数月，反对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罢工委员会是一股同广州政府旗鼓相当的很大力量。广州政府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内部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一切措施，都要依靠共产党广东省委领导的罢工委员会。

尽管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党在广州无论数量上（总共才几百人），还是组织上都是弱小的。当时我们党没有在报刊上和在广州广大群众面前独立行动。

此时，农村已经发生了规模颇大的土地运动。农民支持广州军队反对陈炯明等反革命将领，组织农会来夺取土地和农村政权。我们党对这个过程的极其伟大的意义重视不够，没有投入主要力量来组织这个运动。

这是北伐即将开始前的形势。

国民党内部的形势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收罗了更多的力量。

由于广东内部受香港英帝国主义操纵和资助的反革命势力直接威胁着当时的民族革命基地——广州，城市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农民保证支持蒋介石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显然，蒋介石的胜利巩固了他的地位，而他却贪得无厌，意欲攫取军队、政府和国

民党的领导地位。

一则由于战胜了内部反革命势力,整个广州政府得到巩固,再则广州无产阶级同英帝国主义者进行英勇斗争,以及全国工人群众和城市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广州的威信,使广州成为反帝革命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军阀反革命势力集中攻击广州,是可以理解的。随着革命进一步发展,两种力量的冲突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广州是否开始进攻。国内的总形势和广东形势都要求进攻。

北伐对于推动中国革命起了巨大作用,同时这又是一个反映中国革命过渡形势中基本因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北伐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中国资产阶级力求在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统一国家;一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力求推翻国内现存的封建军阀政权,夺取土地和争取民族独立。

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又转到镇压工农运动方面。北伐在客观上发动和发展了国内的工农群众斗争,正是这一重大事实促使蒋介石和他所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以及国民党以外的资产阶级、买办和地主分子寻找一切可能途径,利用国家政权和国民党的威望,去限制和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

在共产党内,对北伐有两种态度。一种表现是,有的人藉口北伐在客观上有革命意义,默认这样的说法:“共产党的作用就在于全力协助北伐取得军事胜利,不可让工农群众为争取自身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过火行动使局势复杂化。”这个观点历来未公开提出过,而是由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对该革命阶段的形势估计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①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形势和蒋介石

^① 领导方法上的错误之一就在于,对类似的观点没有加以揭露,公诸于众,而是任其暗中存在,影响共产党的政策。——作者

石“问题”大体情况如下：(一)北伐之所以有利于革命，不仅因为它就其意义来说是一个使国家革命化的因素，而且还因为北伐是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摆脱当前内部局面的一条出路，如果不进行北伐，国民党内部必然分裂，国民党所依靠的军事集团之间就会兵戎相见，首先蒋介石就要进一步进攻；(二)北伐之所以需要，是为了使广东摆脱蒋介石；(三)为了北伐成功，需要帮助蒋介石，并提高其威信(1926年5月28日蒋介石确是取得了独裁大权：他不仅是总司令，而且是政府首脑和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这并不危险，因为蒋介石反正已从广东出师北伐去了；(四)蒋介石在北伐期间的成功将不可避免使他同其他参加革命军队的人发生冲突，然后我们就能够加以利用；(五)所以，不必在后方同他发生争执，换言之，不必开展工农运动。

另一些同志主张不需要北伐，因为北伐必将加强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力量，不让我们有机会去组织工农群众和发展革命运动。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即将开始时还没有这样一条正确的方针：在全力支持北伐的同时，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建立独立的组织，首先是发展和组织农民运动，发动真正的土地革命。

由此可知，共产党也没有武装工农群众、认真深入广州政府军队去建立自己力量的坚定方针。

在这个当时对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党的全部政策就是致命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如果不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武装工农群众，要认真考虑取得革命成果，巩固和加深这些成果，是不可能的。

的确，随着革命运动在北伐过程中的发展，共产党日益壮大，全力组织城市工人群众和帮助农村建立农会。但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党周围，进一步使革命深入发展，在各地建立新型革命政权，坚决粉碎旧政权机构的口

号。由于城乡千百万群众前所未有的自发热情，中国共产党本来极有可能组织和发动群众去同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共产党对革命新阶段的性质，对利用群众极大热情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理解不足，因而未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各种革命力量的对比在北伐过程中发生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变化。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机会主义决议，这个决议压制了北伐地区内的土地运动^①。中共中央在客观上赞同了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机会主义地理解关于全民族阵线的列宁主义方针。

关于“劣绅”和“良绅”的看法在这里得到了党内公认。这个看法认为，农会不应同北伐期间同情广州军队的那些豪绅作斗争。

同时，随着北伐的发展和人民群众自发热情的更加高涨，国内各阶级力量进一步改组。

1926年秋，广州军队进军长江以后，对国内其他地区影响很大。此后，华北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高涨。河南、直隶、山东和其他地区的农民群众已发动起来。城市工人运动开始活跃。在发生这些现象的同时，反动的反革命势力也开始集结。张作霖成为反动阵营的主角（1927年4月在北京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并杀害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而蒋介石侈谈其继续北伐的同时，实际上与张作霖结成了反革命同盟。

国民党的民族改良主义右翼已羽毛丰满，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封建军阀集团的联盟开始逐渐形成。

^① 这里要顺便说一下，《中国问题》编辑部认为我要对此决议承担责任，这是不对的。我是在全会通过决议以后才获悉的，而且反对这个决议。但我的错误是没有坚持撤销它。——作者

武汉时期

共产国际密切关注中国事态，在1926年11月第七次全会上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及其今后发展前途，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路线。

第七次全会决议的基本思想是，北伐已取得胜利，民族革命运动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几十万工人和几百万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的斗争，革命已转变到下一个更高阶段。

问题是，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深入发展能否导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民族革命已经碰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自下而上以革命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的任务。

如果不坚决打击形形色色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残余：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和经纪人，一句话，如果不铲除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反帝反军阀斗争就不可能前进一步。^①

如果共产党不采取大胆果断的策略，如果党不引导农民群众焕发热情（1926年底和1927年初农民群众运动的高潮如火如荼，遍及广州政府管辖的整个地区，也就是说几乎遍及半个中国），就不能设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攻。

不言而喻，在革命运动发展的同时，民族革命阵线内部发生了分化。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工农运动的规模惊恐万状，另一方面又被帝国主义者的自由主义的建议所诱惑（如英国政府1926年12月的声明）而准备脱离和阻挠革命，准备叛变。以前站在封建军阀反动势力一边而在北伐胜利进军途中混入广州军队的那些

^① 当然，帝国主义的基础不仅有上述资本主义的成分，还有银行、大工业、设备和交通运输。——作者

新军事集团，也支持在民族革命阵营内酝酿分裂。

1926年秋是北伐军最为努力，革命浪潮继续高涨而资产阶级叛变的风声日甚一日的时期。

在国民党内部，这一过程明显地表现在各种力量的迅速改组上：一派力量集结在十分明显地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周围，而资产阶级又是同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①另一派力量则集结在国民党左派集团周围，当时国民党左派基本上代表尚未分化的革命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1926年12月，广州政府实际已形成两个中心，一个在汉口，另一个在蒋介石领导的南昌。因此，民族阵线已开始分裂。

此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各集团）同地租和农村高利贷资本的收入休戚相关，不会去反对封建地主制度，恰恰相反，随着土地运动的发展，将会日益转到反革命立场。

当时，向共产党全面地提出了需要重新制定对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对这一形势作了说明：“当前形势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过渡性质，此时无产阶级必须在两种前途之间作出抉择：同资产阶级主要阶层实行联合，其前途将会如何；进一步加强同农民的联盟，其前途又会怎样。”

为了做出这一抉择，中国共产党自己必须弄清这个阶段的性质和今后革命发展的前途，以及对国民党的策略。共产党必须充分理解“中国革命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就不可能消灭帝国主义”^②，也就是说，已经到了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就不

^① 我在一本论中东铁路的小册子内认为南京这个中心只代表资产阶级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早在1930年1月我就改变这种看法了（参见《革命东方》第6期）。——作者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作者

能进一步发展的关头。

处境的困难在于，革命依然是反帝的，要求共产党全力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北方军阀的一切力量。资产阶级显然已脱离革命，但有一些资产阶级阶层继续留在民族阵线内，反对帝国主义，对此应加以利用；还应当充分利用脱离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但所有这些利用资产阶级的策略性措施都必须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即进一步发展和推动土地革命，而不是单纯维护统一战线。1927年冬，蒋介石反对孙传芳的斗争和同年2月蒋介石进攻上海，可作为说明形势极端复杂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时，蒋介石已开始反对武汉，拒不执行国民党全会决议，显然在准备分裂。但是，他的部队打败孙传芳和继续进逼上海，这对反帝斗争有巨大作用，激发了沿海各省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当然，在这种形势下，就不能不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南方军队了。1926年冬，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就是在推翻盘踞上海的北方军阀政权和建立武汉政府政权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些起义必然帮助蒋介石取得胜利，而蒋介石却将要到上海来，镇压革命了。

托洛茨基提出问题说，共产党当时本应同国民党决裂，引导工人阶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这种提法显然是冒险主义的提法，必然导致工人阶级覆灭，民族革命惨败，而使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反动势力取得胜利。无疑，中国共产党如果走托洛茨基的道路，就必定会脱离广大群众，被国内反动势力粉碎。譬如在上海，如果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就可能被孙传芳的军队消灭，那时，国民党军队即使不参与此事，也会表示完全同情的。

但如果不走托洛茨基的道路，这也绝不是说，共产党就可以支持武汉政府而不必尽一切可能去争取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个别部队，不必独立地武装工人，吸收和依靠城市贫民去同民族资产阶级抗衡，不必支持、发动和组织江苏省已经爆发的农民运动了。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采取这一切革命措施。在这方面，上海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其他革命中心推行机会主义策略的一个典型。这个策略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了力图维持反帝统一战线，尽管知道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已在这个阵线内部准备投降，却仍把**主要赌注下在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政府和资产阶级地主代表蒋介石发生矛盾上**，而没有去独立组织自己的力量，即独立地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

中国共产党知道，武汉政府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政权，但在革命进一步发展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作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可能成为这样的政权。然而，中国共产党没有认真考虑，要使这个政府变成这种专政的政府，全力支持它反对蒋介石是不够的，应当进一步发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促使这个政府革命化。

宁汉斗争应当视为革命**不断深化的情况下的内战**。战胜蒋介石进而攻取南京，其意义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新战果和土地革命的胜利，即反帝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利用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和蒋介石营垒内部矛盾的意义，仅仅是实现基本任务的必要策略，但是它不能解决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问題。**

中国共产党后来所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代表起初不愿参加武汉政府，而后来在这个政府中的可耻行径正是这个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的表现。反对参加这个政府（我也在内）和赞成参加这个政府的人，其间没有区别，因为前者和后者都没有看清武汉政府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前途。如果前者为自己对政权问题的态度辩解，参加当时的武汉政府，就会使共产党信誉扫地，而后者提议参加武汉政府，是为了“同国民党一道对革命负责”。后来，当土地革命和武汉政府辖区的工人群众斗争极大高涨时，后一种论调就解释成为不许共产党人在农村搞“过火行动”，不许工人提出过高要求，因为共

产党人要“同国民党一道对革命负责”。

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整个武汉时期^①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关于这一点，已有比较多的文献资料。

我只讲一点看法。在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1927年4月）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很快就形成了反对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派，而在即将召开五大时（5月20日）^②，中央委员会内就已发生了转折，实际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彻底揭露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方针，也没有揭露他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和对各阶级的估计问题上的孟什维克观点。陈独秀同意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对此理解为他已转到正确的立场上了，虽然他在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报告是含混不清的，仍保留有机会主义的全部特征。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对陈独秀做出任何组织结论。还必须指出，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也给了机会主义策略以可乘之隙。

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表明，对陈独秀的揭发是不充分的，而且让他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

现在说几句关于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任何国家都不像中国这样，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同孟什维主义是如此气味相投。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托洛茨基关于跳

^① 这里应当说明，我在关于中东铁路的小册子（维经斯基著《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社，1929年出版）中对武汉中央的估计是错误的，第一，说南京已在4月打败武汉中央是不正确的；第二，武汉中央的政策实际上和蒋介石的政策没有区别，也不正确。我这两个论断都不确切，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作者

^② 中共五大是4月27日召开的，此处应为4月20日。——译者

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不断革命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可能成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权形式，这种理论主要是源于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如上所述，陈独秀主义也轻视农民，并按照孟什维克的办法选中了资产阶级为其同盟者，而反对农民。

这就在中国形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主义的共同基础。说明不断革命论后果的明显例子就是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他们两人都滑到国民党反革命派的立场上去了。

中国革命继续不断发展，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问题已在中国苏区得到具体解决。

中国革命的困难主要在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于国际帝国主义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却组成了武装的联合战线反对工农群众。尽管如此，中国革命仍节节胜利。

如果中国共产党坚决而彻底地清除其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这是主要危险，它反映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代表着党的队伍中的陈独秀主义残余），它就一定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与此同时，1927年革命失败后，党内的盲动主义政策立即重新抬头，这也威胁着中国共产党，因此，反对左倾的斗争，应当比反对右倾主要危险更顽强、更坚决。

编辑部附言：维经斯基同志在其检讨错误的文章发出以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讨论萨法罗夫同志报告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确观点。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至于鲍罗廷同志，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做出相应的报告。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

作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录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原载《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

论陈独秀主义

(1931年9月10日)

蔡和森

—

陈独秀主义是什么？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和孟塞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所有从中国近时革命运动中发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以至鲍罗廷主义，都可以且应该归纳在这一中国孟塞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之中。

陈独秀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而且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跑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来影响中国工人运动，原来是很明显的。他是欧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主唱者，美国式的“科学”和“民主主义”（《新青年》杂志的两个主要口号）的宣传者；哲学上，他是从美国杜威博士的实验主义进到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这恰好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欧洲大战时期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政治的表演。这一时髦的表演，在“五四”时期确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

凭靠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的“五四”反日运动，渐渐的软弱下来，而由此运动所引起的北方工人运动（主要是京汉路工和唐山矿工）和上海以及广东的罢工斗争继续不断的表现出新

的社会阶级带着伟大的革命力量跑出舞台。于是陈独秀首先起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说：“工人的力量比我们大些”。此时正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前途发生悲观，对于“五四”以后的发展方向发生彷徨，他们的先进分子正想“从下等社会”中找出自己的力量的来源和凭靠，这就不得不使他们看中了时髦的工人运动。因此陈独秀同着他所影响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与胡适之派（《新青年》杂志中的左翼）分化，改变自己的方向：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方向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俄国方向；由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改向远东民族会议（1922年在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召集的）。由此，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二

陈独秀主义不是忽然一下形成的，他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1923年党的三次大会之前后建立了他的孟塞维克的路线之一般的理论基础；1926年3月事变前后以至武汉时期建立了他的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武汉失败至六次大会时，是他的动摇和消沉时期，1929年中东路事变后，进到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总路线，由取消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之叛逆的社会民主党地位。

三

首先看他在党的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的孟塞维克路线之理论的基础。这一时期有他最典型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两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论的立场和倾向。

假若在1919—1922年陈独秀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那末，到1923年京汉路罢工失败后，他就跑到孟塞维克的根本立场——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势力。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

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展，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界分为三愿：（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庭，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工人阶级的思想尤其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也并不是少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固然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可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他在三次大会的演说中，简直把中国工人阶级咒骂得不成东西。什么“宗法思想”呵！“不脱神权帝王迷信”呵！没有“国家觉悟”呵！他举了许许多多的琐细事实来形容中国工人阶级之“穷极丑陋”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上面所引的文章，是在大会开幕后写的，语句口气已经比在大会争论时客气万倍了。他在大会中从中国工人阶级的落后，神权帝王迷信及没有国家觉悟的立场发出来的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拚命的肯定中国工人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之后，他就很骄傲的夸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同上文）”又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此文是大会前两星期写的）。”他在大会的答辨中，热烈地辩护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

他对于农民怎样呢？大会中的左翼曾提出工人阶级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理论与他对抗，这在他看来简直不值一笑，因为中国农民更是宗法观念，反动思想，神权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象”。大会闭会后，在他的论文中很客气的这样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在他的革命势力的计算中始终没有农民，因为他看定了三个原因，农民难于加入革命。试看他所计划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的经济状况，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当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的敌对的军阀阶级……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当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一切时候，陈独秀是把农民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外，并自始至终了解这联合战线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联合，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在这革命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是居领导地位，而无产阶级是附属的。

陈独秀怎样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呢？他说：“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

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固然在党的六次大会以前，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全党都没有明确的观念，然而如像陈独秀始终不认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内容，始终不认识而且不愿认识工农民主独裁制，这对于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说：“在普通形式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如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算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同文）”

那末，工人阶级为什么目的要加入这革命呢？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则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之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之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同文）”工人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仅仅在这里——不是为得争取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领导权，不是为得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胜利，更不在争得革命之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种转变的观念在他是完全没有的。他同俄国的少数派一样，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连续的阶段，即现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工人阶级只有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对于农民运动也就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说：

“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

从以上所述，就可明显的看出陈独秀主义在第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之理论的基础，——即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之少数派的路线；他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而忽视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的阶级妥协，无产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对于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念——看不见土地革命的内量，看不见工农民主独裁而更没有看见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资产阶级的握得政权”，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将来再来社会革命。所有这些就确实实形成了中国少数派的总路线。从他的“造国论”以至“汪陈宣言”以至中东路事变后的三封信，不过把这总路线“一言以贯之”罢了！

为什么使他这样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始至终是站在左翼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影响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既然自始至终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的领导；不能了解土地革命，只能了解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不能了解工农民主独裁，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造国论之精神）；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必然要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了解革命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之上，或完全跳过此阶段。

陈独秀在三次大会的立场既然如此，他当时发出些什么具体的口号呢？“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三次大会闭会后，陈独秀和马林共同提议响应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治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办法是请求国民党发宣言，而不用共产党名义发宣言。当时，我向他们抗议，才把这一个企图打消。难道现在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和叛逆是没有历史的深远的来源？

1925年的革命高潮，推动中国党开始由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变为工人群众的党。党在这一高潮中起了相当的组织的和领导的作用。

用。这一高潮首先就是证明中国无产阶级之领导的能力与作用,打破陈独秀马林以至鲍罗廷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势力之不相信和轻视。陈独秀在相当的短时期中,似乎多少变动了对于革命动力的机会主义观点。可是一到五卅末期——张学良出兵镇压上海工人,郭松龄事变及吴佩孚攻取河南之后,又使陈独秀对于工人阶级势力发生悲观,对于时局发生不正确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汉时期就实行陈独秀主义之机会主义的实际政策。

第一、改变只要左派国民党的方针(坚决打击右派,削弱中派和强大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左派)号召国民党右派合作,并送右派首领回广州,这是三月事变的主观原因之一。

第二、对三月事变完全采取无原则的退让政策,并实行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阻滞广东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开始后,即将独立的工人运动隶属于蒋介石所要挟的民族利益之下,实行阻止和削弱罢工运动的方针;同时扩大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去阻滞湖南高涨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中实行“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要政治自由”的孟塞维克策略。

第五、对于已经开始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代表蒋介石采取卑鄙的屈服退让政策。

第六、北伐出发,鲍罗廷同陈独秀完全把广东交于李济深,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层政策。

上面这些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就规定了1927年4月间上海和广东之大失败。

现在再看武汉时期陈独秀主义之实际政策。这一时期,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廷主义混合起来,有名的西北学说的理论与实际成为陈独秀主义之变形发展。他的主要内容是:(一)回避帝国主义离开东南工业中心,接出冯玉祥同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二) 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说；(三) 取消所谓工农运动的过火；(四) 向小资产阶级让步；(五) 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处于隶属地位；(六) 完全向汪精卫、唐生智投降，自动的承认退出国民党和其政府，以换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详见我的《党的机会主义史》）。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之断送于陈独秀主义及其变形的西北学说之手，难道还不显明？

五

武汉失败后，陈独秀进到消沉与动摇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他不仅顽固的拒绝承认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开始演进到取消主义和合法主义的阶段。1927年7月底，他向临时中央局提议：(一) 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交于国民党左派；(二) 我们在左派政权下进行下层群众日常工作；(三) 暂时专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避回大的牺牲和破坏，这就是他的“保全”自己势力的方法——取消主义合法主义。

以为资产阶级完全胜利了，革命完全没有了。现在要紧的是怎样回避牺牲保全势力——这就是陈独秀主义发展到取消主义的根本精神。

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时，他提出下列主张：(一) 苏维埃口号现在不宜采用；(二) 农民运动应在四不主义（不纳税，不还债等）的限度下进行；(三) 中国共产党不能一党包办革命，如谭平山等仍应与之党外合作。

这一取消主义的“温和”纲领，难道不是中国孟塞维克路线之继续向前发展？

六

陈独秀拒绝出席党的六次大会，违抗两年以来共产国际的电

召；他只是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牺牲了我和平山”。然则他向那方面走呢？早就看得明白：他非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不可。南京政府向苏联进攻的冒险事业，就成了他的最后的转变。他向中央进攻的三封信，不外是“资产阶级工党”的大纲。

他对中东路事变的态度根本是站在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上，绝对的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相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来就是带着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影响跑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现在仍然不得不带着这副本来面目跑出中国党的队伍之外去。所以他不关心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祖国之被攻，而且只关心于国民党强盗统治的中国之变为塞尔维亚第二。他们的主要借口是：“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不能懂得拥护苏联的口号。”他所谓大多数民众自然是把工人与资产阶级混在一起。经过长期激烈的阶级血战之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在陈独秀看来还是这样落后，这样不能了解拥护苏联口号。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在1923年认定中国工人“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没有国家的觉悟”，现在经过七年以上的斗争，中国工人已有了“国家的觉悟”即在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拿这个1923年他所说的中国工人对照起来已经是大进步了！陈独秀先生！你不是没有进步的呵，拿你的进步，与你所想象的中国工人的落后或进步去比较：你是进步得更远了！中国工人只领导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而你却领导孟塞维克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进到公开反革命！陈独秀先生，你不必拚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口号”罢，你自己的“反对误国政策”就是你们自己的阶级口号；改组派同你们一样的采用此口号。

陈独秀对于革命失败后的政权性质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这完全没有有什么奇怪。因为他自始至终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一切阶级关系都用资产阶级做中心来决定。看他怎样说1927年的事变：

“这一种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加增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之残余！为自存计，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这“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他所看到的主要的只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绝对不会梦想到由这一转变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的领导地位。这些小事情，在他是不会梦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中国革命的图表素来就是这样预定的：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下，发展资本主义，再来做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现在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完全过渡到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由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完成了，封建势力不存在了，帝国主义让步了，现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以后再再来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要了，以后直截了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共同立场。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自来在陈独秀脑中就没有设想过，直到现在依然不能设想。因为他所能设想的，只是既然叫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末一定是资产阶级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那里会有什么工农专政这回事。中国资产阶级从1927年以来已经胜利了，已经“形成了自己为中心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再则反资产阶级的资

产阶级民权革命——在陈独秀看来简直不可了解，他至死也不会了解，因为这与他素来所设想的相去太远了。他素来设想的革命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若失了资产阶级这革命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然则现在革命动力既然把资产阶级除外，而革命任务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

所以陈独秀和托洛茨基接着就提出“国民会议”做目前政治任务的中心口号与中国共产党工农民主独裁和苏维埃口号相对抗。陈独秀自来就不赞成采用苏维埃口号。托洛茨基咒骂在武汉失败后，采取此口号是犯了罪恶。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现在所应有的任务只是召集国民会议来做议会行动，合法运动，及“取得一些自由”罢了。这不是新的，仍是发展他1927年7月底的取消主义的大纲。

在这样的取消主义之下他们自然要拚命否认中国革命高潮，用反对“盲动主义”来做阻止与破坏高潮的借口。陈独秀曲解列宁两个波涛间的话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其实他在武汉失败时就宣言革命在很近的将来很难再起。从他看来中国的事变似乎已经证实了他与彭述之的革命阶段论：现在是南京政府稳定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长的历史时期现在所有军阀战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托洛茨基在1928年就预言蒋介石制度的稳定。国民会议的口号就是建立在他所估量的中国革命低潮上面。

陈独秀把自己装做是革命势力“保全者”，极力咒骂八七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牺牲了干部如何丧失了革命势力，那么我们首先看他在武汉政变时用什么政策“保全”革命势力；他同鲍罗廷规定投降的政策来“保全”革命势力——自动退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把一切革命领导权政权工农组织交给国民党左派，用“适合工商业利益的政纲”同汪唐共同打到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时没有共产国际坚决的出来打碎你们这一“保全”革命势力的投降政策，还有今日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党吗？还能取得中国

革命中无产阶级之唯一的领导地位么？你们自命为革命势力的“保全”者和反对盲动主义的英雄，实际你们只是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再看你们七月会议的大纲十一月的大纲（1927）以至中东事变后的大纲，难道你们革命势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还不显明么？

七

陈独秀现在全身投到托洛茨基的怀里，用托洛茨基的旗帜来回护他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来破坏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来进攻共产国际。他无耻的宣言他的错误是在所谓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做出来的。他宣言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及工农民主独裁，而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盲动主义的策略。他咒骂现在工农革命的高潮为“土匪式的扰乱”侵犯了资产阶级的胜利“与稳定”，使他们国民会议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计划遭遇困难。他不要脸的诬蔑“国际的指导却在当进攻的时候教中国党投降，当退守的时候教中国党胡乱的拚命”。他认为一切罢工斗争、街上示威、游击战争都是盲动主义都是土匪式的扰乱。他不仅咒骂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为官僚主义，他更咒骂“国际的领导站在官僚主义的路线上”。

还在武汉失败时陈独秀同鲍罗廷就说“如果说中国党是犯了机会主义那末根本这机会主义就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国际教我们的，国际教我们加入国民党教我们帮助蒋介石”。照陈独秀的见解，加入国民党就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是鬼话”。这样叛徒的思想难道是1923年国际教你们的？断送上海暴动的胜利，对蒋介石卑鄙让步与幻想，隶属工人阶级于民族资产阶级之下，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工农运动的过火，以至向汪唐投降……难道这些是国际教你们的？现在你们的假面具要算完全揭穿出来了：你们根本否认工农民主独裁的路线，认为机会

主义的路线，因为这一路线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是要建立苏维埃的中国，保证他迅速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违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陈独秀主义之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陈独秀同蒋介石汪精卫一模一样的咒骂“共产国际破坏中国革命”。

八

中国革命运动中之有少数派路线和半少数派路线——托洛茨基主义——现在也如俄国一样的，假如托洛茨基主义在俄国革命中表面上能维持一种与布尔塞维克对立的第三种路线和第三种派别，那么在中国他（托洛茨基主义）一开始便与取消主义的陈独秀主义完全混同，以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路线相对抗。这完全是自然的，因为1928年以后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从半孟塞维克的性质完全进到反革命。所以现在托洛茨基派与陈独秀派在中国所进行的不止是“八月团结”而且立即进到“资产阶级工党”的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在中国比八月团结时的俄国，阶级斗争的剧烈与革命复兴的状况要不同些，现在的中国（1927年以来）阶级斗争这样的剧烈，与托洛茨基主义混合的陈独秀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身必然迅速进到社会法西斯蒂主义。陈独秀派马玉夫等在上海工人斗争中的工贼行为就表征了这一社会法西斯蒂的前途——不是远的将来的前途，而是目前的非常之近的前途。

这一社会法西斯主义必然成为民族法西斯主义的补充和助手。

所以对于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任务之一，对于这种斗争的丝毫犹疑或调和态度就是帮助了反革命。

九

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阶级基础以及其前途之不正确的了解就要弄弱对于他们的斗争。比如鲍罗廷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莫斯科中国科学研究院）开口便说：“陈独秀主义与西欧的孟塞维克主义有区别么？我以为在业已走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欧洲孟塞维克主义，与中国的孟塞维克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说他同欧洲的孟塞维克是一样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承认在中国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已站在政权上，孟塞维克已在中国起社会法西斯蒂主义的作用。不能断定中国孟塞维克主义走到欧洲社会法西斯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必不可免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说不上中国有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所以陈独秀与他的派别即中国少数派完全不要妄想他们与其欧洲兄弟——即帝国主义国家孟塞维克起同样的作用，换过说，中国孟塞维克没有任何前途。”

又有一个同志用书面这样的写着：“假如我们现在再提出一个问题：陈独秀主义代表什么东西，他的社会基础怎样？那么我们明白看出一种回答，以为陈独秀代表将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这是不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有工人贵族做基础，而且只有在财政资本和剩余赢利发达的地方才有地位。以为陈独秀和他的派别会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党那就会错误。因为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就须要设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开始第二个资本主义时代。照我的意见他的社会基础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中国资产阶级，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的自由职业者学生等，另方面没有脱离半封建地主的。”

上面的见解可以说是补充鲍罗廷的。他们做出陈独秀主义与

欧洲孟塞维克主义的区别，在陈独秀主义不会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主要理由是中国不是财政资本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工人贵族等等。这种不正确的区别和否认，不仅是建立在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机械的对照上面，而且建立在对于中国阶级关系之不正确的了解上面。所以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作用及其阶级基础就发生不正确的估量。

陈独秀主义他在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铁一般的证明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内来执行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无论陈独秀及其派别的个人大都是由上面所引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但当我们正确的判断陈独秀的主义性质，作用及其代表的阶级基础时我们就不得不：一方面指出他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内来执行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另一方面指出他是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工头及少数的高等熟练工人等）及一部分被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影响包围的落后工人。不指出这两点就不能正确的了解陈独秀主义的性质及作用，也就不能正确的了解陈独秀派与改组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派别的区别，和他（陈独秀主义）的危险之更大。

陈独秀主义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和被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故自来就看不起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欲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陈独秀主义和欧洲孟塞维克主义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如阶级关系，革命动力之不正确的了解（崇拜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及政权性质等等没有任何区别，在工人阶级内来执行资产阶级的影响更没有任何区别；代表贵族工人和资产阶级影响包围的落后工人一点上也找不出严格的区别。毫无疑问的现在陈独秀主义是隶属于民族改良主义下的社会改良主义（如四不主义，限制工人运动于部分的斗争，而反对工人的政治进攻，国民会议等等）。所以中国的孟塞维克主义也如西欧一样，必然要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

——而且正在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否认陈独秀主义之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前进，就等于否认陈独秀主义之孟塞维克的性质。如果要在他们之间找区别只能说中国孟塞维克主义转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速度比欧洲的特别快些。因为在中国发展社会改良主义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条件远不如西欧之具备。如果这一转变在欧洲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过程而在中国这一过程却是非常之迅速的。这不仅由于中国是殖民地的国家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较，而且也是由于世界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国阶级斗争特别剧烈，不能容许中国资产阶级工党如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经过一很长的发展时期才转变到社会法西斯主义阶段，只有在这样的观点上，不能笼统的说陈独秀派完全同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因为他的命运特别短促和不固定，他的发育特别困难。

以为指出陈独秀主义必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是设想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这样机械的可笑论证，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鲍罗廷主义近年以来显然趋向于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他把民族资产阶级通看为买办资产阶级。鲍罗廷主义对于中国的阶级关系又复活了彭述之主义的“新”解释。

鲍罗廷主义否认陈独秀主义之必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对于中国党与陈独秀主义的斗争是很有害的。鲍罗廷主义是陈独秀主义的兄弟。这一否认的意义就是辩护陈独秀主义。

十

对于陈独秀主义之狭义的不正确的了解也是很有害的。以为陈独秀主义就是陈独秀个人和其团体而与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以至现在还隐藏在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没有思想上路线上的联系。所以为要充分的制胜党内右倾的危险，现在主要的危险，必须充分的了解陈独秀主义为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路线与

各种已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机会主义与倾向有密切的思想上的关系。我们单从陈独秀的本身还不能充分了解陈独秀主义，纵然陈独秀自己在机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已做出整个的系统（如以上所述的）。我们必须更从中国革命中之已发生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来观察这一孟塞维克的路线与系统。

首先来看戴季陶主义。他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换句话说，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原则，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拚命的反对阶级斗争，也无异是发挥1923年陈独秀“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则。假若陈独秀主义在五卅高潮时曾反对过戴季陶主义，那末从五卅末期和三月事变开始陈独秀主义在客观上就成为在中国工人运动中之戴季陶主义的执行者——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一直到中东路事变陈独秀提出的“反对误国政策”的口号还是隶属于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

再看彭述之主义。彭述之主义的特质就在用左的浮词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来帮助陈独秀主义进行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口头上很漂亮的叫“天然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上把革命领导权奉送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彭述之主义的帮助，陈独秀主义在党内之宗法的统治与党外实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发展不能那样顺利。

再看谭平山主义。他在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宣布“中国革命要得真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广大的劳苦平民为中心，联合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构成民族阶级与帝国主义作整个斗争才能实现。故中国革命充满了阶级性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斗争，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就是无产者国家与有产者国家的斗争。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无产者国家，可谓把戴季陶的最高原则发挥尽致了。谭平山比戴季陶聪明些，他不反对阶级斗争，只把阶级斗争翻译成为“被侵略的无产者民族与侵略的有产者一种剧烈的阶级斗争”。陈独秀比

谭平山又聪明些，他现在率性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防护中国不变为塞尔维亚第二。

十一

最后不能不说到陈独秀主义一个重要的伴侣——鲍罗廷主义。武汉时期鲍罗廷主义与陈独秀主义混合为一个东西，此处不用赘说。现在所说的，只是1927年后，鲍罗廷关于中国问题最近的见解和态度。

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中国科学研究院），鲍罗廷宣言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的政见，而他并没有把这不同的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宣言当时有广东路线与上海路线的对抗；他的结论是：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那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

不是1927年以后生长的人，大约不会相信鲍罗廷的话是真实的罢！然而不然，竟有同志公开出席替他辩护。可见鲍罗廷主义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直到现在不是没有保留重大的影响和残余。这一残余保留在党内终于有复活陈独秀主义的危险。所以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能把鲍罗廷主义除外。

鲍罗廷在中国革命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假若说陈独秀是中国的蒲兰德尔，那末，鲍罗廷就是中国的拉狄克。所以他对于我们党内同志的影响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看他对于中国阶级关系的新见解：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当时垄断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经纪地位的，是以皇帝为首的高等官僚贵族……第二个时期……即你们所知道的买办阶级；……最后第三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已在排挤第二时期的中间人，排挤买办阶级而开始与帝国主义发生各种相互关系。”

“……资产阶级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外是企图在中国创造一种条件，在这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更能密切与帝国主义联系。不仅在各大商埠条约上给他与帝国主义联系的可能，而且在全中国。换说一句即为帝国主义肃清在中国道路上一切的障碍，实现买办性质于新形式中，在新环境中，于极广大的范围中。”这在鲍罗廷主义的信徒看来，要算是极革命的极响亮的高调了。看他的下文说些什么呢：

“讲到这一点还必须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是另外一个程序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他要把中国工业化的大道上的障碍物扫除，准备同国内的封建势力以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资产阶级。”

“当我们说到民族资产阶级还极弱时，我们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指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的资产阶级，但是有点工业资产阶级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末我们就应当说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不能引导中国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

原来鲍罗廷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同化之后，还保留一“不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准备同国内封建势力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极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还不晓得把中国引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将来怎样呢？这点他虽没有明说，但读者不难从他的观点做出结论，就是从鲍罗廷主义的中国阶级关系的观点非走到复活“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的机会主义不止。

鲍罗廷接着上文就来估量无产阶级：

“这种资产阶级在中国现在是极弱的。由此就可明了**中国无产阶级也充分的弱**，数量太少，他的年龄，总共不过几岁。**他的基**

本群众不在中国内地，而在租界，完全与中国隔离的香港一类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汉口你们有工业无产阶级基本群众，而在中国其他各地，工业无产阶级在真正的字义上是很少的。”

鲍罗廷新的“租界无产阶级论”的论证仍然回复到自己老的西北主义的结论，就是远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国无产阶级很难领导中国的农民，中国革命很难凭靠大城市的领导。所以在反动下，职工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前途，唯一重要的是农民游击战争。中国全体共产党都要加入游击战争，如欧洲共产党全体参加工会工作一样。鲍罗廷主义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终，如陈独秀主义一样，怀疑与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鲍罗廷主义不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领导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国革命之可能。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的缺点，在数量上，年龄幼稚上及其他方面，这些缺点之百倍的补偿，就在不能把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从其他世界分开。假若拿中国无产阶级从印度无产阶级，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苏联的无产阶级分离起来，那末，自然不待说对于指导基本联盟的农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难。假若中国无产阶级是分离的，那末就很可能怀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摆在他前面的伟大任务，即关于指导农民与封建残余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等等。但假若拿他与印度无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特别苏联无产阶级共同来看。那末中国无产阶级之必不可免的历史的缺点就百倍的补偿起来了。从这样的观点看来，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中国资产阶级。”

这是多么漂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呵！托洛茨基不相信俄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鲍罗廷却比较更进一步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国革命之可能。

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转变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之必须依靠先进中国无产阶级的帮助，尤其苏联的帮助，这是毫无问题的：中国革命之须要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也是毫无问题的。可是照鲍罗廷的观点，就完全是不对的。从列宁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不仅有自己的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进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东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强有力的理由，不仅在于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而尤其在中国内部阶级势力之对比上。鲍罗廷主义完全与列宁主义相反，从他自己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更弱些，只有在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中国无产阶级较强烈于资产阶级。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建立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依赖之上。

鲍罗廷主义的信徒以为鲍罗廷同陈独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鲍极看重农民势力，着重游击战争；纵然他在武汉时期与陈独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现在他却与陈独秀“根本”相反，他“异常”看重土地革命。现在来看他对于农民问题的政见：

“现在说到农民方面。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必须指出下列的根本要点：一、是不是真的在中国乡村中已发生这样的阶级变迁，其结果已使富农分化，而这富农已同着资产阶级组成南京的政权，所以需要与富农斗争。我不否认中国乡村有富裕的农民之存在。但是应当说明富农是什么，其意义就不能如我们（指苏联——森注）所了解的一样，不能搬运革命以后的我们所有的富农观念到革命以前的中国所有富农的观念上去。这个不是一样的富农。说到中国农村，那就必然须要一个**全体农民的共同民主的战线**去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军阀制度，反对一切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证列宁——森注）。**土地革命在中国只有凭靠在中国农村的统一战线上才有可能。**”

此外关于国际状况，他做了以下的肯定：“无论怎样还没有牢不可破的论证，证明在最近的将来，在太平洋上美与英日就发生

武装冲突。美在中国将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话都是从鲍罗廷 1929 年 5 月 20 日之“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报告中引出来的。这是新的变态中的机会主义的大系统，是西北主义之继续发展：在中国革命的一切根本问题上——阶级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与共产国际和列宁主义的路线不能并存的。假若拿了现在的鲍罗廷主义与 1927 年和 1929 年以及 1923 年的一切机会主义去对照，便可看出中国革命中孟塞维克路线之一贯的线索。这一路线的中心点，是在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统一战线之孟塞维克的了解：从隶属无产阶级于资产阶级（武汉时期以前），做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尾巴（武汉时期）以至联合富农。假若陈独秀在 1929 年用托洛茨基观点来攻击中共中央之业已改正的联合富农的错误，那末鲍罗廷在同年就企图恢复以前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与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内外相应。由此不难推想：假若中国共产党真正执行反富农路线到底时，陈独秀主义便会同鲍罗廷主义一样暴露其代表富农的真面目。

十二

陈独秀主义一直到今有他的三个不可分离的机会主义同盟：即彭述之主义，鲍罗廷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彭述之主义早已丧失其独立的影响，因为一方面他早已融化于陈独秀主义，另一方面鲍罗廷主义已摄取了他的精神。所以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实成为陈独秀主义左右之手。假若陈独秀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点在忽视土地革命，忽视农民为革命的动力及不了解工农民主专政；那末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廷主义的共同点就在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领导，轻视中国革命之内部的阶级力量，及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解为隶属于资产阶级——自民族资产阶

级以至乡村资产阶级的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与陈独秀主义的坚决斗争，同时就要求打击他的左右手，——托洛茨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

公开的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在表面上现在虽然已驱逐于党外了，但他暗藏在党内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友军鲍罗廷主义的影响还很严重。不少可爱的同志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从他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如对于富农，对于阶级关系，职工运动和游击战争之不正确的了解等）。这样的现象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当忽视。为要彻底肃清陈独秀的主义在党内的残余，就要求这些同志在以后能自觉的与陈独秀主义的同盟者鲍罗廷主义在思想上完全脱离关系。不然，党就应该作不客气的斗争。

十三

与“陈独秀主义斗争的任务，尤其要执行于一切实际工作，群众工作，党的生活及一切目前所发现的各种各色的不正确倾向的斗争之中，一切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失败情绪，合法主义，和平发展倾向，党内调和倾向，盲动情绪，保守观念，极端民主化等等，如若任其发展都可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随时随地制胜这些倾向，其意义就是制胜陈独秀主义。中国革命中和我们党中的危险现在主要的是右倾的危险。譬如富农路线的错误，在上级指导机关，虽然改正，但在实际工作上和在下级党部中，严格的说，还是没有改正过来，有些地方还正在发展。反对农民分土地，固然是富农路线，同时就是在分土地之中也发现了富农路线——如闽西分土地定出以生产工具及资本为标准，显然的是富农路线；同时在闽西苏维埃区域中“不要增加工人工资”之不正确的提议也开始发现。

为要制胜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首先要求对于革命的性质，目前阶级关系的变迁，及革命发展的形势有正确的了解和估计；对

于这些主要问题的丝毫错误都是帮助了陈独秀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帮助陈独秀主义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夸大资产阶级，看不见封建残余势力，因此完全忽视土地革命；而事实上是企图帮助资产阶级来建立他们所“梦想的稳定”去实行国民会议制度；鲍罗廷主义帮助陈独秀主义停留于他所了解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阶段；夸大封建势力，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企图贯彻把中国革命隶属于资产阶级利益之下的路线，即把以前隶属于城市资产阶级的路线变成隶属于乡村资产阶级的路线。这一孟塞维克路线的危险在目前是非常之有害而带现实性的主要危险。陈独秀的根本立场，就是要利用托洛茨基主义的遮饰来实现这一孟塞维克的路线。在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鲍罗廷主义，两者都绝对没有目前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的正确观念，尤其两者都绝对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有些同志在反对陈独秀主义的过程中，常常发现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观念，或鲍罗廷主义的错误观点，尤其是后者占多数。常常有人把反对富农的路线与反对地主的路线对立起来，常常不了解在中国土地革命中之反富农是同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之反资产阶级的总路线是一致的；常常有人过于夸大封建势力而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又隐隐的发现复活以前的两个革命阶段论的倾向而完全忽视革命转变的观点。这些都证明右倾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之主要的危险之表征。他们不能正确的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过程：当他们“严格的”区别革命的性质及任务时，便连革命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时，也把他完全划成鸿沟，以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陈独秀主义和鲍罗廷主义就是这样看法）；或则完全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而不自觉的堕落到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这种“右的”错误实际

是帮助了陈独秀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是长的过程，但有快的速度之可能，因为他具有很优越的转变的条件——国际的和国内的。国内的条件，如1927年以来，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的革命领导权；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区域之建立，无地的贫农，雇农，苦力以及地少的中农占乡村人口之绝对多数；城市大工业具有相当的经济前提，（此前提在工农民主专政的过程中更会大大的加强）；最后尤其是中国革命之反帝国主义的特性，和反资产阶级的特性，——自城市资产阶级以至乡村资产阶级。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已在而且正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国际的条件，如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大工业化与农村的集产化之异常迅速的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涨，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稳定”不仅剧烈动摇而且开始崩溃。这些条件对于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都有决定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应坚决的明确的站在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上，来执行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任务，同时准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前提。他丝毫不为企图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左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所动摇。同时，更丝毫不为企图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右的”鲍罗廷主义所动摇。他一定要彻底的克服陈独秀主义及其左右手的托洛茨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他一定要领导现在的革命高潮迅速进到直接革命形势，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中国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由工农民主独裁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独裁制。

打倒陈独秀主义及其左右手——托洛茨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

全体党员站到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路线上来！

（录自《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托洛茨基给伊罗生的四封信*

王凡西译 唐宝林编

编者按：最近我从上海九旬老人郑超麟处获得其至友王凡西译的《托洛茨基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和王写的《关于托洛茨基九封信的几点感想和说明》两份材料，阅后觉得对我们深入研究陈独秀、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有所启发，经郑超麟同意，现公开介绍给读者。

托洛茨基在苏联十月革命时，是一位著名的领导人。1923年列宁病危及逝世时，在苏联国内建设及国际共运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分歧，最后导致决裂。他的思想形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并创立了第四国际，成为第三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反对派——托派的精神领袖。其实，托洛茨基主义虽然其基本理论是错误的，但也有不少可供参考的意见。

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原苏联当局已为托氏平反，在我国，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托洛茨基的学者和论著也逐渐多了起来。1991年，我国公开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肖像集》，去年又出版了他的《文学与革命》。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些“独特”见解，正在引起我国学者的浓厚兴趣。

这里介绍的四封信是从上述九封信中摘引出来的。因为其他五封信及所引四封信中被删去的段落，谈的是《中国革命悲剧》这本书稿的具体写作、修改、出版等琐事，与中国无关，为了节省篇幅，没有选用。

《感想和说明》写得很长，为了阅读方便，我把有关内容安排

* 这份资料中的编者按和注释均为原编者所加。

在每封信的说明中，其他重复的内容则删去了。

关于译者王凡西（又名王文元，笔名连根等），其经历和思想可参见他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双山回忆录》。这里只指出与信有关的一点：1931年5月初，在上海成立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时，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王凡西和郑超麟为中央常委。后来，中国托派分裂。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王与郑等另行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后来郑留在大陆，王则亡命海外，主要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译、著颇丰，成为著名的托派理论家。近年来与郑超麟联系密切。这两个材料就是他寄给郑的。

关于这几封信的基本情况，王凡西在“译者序”中介绍说：

伊罗生（Harold R. Isaacs）著的《中国革命悲剧》，现已普遍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凡是研究中国革命的人，特别是那些研究1925—1927年中国革命历史的学者们，对它都非常重视。

伊罗生写作这部书的时候，是托洛茨基的一个追随者。初稿写成后，他还特地到挪威去访问托洛茨基，和他讨论问题，请他读原稿、提意见。托洛茨基很赏识这个年轻美国人（当时他才25岁）的才能，他仔细阅读了稿子，认认真真地提了不少意见，最后还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很有份量的序。

托洛茨基所提的意见，都写在他给伊罗生的九封信中。这些信我们是从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托洛茨基文件中找到的，现在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们。

从这九封信中，我们不仅可以见到这部名著的成书经过，见到托洛茨基如何奖掖一位青年作家，而且更重要的，我们还可以得到不少有关中国革命与中共历史的宝贵材料，可以看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分析。

各项意见中最值得注意的，我个人觉得有三：（1）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来写作？（2）当初中共是如何决定加入国民党的？（3）什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这些问题及其答案也许不会让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但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共历史的学人们来说，它们却非常重要，极有启发，甚至还有现实性。

譬如拿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这个问题来说。为了解答中国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生产关系中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们曾经提出过不少答案：有的将它归咎于中国的地理条件（海岸线相对平直），有的归罪于儒家思想（保守自足），有的——目前相当时髦的——则要让老是给中国人造成灾难的几条大河——特别是黄河来负责。

其实，这些答案不是隔靴搔痒，便是舍本逐末。真正抓住这个特点的，不能不数托洛茨基在第五封信中所指出的——实质上也正是马克思曾经指出而未曾充分阐明的那种“亚细亚生产模式”。

一、1937年11月1日信^①

亲爱的朋友：

刚刚读完了第3章，它给了我关于“新觉醒”的一些很有趣与很重要的知识。这一章你写得和前面两章一样好，我完全相信整部书会具有同样高的水准。

我有一个建议。每一章都很长，而每一章又都包含许多个问题，你是否觉得在各章之内加上一些小标题会更好呢？这些小题目或者紧加在总标题之后，或者加插在文章中间。

不过在这一章中，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你有不同意见。不同意

^① 原件为英文件：编号 EP8558。本稿注释全是译者注。

见不是原则性的，但是很重要。

首先是关于马林^①与陈独秀之间的争论（第3章9—11页）。你确实是袒护马林而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了。马林在事后对你提出的几点论据毫无历史价值。说马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出于他个人的主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那时负有官方使命，他的活动不是以他早年在爪哇的经验作根据；而是以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与布哈林的训令为依据的——这些训令还可能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你在信中没有写明确切时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整个事件发生在1922年。列宁病了。我则完全不让知道共产国际的工作情况。我第一次见到马林是在他出使中国回来以后。

陈独秀与其他中共领袖们反对把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我认为绝对可能，如果我不能完全保证的话。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很自然地会更倾向于不妥协，较少可能倾向于机会主义。我们并无丝毫理由不相信陈独秀的报告。说马林当时并无“书面训令”，那是可笑的。他的莫斯科派遣的特使身份是毫无疑问的，他自然会乞灵于共产国际纪律这个法宝。对于这件事是否还须提出更可信的说法，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以为我们不需要袒护马林，只因为他是自由的而陈独秀则在监狱里。

你引用这个事实：即使中共领袖们反对加入国民党，他们所依据的也不是原则性的理由，而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是死的”。你把这个论点提了两次，也许还不止两次。我以为在这里你把原则与事实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过去，当资产阶级政党还能领导劳动大众之时，革命者的责任是要参加它。例如，马克思与恩

^① 马林(Maring)系斯内夫利特(Henricus Sneevliet, 1883—1942)在华工作时所用化名。他是荷兰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他所领导的一个小派别曾于1933年后接近托派，但在1938年主要是因对西班牙内战问题有不同意见而离开托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纳粹所捕，最终被杀。

格斯曾经在 1848 年加入过民主党（此事做得是否正确，得具体分析）。“国民党是不能领导革命群众的。从革命的观点来看，它是一个死的政党。因此我们反对加入”——这样一种论断可能具有十足的原则性的价值。

我还可更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1922 年，在这样一种设想下，即认为国民党当时已拥有一些工人，而年轻的中共则是弱小的，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因此决定加入国民党——这样的加入，特别在华南，本身不是一桩罪恶，甚至还不是一个错误（1922 年的情况真是这样吗？）。事情果真是这样，那么加入〔国民党〕只是〔共产党〕走向独立的一个插曲性的步骤，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如你们之加入社会党^①一样。这里的问题便在于加入的目的何在与加入后将采取什么政策。

你引用陈独秀 1922 年自己写的文章来反对他。他写道：“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是一条必需的道路。”……这句话是写在马林的训令之前还是之后呢？而且，“合作”并不意味着加入。1927 年时，我们也曾提议与国民党进行军事合作。不……你对马林太慷慨，对陈独秀太苛求了。

我的第二个不同意见是关于你对苏联 1920 年的对华政策的批评。在第 3 章第 13 页，你写道：“一个更为显著的例子，它让人们见到那个倾向：国家的眼前利益被置于革命目的之上。”你提及的那些事情（你没有说明时日），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摘引了《消息报》上登载的一篇愚蠢的文章，但这篇文章能代表我们的整个路线吗？这难道真的是“一个倾向的显著例子”吗？你拿这件

^① 美国的托派组织“合众国社会党”曾于 1936 年自动解散，加入以诺曼·托马斯（1884—1968）为首的美国社会党，1937 年底脱离，复于 1938 年初成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事情来责备苏维埃政府重视吴佩孚^①更甚于中国的革命力量。你在这里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共产国际有援助革命力量的义务,但是苏维埃国家拥有在她的远东边界上对各个帝国主义者采取不同策略的权利。不但在远东,而且,例如在德国,这都曾使政治在两个不同的平面上展开。

你在第15页上首次提到鲍罗廷在1923年秋来到中国。那正是“三头”^②统治时代,当时对国民党所采取的政策正反映了他们开始反对我们“轻视农民”的斗争。他们是把国民党看作代表农民的政党的。

请你把第3章第20页的第5、6两行和第2章第34页的第4以及后几行的文字对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同时前后两处都有一点言过其实。

我虽然提出这些批评,但我必须说,这第三章写得很好。

请接受我最佳的祝愿!

列夫·托洛茨基
于考约奥冈

编者按:这封信和下一封信谈的是陈独秀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政策的态度问题,以及共产国际制定这个政策的一些内幕。这个问题曾在苏联和中国史学界引起热烈争论,现在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译者在《感想和说明》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兹录如下:

第六封信里谈到有关中共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年中共是如何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关于这个问题,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与共

① 吴佩孚:1920年初为北洋直系军阀领袖。

② “三头”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

产国际代表马林二人有过相反说法。伊罗生倾向于马林所说；托洛茨基则认为陈独秀的说法更近情理。

陈独秀是这样说的：

……大会（按指1922年7月16日—23日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译者）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按即张国焘——译者）、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以服从国际决议为首，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马林认为这不符合事实。

当伊罗生写好了《悲剧》初稿，于1935年前往荷兰访问马林并谈到此事时，马林否认在中共中央的西湖会议上曾经拿纪律来逼使中共服从。他并且说：

况且我并没有〔国际的〕特别指示……〔如果他们真的反对我的建议〕，他们尽可能向共产国际的较高机关去申诉〔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根据伊罗生当时摘记的谈话记录，马林又曾这样说：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接受他的观点。有几个委员反对他的计划，只因他们怀疑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国民党究竟有多大影响，同时他们不

相信国民党愿意而且能够把自己发展成一种群众运动。马林把陈独秀归入极愿使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中委之一。

不过在谈话中，马林声明：“我手上并无文件。”

(以上所引及转述的文句均见《中国革命悲剧》，1980年修订版，第59页——译者)

究竟谁的说法可信，伊罗生不下断言。他只说：“也许共产国际未曾公布而且不让查阅的档案中，存在着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这个争议的文件。”(见同上引文同页。)

可是紧接着这一段话，伊罗生却写道：

依照共产国际远东局主任米夫所说，共产国际“要年轻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行动的”第一批正式指示，是于1923年1月12日由国际执委会在一项特别通知中传达的。此时共产党党员早已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了！”

(见J·米夫：《英勇的中国》，纽约1937年版第21—22页)

伊罗生同时又指出：“在1922年，陈独秀曾经写过文章，认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必由之路。’”(见《悲剧》，第59页)

这样一来，伊罗生事实上还是下了判断：马林当年确实手上没有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则不仅不会在1922年反对加入国民党，而且他本人还竭力主张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

这一方面证明了马林所说种种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委婉地点出了陈独秀在《告同志书》中说的乃是事后编造。

托洛茨基觉得伊罗生这样的说法“对马林太慷慨，对陈独秀太苛求了”。但他的批评不会根据什么文件(他手上没有这些文件)，他只是凭自己的体验：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很自然会更倾向于不妥协，较小可能倾向于机会主义”；只是凭他对陈独秀的不很多

但很深的一点认识；又凭他本人当年在此问题上与季诺维也夫及斯大林打交道的一些回忆——认为伊罗生不会“公平地对待陈独秀”。

托洛茨基的此项批评不会说服伊罗生。在后来出版的书中，著者完全保留着他的原来说法。

不过今天因为近二三十年来有关人物的一些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有关文条的印行，我们能以人证、物证来支持托洛茨基的看法了。

人证：张国焘，当时中共中央的五个委员之一，西湖会议的参加者。在他所著《我的回忆》（243—244页）中，比较详细地讲述了当时讨论的情形。他首先讲了他和蔡和森如何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何与马林争吵。然后他说：

陈先生（按即陈独秀——译者）也反对马林的主张。

接着，讨论到最后，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问马林：他的提议可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決定？”马林回答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此时陈独秀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应该服从”。不过，陈独秀还提出了加入国民党的条件：不打指模，不宣誓效忠总理。

如果以人废言，以为张国焘的见证不足信，那还有如下三件物证：

第一件是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即吴廷康）的信。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在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新加入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这是西湖会议之前四个半月陈独秀为了反对马林建议中共加入国民党而向第三国际提出的“上诉”。

第二件物证是1922年7月由马林带回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写给中共的密信：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利浦（按即马林——译者）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①

这个文件是由维经斯基具名的。它是对陈独秀所提的上诉的答复，是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特别指示”，也是给予马林以“便宜

^① 转引自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第303—305页。又据该书著者说，这封信是用打字机打在一件衬衫上，此物现存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行事”的大权的一张空白支票 (Blank Cheque)。

第三件物证是第22期的《向导》周报，上面登载着陈独秀写的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其中有被伊罗生引用的那句话：“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但问题是这一期《向导》出版于1923年4月25日，并非伊罗生所说的1922年。陈独秀这篇文章不是写在西湖会议之前，而是在会议之后，在会议之后八个月！

看到了这些物证，谁都会承认托洛茨基的推断和看法是对的。

但是伊罗生为甚么会对陈独秀如此“不公平”？为甚么不肯接受托洛茨基对他提出的意见呢？

据我所知，因为他受了刘仁静的影响，在《悲剧》序言中，伊罗生写了这样一段话：

……花了一年时间，辛勤地研究、摘取以及翻译大量搜求到的现代资料——报纸、书籍、小册子、报告以及种种文件……进行这一部分工作时，我曾经得到我的朋友J.C.L.的巨大帮助……

这个J.C.L.就是刘仁静。刘仁静如何帮助并影响伊罗生，特别是，他如何影响了伊罗生对陈独秀的态度，我将在后面详谈（参见《关于托洛茨基给伊罗生的四封信》——编者）。

二、1937年11月9日信^①

亲爱的埃撒克斯同志：

最近有好多事情要做，因此直到现在才读完第4章和第5章。两章都很好，特别是描写蒋介石性格的第5章，极好。真是非常

^① 原件为英文件，编号EP8559。

精彩的一章！我觉得当你的文章从一般的历史议论转入特殊事件的描写时，显得更加活泼生动。对于〔这两章〕我几乎是无可批评的。

第4章第3页，从底行数起第12行，我以为最好这样说：“组织着，宣传着，正在进行阴谋诡计。”用这几个字来代替你原来的文字。

……

在第5章第23页，你首次提到左派反对派对对中国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这里必须告诉你如下的情况：在1924到1925年期间，中国问题是先在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两个人之间取得同意，然后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来处理的。他们从来不曾征求过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意见。鲍罗廷〔所执行〕的政策，甚至从来不曾在政治局里提起过。这是共产国际的专享特权，实际上是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的专享特权。我只是偶尔预闻一下，例如，当我在政治局里投票反对接纳国民党以同情党资格加入共产国际之时。只当1926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破裂之后，〔有关中国问题的〕种种秘密才逐渐透露出来。不过季诺维也夫本人还是受着他以往政策的束缚的，并且在我们最初几个公开声明之前，左派反对派曾经有过一连串内部讨论。这就说明了为甚么我在中国问题上延迟很久才出来作公开斗争的缘故。

……

三、1937年10月23日信^①

亲爱的埃撒克斯同志：

收到你的稿子，并且已经读完了第1章（31页）。我觉得这篇新导论，无论内容与形式都非常出色。要把一个庞大国家的几千

^① 原件为英文件，编号EP8556。

年复杂历史在 31 页篇幅中讲出来，那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你却能把它们描绘得既清晰而又有教益，描绘得很成功。你的文体是美丽的：清楚、确切、完全没有新闻记者式的浮夸词藻。

从你开列的参考书目中，人们可以看出你是从各种文字的书籍中吸收了大量资料的。这就给了你的著作以一个坚实基础。真是好极了！我们这个流派不但能出小册子，不但能写单篇文章，而且开始能写出严肃、郑重的书来——这一事实是我们这一派具有的内在信心的一个极可喜的象征。这个自信本身就是成功的一项保证。只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有了詹姆斯^①的书，有了沃克^②写的接近我们意见的书，而现在，又有了你那本扎扎实实：事事有根据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现在都不能产生甚么严肃、郑重的作品了。它们都丧失了自信，它们都只是在于得过且过。第四国际在任何方面都开始继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这里我只有点意见想说。在第 1 章第 3 页开头，你谈到中国的古老城镇与一般的“亚细亚生产模式”，我以为说得不清楚。诚然，事情的本身就是不很清楚的。不过，我相信中国后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确定以下一个公式：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生产中心；亚洲的城市是消费中心。欧洲的乡村^③即使在中世纪也已强大有力，强大到足以使手工业者与农民分开，让工匠们集中在城市里面。贸易则在工匠们的城镇和它周围的农村之间造成一种联系。在亚洲，手工业，即使是那最重要部分的手工业，也仍然和农业结

① 詹姆斯 (C. L. R. James, 1901—1989) 是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革命家、作家，曾长期在英国和美国的托派运动中工作。著作中最出名的是《黑色的雅各宾党人》和《世界革命》。

② 沃克 (C. R. Walker, 1893—1974) 曾做过托洛茨基在美国的文学代理人，《美国的城市》一书著者。

③ 这里的“乡村”疑是“城市”之误。

合着，分散在乡村中。城市里面住的是贵族、官僚、放债者和士兵。城市中的工匠们是为那些寄生者们服务的，而手工艺的本身便带有一种‘贵族’性质。贸易在很广大的场所活动，它和放债这个行当结合着。这些不同的特点，即欧、亚两地的城市以及它们和乡村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的特点，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一部缓缓向前的历史，而亚洲的历史则是一周而复始的循环的历史。

第14页最后一行，最好说“游击战争与盗匪活动”。

致

最诚挚的敬礼

列夫·托洛茨基

寄自考约奥冈

编者按：这封信对旧中国历史发展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展等问题提出了看法，联系到建国以后到如今才好不容易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很有启发。译者在《感想和说明》中发挥到：

据我所知，托洛茨基不曾写过专门文章来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因此，1937年10月23日写给伊罗生的那封信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在那封信里，他用了不多几句话，明白确切地表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生产中心，亚洲的城市是消费中心。

.....

“在亚洲，手工业，即使是那最重要部分的手工业，也仍旧和农业结合着，分散在乡村中。城市里住的是贵族，官僚，放债者和士兵。城市中的工匠们是为那些寄生者服务的，而手工艺的本身便带有一种‘贵族’性质。贸易在广大的场所活动，它和放债

这个行当结合着。这些不同的特点，即欧、亚两地的城市以及它们和乡村之间的不同特点，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一部缓缓向前的历史，而亚洲的历史则是一部周而复始的循环的历史。”

托洛茨基当然不是研究了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也不是亲身来到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从事调查研究而构成这些概念。他显然是根据他研究俄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加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见解而形成这些看法的。（这当然不是说托洛茨基完全不懂或不理会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相反，为了参加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与讨论，他曾经，特别是当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之后，很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了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献。）

关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点，托洛茨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埃及、印度与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一种颇能自足的性质，且享有足够时间，能使各自的社会关系，不管生产如何低下，差不多达到这样一种精细的完成的地步，即各该国中的手工业者已能生产自己的工艺品了。……”

“不仅是俄国封建制度的贫乏性，而且也是全部旧俄历史的贫乏性，最悲惨地表现于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缺如。俄国的手工业不曾能脱离农业而独立，且保持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质。旧时的俄国城市是商业的，行政的，军事的与地主的，因而是消费的而不是生产的中心。……”（以上引文分别见于中译《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2页与第3页。）

很显然，托洛茨基是把他研究俄国历史的成果，移用到中国来了。同时，托洛茨基的这个见解，不管是有意地应用，或无意的符合，我又以为恰好和马克思在这问题上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人们经常谈到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模式”，可是究竟它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曾做过具体与明确的说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有了不同的解释。不过依我看，托洛茨基在

信中和他在俄国革命史中所说的话，最能代表马克思的真意，也最能抓住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特点。

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一篇谈论英国对华贸易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01页。着重号乃引者所加^①。）

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又写道：

“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见同上引书604页。着重号并非原有^②。）

马克思称这个“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又说这“是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既然这种社会经济结构成了两个主要亚洲国家的共同特点，那末它即使不是“亚细亚生产模式”的全部内容，至少是它的主要特征。

不错，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在寻求中国或印度何以不能凭自己的发展而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它是要解释为甚么英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会在印度与中国长期受到阻挡与妨碍。但是问题很简单，如果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顽强得足以长期抗拒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那就更加谈不到从这个结构的外部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了。

“亚细亚生产模式”是决不能自发地生长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

什么缘故呢？托洛茨基在那封信中的简单分析，给了具体回答。原来中国传统的、一直被理想化了的“男耕女织”，那种“小

^{①②} 原文并无着重号。——编者

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生的、以独立的工匠为主的生产城市的缺如，竟是中国历史长期不前的主要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哩！

托洛茨基给伊罗生提的这个意见，很可惜，似乎不曾为受信人充分理解或同意，他不曾清楚明白地采入他所写的书的有关段落中去。无论在原版或后来的修订版中，他都只是罗列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些现象，指出它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这个事实，却不曾说明为甚么从如此这般的情形中产生不出资本主义来的根本原因。对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理论，他曾经在初版中说：“只有更深一步研究国内市场的性质和程度，研究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及狭小农村社会的相对孤立，才能了解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及其自行更新的非凡能力。”（见中译本第54页）在以后的修订版中，他索性把这些话删去，无意作“更深一步的研究”了。

当然，伊罗生没有接受托洛茨基的此项建议，不曾影响到《悲剧》这本书的价值，因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记述和理解，与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正确认识，其间虽有关系，却不是简单直接的。（略一段）

四、1936年2月21日信^①

亲爱的劳勃茨同志：

……

这里是我想对它提出的一点简单意见。你的著作是很好的，很重要的，它会给读者们带来很大好处。不过这书的结构，以及你叙事的方式，我觉得还需要有点变动。照你这本书的现有方式，好

^① 原件为法文件，编号EP8544。

像是给布尔什维克——列宁派^①的先入之见作一种历史图解。你一开头摘引了圣经文，然后你指出：往后的事变发展完全符合这些圣经文。这么办，你给了你的叙事方式以一些“神学”气味。当然，我想你知道得同样清楚，你的分析与“神学”毫无共同之点。你所摘引的学说与你的叙述一样，实际上都是用唯物主义来分析事变，并以此作为根据的。但是这种叙事方式却会使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人们为之震惊。这就是说，它会使人人类中极大一部分人，特别是美国人，为之震惊的。

我对你提出什么建议呢？

不要那篇教条式的与抽象的导言。另写一篇以事实的叙述为根据的、像是结论式的东西，来代替它。

给那些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写一篇历史性的导言吧。譬如说，16世纪的荷兰革命，也是一次民族解放的革命，它反对西班牙的统治。将荷兰革命的动力与中国民族革命的动力作一个比较，那怕是很简单的比较，都能使你的叙述大为突出的。

也可以把法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拿来作出发点，进而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变化。类乎这样的一个导言，曾引起编者的更大兴趣，会赢得读者们的同情。

从同样观点出发，你得把整部稿子修订一下。我不认为你得大修大改。只要去掉那些“神学”形式的痕迹，用更生动的描写，用对人物的更好的刻划，等等，来加以补足就行了。

编者按：这封信谈的是如何写书写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实

^① 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是苏共左派反对派称呼自己的名字。1929年后，它成为国际托派的共同名称，直至1933年。后来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1936年7月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大会上通过决议，发起一个“为建立第四国际的运动”，1938年9月第四国际正式成立。

际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译者在《感想和说明》中发挥说：

我们没有见到伊罗生的初稿。从托洛茨基的第三封信（即1936年2月21日的信——编者）中，我们知道著者原来的导言是先引了几段“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文句，然后铺叙开去，证明客观发生的事变如何符合了这些论断。托洛茨基讥笑它是“神学”笔法。因此他提议改作。他要作者从事实出发，不要从“教条”出发。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叙述与研究事变，不要拿事变中的发展去凑合既有教条。

伊罗生显然接受了这个劝告。他彻底放弃了“神学”写法，写了我们后来见到的新导言。在第五封信中，托洛茨基很高兴地称赞说：“我觉得这篇新导言无论内容与形式都非常出色。”

这是一件“小事”，但它深深地感动了我。试问，

你们可曾听见斯大林对谁说过这样的话吗？

不曾，从来不曾。

在后来为伊罗生的《悲剧》写作的序言中，托洛茨基把最后一层意思相当充分地发挥了。他说：——

“在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起了一个很大作用，本书对它有详细描写。但在共产国际文献中，我们如果想找到一本能多少企图给中国革命以一幅周详的图画的，却总是徒劳。我们只能找到几十种‘行情性’的著作，它们卑顺地反映着共产国际政策的每一个曲折，或更正确地说，卑顺地反映着苏维埃对华外交政策的每一个曲折，并且把事实与一般的论断穿凿附会于每一个曲折。这种文献只能引起人们心里的反感，而伊罗生的著作则与此相反，它从头到尾代表着一本科学的著作。他秉着科学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与补充材料，花了三年多的光阴……”

（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集）

彭述之为《托洛茨基论中国》 一书所写的《导言》

(1976年)

本文作者彭述之是中国的托派分子。这篇《导言》是他为1976年美国出版的一部近60万字的专题文集《托洛茨基论中国》(Leon Trotsky on China, New York, 1976)一书而撰写的。

彭述之早年曾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4年,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成为陈独秀的翻译和助手,并先后担任过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向导》和《新青年》主编。因在大革命中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和陈独秀一起被免去了党内职务。1929年,因为组织反党的“左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此后多年中,他一直是中国的托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且与世界性托派组织“第四国际”建立了联系。1949年,我国革命胜利后,彭述之逃往欧洲,成为“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在这篇导言中,彭述之百般美化托洛茨基,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攻击我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其中包括对我们党解放以后实行的正确政策。这篇导言是我们了解、研究、批判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观点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材料。为了保留原作全貌,本刊未作节删。

——《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编者

莫纳德出版社决定出版托洛茨基论中国的一本新的文集,其编辑之一勒斯·伊万斯写信给我说,此书收集的文章比1932年出

版的《中国革命问题》要多得多。他问我是否愿意为《托洛茨基论中国》写一篇导言，并且他还给我寄来了将收入此书的某些文章的清样和全书的目录。我很乐意承担这个任务，因为这将给我一个机会来说明一下过去不曾讨论过的有关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的一些历史事实，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的一些历史事实。但愿这将帮助读者比较具体地理解列甫·托洛茨基的伟大贡献。

托洛茨基对于理解中国革命问题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它可以同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的顺利发展所作的贡献相比拟。尽管由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领导，第二次中国革命失败了，但是，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理论、战略和策略的观点却被历史记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托洛茨基补充、增加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训。正如在俄国的1917年2月至10月的时期中一样，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中也有两条不可调和的政治路线。托洛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斯大林代表孟什维克路线。在俄国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路线占了上风，取得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在中国，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孟什维克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不过，这一失败正如俄国革命的胜利一样，对于中国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

“对于每一个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先进工人来说，‘研究中国革命’是一件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事情。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去研究中国革命的重大事件、动力和战略方法，那么，在任何国家中都不可能严肃地谈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知道什么是黑夜，也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白天；没有经历过冬天，也就不可能懂得什么是春天。同样地，不研究中国惨剧的方法也就不可能了解十月起义的方法的意义。”（《需要一部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历

史》，1930年9月，着重号是引者加的^①。

我完全同意“研究中国革命是一件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事情”这个说法。不过，我还想加上一句：“如果不认真地研究《托洛茨基论中国》，那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惨剧的方法的意义。”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主义

直到1926年8月30日给卡尔·拉狄克写信的时候，托洛茨基才真正开始系统地提出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虽然他说他在1923年就“坚决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而且在1926年春他“再次提出过一个正式的建议，让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见托洛茨基1930年12月10日致马·沙奇特曼的信），但是我们并没有托洛茨基的“正式建议”的副本。因此，很难讨论1926年8月以前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特别是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反应。为了比较具体地理解托洛茨基的贡献，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代表格里戈里·魏金斯基的帮助下，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组织成立以后，它面临着三个迫切的任务：如何吸收和训练共产主义的干部，如何开始组织工会，以及如何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主要是由那些在俄国胜利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脱离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或劳动党的人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必须从零开始；当时甚至连现代的工会也没有。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两个月以后，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一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派往莫斯科去学习。从1920年8月起，共产主义小

^① 着重号已改为黑体字。——编者

组出版了一份周刊《劳动者》。它还负责在工人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并且发展现代的工会。9月，陈独秀主编的著名的月刊《新青年》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公开鼓吹马克思主义，同时报导苏俄的真实情况。接着，11月，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一份秘密的月刊《共产党》，介绍布尔什维克思想和革命经验，同时发表一些关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这个刊物还发表了托洛茨基写的《共产国际告世界工人书》以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此外，《新青年》和《共产党》还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在一些激进的青年中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得很广）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阶级合作，同时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这就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某些基本原则。由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了这些坚持不懈的活动，大约从1920年10月起，在其他地方，如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也相继建立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

由于陈独秀未能参加这次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大会仅仅通过了要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类型的党的决议。对于政治问题没有作出其他明确的决定。但是，由于这个新的党的总方向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无产阶级方向，所以中共建立了一个组织劳工运动的书记部。拟定了一些计划：要通过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斗争来推动各大工业中心、矿区和铁路的工人运动。1921年至1922年间，中共领导了一系列的罢工，并且取得了某些胜利。在此基础上，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的参加者代表着23万有组织的工人。由此可见，在短短的一年之内中共就已成了工人阶级运动的中心。

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帮助。（魏金斯基详细地向中共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观点）因此，1922年春中共就

已决定了关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路线。这条路线正式表述在 1922 年 7 月的《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其最重要之点是：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中国共产主义史文献》1952 年剑桥英文版第 63—64 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①；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197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5 页；以下的引文凡译者已查到中文原文者或已有中文译文者，不另注明英文版本出处——译者）

这些“目标”共有七条，但我在这里仅仅指出几条：“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让西藏、蒙古和新疆，即让各少数民族实行自决〕……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接着，宣言指出：

“上面的七条，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工农和贫农必定要环绕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呀！”

^① 着重号已改为黑体字。以下同。——编者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现在他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呀！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并又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15—17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我专门引证了这个宣言，因为它是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明确地指出：工人“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并且要“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直到完全解放的目的”。这正是1920年7月列宁提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的根本的路线。《提纲》说：

“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选集》第4卷第275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时，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宣言除报导了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反对军

阀和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外，还说：

“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1页）

由“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组成一个“联合战线”的这一号召，并没有背离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因为列宁在那里说过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因此，中共如果实际运用这一战略，它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且“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这就是早期中共对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策。

二、中共之遭受压抑以及向孟什维主义的转变

正当中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它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反映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原名斯内夫利特）带来的一些指示中。

早在1922年8月，当马林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之后，他就让中共中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指示是：中共党员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办法来谋求国共合作，以便推动国民革命运动。所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都反对这个建议，其主要理由是：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中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所以合并是不行的；这种几个阶级的组织只

会妨碍中共的独立政策。^①可是马林提出了中共应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的问题，在“纪律”的威胁之下，中央委员会勉强同意了共产国际的建议，保留的一个条件是：这个问题要经全党讨论，由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讨论是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的时候，每一个部门都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从事工人运动的干部持最激烈的反对态度。据陈独秀说，他在1922年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对于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仍然抱怀疑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小心翼翼地监视他，把他看作“‘左派’幼稚病”的代表人物。拉狄克甚至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批评，说中共的任务是“要使工人同客观上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结成一种合理的关系”。（《中国共产主义史文献》剑桥英文版第53页）

因为中共的下层和干部反对加入国民党，特别是因为陈独秀

^① 伊罗生 (Harold R. Isaacs) 在《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中谈到过这个问题：“他〔陈独秀〕说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反对马林，他认为即使在当时，中共的领导者们也相信这样一个步骤‘会混淆阶级组织，约束我们的独立政策’。不过这是在事后写的。”（《中国革命的悲剧》1968年纽约英文版第二版第59页）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独立”政策是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的。马林的政策与此正相反，所以遭到了中央委员们的反对。

据伊罗生的说法：“1922年，陈就曾写过：‘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同上书第59页）不过，伊罗生所引证的这句话并不是在1922年写的，而是在1923年4月23日（应为25日——译者注）发表于《向导》周刊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出现的。（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当时陈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正在向右转。

这里必须指出，伊罗生的书是关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总方向的一个有价值的记录。不过，伊罗生没有提到中共的内部事务、它的领导人中间的互相冲突的思想，特别是它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反应。似乎中共机械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没有任何异议。这是伊罗生的著作的主要缺陷，这也是我要详细地提供共产国际领导的记录及其与中共发展之关系的主要原因。

在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表明了这种反对态度，所以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于1923年1月初曾在俄共政治局内正式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除了托洛茨基之外，其他的一切委员，如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都赞成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根据这次会议的结果，季诺维也夫写了一个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正式决议：

(1)“国民党现在是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为依据。

(2)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此外，因为解决民族革命问题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

(3)总之，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当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现在是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因此命令“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而后者是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为依据的。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政党就被置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控制之下来欺骗群众。这是同布尔什维克对“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传统立场以及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针锋相对的。所以，这条孟什维克路线是第二次中国革命悲剧的根源。

政治局赞同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是斯大林就派阿·越飞为苏联政府代表去上海，直接同孙中山谈判关于两党合作以及苏联援助国民党的方法等问题。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和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宣言的头一部分说：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

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目前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总理全集》下，第3集第61页，众志书局版）

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这是他的资产阶级观点的坦率的表现。可是苏联代表越飞公开地对“此项见解”“完全同感”，而且答应苏联将“援助”孙中山完成“民国的统一”和完全的“国家的独立”。这样一来，中共的唯一任务就是紧跟苏联的政策领导，援助国民党去努力获得“民国的统一”和“国家的独立”。这是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决议的具体表现，不用说，这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进行的。

遵照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决议和1923年1月26日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共领导于1923年6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马林。虽然这次代表大会上有着尖锐的争论，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权威迫使多数代表赞同了号召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的重要之点是：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

出版社版第 24—25 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人们如果把把这个宣言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个宣言的内容完全是矛盾的。中共已经背离了它原来的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滚进孟什维主义的泥潭了。实际上，中共的情况比俄国的孟什维克的情况更坏；后者至少还是保持了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没有加入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而中共则加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并且说什么“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这种惊人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的变化和蜕化。这里我要指出一个事实来说明问题的真象。1922 年 5 月列宁患病以后，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一起在俄共中央政治局内形成了一个小组（所谓三头政治）。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搞掉托洛茨基（他们害怕他在列宁逝世以后占据领导地位）。他们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保持合作为基础。因此，共产国际于 1922 年 8 月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列宁患病以后还不到三个月）。

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赞同了这一政策之后，中共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思想”方面，中共的某些领导人为了给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寻找“理论”根据，便夸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以及它在领导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毛泽东就是这种工作的最早的鼓吹者和提倡者。

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以后，他就给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北京政变与商人》，其中的一些要点是：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

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而出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即资产阶级。——引者注）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锐敏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向导》第31—32期合刊；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很锐敏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因此，“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根据这种分析，毛得出这样的结论说：

“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上海以外的商人都一齐起来一致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同上；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毛认为，“革命的成功”的“希望”就在于商人（资产阶级）的“领袖全国国民（工人，农人，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显然，这一结论是孟什维主义的最基本的形式。

陈独秀收到了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号召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后，同时由于发生了“二七惨案”，即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遭到了镇压，他便缓和了原来反对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态度。这第一次表现在他为《向导》周刊所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陈在这篇文章中说：“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23页）此后，1923年12月1日，陈又给《前锋》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各社会阶级以及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资产

阶级在三个方面都具有最大的影响，而工人阶级在人数上实力很小，既贫困又幼稚。因此，不能希望由工人来领导国民革命。总之，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工人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合作，以便成功地完成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国民革命。

陈独秀强调工人阶级在人数上缺乏力量，而且既贫困又幼稚，所以，他说：“工人阶级不能领导革命，而必须同资产阶级合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国民革命。”如果把陈的这个观点同毛的观点（“很锐敏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商人有“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去更快地取得“革命的成功”）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看出，这是同一种孟什维克思想的两个表现。

新当选的另一名中央委员瞿秋白恰恰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写了一篇题为《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的文章，登在1923年12月19日出版的《向导》上面。瞿在这篇文章中对国民党及其改组提出了如下的评价和希望：

“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一，从此平民的政治运动与军事的革命行动并进。二，从此组织群众的民主式的真正政党，肃清腐败分子。三，从此实行严格的纪律，作为全国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处处时时代表平民而反对军阀和列强。”（《向导》第94期）

在对国民党的“革命成就”以及它的紧急改组将带来的“大有希望的前景”作了如此高度赞扬和充满希望的评价之后，瞿高呼：

“全国的平民啊……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我们必定……要组织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商人〔资产阶级——彭注〕，农民，工人，学生，教

育界，凡是平民……都应当加入国民党……”（《向导》第94期；着重号是引者加的）^①

瞿秋白对国民党的莫大的幻想，除了是毛和陈对资产阶级的幻想的具体化和实现之外，也表现了他自己特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和投机性。而且，这些观点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观点；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赞成这些观点。瞿的文章在公开的党刊上发表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国民党是“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而且，“现在的国民党……是势力的中心”，通过这个“中心”就可以“脱离列强〔帝国主义——彭注〕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所以瞿的结论是：“一切工作都应当为了建设国民党”。事实的确反映这一点！

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中共中央命令所有的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动员一切干部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参加国民党的一切工作。例如，中央常委和组织书记毛泽东用他的全部时间去为国民党的上海执行部进行宣传工作，完全放弃了本党的组织工作。另一个中央委员谭平山专门为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工作。在其他一些省份和城市，如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和天津，所有的中共干部都努力为改组国民党而进行工作，并且直接接管了该党的工作。其中一些突出的人物有：李立三、项英、邓中夏等，这些人原来是工人运动中的负责干部，被调去做“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结果使中共的组织工作陷于停顿。工人运动被忘记了，以至中共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被解散了！

另一方面，1923年秋，俄国共产党派米哈伊尔·鲍罗廷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顾问，协助他改组国民党。鲍罗廷向国民党介绍了俄国式的党组织，企图把它变成“势力的中心”，一个“实行严

^① 该文署名为“巨缘”。——译者注

格的纪律”的党。此外，他为国民党搞出了一个纲领，使用了这样一些改良主义的和抽象的词句，如“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等等，以便美化这个资产阶级代表的真正的反动本性。于是，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改组代表大会，大会采取了鲍罗廷的政纲和党的制度。这次代表大会还把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和候补委员（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这样一来，原来已完全腐朽和涣散了的国民党，在通过鲍罗廷给予的苏联帮助的影响下，运用中共党员的才智，就戴上了一个新的假面具，而成了瞿秋白所希望的“我们平民的党”！

1924年春，苏联派遣了另一个代表加仑将军（真名为瓦西里·布留赫）到广州担任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他带去了许多军事专家和武器，协助国民党重新组织军队。他还把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介绍给了国民党的军队。首先，他帮助蒋介石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为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作好了准备。这是后来一切发展的基础，因此，国民党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武装起来了”。

但是，国民党的老干部感到，“联合苏俄，接纳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来说是危险的。他们说：“由于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它反对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一切宣传，有损于国民党在国际上的形象……它反对军阀的宣传会毁掉国民党同国内实力派进行合作的任何机会，而那些实力派的计划就是要搞垮国民党。”（见《革命文献》九，第72—80页）孙中山给这些老干部作了如下的解释：

“如果俄国想要同中国合作，它便必须同我们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不服从我们党，他就会被撵出去。

中国革命从来没有受到列强的欢迎，它们总是帮助我们的对手〔军阀——彭注〕来破坏我们党……只能希望从俄国获得同情

……有助于我们的不是陈独秀的主意而是俄国的主意。”（《中国共产主义史文献》英文版第73页）

孙的解释是清清楚楚的：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俄国的“同情”，即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就表明了他准备随时把陈独秀的中共撵出去。因而，这就预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后来采取的清党措施。

为了安抚自己党内的反对派，孙首先提出要对中共党员进一步实行控制。1924年8月，他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他在会议期间不仅重申了接纳中共党员的政策，而且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把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和给中共的命令交国民党中央审查。瞿秋白参加了这次会议，表示同意孙的动议，但说他要询问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三、中共向左转——转向工人阶级

1924年8月，当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时，蔡和森（中共中央常委、《向导》主编）告诉了我关于孙中山要求把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和给中共的命令交国民党中央审查的动议，并且问我对此有何看法。“中央接受了这个要求吗？”我提问道。蔡回答说：“现在他们正在斟酌。”我愤然说：“中央必须拒绝孙中山的要求，否则我们党就会变成国民党的附属品。”蔡与陈独秀对此进行了商谈（他们是留在上海的仅有的两个中央常委），然后，他们就给瞿秋白发去了一封电报，命令他拒绝孙的要求。这是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我向中央提出了三个正式的决议案：（一）我们必须对国民党的政策和行动持批判的态度；（二）我们必须恢复我们党在各地的地方组织；我们必须号召由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回来的同志负起恢复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这一责任；（三）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劳工运动委员会，以便计划和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中央通过

了这三个决议案，并且指定李立三、项英、李启汉和我组成劳工运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上海西区建立了一些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1925年2月，上海的日本人的纱厂中的大罢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十月革命7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题为《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的文章，发表在1924年11月7日出版的《向导》周刊上。我在讨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之后指出：“十月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楷模；中国革命必须遵循这条道路。”换句话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将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大致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我就应由哪个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讨论，尽管通过这场讨论，陈仍然保持他认为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但他已多少修改了自己的这个观点。正在这个时候，中央任命我担任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的主编。我设法把1924年12月出版的那一期刊物搞成了“国民革命号”专刊。那一期专刊除翻译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决议以及列宁的论述之外，还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在这一期刊物出版之前，我把我的文章的原稿交给了陈独秀，请他就此问题写点东西。我的想法是：如果他不赞同我的观点而且想要批评我的话，就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开展公开讨论。

实际上，我的文章是对陈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答复。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相互关系之后，我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它同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密切联系，决不能领导反对这些祸害的国民革命。此外，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必然变成反动的。由此我得出结论说：

“我们分析以上各种阶级……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陈独秀为《新青年》专刊写的文章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他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使国民革命获得胜利；他已放弃了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了。结果，陈和我对于应由哪一个阶级领导革命这个基本原则达成了协议。

1925年1月，中共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写出了一个主张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决议，并且作出了要在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的计划。首先，为了恢复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要召开全国铁路工人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其次，作出了计划，要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便统一工人运动。如果我们把第四次代表大会同第三次代表大会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而第四次代表大会则正式决定，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切工作都应集中于发展工人运动。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共回到布尔什维主义，并且为第二次中国革命创造了条件。

全国铁路工人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2月7日（“二七惨案”的两周年）在河南郑州（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在这里被查封）召开。出席的代表有45人，他们代表工会的12个分部。大会通过了一些关于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决议。这大大地推动了后来铁路工人的斗争。

大致与此同时，上海日本纱厂中发生了罢工。约7万人参加了罢工，在上海西区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罢工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次罢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增加了工资，改善了劳动条件，而且取得了建立工会的合法权利。这是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个伟大成就。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5年“五一”节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281人，代表拥有会员57万人的166个工会。除通过了一些关于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决议之外，这次大会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应当参加民族民主解放斗争，并且必须在这些斗争中充

当领导力量。总之，这次全国劳动大会被灌输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国民革命的信念，并且把这一思想带到工人群众中去了。

紧接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上海日本纱厂中的工人再次举行罢工。这是日本资本家实行反攻的直接结果。他们先是禁止任何工会活动，接着就实行血腥镇压。5月15日，工人领袖顾正红被枪杀。这激起了学生和工人群众举行反帝示威和街头集会，表示直接的抗议。这一反帝运动于5月30日达到高潮，当时有数千学生和工人集合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示威者。英国巡捕举枪射击，示威者死七人，伤数十人。这就是震动了全中国的“五卅惨案”，它是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开始。本书收入的托洛茨基的第一篇文章《莫斯科精神》，就是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它于几天之后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

四、革命开始——共产国际的政策和中共的政策之间的冲突

五卅惨案以后，上海的全体学生、工人和商人举行了罢课、罢工、罢市。这就形成了一个“全民”的伟大的反帝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中共动员全体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领导学生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同时，以各纱厂的工会为基础，不到一星期就成立了上海总工会。这个总工会成了后来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中的斗争的总指挥部。

在上海反帝运动的强烈影响下，每一个大城市，如南京、武汉、北京等，都有学生、工人和一般市民起来举行罢课、罢工和示威；这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真正的反帝热潮。最后，广州的学生和工人群众为抗议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实行的屠杀，于6月23日举行了示威。示威队伍沿着沙基路前进，当到达帝国主义的租界沙面时，英国和法国的武装警察用机枪向群众射击。在著名的“沙基惨案”中，57人被枪杀，170人受伤。

香港的工人一听到英帝国主义在广州的暴行，就举行了总罢

工，而且有许多人回到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它成了华南反帝运动的堡垒，对香港实行了封锁。这是对英帝国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

资产阶级看到上海、香港、广州工人在反帝的民族革命中表现了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坚强的领导，特别是由中共党员在进行领导，它就惶惶不安，迅速地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来阻止运动。最先采取行动的是上海总商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公开改变了工人、（中小）商人、学生联合会的反帝立场，并且命令商人开市。最后它采取了一切阴谋和办法来破坏罢工。资产阶级发现，它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冲突超过了它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于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中反映出来，成了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斗争。1925年7月，国民党的一个主要的理论家戴季陶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强调“民族利益和统一”，攻击阶级斗争的概念，特别是中共领导下的工人斗争。这篇文章表达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希望，它发表之后不久，蒋介石就在黄埔军官学校和他直接指挥的部队中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个组织迅速扩大了，而且专干反共的勾当。

上海资产阶级看到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戴季陶的这一公开的表现以后，就立即采取行动同地方的军阀实行勾结，而且采取了镇压的政策。于是，1925年9月20日，他们就封闭了上海总工会，想对工人的斗争实行釜底抽薪。不过，上海总工会虽然被封闭了，它仍然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它只是转入地下，协助工人的斗争。

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任务》的文章，发表在1925年10月5日出版的《向导》周刊上。根据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我指出：

“想达到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国的工人起来奋斗，起来领导才有可能。上海……是俄罗斯的彼得格勒，俄罗斯的二月

革命以至十月革命都是彼得格勒工人为领导……”

然后，我作出结论说：

“上海数十万工人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在上海总工会指导下，已经学到了许多经验，许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一点：当时我强调工人在五卅运动中的决定作用，而且预见到必须实行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这同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是直接对立的。

陈独秀亲自看到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显示了领导作用。他强烈地感觉到，中共必须以工人阶级作自己的基础，因此，他在《向导》上作了一个公开的声明，号召工人加入中共。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同瞿秋白号召工人、商人和学生加入“我们平民的国民党”的那种宣传完全不同。

当陈独秀批判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时（陈的文章登在1925年8月出版的一期《向导》上^①），虽然他非常有力地驳斥了戴反对阶级斗争的论调，但由于“国共合作”的政策，他不可能公开批判孙中山的反动的反阶级斗争观点。同时，陈目睹了孙文主义学会会员越来越靠近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共活动。这一切都使陈相信：要求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这种政策，只能束缚中共在领导群众方面的独立性。因此，陈曾正式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而仅仅在党外同它进行合作。这个建议是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提出的。但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认为，中共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使整个党落入左派的手中，从而掌握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①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登在1925年9月11、18日出版的《向导》第129、130期。——译者注

这样一来，陈关于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就被拒绝了。这是中共和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政策上的第一次冲突。

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发表了一个浮皮潦草的宣言，表示决心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左派领袖”汪精卫在发言中假惺惺地表示真心实意地对待革命工作并且同中共合作。许多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被增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几个右派被排斥出去了。以“左派领袖”面貌出现的蒋介石第一次被选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全是中共党员。其他如宣传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等等，都有中共党员担任书记。毛泽东就在汪精卫领导下的宣传部任书记。这样一来，“整个国民党”都成为“左派”的了。中共党员已在国民党中央占据“领导岗位”了；但是，不到两个月，这个“左派国民党”就在一个小小的袭击——即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实行的政变面前失败了。

这次的反共政变是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在蒋介石的指使下策划和实行的。在政变的那一天，有50多个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被逮捕。同时，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以及苏俄顾问办事处的警卫部队都被缴了枪，蒋介石在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撵走之后，就建立了他个人的军事独裁。

对于应采取什么政策来对付蒋介石部队实行的这次袭击，中共中央希望从莫斯科得到某些指示。然而，过了3个星期之后，却一无所获（因为斯大林惊慌失措，正坐在一旁观望形势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决定对待蒋的政策。这一政策的要点是：联合国民党的左派以及他们的军队来反对蒋介石；扩充中共党员叶挺领导的部队（至3000人）；武装工人和农民，以便他们能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发挥作用。此外，决定派我去广州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中央委员谭平山和张国焘，广东省委委员陈延年、周恩来和张太雷）去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商讨对付蒋介石

的具体办法。

我于1926年4月底到达广州。此时，鲍罗廷恰巧带着斯大林的指示从苏联回来了。我就立即召开了特别委员会会议，邀请了鲍罗廷参加。当我说明了中共中央对待蒋介石的决议案之后，鲍罗廷强调“当前局势极其危险”，并且以此为理由不让对中央的决议案进行任何讨论。当我建议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只在党外进行合作时，鲍罗廷又寻找借口说，“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应与国民党左派磋商”。总之，鲍罗廷传达斯大林的命令说：不管蒋的三月政变的后果多么严重，“国共合作”的政策应保持不变。他公开提议：中共应接受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局势，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①，同时协助他领导北伐。鲍罗廷安抚其他的同志说：“北伐的成功将来会有利于我们”。除我之外，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所有的委员都赞同了鲍罗廷的观点。这样，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对蒋介石的政策，就被转变为投降蒋介石的政策了。这就为他下一次的政变铺平了道路。这是使第二次中国革命遭受失败的转折点。

陈独秀和我都感到共产国际所推行的这种可耻的投降政策有莫大的危险，但当时还是无法公开反对。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讨论形势并且试图克服这种危险。这次全会于1926年7月中旬召开，当时正是在蒋介石当上北伐军总司令并且发布动员令一星期之后。所以，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而且严重了。陈独秀和我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所有的中共党员都退出国民党，仅仅在党外同它合作，并且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统一战线。我们说明，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共的控制，我们才能实行真正独立

^① 蒋的“整理党务案”的要点是，中共党员不得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不能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中共必须交出已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名单。——作者

的领导工农运动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压力下，以瞿秋白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拒绝接受我们的决议案，但同意把它提交给共产国际考虑。共产国际不但不考虑我们的决议案，布哈林反而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那些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人正如苏联反对派中那些主张苏联退出英俄委员会的人一样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后来写道：

“必须承认，中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案是绝对正确的，它要求党退出国民党并通过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缔结联盟。”（《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1927年4月3日）^①

五、共产国际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使中共陷入绝境

陈独秀和彭述之提出了决议案，要求“所有的中共党员都退出国民党，仅仅在党外同它合作，并且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统一战线”——这一“绝对正确的”决议案最后被共产国际否定了。此后，中共只能在“国共合作”政策的约束下进行活动。这就是中共在1926年7月至1927年3月的大革命浪潮中不得不应付的困难而矛盾的处境。

在这种处境下，中共不得批评孙中山的幼稚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行为。一个更加严重的约束就是，不准鼓吹土地革命，不准号召农民为土地而斗争，不准组织工农兵苏维埃，不准把士兵吸引到革命的部队中来。因为那些做法都是直接违反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的。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的使命就是“竭尽全力去动员工农支持北伐”。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确把工农动员起来，支持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它动员了各条战线上的所有的党员和团员去进行宣

^① 托洛茨基提到的“中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案”就是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决议案，中共中央七月全会同意把它提交给共产国际考虑。——作者

传工作，反对北洋军阀，鼓励北伐军进行战斗。它还把工人和农民组成各种支队，去进行侦察、带路等活动。这些支队还负责破坏敌后的交通（铁路、电线、船只等等），并且在敌人撤退后去收集扔下的武器。在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中有成打的中共党员担任连长、营长、团长。他们都英勇作战，奋不顾身，有些人在战斗中牺牲了。因此，在不到四个月之内（1926年7月至10月），只打了不多的几个硬仗，北伐军的西路军（经过湖南）就已到达长江岸边，占领了华中的工商业中心——武汉。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路军于1926年11月占领了江西南昌。东路军经过福建于1927年2月占领了浙江杭州。所有这些迅速而惊人的胜利，都是由中共党员动员起来的工农群众积极协助的直接结果。

当工人和农民已被动员起来协助北伐军的时候，特别是当取得了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迅速地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例如，湖南在短短五个月之内就组织了许多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400万人。湖南总工会拥有会员约50万人。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有30万工人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建立了湖北总工会。湖北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地开展起来了。大致与此同时，在北伐胜利的影响下，上海的工人阶级由经济罢工转向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并且准备实行武装起义。另一方面，早在1927年1月初，汉口和九江的群众就已自发地行动起来，收回了英帝国主义控制的租界。总之，从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的时候起，两湖的工农运动就如春潮一样汹涌澎湃，摧毁着一切社会关系。工人由争取较好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罢工，进而准备摧毁私有制本身。他们甚至发展到直接收回原来由帝国主义控制的租界。农民，特别是湖南的农民，由争取减租减息的斗争而径直采取打倒地主和绅士、并且夺取土地的革命行动。实际上，在许多乡村里，农民协会成了支配一切的组织。由此可见，革命的浪潮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反革命的代表蒋介石也以同样的速度在进行反革命活动。首先，他翻脸不认人，镇压那些原来帮助北伐军进行战斗并且取得许多胜利的工人和农民。他封闭工会，取消农民协会，暗杀工人和农民的领袖。他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有些国民党左派的省党部同情工农运动，他就实行解散（例如江西的省党部），然后建立他自己的国民党党部。其次，他开始同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军阀进行谈判，企图建立“反赤统一战线”。在上海，他的党羽同一些反动政客（黄郛、郭泰祺等）和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起来，与帝国主义的租界互相配合，施展阴谋诡计来反对工人群众和共产党。1927年3月初，这样的局势已十分明朗，所以当时我写了题为《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这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3月6日出版的《向导》上。该文对危险的局势作了如下的表述：

“中国革命的全部局面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方面革命势力特别是革命军和工农群众的势力异常发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另一方面……在革命的队伍中发生了一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已公开地或秘密地企图与敌人妥协，反对革命民众的利益……这是目前革命中极危险的一个现象，足以毁坏全部革命而有余。”

除了指出总局势的这些严重危险之外，我还揭露了国民党中的蒋介石（当时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者都把蒋介石集团称为“稳健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倾向：

“现时国民党内所谓稳健派便完全表现其资本阶级的色采，他们……已经看见工人农民起来不仅为一般革命的利益争斗，而且为自己阶级的利益争斗，已经看见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向他们表示让步，于是便想停止革命的进行……抑止工农的利益……扶植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

当时蒋介石集团联合一切反革命势力，阴谋打击工农群众和

共产党。事实上，在江西和安徽的许多地方他们已经开始了镇压活动。在这种危险面前，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政策呢？除了实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一个革命的专政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当时中共已在上海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当时我不可能提出来进行公开讨论。但在同一篇文章中，对于武装起义胜利后的政权应当是什么，我已提出了如下的见解：

“中国革命应该创造一个革命的民主制，而绝不应造成个人的军事独裁（蒋介石）……目前革命已经很迫切地需要一个革命的民主独裁统治，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直接参加政权支配政权的民主政治，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真正谋利益的政治，打击一切反革命派并对一切反革命施行独裁的政治。”

在上面的对革命的危险的分析中，我主要是揭露国民党中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倾向和计划。1927年3月18日，我在《向导》上发表了《读蒋介石2月21日的讲演以后》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更加具体地揭露了蒋的反革命活动的事实，其中包括：他的“3月20日政变”，他的个人的军事独裁，他联合一切反革命势力以及同帝国主义勾结，镇压工农群众运动和迫害中国共产党等等。最后，我提出了如下的警告：“中国将来的斗争便是这种革命势力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的决死战”。总之，把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样，就把资产阶级置于任何新的政权之外了。

可是，共产国际对于当时的局势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它对蒋介石的北伐或对他的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的估计又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看看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1926年11—12月间在莫斯科举行）上的讲话。在他的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有两节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当斯大林谈到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时，他声称：

“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5页）

而事实上，蒋领导下的北伐刚开始，它就对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特别是罢工自由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在他领导下的“广东军队的推进”，根本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而是他取得有利的地位以便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的方法。

当斯大林谈到蒋的国民政府时，他强调说：

“问题不仅在于广东政权（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首先在于这个政权是并且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同上，第327页）

斯大林的话同事实截然相反。“广东政权”是“未来全中国反革命政权的萌芽”。“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就是按照斯大林对蒋介石的北伐和国民政府所表明的态度而决定的。所以，全会邀请了蒋的私人代表邵力子参加，承认蒋的国民党是一个“同情党”，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应参加他的国民政府，认为蒋所领导的北伐能驱逐帝国主义，打败它的中国的代理人——军阀，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按照这种想法，中共当然不可能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和阴谋进行任何有效的反击，更不用说准备自己的力量去推翻他了。这样一来，中共就被迫逐渐陷入了无法逃脱的绝境。

因此，尽管中共于1927年3月21日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成功地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占领了上海（除外国的租界之外），而且组织武装的工人维持了和平和秩序；但是，它不可

能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政权。那样的政权会造成一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专政，特别是，会反对和打败蒋介石匪帮策划的政变。它之所以不可能那样做，是因为那会破坏“国共合作”，会干扰“四个阶级的联盟”的路线，尤其是会搞垮蒋介石的北伐的事业。虽然中共已经占领了上海，已经获得了全体工人阶级和多数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及一部分士兵的同情，但是，为了坚持共产国际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的政策，中共一筹莫展，只能同资产阶级合作建立一个上海临时政府。那些“被选进”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进行破坏和捣乱，使政府陷于瘫痪，为蒋的下一步的政变铺平了道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就进入了一个异常艰苦和进退两难的时期。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和我，因为瞿秋白（中央委员）并未事先经中央同意，已于上海工人胜利之后几天到武汉去了。^①陈和我曾多次讨论如何使党摆脱危险的处境。我们感到，如果不加紧武装工人并且同国民革命军中那些同情工人运动的部队建立联盟，我们就无法保卫自己而反对蒋介石正在策划的政变（当时几乎人人都知道蒋的计划了，唯独莫斯科否认有这样的计划）。可是，我们的反蒋的武装斗争的计划，涉及到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即纪律问题。如果实行我们的

① 瞿秋白到武汉去的目的，是要设法由他个人来接管党的领导并且把陈和我搞下台，因为他是一贯维护共产国际的政策。他特别维护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而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当时他写了一本叫做《中国革命问题》的小册子，着重攻击我和我的“不断革命”立场。那是对我写的一篇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的文章的答复。我的文章《列宁主义适合中国的民族特点吗？》发表在1927年1月21日出版的《向导》上。在这篇文章中，我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与十月革命前俄国情况的相似之处。我得出结论说，列宁主义完全适合于中国，因而我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而且指出：“中国革命将直接由民族革命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瞿反驳说这是“抄袭托洛茨基主义”，这样一来，他就同斯大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作者

计划，那就会直接违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对蒋和他的国民党的政策；那就意味着同共产国际完全决裂。关于这个问题，当时陈独秀和我都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于是，我们就把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当时领导上海起义的周恩来找去，一起讨论这个困难的问题。他们完全赞同我们的立场：除了进行反蒋的武装斗争之外，别无其他办法。不过，他们也赞同陈的意见：不能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在这种非常矛盾的情况下，陈独秀就要我去武汉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其他中央委员讨论反蒋的武装斗争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

我于1927年3月底离开上海去南京，因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和第六军驻在南京。这两支部队仍然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部分，是反对蒋介石的。这两支部队中的政治委员都是共产党员；还有许多党员在其中担任其他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所以，我到南京以后，中共南京分部的书记就同第二和第六军中的干部和一些俄国顾问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上报告说，中共中央主张实行武装斗争来反对蒋介石正在准备的反共政变。讨论的结果是，全体赞同中央的计划，特别是俄国顾问们也表示赞同。根据对驻在上海、南京、无锡等地的部队的分析，使用军事力量来战胜蒋介石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就请中央代表下令开始采取反蒋的军事行动。我告诉他们说，如果实行反蒋的武装斗争，那就会违反莫斯科的官方政策，所以中央派我到武汉去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以及其他中央委员讨论这个问题。第二、第六军的干部和俄国顾问们听了这话以后，就催促我立即去武汉；他们在获得讨论的结果之前暂不采取行动。

因为我在南京花去了几天时间，所以1927年4月10日才到达武汉。而蒋介石在4月12日就在上海发动了政变。成千的进行战斗的工人和共产党员被屠杀。工人的组织（工会）被摧毁了。共产党员遭到反动派的追捕。上海和东南的全部工业都被蒋的势力

夺过去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就是他无条件支持蒋领导北伐、隐瞒和保护蒋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希望蒋能成功地消灭帝国主义和军阀、完成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的报应。

六、由蒋介石转向汪精卫

蒋介石政变两星期之后，中共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初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首先把政变列入议程，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以便从经验中得出教训，并且为党制定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本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纳·罗易向代表大会作第一个报告时，他甚至没有提到蒋的政变；他只是着重讲了一番抽象的话：

“国民党内的阶级分化加强了其左派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得国民党变成了由工业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组成的一个革命联盟……中国革命继续在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发展，仍然不能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国民党的一些领导成员参加了此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并且宣称他们打算加强同共产党的联盟。”（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18页）

如果把罗易的抽象的词句译成具体的语言，那么我们会得出：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因此，“四个阶级的联盟”仍然保持着，只是必须撇开蒋介石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国共合作”政策仍然保持着，只是必须撇开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而代之以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党左派”。这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向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的方向。

我自己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着重分析了蒋的第一次政变（1926年3月20日）和第二次政变（1927年4月12日）之间的联系。我指出：后者是前者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在蒋

的第一次政变之后，我们党采取了极端妥协的政策，不仅没有实行任何抵抗，反而承认他个人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特别是花了最大的精力去帮助他领导北伐，在北伐的过程中纵容了他的种种反革命活动，所以，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方法来阻止最近这一次的政变。最后，我呼吁代表大会对这一经验进行详细的讨论。在我发言之后，在大会活动的的一个休息时间，罗易非正式地对我说：“您对事件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过，关于我提出的要讨论政变的建议，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已经接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发表在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上的斯大林的文章《中国革命问题》的稿子。这篇文章在讨论过去的路线时，它声称：“当时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既然“当时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自然就不允许讨论过去路线的错误，尤其是不允许讨论过去路线的产物——蒋介石的政变了。

按照那条“唯一正确的路线”，斯大林作了如下的解释：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我们必须采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203—204页）

罗易的报告，特别是斯大林的文章，束缚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手脚。因此，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问题仅仅限于：如何“加强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如何促使“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

关”；以及如何加强“武汉的革命中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中共自然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态度。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迁就国民党左派的意愿。例如关于当时的一个迫切而严重的土地问题，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屈服于汪精卫的观点：“不得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军官的土地。”这就无异于实际上放弃土地改革，因为“革命军军官”要么是地主，要么与地主休戚相关。

为了“加强武汉的革命中心”，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决定派遣两个中共党员（谭平山、苏兆征）参加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别担任农业部长和劳工部长。形式上，他们应当保护工农的利益，可是实际上，他们是被派遣去抑制工农的任何革命行动。这就是说，去阻止国民党左派宣传的所谓“工农的过火行动”。这样，他们就为后来的反革命进攻铺平了道路。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头一个星期以及它闭幕以后的两个星期之内，两湖工农的革命运动达到了高潮。与此同时，反革命势力也在制定疯狂的计划来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在武汉和长沙，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人群众的生活已痛苦得不堪忍受。此外，许多工厂和商店关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工人和店员不能接受这种情况，所以他们要求把那些工厂和商店接管过来，由他们来经营。农民，特别是湖南的农民，驱逐了许多地主并且夺取了土地；他们建立“农民协会”（农民苏维埃的雏形），掌握了乡村的政权；他们建立了武装队伍，同武装的地主和士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表明：工农的革命运动已经达到了紧急关头，如果要把运动推向前进，就迫切需要把工人和农民联合到一个组织形式中去。而这种“组织形式”只能是苏维埃。另一方面，士兵群众在进行北伐的时候，在作战的过程中接受了工农群众的帮助和影响。但是，他们在反动军官的控制之下，无法与工农群众发展组织联系。而获得这种联系的唯一道路，也是要通过建立苏维埃。

当时两湖的工会会员超过 100 万人。湖南农民协会拥有会员约 1000 万人，湖北农民协会拥有会员约 300 万人。这是一支伟大的有组织的群众的力量。如果当时中共听取了托洛茨基的意见^①，依靠这支伟大的群众的有组织的力量，号召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作为中心的革命组织，并且通过这些武装的苏维埃进行土地革命，给与农民和革命士兵以土地，那么，他们不仅能够把两湖的贫苦群众集合在苏维埃中，而且能够直接摧毁反动军官的基础，并间接地动摇蒋的军队。这样一来，革命就可能从消灭反革命政权的根子开始而发展下去，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前进。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在斯大林的“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下，中共不仅没有建立苏维埃（因为斯大林绝对禁止这样做）和发动土地革命，而且没有告诫工农群众并帮助他们准备一些自卫的措施，如扩大工人纠察队和农民的自卫队，以便对付反革命势力的突然进攻。当时中共的领导仍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汪精卫身上。他们力求同汪“密切合作”，请求他改善工人的条件并开始实行土地改革，而他们则将竭尽全力来控制“工农的过火行动”。例如，为了避免破坏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中共愿意禁止工人和店员接管工厂和商店，同时禁止农民夺取土地，因为这可能把“革命的军官”推上反动的道路。这样一来，一方面，工农的革命行动陷于瘫痪，而另一方面，那些军官却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他们的反革命进攻。其结果是 1927 年 5 月 17 日夏斗寅在湖北的反革命叛变。4 天以后，许克祥（唐生智的部下）在湖南长沙举行了反革命的政变（这些事件是蒋介石 4 月政变的发展）。夏斗寅的叛变被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部队粉碎了，而许克祥的政变则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所以他控

^① 参看《致阿尔斯基的信》（1927 年 3 月 29 日）以及《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1927 年 4 月 3 日）。——作者

制了长沙。从此以后，工农的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一个一个遭到了进攻。

当时中共领导对许克祥的反革命政变采取了什么政策呢？就是它在蒋的上海政变以后所采取的同样的政策；武汉的国民党政府被请求派兵去惩罚许克祥。可是，武汉却请许的上司唐生智去长沙进行调查并且掌握局势。唐在长沙进行“调查”以后向武汉报告说：

“我发现，工人和农民的运动，在其领导人的错误的指导下，业已失去控制，并且已造成了一种反人民的恐怖统治……驻在湖南的士兵起来实行自卫……虽然许克祥的行动是出于正义感，但他已越过了法律和纪律的界限。他应受到记过的轻微处分，但应留在军队中服务。”（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0页）

许克祥“应留在军队中服务”，这就是说，要让他完成反革命政变，直至消灭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即工会和农民协会，并且搞掉所有的共产党人。在此后的几个月当中，许所完成的就是这个使命。当时湖南本来是革命势力的中心，结果却成了最强大的反革命堡垒。

许克祥在长沙实行政变（1927年5月23日）两天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开幕。老实说，这次全会本应讨论长沙政变以后的中国革命的形势，并且作出必要的结论。可是，这次全会对许的政变的反应跟对蒋的上海政变的反映一样：都是竭力加以掩饰。5月24日斯大林在全会上的演说中对许的反革命政变只字不提。他所强调的一切就是攻击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及他们关于建立苏维埃的主张：

“反对派是否懂得现时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假如中国没有像左派国民党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

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胜利，而且不会很快胜利的现在，就把这个费了多年时间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未免太愚蠢太无知了。”（《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2、274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上述引文除了揭示斯大林对已经是反动的国民党左派所抱的“愚蠢的”幻想之外，还进一步表明了他自己对待成立苏维埃的反动的思想。他害怕成立苏维埃会导致“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那么，斯大林对“武汉政府”的评价是怎样的呢？这就是：

“既然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同上，第267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斯大林断定武汉政府“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有一切机会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因此，武汉政府可以代替苏维埃来完成“土地革命”。为了证明斯大林的观点是以莫大的幻想为根据的，我们不需要去看过去的一切事变。我们只要看看许克祥政变所造成的反动的局势，就能认识到斯大林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结果他就给革命造成了最后的灾难。所以在那次全会上托洛茨基向斯大林的灾难性的政策实行了战略性的进攻，并且还直接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发出了呼吁：

“斯大林在这里再次宣布反对建立工农苏维埃，其理由是：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就是进行土地革命的足够的手段和工具。这样一来，斯大林就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而且要共产国际承担责任，正如他过去再三为原来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承

担责任一样（特别是在他4月5日的讲话中，这篇讲话的速记记录自然是对国际隐瞒起来了）。

我们同这一政策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不愿意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者的政策哪怕是承担一丝一毫责任，而且我们迫切地劝告共产国际拒绝承担这种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跟着武汉的领导人跑，而不去建立你们自己的独立的苏维埃，那么汪精卫之流的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就一定会出卖你们。土地革命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汪精卫一类政客在困难的条件下，将十次地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与农民。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政府中的两个共产党人，如果不成为准备对工农群众实行新的打击的直接掩饰的话，就会成为软弱无力的人质。我们对中国的工人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无产者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那么他们就不会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必须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把它们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通过苏维埃把你们自己武装起来，把士兵代表吸收到苏维埃中来，枪毙那些不承认苏维埃的将军，枪毙那些组织暴动来反对苏维埃的官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只有通过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你们才能把蒋介石的多数士兵争取到你们方面来。你们，中国的先进的无产者，如果相信一个由领袖们和小资产者构成的、充满妥协精神的、不到25万人（参看谭平山的报告）的组织，——你们如果相信这样一个组织能够代替包括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那么，你们就是你们的阶级和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徒。**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会继续前进并且通过苏维埃的形式而取得胜利，要么就根本不会胜利。**”（《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篇讲话》，1927年5月24日；着重号是原有的）

假使共产国际采取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并且把这些建议及时寄给中国的话，革命也许就得救了。可是，由于斯大林控制着共产国际并且扣压反对派的文件，所以托洛茨基向工人和农民发出

的紧急呼吁不仅没有传到中国，而且在共产国际的内部通报中根本没有发表。因此，在此紧急关头托洛茨基挽救中国革命的最后的建议，只不过是预言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悲剧而已。

总之，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控制下进行的，所以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就是斯大林的决议。例如：

“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共产党都不应融化于其他政治组织内。共产党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观点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绝不应当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但是绝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理解为跟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首先是农民断绝联系。根据这一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反对那种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反对那种事实上势必导致退出国民党的立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起领导作用，无产阶级也就无法在国内起领导作用。”

决议接着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那种看不起武汉政府，因而实际上否认其巨大的革命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就阶级成分来说，不仅代表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由此可见，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已走上通向这种专政的道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获胜，激进资产阶级同路人被淘汰，一系列的背叛行为被粉碎的情况下，武汉政府必然会向这种专政发展。”（《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联书店版第2册第450、452—453页）

如果给上述决议作一公正的评价，则这种评价只能是：这个决议是幻想与矛盾的混合物，它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看来，斯大林已经发现“革命的左派国民党”跟他的理想并不完全符合，他特别感觉到那些控制着“武汉政府”的将军“不

可靠”。因此，在共产国际全会闭幕的时候，1927年6月1日，他向中共发了一封电报。这个指示包含五条要点，其中最重要之点是：

“应当让大量工农出身的新的领导人加入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去，他们的粗壮的声音将给老的领导人撑腰，或者把他们抛到一边……”

必须消灭不可靠的将军。动员约2万名党员和两湖的约5万名革命工农，组成新军……建立你们自己的可靠的军队……”（罗·C·诺思等《马·纳·罗易中国之行的使命》1963年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第107页。）

但是，如何把“工农出身的新的领导人”放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去呢？我们怎样去“消灭不可靠的将军”呢？我们从哪里弄到必要的武器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可靠的军队”呢？斯大林在他的指示中根本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好像武汉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他能运用独裁的官僚主义的指示来获得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似的。总之，当中共的政治局收到斯大林的指示时，他们惊慌不已，不知如何对待这个指示才好。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召开一个会议，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人人都感到无法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然而幼稚的马·纳·罗易却决定把这个指示转交给汪精卫，希望他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会赞同它的内容。可是当时汪已决定要驱逐共产党了。他看了斯大林的电报以后，它不仅增加了他反共的决心，而且加速了他把共产党人清洗出国民党的计划。

1927年6月12日，汪精卫和其他一些反共官僚去河南郑州同冯玉祥将军一起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反对共产党和蒋介石。冯主张立即驱逐共产党并且镇压两湖的工农运动；后来，他又主张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冯与汪在郑州见面后一星期，就在江苏徐州会见了蒋介石。这次会见之后，冯就

对报界的记者公开宣称：他“真心实意地希望同国民党人合作，来消灭军阀和共产主义”。这就是那个已得到莫斯科的承认并被宣布为“劳动者的儿子”和“最可靠的同盟者”的人的最后的表示。

汪、冯郑州会议以后，“革命中心”武汉的空气突然变得十分紧张，到处都可以嗅到反共恐怖的气味。中共的领导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都感到一个可怕的阴影正在落到他们的头上。似乎一场巨大的灾难已近在咫尺了。1927年6月20日，中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以便应付和避免这场灾难。这次会议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了中共对左派国民党的态度。这个声明是在瞿秋白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讨论以后发表的，其要点是：

“既然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所以它理所当然地居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工农群众的组织应当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

根据国民党的原则，群众应当武装起来。但是工农群众的武装团体应当服从政府之整训。为了避免政治纠纷，武汉现在的武装纠察队可以缩减或编入军队。”（罗伊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2—263页）

不必详加叙述了；这个声明是中共向国民党屈膝投降的最后文件。发表这个声明一星期之后，湖北总工会于6月28日自愿解散了纠察队，把纠察队的武器和弹药交给了武汉的卫戍部队。两天以后（6月30日），中共命令谭平山和苏兆征辞去了在武汉政府中的职务。这一切说明，中共自愿地撤出了战场，并且把工人和农民交给国民党左派去任意处置。

6月中旬，陈独秀感到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已走进了死胡同。因此，他建议：中共应退出国民党，重新估计局势，并且决定自己的独立的政策。但是，共产国际断然否定了陈的建议，它认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把国民党的革命旗帜交给反动的右派。因此，1927年7月初，陈辞去了中共总书记的职务。瞿秋白担任代

理总书记。瞿秋白的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着，看左派国民党对中共作何处置。

1927年7月15日，左派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国民党和革命军中的一切中共党员退出中共，否则将严加惩处。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可耻的结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让我们回忆一下托洛茨基所说的话吧：

“汪精卫一类政客在困难的条件下，将十次地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与农民……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继续前进，并且通过苏维埃的形式而取得胜利，要么就根本不会胜利。”

在不到七个星期之内，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所作的预言就完全应验了。

七、由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冒险主义

斯大林对汪精卫的“7月15日清共”的反应，同他对蒋介石的“4月12日政变”的反应是一样的。他不仅拒绝考虑局势和吸取教训，而且把革命的失败分析为“革命向着一个更高阶段的发展”。这样一来，他就由他以前的使革命遭到失败的机会主义跳到了冒险主义。这就造成了以后几个月当中一连串盲目的冒险主义的武装起义。

1. 南昌起义。汪精卫宣布驱逐共产党人以后，斯大林就急忙忙派他的表兄弟罗明那则去武汉。这个大草包既不对革命失败的严重局势作一点调查研究，也不召集仍然留在武汉的中共领导干部讨论形势和决定新的政治方向，只是把斯大林号召实行武装起义的新指示交给了代理总书记瞿秋白去贯彻执行。这就是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背景。

参加这次起义的武装力量包括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原先属于朱培德的

第三军),共3万余人。这些部队占领南昌城以后,他们就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委员中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宋庆龄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革命委员会”没有任何纲领,也没有实行什么革命措施。此外,起义显然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进行的,所以,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这仅仅是左派国民党反对右派的一次政变。

起义者占领南昌之后不到三天,贺龙和叶挺领导的部队,由于遭到张发奎部队的攻击,被迫撤离。他们向南方逃跑,经一个多月曲曲折折的行军之后,于9月13日攻占了广东的潮州和汕头。在不到一星期之内,贺、叶部队又被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所击溃。贺、叶逃跑了;朱德则带领一小批残部离开广东向井冈山进发,在那里同毛泽东的部队会师,后来这就成了“红军”的基干。总之,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中共的基本武装力量,都被南昌起义的盲目的冒险主义葬送了。

南昌起义失败两天之后,8月7日,在罗明那则的指导下,瞿秋白召开了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实际上,出席的中央委员很少),即所谓的“八七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加在陈独秀和谭平山的身上。这就推卸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领导对中国革命失败的一切责任和罪行。“八七紧急会议”不仅没有讨论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而且决定在两湖发动秋收起义。

2. 两湖的秋收起义。由于许克祥在长沙叛乱,湖南已成“白色恐怖”的世界。几乎所有的工会和农民协会都被摧毁了。剩下的只是一部分躲藏在矿山、工厂和小村庄里的工人和农民干部,他们仍然与工人和农民保持着某些秘密联系。湖北的形势更糟。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武装起义去夺取政权,这如果不说是发神经病的话,至少是幼稚的。实际上,参加起义的人很少。

参加湖南武装起义的大约有3000人。萍乡和安源的矿工和农

民中的干部同中共党员汇合在一起，于1927年9月8日至12日之间开始向萍乡和醴陵等县进发。他们迅速占领了这些县的主要城镇，但在几天之内就被国民党军队打败了。大部分起义者溃散了，只有一小部分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至于湖北的起义，只有通山、通城、蒲圻等南部几个县的少数农民真正参加了。而且，他们很快就被反动的军队镇压下去了。所谓的两湖秋收起义不仅带来了不利的后果，而且有大量英勇的干部被杀害或受伤了。最糟糕的是，许多隐藏在矿山和农村中的干部现在暴露了。结果，中共就失去了同工人和农民的联系，这实际上意味着失去了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活动的基础。

3. **海陆丰苏维埃运动。**中国农民协会的发源地是在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通过农民运动的英雄彭湃的不倦的努力，从1922年起就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两个县的农民协会拥有会员约20万人，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奋斗时期，发展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训练了大批干部。因此，这两个县成了广东的农民运动的典范和堡垒。甚至在李济深按照蒋介石的榜样实行“4月15日政变”之后，海陆丰的农民协会仍能保持自己的权力。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中共党内的冒险主义者选择了海陆丰作为苏维埃运动的试验场所。这是符合斯大林1927年9月30日的报告的精神的。他在那个报告中说：“苏维埃的宣传口号现在必须成为行动口号！”

海陆丰起义于10月底开始，11月1日就占领了海丰的主要城镇。接着，又占领了陆丰的主要城镇以及一些邻县的主要城镇。起义期间，成立了苏维埃，建立了一支农民军队，并且宣布要夺取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约有二三十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参加了这个运动。可以说这是农民实行的一次真正的土地革命。但是，这一运动没有得到广州、香港或其他大城市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或任何支援（事实上，广州和香港的工人阶级本身当时正处在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时期，因为机会主义的政策使它遭到了惨重的

失败)；因此，苏维埃运动完全是孤立无援的。最后，由于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不断的进攻，这个运动就被消灭了。

被杀害和受伤的起义农民的数目，起义失败后没有作过记录。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这就是：这次苏维埃运动流产以后，海陆丰的强大的农民协会被消灭了，成千的农民干部和起义者，不是被杀害就是被赶走了。结果，农民群众又遭到地主和绅士的残酷的剥削和奴役。

4. 广州起义。斯大林看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遭到失败以后，他就命令罗明那则立即准备一次新的起义，而且还派海因茨·诺伊曼到中国去协助计划这件事。从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的一个报告中，罗明那则了解到广州有一部分武装力量（张发奎下面的一个教导团）接受中共党员的命令。此外，虽然省港罢工委员会已被解散，但还保留了许多干部，其中包括以前的纠察队员。因此，罗明那则就选定了广州作为最后一次起义的基地。而恰恰在这个时候（1927年11月中旬），爆发了国民党军阀张发奎（代表粤系）和李济深（代表桂系）之间为争夺对广东地区的控制的内战。罗明那则就利用这一局势，立即命令广东的中共组织在广州举行起义，他还派了诺伊曼去广州直接掌握起义。

广州起义是在1927年12月11日开始的。起义的主力是教导团和赤卫队（由原来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中的工人干部和纠察队组成）。此外，还有数千名党员和工人积极参加了起义。当天就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其代表是党指定的），同时还公布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法令，如：实行大工业和银行国有化；没收地主土地交农民使用；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交平民使用等等。但是，这次起义只持续了三天，就被张发奎和李济深的联合力量扑灭了（他们联合起来完全是为了消灭共产党）。根据国民党的官方报导，在这次起义中被杀害的人数超过5700人。他们恰恰是第二次中国革命中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最英勇的革命战士。

现在他们为斯大林的冒险主义政策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此以后，广州的工人阶级就对革命丧失信心，对共产党抱反感，陷入了一个很长的痛苦和失望的时期。

八、托洛茨基对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

为了帮助年轻的读者比较具体和深刻地理解托洛茨基作出的伟大贡献，我在上面叙述了准备革命的时期一直到第二次中国革命整个过程中中共内部的政策和思想的变化，并且还叙述了中共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于被涉及到的一切问题的讨论非常广泛。所以，年轻的读者要掌握每一个问题的中心以及各类问题之间的联系，那是不容易的。因此，我认为必须对托洛茨基所谈过的，特别是与斯大林辩论过的一些最重要的（而且对于今天最有意义的）问题作一点简单的解释。

1. **每一个阶级对反帝革命的态度。**斯大林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每一个阶级，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到无产阶级，都同样感觉到需要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因而各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将成为次要的。所以他主张把“四个阶级的联盟”作为反帝斗争的基础。

托洛茨基的看法与斯大林截然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不会削弱阶级斗争，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反而一定会加剧这种斗争。他指出：

“认为帝国主义机械地从外部把中国的一切阶级焊接在一起，那就大错特错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并不减弱，反而加强各个阶级的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来源不是扬子江中的兵舰……而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联系……凡是使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站立起来的任何事情，都必然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公开的联盟。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弱资

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种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严重的冲突中都达到流血的内战的地步”。(《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1927年5月7日)

根据以上所作的明确的分析,托洛茨基谴责斯大林的“四个阶级的联盟”的政策是毁灭国民革命的最有效的方法。无产阶级以及农民和城乡的贫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希望,就是要粉碎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妥协的企图。

2. 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各个阶级的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并且实行“党内合作”。斯大林相信,通过这种合作他们能够领导国民革命并且完成其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

托洛茨基对国民党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不管国民党内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或工人、或农民,但它毕竟基本上是一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领导的资产阶级的党。中共加入国民党,那就意味着它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的阴谋中的工具。因此,早在1923年俄共政治局内的一次讨论中,托洛茨基就坚决反对这种政策。1926年,当革命已经开始的时候,他“主张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1927年3月4日,在一封致拉狄克的信中,托洛茨基再次强调中共无论如何必须退出国民党。而且,他还预言:“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将给无产阶级和革命带来可怕的后果。”他的这个预言很快就被蒋介石的4月12日政变证实了。

1927年5月10日,托洛茨基在另一篇文章,即《共产党与国民党》中,详细地驳斥了反对退出国民党的各个基本论点。他进一步警告说:“如果同汪精卫们留在同一个组织内,那么我们就为他们的动摇和叛变负责。”结果,在“我们为他们的动摇和叛变负责”以后,我们就会被汪精卫清洗出来。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实际经验所发展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充分的

独立性是绝对不可少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团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切欺骗，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组织起来，准备武装斗争去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自己的统治，以便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斯大林却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把对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领导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最高领导上。这就是第二次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

最初托洛茨基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又不断地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并且实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可见，托洛茨基完全忠于并且发展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假使当时中共是在托洛茨基的思想的领导之下，那么，胜利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当革命达到高潮时（1927年3—4月），中共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即使当时党（包括共青团在内）只有10万人，但是它领导着300万有组织的工人（工会）和1500万有组织的农民（农民协会）。这是一支占绝对优势的革命力量。它的失败完全是由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我们从中获得的教训是：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它就不能避免失败。

3. 苏维埃问题。如果说共产党是领导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并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参谋部，那么苏维埃就是团结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工具。它是革命的组织中心，是武装群众，实行起义，以及最后夺取政权的指挥所。在夺取政权以后，苏维埃是国家的根本的机关。这就是从俄国三次革命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在建立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列宁着重指出了苏维埃是政治纲领的一个基本的部分。斯大林把这个纲领忘得一干二净，把组织群众和夺取政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一开始，他就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革命的议会”，因此，反对建立苏维埃。蒋介石的4月12

日政变扫除了这个“革命的议会”之后，斯大林仍然认为左派国民党即“革命的国民党”可以代替苏维埃。既然斯大林断言，“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事实上将变成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所以它将解决民族独立和土地问题等这些民主任务。而结果，“革命的国民党”却很快地“变成了”绞杀共产党和工农的刽子手。

根据两次亲自领导苏维埃运动（1905年和1917年）的经验，托洛茨基感觉到，只有通过工农兵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准备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所以从第二次中国革命开始时起，托洛茨基就主张建立苏维埃。1927年3月29日，托洛茨基在致阿尔斯基的信中写道：

“只有通过苏维埃把阶级的力量凝聚起来，才能适应新的革命阶段：决不可迁就往日的组织和政治传统，即今天的国民党所允许的传统……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它与城乡小资产阶级密切合作的形式就是苏维埃，**苏维埃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或政权机关。**

大部分中国国民革命军都没有经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在军官中影响很大。因此，**革命的未来是有危险的。**再说一遍，我认为，除了士兵代表与工人代表结合等等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对付这种危险。”（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以上这段引文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苏维埃的根本作用和能力，特别是托洛茨基在这里指出了国民革命军的巨大危险，并且说，除了士兵代表与工人代表在联合的苏维埃中结合起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对付这种危险”。这个结论具有决定性的和迫切的重要意义。假使当时中共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指导，而且立即在上海建立了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话，那么局势就会改观。当时驻在上海

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同情工人群众的。^①甚至有一个师长薛岳也同情共产党，请求共同反对蒋介石。此外，驻扎在无锡和苏州的归阎冲（Yian Chung，译音）师长指挥的部队，也是反对蒋介石的。在这种形势下，假使中共号召建立工人和士兵苏维埃，那么，蒋介石的部队就可能立刻被击溃，他4月的政变就会被彻底消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正确的政策（如建立苏维埃）十分重要，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蒋介石4月政变之后，托洛茨基更加迫切地号召建立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他详尽地说明了在革命形势下苏维埃的决定性的意义和力量（参看《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他一再指出，只有苏维埃才能使死气沉沉的形势具有生气并且扩大革命的视野。当时两湖已经接近了“紧要关头”。一方面，共产党已经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了。工人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另一方面，士兵仍然受那些与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关系的军官们控制。这就成了一种使工人和士兵互相对立的障碍。为了打破这种极其危险的形势，当时必须建立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这样就能抛弃资产阶级军官的控制，在工农代表和士兵代表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斯大林却坚决反对建立这种苏维埃。他的理由是，如果建立苏维埃，那就会把军官们推到反动的阵营中去。而事实却截然相反。只有苏维埃才能击败反动军官；因为，如果建立了士兵苏维埃的话，反动军官就失去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基础，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对这一点的伟大的证明。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教训就是最近在智利发生的悲剧。

^① 3月21日，即上海工人起义胜利之后的第五天，工人和士兵都选出了代表共约1000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举行了一个大会。第一个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先头部队司令官白崇禧。他发言之后，几乎没有什么人鼓掌。接着，我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发言，受到了所有的代表们的非常热烈的欢迎。这个事例切实证明，工人和士兵对国民党的将军们很冷淡，而对共产党很亲密。——作者

1971—1973年间智利的形势与1927年4—5月间武汉的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正在增长。另一方面，士兵却完全掌握在反动军官手中。这种形势正在接近于摊牌，而阿连德却根本没有想到建立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使反动军官失去自己的基础。他只是把几个将军纳入他所指定的内阁，以为这会缓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事实上，这恰恰给了将军们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方便来组织反革命军事政变。结果，成千的工农战士丧失了自己的生命。阿连德本人也成了自己的政策的牺牲品。这个教训应当写进每一个革命政党的纲领。

4. 革命失败后的战略问题。第二次中国革命完全失败以后，斯大林由机会主义转到冒险主义，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从而毁灭了残存的革命力量，加深了失败的程度。斯大林帮助蒋介石稳固地建立了反革命的军事独裁之后，他突然发现了“第三时期”的哲学。根据这一哲学，世界革命正在日益增长，准备起义去夺取政权，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迫切任务。所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提纲》，给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如下的路线：

“党现在就已经应该在群众中到处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宣传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宣传将来必然要举行胜利的群众武装起义。党现在就已经应该在自己的鼓动工作中强调推翻统治集团的必要性，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示威游行……坚定不移地彻底执行下列方针：夺取国家政权，成立苏维埃作为起义的机关，剥夺地主，驱逐外国帝国主义者并没收其财产……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和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道路。”（《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联书店版第3册第118、124页）

中共后来搞持久的游击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

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进行的。

在汪精卫“七月清共”之后，托洛茨基指出：既然第二次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中共应当采取防御政策。他说，斯大林的武装起义政策只能毁灭残存的革命力量。但是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防御政策称之为“取消主义”，因为它要“取消”斯大林的冒险主义。

当托洛茨基看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为中共制定的冒险主义的战略路线时，他写道：

“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特点是，它不仅具有革命的胆略，而且具有政治的现实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最伟大的任务是要懂得，如何及时地认识革命形势并且彻底加以利用。但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时候这种形势已经完结了，而且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已经变成它的反面了。再没有比打完架之后挥拳头更无益和无聊的了……必须清楚地懂得，现在中国没有革命形势。在那里代之而起的宁可说是反革命的形势，它正在转变为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期。”（《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1928年10月4日）

由于在中国“代之而起的……是反革命的形势，它正在转变为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期”，所以托洛茨基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一个提出民主要求的过渡性纲领，以代替斯大林的冒险主义路线。这个纲领包含一些最基本的民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罢工的权利。所有这些要求包含在一个总的政治口号之内：召开通过普遍、平等、直接选举产生的和拥有全权的立宪会议。党在宣传召开立宪会议时，还必须宣传剥夺地主土地和争取民族独立。这个提出过渡性要求的纲领的任务，是要通过争取日常要求的政治斗争来鼓舞群众的情绪和信心，同时帮助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换句话说，党应当由防御性的斗争逐渐地发展到反对统治阶级的

进攻性的斗争。当革命的高潮再次来到时，就应当建立苏维埃，而且无产阶级应当准备领导农民为夺取政权而斗争。1929年形成的中共党内的左倾反对派的一切宣传和活动，就都是以这个过渡性的纲领为基础。

自然，中共并没有看到托洛茨基的建议，因为当时它处于斯大林的严格控制之下。它只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准备实行武装起义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道路。”所以，从1928年秋天起，中共在江西、福建、湖北、安徽等省发动了许多小规模游击战争，而且组织了“红军”和“苏维埃”。他们甚至宣布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一个时期内（1930—1934年），中共的游击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就迫使蒋介石集中全力来实行围剿，从而造成了一场残酷的内战。但是，1934年秋，在蒋介石的猛烈进攻的逼迫下，中共最后放弃了江西南部的“苏维埃”而开始了“长征”，逃往西北。最后，1935年秋，他们到达了陕北的延安。结果，不仅江西、福建、安徽、湖北的千百万农民被置于蒋介石的残酷迫害之下，有数十万人被杀害，而且丧失了百分之九十的长征部队。长征开始时有30万人，而到达延安时只剩下3万人。

中共的这些残部逃到延安之后，蒋介石立即调遣张学良的东北军（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从东北逃出来的部队）去包围延安，准备最后用武力消灭中共。当时，1935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采取了斯大林的人民阵线路线，支持友好的资产阶级政府。中共为了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并且企图摆脱它所处的军事上的困境，就改变了原来的政策。他们由想要“推翻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为呼吁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便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在蒋介石看来，在抗日之前必须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所以，1936年12月，他亲自去西安视察张学良的部队，准备进攻延安。

蒋到达西安之后,张部队中的少数军官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他们逮捕了蒋介石,并且威胁说要杀掉他。因为他在日本进攻东北时的“不抵抗主义”使他们沦为无家可归。这就是有名的“西安事变”。

当斯大林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时,他认为这是使中共同蒋介石再次合作以便抗日的一个大好机会。他就立即发电报命令中共设法“拯救蒋介石”,并且同他进行谈判以便团结抗日。当时中共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就派周恩来去西安直接同蒋谈判。谈判的结果是:(1)如果蒋愿意领导抗日,则中共保证他的安全;(2)中共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并且放弃土地革命。中共的武装力量将在蒋介石的统帅下参加抗日战争。这就是中共遵循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决议的结果,而且这是经历了十年(1925—1936年)流血斗争、牺牲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而得到的。托洛茨基根据这一结果总结了教训,他在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中写道:

“广州起义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共产国际走上了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民苏维埃的道路,而完全忽视了工业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既然陷入了死胡同,它便利用中日战争,大笔一挥消灭‘苏维埃的中国’,不仅让农民的‘红军’而且让所谓的‘共产’党服从统一的国民党即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38年,载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1974年纽约英文版第98页)

5. 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当第二次中国革命还没有展开的时候,虽然托洛茨基没有明确地主张以不断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但是,在他写的许多关于中国、特别是批评斯大林的文章中,他对种种事件的分析以及他的建议,都符合并且发展了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为中国革命制定的路线则显然符合孟什维克的革命阶

段论。他坚决主张首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然后实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且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

为了首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斯大林硬说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合作”并且建立“四个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为了保持“合作”政策，斯大林强迫中共吹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贯彻实行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斯大林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甚至在蒋介石实行了“三月政变”（1926）并且建立了军事独裁之后，斯大林仍然完全支持蒋介石的北伐。他希望（这显然是一种幻想）蒋介石打败帝国主义和军阀，并且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任务。在蒋实行“四月政变”（1927），大批屠杀中共党员和工农并且投降帝国主义以前，斯大林一直没有放弃对蒋的希望。可是后来，他又希望国民党即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以及武汉政府会完成民主革命。只是在汪精卫抄袭了蒋的“四月政变”、发动了“七月清共”之后，斯大林才放弃了认为国民党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幻想。

斯大林坚决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以便实行独立的革命政策并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是同他的分阶段进行革命的基本立场相一致的。在斯大林看来，这些行动会超越“民主革命的阶段”。由此可见，第二次中国革命是被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的绳索绞杀的。

托洛茨基的立场截然相反。他断定资产阶级不仅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来反对工农群众的民主要求。所以，他坚决反对斯大林的“四个阶级的联盟”和以此“联盟”为基础的“国共合作”政策。他感到这会“给无产阶级和革命带来可怕的后果”。因此，他一开始就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后来又一贯主张让它退出国民党而实行一种独立的革命政策。在革命高潮来到时，他不断地主张组织苏维埃，以

便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党，并且准备在一旦有机会时就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任务，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进行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时候为什么托洛茨基没有公开提倡不断革命的路线呢？主要原因是：不仅斯大林分子歇斯底里地反对不断革命论，而且左倾反对派中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加，也不赞同这一理论。为了保持同他们的合作，托洛茨基认为必须暂不使用“不断革命”这个词；而实际上，不断革命的观点贯穿在托洛茨基对种种事件的一切分析以及对解决问题的一切具体方案中。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的分析，他对四个阶级的联盟以及国共联合政府的批判，他关于中共应保持完全独立和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筑在不断革命论基础之上的具体纲领的实际表现。

托洛茨基第一次公开指出中国革命的不断的性质，是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托洛茨基对由于这次起义而产生的苏维埃政权及其社会主义政策作了明确的分析之后，他得出结论说：在未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将解决民主任务并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

“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在用尽了它的其他一切方法之后，明确地把领导城乡亿万被压迫的穷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州起义虽然时机不成熟和领导者犯了冒险主义错误，然而却揭开了一个新时期的幕布，更确切地说，是今后**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幕布……广州工人禁止了国民党，**宣布国民党各派都是非法的**。这就是说，为了解决基本的民族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都未能产生一股政治力量，一个政党或一个派别，——无产阶级的党可以与它携手合作去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领导贫农的运动的任务已经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直接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了；要真正解**

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于无产阶级手中……第三次中国革命这个根本的、同时是无可争辩的社会和政治前提，不仅表明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它的适用性，而且表明第三次中国革命……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而将被迫一开始就最坚决地动摇和废除城乡资产阶级的财产。”（《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展望》，1928年6月，着重号是原有的）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三次中国革命（1949年），在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异常有利的条件下取得了政权。可是，中共仍然坚持革命阶段论，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了一个联盟（所谓的“协商会议”），而且组成了一个“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他们不仅保护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财产，而且推迟了土地改革，企图实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可是，在阶级斗争的辩证法的逻辑以及国内外敌对阶级的严重威胁（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国内的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反攻）的压力下，中共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采取某些社会主义的措施，如计划经济和实行对外贸易垄断，以便限制资产阶级的活动。他们还使用了“公私合营”的办法（1955）来逐步剥夺资产者的财产权。最后，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宣布现在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表明“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已告终结。所有这一切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的压力下，中共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承认不断革命的规律，把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从而使中国成为工人的国家。这就证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的预言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共被迫服从不断革命，但它是不自觉的，是经验主义的，因而大大地歪曲了不断革命的自然发展。这种歪曲的表现可以在下列事实中看出：中共用无所不包的“人民代表大会”代替工人和

农民的苏维埃，用**官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成了社会经济基础和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消除这种矛盾，使革命进一步发展，消灭一切内部的剥削关系并且把世界革命推向前进的唯一办法，对于中国来说（苏联、东欧、北朝鲜、北越也是如此）这就是要进行一场政治革命来消灭官僚专政并且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6. 对中日战争的政策问题。1937年7月开始的中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是当时国际形势中最爆炸性的因素之一。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利用中日战争而同日本建立了军事联盟。关于中日战争的性质，从日本方面来说，那显然是侵略的、因而也是反动的战争。因此，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进步的，可是它的领导者蒋介石是极其反动的。他不仅是扼杀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而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从1931年9月日本进攻东北时起）他一直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发动了这场企图占领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种极其矛盾的形势之下，在对抗战的态度和政策问题上形成了许多倾向，其中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倾向：极右的机会主义和极左的宗派主义。

中国共产党代表前一种倾向，它以抗战的进步性为根据，不仅取消了“红军”和“苏维埃”，而且放弃了一切民主改革的要求，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在战争中自愿地把自己置于他的领导之下。这是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中斯大林所实行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再版。另一种倾向认为，因为蒋介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所以在他领导之下的抗战就不可能是进步的。这种倾向以为，“中日战争是日本天皇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是反动的。因此，他们主张对抗战采取失败主义的政策。遗憾的是，这种失败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个托洛茨基派郑超麟。在抗战初期，这种倾向影响不大。但是在美国参战的前后，另一个托洛茨基派王凡西认为，如

果日美之间爆发了战争，那么中国的抗战就会被纳入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从而丧失其进步性而成为反动的。于是他用这种“抗战性质改变论”来支持失败主义。从此，在中国的托派组织内部就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激烈的争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托派组织陷入分裂。

对抗战主张持失败主义政策者，决不仅仅是少数几个中国的托洛茨基派：这是一种国际的倾向。例如，在美国，奥勒和艾菲尔就公开反对托洛茨基对中日战争的立场，托洛茨基曾给迪戈·里维拉写了一封信（1937年9月23日），耐心而正确地揭露了奥勒和艾菲尔的荒谬主张，同时说明了他自己对中日战争的基本观点。可以说，这封信中包含着托洛茨基为中国的抗战所提出的战略路线，同时，这又是他对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所作的最后的重大贡献。很值得在这里详细加以引用：

“我在向资产阶级报刊的声明中曾经说过：中国的一切工人都应当积极参加，而且是在第一线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而又一时一刻也不放弃自己的纲领和独立的活动。可是艾菲尔派叫喊说：这是‘社会爱国主义’呀！这是向蒋介石投降呀！这是抛弃阶级斗争原则呀！布尔什维主义曾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现在，西班牙的战争和中日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工农的唯一出路，就是独立地进行斗争，反对两国的军队：既反对中国的军队，也同样地反对日本军队’。这些话是从1937年9月10日艾菲尔派的文件中摘出来的。对此，我们只需说如下的话便足够了：‘我们在这里与之打交道的，要么是叛徒，要么是十足的蠢才。但是愚蠢到这种程度也就与叛逆无异了。

我们从来不对一切战争采取同样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革命斗争，支持波兰人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虽然这两次民族战争中的大部分领导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人物，甚至有时还是封建贵族，……总之，是天主教的反动分子……列

宁写了几百页书来说明：无论如何必须把帝国主义国家和包括人类绝大多数在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区别开来。一般地说‘革命的失败主义’，而不把压迫者的国家和被压迫者的国家区别开来，这就是可悲地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并且用这种歪曲为帝国主义者效劳。

在远东，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我们亲眼看到，日本正在把它变为一个殖民地的国家。日本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中国的斗争是求解放的，进步的。

那么蒋介石怎么样呢？对蒋介石、他的党、或中国的整个统治阶级，我们不要存丝毫幻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爱尔兰和波兰的统治阶级不存幻想一样。蒋介石是屠杀中国工农的刽子手。但是，今天，他违反自己的意志，为了中国的剩下的一点独立，在被迫进行反对日本的斗争。明天，他也许又会叛变。这是可能的。这是显然的。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今天他在作战。只有懦夫、混蛋或十足的蠢才，才会拒绝参加这场战争……

蒋介石能够保障胜利吗？我不相信这一点。但是，开始战争的是他，今天又是他在指挥战争。要能够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便必须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置身于斗争之中。必须在反对外国侵略的军事斗争，反对软弱、弊端和内部叛变的政治斗争中，赢得影响和威望。到了事先无法确定的某个时候，这种政治上的反对立场就可以而且必须转变为武装冲突，因为国内战争跟一般的战争一样，也无非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但是，必须懂得在什么时候和如何把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转变为武装起义……

艾菲尔派蠢才们企图嘲笑这种‘保留’。他们说：‘托洛茨基派想用行动为蒋介石服务，而用言论为无产阶级服务。’积极而自觉地参加战争，并不意味着‘为蒋介石服务’，而是不顾蒋介石，为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服务。用‘言论’反对国民党，是教育

群众推翻蒋介石的手段。一面参加蒋介石指挥下的军事斗争（因为遗憾的是，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正是他掌握着指挥权），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这就是唯一革命的政策。艾菲尔派把‘阶级斗争’政策同这种‘民族和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对立起来。列宁毕生都反对这种抽象的、死板的对立。他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使我们负有责任帮助被压迫民族进行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现在，在世界大战之后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在十月革命之后二十年，那些仍然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应当作为内部的最坏的敌人，从革命的先锋队中驱逐出去。对艾菲尔之类的人就是要这样处置！”（《论中日战争》，1937年9月23日，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历史经验，不仅对中日战争的性质作出了一个明确的分析和判断，而且还给中国人指出了在抗战中的战略方向：“一面参加蒋介石指挥下的军事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这一战略路线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唯一革命的政策”，而且从根本上说，这是在反对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每一个民族都可以使用的政策（被压迫民族反对侵略的斗争往往是被强加在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阶级身上的）。被斯大林主义的党所控制的各工人国家，在面临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这一战略方向。“一面参加官僚制度指挥下的军事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官僚制度。”

托洛茨基对艾菲尔派的“愚蠢”或“背叛”所进行的正确批判，不仅使艾菲尔派遭到了毁灭，而且间接地是对中国少数“失败主义者”一个沉重打击。这就帮助中国的托派组织减少了分裂的损失。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中之所以写关于中日战争以及西班牙国内战争的问题，就是为了提供榜样，并且敲起警钟，反对宗派主义的蠢事。

九、结 论

为了透彻地了解中共所实行的政治路线的演变以及托洛茨基对于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所作的贡献，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说明把中共的历史（直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暗杀时为止）划分为七个时期：

1.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的影响下，中共遵循布尔什维克路线。（1920年至1922年7月）

2. 由于斯大林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中共由布尔什维克路线转向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1922年8月至1924年8月）

3. 中共的一部分领导人，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参加了对工人阶级的运动的领导。（1924年8月至1925年12月）

4. 由于“国共合作”的问题，中共和共产国际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1925年12月至1926年7月）

5. 中共被迫遵循斯大林的孟什维克路线，在革命中遭到了失败。这也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的争论达到了最激烈程度的时期。（1926年至1927年7月）

6. 在斯大林的控制下，中共由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冒险主义；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则由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转到反对他的冒险主义。（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①

7. 中共所发动的冒险主义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之后，在斯大

^① 在西方，是在1935年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斯大林由冒险主义转到了机会主义的人民阵线主义。当时欧洲的许多共产党都紧跟这一新政策。在中国，这种转变推迟了一些，因为冒险主义的时期造成了双方的武装斗争。毛在1936年他的军队到达西北之后，才宣布准备改变政策。从这个时候起，中共就鼓吹民族战线政策，可是蒋介石拒绝合作。比西方的共产党晚了两年，即到西安事变之后，中共才真正实现了向人民阵线主义的转变。——作者

林的指导下，党重新转到机会主义路线，再次实行“国共合作”政策；而托洛茨基则再次由反对斯大林的冒险主义政策转到反对他的机会主义政策。（1937年至1940年）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第六个时期起（即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都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了。它当时的领导人已成了盲目执行斯大林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一部分领导人和某些干部，吸取了革命失败的教训，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在党内组织了一个左倾反对派。从这个时候起，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就在中国开展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最后，托洛茨基在他论述中国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是很值得提一下的。我已经引用过托洛茨基的话：“不研究中国惨剧的方法，也就不可能了解十月起义的方法的意义。”可是，“中国惨剧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斯大林的经验主义的方法以及形式主义的逻辑。例如，当斯大林看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时，他就认为这种压迫对于一切阶级都是一样的。因而，阶级矛盾就可以消除，或者，至少是缓和了。由此他就得出了阶级合作的结论，“四个阶级的联盟”和“国共合作”政策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托洛茨基根据辩证的方法，相信帝国主义的压迫“必然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结成公开的联盟。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弱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种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严重的冲突中都达到内战的地步”。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鲜明地证实了托洛茨基所作的分析和预言，同时证明了斯大林所作的分析和预言的彻底破产。这就说明了在革命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辩证法——具有决定的重要意义。

彭述之

（杨彦君译）

（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8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册）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丛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页数=605

SS号=10156526

出版日期=1998年08月第1版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尺寸=20cm

原书定价=60(精装:76)

主题词=共产国际 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年代: 1926 ~ 1927)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 关系 共产国际(年代: 1926 ~ 1927)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地点: 中国 年代: 1926 ~ 1927)

参考文献格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6-1927 下. 北京市: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编者说明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上）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14日）中国革命问题&布哈林

（1927年4月19日）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

（1927年4月21日）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托洛茨基

基

（1927年5月7日）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

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18日—30日）布哈林的报告

讨论

报告人布哈林的结束语

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

（1927年5月24日）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

二次发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总结（节录）&布

哈林

（1927年5月）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

中国问题的争论（下）时事问题简评（节录）&斯大林

（1927年7月28日）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布哈林

（1927年8月18日）对反对派的批评意见&斯大林

（1927年9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

（节录）

（1928年6月）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托洛茨基

（1928年6月8日）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929年12月10日）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陈独秀

等

(1929年12月15日) 四、附录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李立三

(1929年9月) 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论&罗易

(1929年) 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学术讨论会记录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
&维经斯基

(1930年) 论陈独秀主义&蔡和森

(1931年9月10日) 托洛茨基给伊罗生的四封信

(1936、1937年) 彭述之为《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导言